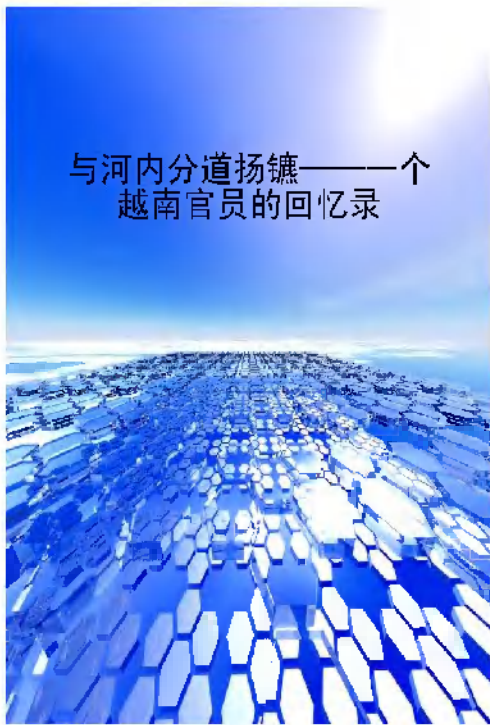


与河内分道扬镳——一个
越南官员的回忆录



与河内分道扬镳

——一个越南官员的回忆录

张如砾

戴维·钱诺夫 段文遂 著

强明 华实 译 声棋 校

世界知识出版社

Truong Nhu Tang
With David Chanoff and Doan Van Toai
A VIETCONG MEMOIR

Random House, New York, 1986
根据美国纽约兰多姆出版社1986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章少红
封面设计：王麟生

与河内分道扬镳
——一个越南官员的回忆录

张如祿

戴维·钱诺夫 段文遂 著
强明 华实 译 卢祺 校

* * *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外交公寓甲31号）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排版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32开本 印张：1.25 字数：20,000

1989年1月第1版 198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012-0146-3/K·26 定价：3.30元

目 录

| | |
|----------------------|-----|
| 前 言 | 1 |
| 第 一 章 家庭圈子 | 3 |
| 第 二 章 与胡伯伯在一起的一个下午 | 11 |
| 第 三 章 我个人的解放 | 20 |
| 第 四 章 回国 | 27 |
| 第 五 章 反对吴庭艳 | 34 |
| 第 六 章 间谍大师阿尔伯特·范玉草 | 43 |
| 第 七 章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诞生 | 65 |
| 第 八 章 加强“阵线” | 82 |
| 第 九 章 城市斗争 | 89 |
| 第 十 章 再度被捕入狱 | 103 |
| 第 十 一 章 春节和一次秘密交换 | 118 |
| 第 十 二 章 南越的第三种力量——联盟 | 131 |

| | | |
|-------|-----------------------|-----|
| 第十三章 | 临时革命政府····· | 142 |
| 第十四章 | 游击生活····· | 149 |
| 第十五章 | 同死神赛跑····· | 161 |
| 第十六章 | 与北方的第一次摩擦·· | 171 |
| 第十七章 | 1972年是分水岭····· | 184 |
| 第十八章 | 巴黎协定的后果····· | 202 |
| 第十九章 | 理论家对一个受害者的 判处····· | 216 |
| 第二十章 | 临时革命政府大使····· | 222 |
| 第二十一章 | 悲喜交加····· | 237 |
| 第二十二章 | 一致与和解····· | 249 |
| 第二十三章 | 一个国家····· | 259 |
| 第二十四章 | 出走····· | 267 |
| 后 记 | ····· | 285 |

前 言

这本回忆录记述了我的革命生涯。在我的回忆录里很少涉及西方世界记忆犹新的越南战争中的某些事件，如溪山的武装冲突；在戊申春节的突然袭击；战俘问题以及在北越部队进攻下西贡陷落时最后一架美国直升机从大使馆屋顶上腾空而起的情景，等等。我知道人们对战争的军事方面抱有极大的兴趣。但它与我无关。我从来不是一名战士，也从未参加过所谓的“暴力斗争”，尽管在监狱和丛林里，在1969年和1970年B-52轰炸机的狂轰滥炸中，我本人经受过一些暴力折磨。作为一个越共“城市活动的组织者及后来的内阁成员，我的活动范围是受到限制的。由于我们斗争的性质，我避开了与我无密切联系的其他各种抵抗工作。

但是，这场战争也存在着另外一方面，即政治方面，越南革命者认为它是首要的方面。近20年来，我直接参加的就是这条战线。我在西贡多年来过着双重（有时是三重）的生活，在西贡的上层和青年中间进行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在被捕入狱和终于被交换回来之后，我移居到丛林里，在临时革命政府总部担任司法部长。后来我又短暂地成为一个外交家，出访过东欧和第三世界一些国家。

我个人对越南战争只能窥豹一斑，因此我对这场革命的

1 “越共”是西方报刊文章及著作中对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称谓

——译者

描述需要其他方面的报道加以补充，包括那些在政治战场的其他领域中活动的人们提供的报道材料，当然也包括那些能如实反映这场战争的军事战场情况的回忆录和历史著作。不幸的是，由于当今的越南迫使历史充当意识形态的奴仆，因而在我国出现这类回忆录和报道的前景是不光明的。再者，这是美国人遭到空前失败的唯一战争，对此他们一直在进行深刻的反省，然而他们只有通过了解那些战斗在另一方的越南人，才能看到这场战争的全貌。

我想，西方对于越共的计划和困难，特别是它的内部冲突了解得特别少。战争的环境以及尽力隐蔽其活动的方式，使这场革命笼罩着神秘的色彩。越共并非铁板一块，其成员的思想动机经常发生剧烈冲突。我们曾经属于越共的政治核心，现在我们许多人都已感到，它的目标最终是被毁掉了。人们的动机、内部的斗争、痛心的决定，这些就是我想在这里记述的。

张如磬

1984年于巴黎

第一章

家庭圈子

当我13岁时，我父亲对我说：“你将成为一个药剂师¹，你大哥会成为一名医生，老三当个银行家，老四、老五、老六都去当工程师。”

由于有福气而生了六个儿子（没有女儿），我父亲作为越南式家庭的一家之主，正在凭借天赐的权力，依靠孩子们的天资和服从来创建一个世界。这是一个充满着幸福——有钱，有地位，有百里挑一的儿媳，有美德——的世界，即一个和谐而富有的，由子女们对父母的孝顺而连结起来的家庭有机体。在我父亲的想象中，有朝一日我大哥琼（医生）将跟我（药剂师）合作，互相支持，发展各自的事业和财产。三个弟弟可以组成家族企业，碧（当银行家的弟弟）负责提供资金。我不想也没有理由对父亲如此决断的任何一项提出疑问。总之，我们居住在西贡市西班牙街一座有许多房间的三层楼里，生活过得既富裕又和睦。

我父亲出身于富裕家庭，他娶的妻子也是来自富有的家庭。我祖父自学成为文人，是一位儒家学者，也是法国殖民政府的一名官员。祖父一定要让儿子受到越南人所能获得的

¹ 在法国殖民地越南的药剂师要比当时在美国的同行享有更多的声誉和收入。——原注

最好的法国学校教育。由于受过法国文化教育，我父亲成了查西劳普·劳巴特法国学院（后来改称为查西劳普·劳巴特公立中学）的教授。但是，他只把教学当作消遣。他从事的事业则是在土龙木的橡胶园和在西贡的印刷所。他的办公室占用了我们家一楼的许多房间。正是这些事业使他能够很好地养育众多子女。

如果说，我父亲的乐趣在于教学，那么，他最热爱的是他的孩子们。对我们的管教、培养和前途是他最关心的。对我们的学习和身体健康所需要的各种东西，他都在家里为我们购置好。当我们长大后，我们的任务仅仅是按照父亲为我们（和他）的幸福而热心周到安排的计划，很好地利用这些条件。父亲所受的法国教育同当地越南教育相比不是那么严厉，这就促使他放弃当时当地大多数父亲对他们的孩子所施行的体罚和专横态度。父亲生性温和且有耐心，再加上他的职业是教师，所以，他花费了无数时间向好奇的六个儿子耐心解释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

在协助父亲养育我们成长的艰辛工作中，我母亲的亲切和蔼和通情达理的品德也影响了我们。为了照管好我们，她负责监管六个中国保姆（每个保姆负责照看一个孩子）。这些保姆住在印刷所后边的一层楼房里。她们一直陪伴我们长到13岁。在越南，有这样一条信念，认为所有中国妇女都热爱儿童——似乎中国妇女一概如此。因此，我们张家象其他有钱人家一样，只要家里需要并且有钱雇得起，就尽量雇用中国保姆。我们的保姆总是陪着我们上学，放学时护送我们回家。她们经常跟“她们的”孩子们交谈，劝说孩子们学好，并且对于彼此的孩子们都这样劝说，好象我们总是一群亲亲热热、吵吵闹闹的孩子们。甚至在我们长大而不需要保姆照

管，而有的阿姨也已成了她们所在家庭的一部分，这时虽然她们更多地忙于家务，但仍用一双喜爱和警觉的眼睛注视着她们以前照管过的人。

阿姨们虽然不乐意，但往往不得和我父亲同时聘用的种种家庭教师一起，共同负责照管孩子。一旦我们之中有谁在学校的这一门或那一门功课上成绩较差时，一位精通这门课程的家庭教师就来辅导，帮助排忧解难。尽管我们六个兄弟都是好学生，但是学校的课程太多，因此这些专家教师中总有几位定期到家里来辅导。尤其受欢迎的是几位音乐教师，他们分别给我们每个人每周上两次课。父亲并没有忽视我们的艺术修养。琼和我年幼时就开始学拉小提琴，老三碧学弹钢琴，将来要当工程师的三个弟弟则学弹曼陀林，我们专门学西方音乐，我们喜爱演奏的，并把它视为我们的一种运动。我小的时候时常怀疑，父亲所说的家庭和睦也许不必认真对待。

虽然家庭和陆是父亲常爱念叨的话题之一，但我发现，祖父对这一观念和其他生活道德原则尤为信守不渝。我祖父住在西贡效区的嘉定。凡是节假日或遇到红白喜事，我们一家和远近亲戚都聚集到祖父那儿，供奉祖先，家族团圆。祖父是这个家族的族长，正如父亲是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家长一样。由于他要照顾这么多人，祖父能做到的只是关心他们最重要的事情，他们的健康幸福和道德品行。

每个星期天，我们大家就到祖父家里去看望他并听他讲儒家伦理。他提醒我们要过有道德的生活，做人要正直和尽孝道。“仁、义、礼、智、信”是他常讲的五个主要的道德原则。讲解时，祖父援引中国古代英杰圣贤的惊险故事和他们的丰功伟绩来说明这些崇高品德，听起来并不抽象，也不枯燥。对我们这些男孩子，他特别告诫，维护家庭荣誉和效忠

祖国是不容置疑的必做之事。我们经常齐唱已经牢记在心中的伦理之歌：“父亲的养育之恩重如泰山，母亲的爱抚之情永不枯竭。”我们深信，这首歌曲是专为我们自己的父母谱写的。

我母亲的家庭宗教背景则有些不同。我外祖父是越南高台教的创始人之一。事实上，高台教徒在西宁建立他们的“梵蒂冈”时，我外祖父献出了自己的300公顷土地。高台教是一种混合性的宗教，教义包含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儒家学说的内容，带有强烈的越南民族主义色彩。我外祖父的第二个妻子是高台教的妇女领袖。我母亲也是高台教的高级成员。她常带我们几个兄弟去西宁朝圣。我很讨厌朝拜仪式，因为祈祷时我们必须躬腰一小时。

我们就这样生活在温暖的家庭环境中。我们的活动天地只是家中二楼上我们的房间、我们的学校以及祖父的住处之间。在幼年时期，家里不准我们外出访友，朋友也不能来访问我们。我们整天只是学习功课和演奏音乐，接受老师辅导，我们孩子们只好互相做伴。为了消遣，除了去西宁旅行外，我们在大叻的山里和圣雅克角（头顿）的海边各有一座房子，每年夏天全家人总要到其中的一个地方去。保姆、厨师、家庭教师、音乐老师都和我们一起去。我们象个小游牧部落那样迁徙。在这种精神与物质都很富足的环境里，在井井有条的安全保护下，我度过了青少年时代。

我在西贡市查西劳普·劳巴特公立中学上学（父亲在那里教书）。这所学校是专门为法国殖民政府官员和最有权势的越南人的子女开办的。我从一开始就喜欢这所学校，且不论父亲培养我们的方式会有什么其他影响，他和祖父使我们都强烈渴望获得知识，而学校的老师也能满足我们学习上的需要，只不过他们是用自己那种强制性办法来进行的。我们

从很小就懂得，生活的目的就是学习，从而成为有教养的人，成为富有的人。学习是手段，有教养和有财富是目的。学校是帮助我们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的必经之处。

在劳巴特学校，我们说和写都是用法语，我们学习数学、自然科学、文学以及所有有关古代高卢人的历史和文化。我们背诵法国地理，了解法国文学、法国人民和法国艺术。我们读了不少有关法兰西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以及科学家和文学家的书籍。我们在本地家乡感触和了解到伟大的世界文明，而这是我们杰出的“祖先们”所创造的。然而，对于我们自己的国家，除了我们在历史课本的最后一部分叙述法兰西殖民帝国的《法国海外省》读过几个章节之外，其他毫无所知。可是，我们的无知并没有妨碍我们，因为实际上我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直到上中学时，我才开始感觉到，至少在某些方面，我是与人不同的。

我开始领略到殖民主义的不可思议是在课间休息时的劳巴特学校操场上。在那里我们进行的体育比赛越激烈，我的越南伙伴和我就越意识到，我们与法国同学不一样，是属于另一个种族。有时被称为“乡下佬”，有时则被叫做“小安南人”，这是法国人对越南人的蔑称。面对这种伤害自尊心的攻击，我毫无准备。开始，我对这种侮辱而感到震惊。震惊很快变成了愤怒，我们的课间休息时常被吵架打断，这反映出许多年龄较大的同学都仇恨这种侮辱。但是由于我受的管教很严，我没有办法弄清楚这种事情。当我第一次由于自己的越南人身份而受到刺激时，我甚至一点也不知道法国人是怎样来统治越南的，也不了解越南同以前的统治者打交道的历史。

在我为当一名药剂师的前程作准备的时候，学校操场上

发生的冲突所带来的刺激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感觉，对我内心的触动显然还是很小的。尽管实际上我喜欢历史，不太喜欢化学，我还是于1943年开始在格拉医院学习药理学，第二年又赴河内进一步深造。河内大学是法国人认为适合在越南建立的唯一高等学府，而我父亲的想法是，它是得以接受法国大学教育的可靠阶梯。琼大哥在我之前已赴巴黎学医。我在北方完成学业之后，也要到巴黎去同他会合。

这一年过得很快而且十分愉快。虽然我对修道院式的培养方式并不太反感，但是我更乐意走出家庭、学校和密友圈子，以便探索新事物。在这段经历中出现的唯一不和谐是，我日益觉察到自己内心并不想当一名药剂师。我父亲对这个消息将会作出怎样的反应呢？我还未找到答案。但在1945年夏季，当我回到西贡时，这种潜在的不孝的最初的暗示便给我惹出了麻烦（以前未曾预料到）。几乎在同时，我个人内心的疑虑不安却在现实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中淹没了。

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通过无线电广播，宣布日本向盟国投降。不论这个事件给世界其他地区带来了多大喜悦，它给越南却带来了混乱。8月17日，在北越，驻在东京湾的游击队进入了河内，准备发动群众起义，从战败的日寇和法国维希殖民当局手中夺取政权。几天之后，民族解放委员会成立并控制了局势。9月2日，该委员会主席胡志明在河内巴亭广场向拥挤在那里的广大群众宣读了《越南独立宣言》。胡志明宣告，“人人一律平等”，“他们具有不可剥夺的天赋之权，……同胞们，你们听清楚了吗？”就在胡主席迅速取得群众支持以巩固政权之时，包括美国、英国、中国和自由法国在内的盟国各方正在考虑决定如何最有效地维护各自在越南的利益以及如何对付在河内自封的新主席。

我刚学完一年药理学回来，河内发生的事件和随之而来的国际上的动荡不安，对我来说好象是在另一个星球上发生的事情。我只知道西贡也沸腾起来了。八月革命正在迅猛发展，在我周围不断地举行群众集会和上街示威游行。到处都是宣告“越南属于越南人”的种种传单，到处都在高举各种标语和旗帜，到处都在发表鼓动性的演说，这一切使西贡全市充满了欢欣鼓舞的气氛。在一次大示威中，一名越南大学生遭到枪杀，这立即激起全城极大的愤慨。在西贡每个街区，建立了“先锋青年”组织。由于卷入了激昂的爱国主义浪潮中，并且受到了时局危机感和争取独立思想的激励，西贡所有的青年似乎都参加了这个青年组织。我内心确实也充满了同样的激情。我毫不怀疑我该做什么。当时，我既不关心也毫不了解各种民族主义党派集团之间正在猛烈进行的政治角逐。于是，我就跑到“先锋青年”组织的办事处去报名参加，并且得意洋洋地把父亲的鸟枪扛在自己肩上。我在那里还发现，这支枪（虽然我没有装上子弹）和我受过中学教育的资历竟然使我自动成为本街区青年组织的小分队队长。因为别人的武器都是些竹棍。我跟我的朋友艾尔伯特·范玉草在一起。他有一辆摩托车。我已完全准备好带领他们投入战斗。

不久命令就下达了。8月21日，西贡市民全都涌上街头，浩浩荡荡的群众队伍从城市的这一头游行到那一头。这些群众来自各个党派、群众团体和宗教派别，还有大批普通市民。他们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法国殖民者！”。街头三三两两分散的法国人受到了攻击和殴打。少数地方发生了群众歇斯底里的私刑拷打事件。我曾看到附近的一伙“先锋青年”围攻一个法国人，他拼命挣扎力图摆脱棍棒和拳头的猛击。我当时跑上前去想把他拉开。残酷殴打无辜的外国人，这不

是我想要的爱国主义。由于我对这种狂热的仇恨行为感到震惊和憎恶，我把手里的枪交给了艾尔伯特·范玉草，垂头丧气地回了家。回到安然平静的家庭环境里，我才能仔细反思自己同革命“光荣”的这一短暂的小小接触，并对不久将能得到去巴黎生活的机会感到极为高兴。

第二章

与胡伯伯在一起的一个下午

但是，在1945年那个动荡之年里，一切都无法确定，就连父亲为我安排的学习计划也是这样。这年3月，日本正式把设在西贡的徒有其名的法国维希政府的招牌摘了下来，而美国的反应则是轰炸西贡。考虑到这类战争行动还在进行，并且预料还会出现不断的暴力行为，父亲决定把全家迁移到省里去。因此，我没有动身去巴黎，反而到了槟榔省。我是跟我父亲一位密友的漂亮女儿一起沿着田野，经过长途跋涉才到达槟榔的。我父亲的这位密友是一名医生，也是个大地主，我们就在他家住下了。

我开始享受乡村悠闲的田园生活，而当时整个南方却处在一片混乱之中。在西贡，9月份成了流血月。9月2日爆发了反法起义。随后，盟国授命英国远征军赴越南维持秩序，并解救自3月以来被日本人监禁起来的法国军团。9月22日，法国军团带领法国侨民在整个西贡商业区肆行屠杀，将其洗劫一空，而且占领了市政厅、监狱和警察局。法国人的暴行激起越南人的愤慨，9月24日，西贡爆发了总罢工，而且在这天拂晓，一些法国人的住宅区受到袭击，死伤达数百人之多。一直到10月中旬，新的法国殖民当局才能在表面上维持西贡市的秩序。而这时被赶到各省去的越盟和其他民族主义

组织决心进行不屈不挠的游击战，抵抗从西贡开来的法国正规军。

由于隐居在槟榔省，再加上我这时整天在想一桩心事，因此，我没有接触到西贡发生的事情。我参加过8月的歇斯底里的暴乱，就我个人来说，这次经历就足够了。为了照看(注：原文为“在城里的中国保姆”)在西贡西班牙街上的房子（两个中国保姆在城里负责照管空房），我和几个朋友经常骑车去西贡城里。除了这些旅行外，我生活在世外桃源里，享受着乡间生活的慢节奏，并且沉浸在坠入情网的喜悦中。

我们过的这种隐居般的愉快生活到3月才告结束。那时胡志明和法国谈判代表琼·圣蒂尼共同达成了一项关于在法兰西联邦之内越南独立的临时协定。鉴于社会又恢复了平静与理智，父亲终于带领全家回到了西贡。我也重新开始实行去年秋天未成行的去巴黎求学的计划。就在这令人兴奋的日子里，我和我的女朋友正式订了婚。我们两家对这门亲事非常满意。此后不久，我就登上海轮，开始了去法国的漫长航行。同行的还有一些越南学生，他们的父母也都是有权势和有远见的人。

我们终于在法国土伦港登岸，接着，又乘火车到巴黎。在巴黎北站，我们受到一个学生接待委员会的欢迎。他们把我们送到大学，并在印支学生宿舍区给我们安排了住房。两天后，公寓楼长邀我们参加一个聚会，在那里，将介绍我们同一些越南代表认识。这些越南代表正在法国参加在枫丹白露宫举行的会谈，以便最后确定胡志明——圣蒂尼协议。

在约定时间，在场的几个身穿制服的人对我们说，他们是胡志明主席派来的，向我们转达胡主席“对你们最热情的

问候，并且热烈欢迎你们到法国来”。他们同时邀请我们在第二天上午11点与主席会见¹。我们对这个邀请毫无准备，大家小声议论起来。坐在我身后的一个人小声说：“胡志明是谁？”另一个人回答说：“我不知道，我没听说过这个人。”第三个讲话的人有点政治常识，说道：“喂，注意，他是主席。他正在为争取（越南的）平等权利而向法国人谈判。我们必须见他。”

第二天上午10点整，一队小轿车开到宿舍区，把我们送到蒙德莫梭西胡志明居住的一幢乡下房子门口。这幢房子属雷蒙特·奥巴拉克所有，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是马赛地区抵抗运动的领导人。他接近法国共产党。他的妻子是法国国民议会议员，与胡志明的关系密切。当车队停在这幢房子门前时，我们看到一群人站在台阶上正在迎接我们。站在中间的是一位瘦弱的老人。有人向我们介绍说，他就是胡主席。与他在一起的有范文同和其他革命领导人。这些人我们一个也不认识。

1 尽管我们当中很少人知道胡志明的情况，但在枫丹白露官会谈时，他已经56岁的人了，参加革命已36多年。1917年，胡志明离开越南赴西欧和（根据一些报道）美国，干过各种工作。他在轮船上当过几年，后来又做过劳工和园林工人。有一段时间，他在伦敦的卡尔顿旅馆有名的法国厨师长伊斯科费尔手下任助理糕点厨师。1917年他在法国居住期间，开始为争取越南的权利而进行宣传鼓动工作。他原来与法国社会党人有联系，1920年他成为法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想象它在殖民地问题上的态度会更积极一些。他曾受共产国际派遣赴中国南方，组织那里的越南大学生和持不同政见者。他的活动象他的许多化名那样多种多样。他编写小册子，吸收新成员，担任编辑工作和组织工作。他幼时取名阮必成。他用过各种化名：尼罗夫斯基、三和阮爱国。最后取名胡志明。在离开越南30年后，直到1941年他才回国并开展游击运动来反抗日本占领者和法国维希傀儡政

我好奇地望着胡志明，立即被他的外表所打动，与其他穿西装的人不一样，胡志明穿的是一件旧的高领中山装，脚上穿着一双橡胶凉鞋。聚集在他身旁的年岁比他小的人，神色有些紧张。和别人比起来，他显得衰弱，几乎是一副病容。但是这些印象只是更衬托出他那充满全身的沉静端庄。我从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对人的外表特别敏感的人，但是胡志明身上透露出一种内在力量和宽容气度，我象受了一记猛击，震动了全身。他直视着我和其他人，目光亲切而热情。

我几乎条件反射般地联想到我的祖父。他同样善于交流自己的智慧和思想，通过这种交流，他向我们宣扬儒家生活的价值。当胡志明伸出手臂一挥，象是招呼我们围过来时，我吃了一惊。他说：“来吧，我的孩子们”，随即就坐在台阶上。我们俩着他坐下来，好象这是人世间最自然的事。我坐在他身旁，对这个引人注目的人物怀着学童般的崇敬，他太象我的祖父了。我只对历史书里的英雄人物，如甘地、孙逸仙、特别是林肯，才产生过这样的感情。我陷入沉思，没有注意观察我的同伴们。我的印象是，他们也被胡志明深深地吸引住了。胡志明要我们叫他“胡伯伯”，不要叫他“主席先生”。然后他挨个询问我们每个人的家庭、姓名、年龄、籍贯和学习情况。他还询问我们对越南独立有什么看法。但是，对这个问题，我们大多数人只有很模糊的认识。我们当然希望自己的国家能赢得自由，但仅此而已。我们几乎做不了什么。

在我们这群学生中，有的来自祖国的南方、有的来自北方和中部地区。当胡志明了解到这些情况时，他温和而非常热情地说道：“瞧！你们都是我们越南大家庭的青年。我

们越南是一个整体，我们的民族是一个整体。你们一定要记住，海可枯，石可烂，越南将永远是一个整体。”这些话西方人听起来也许觉得不自然，而我们听起来却非常激动。越南领袖们经常引用这些口号以及诗歌般的语言，以动员人民投身政治事业。胡志明接着又说，在他出生时，越南就是一个受奴役的国家。从青年时代起，他就一直在为自由而斗争。现在，我们很幸运成了自由独立的公民，而我们的父母和祖父母则没有享受过这个幸福。80年的奴役已经使我们的国家衰弱了。现在，重建祖先留给我们的这份遗产、摆脱我们落后状态的时刻来到了。如果我国人民希望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取得令人尊敬的地位，那么主要就要依靠我们，依靠我们努力钻研、学习，为民族大家庭贡献力量。

胡志明以他令人感动的坦率向我们传达了充满热情和理想的民族主义的信念。他为我们创造了一种祖国大家庭的气氛，同时指出了在伟大爱国行动中我们能起的作用。不到一小时的功夫，胡志明就赢得了围坐在他旁边的我们每个人的心。

一星期以后，主席的一位秘书来到印支学生宿舍，通知我们说，胡伯伯邀请我们中的两名南方学生代表（一男一女）与他共度一个下午。当时我们问为什么要南方人去，秘书说，因为南方人在反抗法国重新征服的斗争中，受苦最深。结果大家推举我和另一位学药物学的李小姐去同胡伯伯一起喝茶。

我们又一次乘车来到蒙德莫梭西的那幢房子前。这次我们被带进起居室，室内陈设着笨重黑色家具。最显眼的是一张大桌子，我们断定这就是代表团的办公桌。这时屋里没有别人，我们站了几分钟，看了看家具摆设，就在大桌旁坐下

来等候。不一会儿，我发觉一只手轻轻地搭在我头上，一个人站在我背后说：“我的孩子们，我非常高兴你们给我带来了英雄南方的温暖宜人的气息。我们喝些茶，一起谈谈吧。”于是，胡志明在我们对面坐下来。他说：“记住，我只要你们称我伯伯。”

胡志明一下子就打消了我们的拘束，使我们感到好象坐在自己家里的桌子边。我们没觉察到桌上的茶是什么时候刚好端上来的。我们忙不迭地向胡志明介绍自己的家庭和个人经历。我还没有详谈自己的历史，胡志明就插话说，他敢打赌，我祖父受过中国的传统教育，并且是位儒家学者。至于我呢，脑子里则可能塞进了不少孔孟之道，并且可以断定，我的汉字一定写得不错。他猜测我父亲受过法国文化教育，法文写得比国语好（国语系指引进罗马字母的越文，在19世纪为传教士亚历山德拉·德·罗德斯所创造）。对这些我都很钦佩地作了肯定。

他说：“好啦，我的孩子。我觉得你的名字有点问题。我看，你的名字一定是你祖父给取的，你兄弟们的名字也是他给起的。（在越南，传统上由祖父为孙子们取名）。你已经告诉我你兄弟的名字。你兄弟名字的汉字都带有‘宝石’的部首。我可以肯定，你祖父想把你们都命名为宝石——张氏宝石家族。因此，你的名字实际上应该叫做‘TOAN’（钻），不应叫做‘TANG’（磬）。你知道，‘磬’的意思是一块大石头，而‘钻’才是一种宝石。”说完后伯伯又要我把自己名字的汉字写给他看。大家一起看着这几个字，都承认，他判断得对极啦。

胡志明又把话题从我们的家庭引到国家。他讲到我们祖先反抗中国人和蒙古人的历史和光荣传统，谈到击败这些侵

略者的我国伟大英雄：陈兴道¹、黎利²、阮荐³和光忠⁴。然后他说，法国人把越南变成一个奴隶国家，为了法国的利益使越南人民陷于落后状态。我们的国家遭受着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双重剥削，但现在，人民已经团结起来，为争取民族解放而在进行伟大的斗争。

他谈到了八月起义，并作了一些分析，使我弄清了曾经目睹过的一些事件。他说，现在他正在跟法国人谈判。但斗争是一个长期而艰苦的过程。我们唯一的力量是我们自己的勇气和意志，以及对祖国的热爱。他又强调说，我们的斗争不仅是反对侵略，而且是要扫除我国同胞所蒙受的愚昧和贫困。他说道：“没有什么东西比独立和自由更宝贵。”（这句话我是第一次听到，最终它成为胡志明所有口号中最著名的口号。）

那天下午，胡伯伯在喝茶时给我们上了一堂短短的越南历史课。他话语中穿插一些小幽默、传奇、轶事和伦理故事，寓教于乐。他的教导是传统越南式的，这一切都使我们感到非常轻松和愉快。我曾在一个星期天，到我祖父那里听过一

① 陈兴道又名陈国峻，又称兴道王。他是越南国王陈日烜的堂兄弟。公元1280年前后，当元朝军队假道越南进入占城（元朝统治时期，越南岷港以南是占城国）时，陈兴道奉国王陈日烜之命，率兵阻击元军，取得胜利。——译注

② 黎利原是越南清化府俄乐县巡检。公元1418年3月，他在他的故乡蓝山发动反对明朝统治的起义，并宣布自己为“平定王”。此后，他先后几次打败明军。1428年1月，他终于把明军驱逐出去，并于同年5月即位，国号“大越”，建元“顺天”，称黎太祖。——译注

③ 阮荐系黎利手下一名将领，起义后，他与黎利一起在蓝山山区建立根据地。——译注

④ 光忠系阮文惠称帝的年号。阮文惠，原为越南农民起义领袖。1771年春，他与他的兄弟阮文岳、阮文信在归仁府发动了农民起义。1788年阮文惠称帝于顺化，其年号称光忠。1789年他击败清军，同年3月他遣使入关请和，清朝封他为安南国王。——译注

次课，但不同的是，祖父讲课的内容总是伦理道德，而胡志明讲的却是政治和革命。

访问结束时，胡伯伯告诉我们要专心致志地学习，这样才能有自己的前途和幸福。他说：“如果你们把掌握的知识奉献给祖国的未来和人民的幸福，那就更好了。”胡志明在拥抱我们时激动地说，“南方永远在我心中。”在我们向他告别时，他送给我们每人一张他的照片。在给我的那张照片下面写着“给亲爱的侄子‘钻’留念——胡志明”。

从那天下午开始，我一下子变成了胡志明的坚决支持者。我为他的朴实、魅力和平易近人而折服。他的文化修养与火热的爱国主义精神为我今后的生活树立了学习的楷模。那个下午把我的学习和理想结合到了一起，而以前它们是毫不相干的，而我也从未能清楚地看到它们的统一。现在，知识价值、美德和对祖国的忠贞已在我身上以某种方式结合成一个整体。我能看见这二者结合得多么好。我开始憧憬自己将来成为一名独立斗士，只是它还有些朦胧。虽然我对胡志明的过去、他的政治和他的活动一点也不了解，但胡志明的个人品格的力量却成为我生活的转折点。不单单是我一个人，几乎所有留法的越南学生都受到胡志明的激励和影响。在9月2日到来时，我们热烈庆祝越南独立纪念日。当胡志明离开巴黎返回越南时，我也置身于那些热情的群众中，欢送他离开里昂车站。

从那时起，我常有机会坐下来思考胡志明性格上自相矛盾的地方。他是民族主义者、人道主义者、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马基雅维里主义者¹，又信仰儒家学说，这些正是他非

¹ 马基雅维里（1469—1527），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主张在意大利结束分裂，建立统一、强大的君主国家；为达此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就是所谓“马基雅维里主义”——译者

凡性格的特征。他取得成功的不可否认的因素之一是，他能以谦逊和热情来感染人。胡志明在许多更重要的场合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我同他在蒙德莫梭西的会见只是其中一个例子。但是这件事可作为一件事例说明，他很重视建立和培养个人关系，而且也表现了他那总是着眼于未来的决心。就在他邀请我和李小姐共进午茶的时候，他的内心一定非常沮丧。因为在枫丹白露宫举行的关于越南独立的谈判以一场个人灾难而结束。由于法国人最终背弃了在越南时对胡志明作出的允诺，什么也没有给他。当我们这些人从印支学生宿舍区来到越南代表团驻地会见代表团时，代表团中的大部分人实际上已准备启程回国，只留下胡志明独自设法争取一些至少能保住面子的让步。甚至当这样的目的也达不到时，胡志明知道他无论如何将面临本人政治上失败的可能，而最好也只能是进行一场流血的艰难的战斗。就是在这种压抑的思想情绪下，他花了整整一个下午，同两个来自南方的青年学生坐在一起，亲切交谈。很难想象世界上其他领袖能够在这种情况下，做出这样的事来。

第三章

我个人的解放

我甚至在开始学习药剂学时，也在兴奋地、以一种对我来说是全新的方式思考着自己的祖国。在越南耳闻目睹过的一切，如法国的行政官员、法国家庭的特权地位、农村的贫困、种族的偏见，对所有这些都开始用新的眼光来看待。我猛然领悟到，这些东西并不是宇宙中的自然规律。相反，有一个理由、一个可以理解的模式是经得起分析的。越南民族从属于法国的地位可以理解成是一种历史和社会现象，人们如果有适当的武器，是可以同这种现象作斗争的。不久以后，我就把大半天时间花在国立政治学校（不久就改名为政治学院）的图书馆里，贪婪地阅读一切所能看到的有关政治学，特别是有关殖民主义的书籍。

在我开始注意越南政治形势的同时，我对法国的看法有了改变。对一个受过严格管教和殖民统治压抑的青年人说来，1946年的巴黎，吹着一股凉爽的北风。我正好生活在第四共和国的政治动荡时期。随着每天对政理解加深，我越来越感到法国大革命的理想似乎正在我眼前浮现。在我钻研政治理论的时候，政治上精力充沛的法国人正在讨论通过一部新宪法。社会党人、共产党人、共和党人和其他各种不那么热心的人都卷进了这场政治争论，这使原来不关心政治的人

感到惊奇。随着政府的更迭和联盟的改组，民主政治的全部机制暴露无遗。我迷恋法国文化，现在又完全被法国政治生活中显示出来的精神与活力强烈吸引住。我热切希望，通过胡志明和法国海外领地部长马里乌斯·莫特达成的临时协议，我国同法国之间能产生兄弟般的合作。同时我决定参加争取越南独立的运动，这个运动正渗入巴黎的街道和辩论大厅。

在这令人兴奋的新生活里，我收到发自我旧日世界的一封信。这封信是父亲写给我的，他以家长那慈爱而温和的口气，告诉我他的决定：我的婚姻大事不会被无限期推迟。明年夏天，我的未婚妻将与她的父亲一道来巴黎。父亲写道：对我说来，别的不用操心，只需要完成药剂学业就行了。然后，拿到文凭，我就能马上步入等待我的黄金般的未来。

父亲的通知使我陷入矛盾之中。我并没有准备放弃我的颇有进展的前程，而且孝顺听话的意识在我脑子仍然根深蒂固。但是，我也不准备放弃我到法国以来所形成的思想。无论父亲对我的问题怎么看，结婚在我头脑里并不是占第一位的事情。而且，结婚将给我在法国的宁静和文明的生活带来很大干扰。我目前正在学会适应不依赖他人而独立生活。我几乎陷入莎士比亚式的窘境：要么同意结婚，要么拒绝。我无法确定选择前者还是后者。

当我向政治迈出第一步的时候，我还是没有消除这种矛盾心理。我开始参加旅法越南人协会举行的会议，后来又参加了它的活动。最初的反对破坏越南和平的示威游行和会议讨论我也参加了。我知道，自己这样做是违背父亲最大意愿的，与他给我的明确指示更是背道而驰。我现在走上了叛逆的道路。为了解决矛盾，在这个学期里，我放弃了我的药剂

学专业。转而报名到国立政治学校学习。从此，我就在那里劲头十足地听课和参加讨论会，从中长了不少见识，弥补了许多书本上得不到的知识。我开始在头脑中想象按照日本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奇迹般实现工业化的方式，建立一个彻底西化的越南。我认为越南虽然刚刚获得独立，但拥有勤劳智慧的人民，似乎没有理由不从世界政治和经济文明中取其精华，如美国的经济思想，德国的科学精神，以及法国的民主热情。

就在我热情而艰苦地探索越南前途的时候，越南国内的实际情况却在迅速恶化。1946年11月20日，海防街头发生了流血冲突，胡志明与莫特赞同的法国与越南部队之间的停火协定随之失效。几天之后，法国人凭借坦克、飞机以及停泊在海防港的军舰上的大炮，重新发动进攻，造成大批平民伤亡，居民纷纷逃离该市。一直到12月，似乎仍然看不到有和解的迹象。甚至在社会党人莱昂·布伦^①（胡的老朋友）上台执政时，也没有阻止局势向战争无情地迈进。胡志明最后一次要求谈判的呼吁没有被理睬。设立在西贡的法军统帅部很可能故意拖延向巴黎政府传递这些信息。在别无退路的情况下，12月19日，胡志明向人民发出了一份呼吁书：

“全国同胞们！”

出于对和平的热爱，我们作出了让步。但是我们让的越多，法国殖民者就越得寸进尺。因为他们一心想再一次侵略我国，我们绝不能答应！我们宁愿牺牲一切，也不愿丧失祖

^① 莱昂·布伦（1872—1950年），法国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理论家。1920年法国社会党都尔代表大会时是党内反对加入共产国际的少数派代表，社会党分裂后为工人国际法国支部领袖，1935年同法共建立人民阵线，曾任该阵线政权政府总理，1946—1947年任法政府首脑。——译者

国的独立，回到受奴役的地位。

同胞们！站起来！

男女老少，不分信披、政治派别和民族，所有越南人都一定要勇敢地向法国殖民主义者开战，拯救祖国。有枪的拿枪，有刀的拿刀。没枪没刀的带上你的铁锹、锄头和棍棒。每个人一定要奋起反抗殖民主义者，拯救祖国。

士兵们！自卫队员们！民兵们！民族解放的钟声敲响了！我们必须不怕牺牲，准备流尽最后一滴血来保卫祖国。无论有什么艰难困苦，我们都要咬紧牙关，坚持到底。只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胜利就一定就是我们的！

独立和统一的越南万岁！

抵抗战争胜利万岁！”

在巴黎，我越来越多地参加反战争鼓动工作。同时，我开始集中阅读军事和外交方面的书籍，特别注意有关殖民主义的著作，对我来说，这是个大问题。马基雅维里的《演说集》，塔列朗的《回忆录》，克劳塞维茨的著作以及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我都研读过。那时在法国知识界，马克思主义风行一时。我受到影响，读了列宁和斯大林论述矛盾的书。列宁写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给我的印象很深。它对越南民族主义的正义性是一个极好的阐明。我开始逐渐懂得了法国坚持不让步的经济原因，以及英国如此热心地支持法国在战后重建其殖民统治是由于担心它自己的殖民帝国崩溃。我第一次发现法兰西的民主理想与她的帝国主义动机之间存在着矛盾。我感到震惊的是，民主国家根本不支持殖民地被压迫人民的正义斗争。

我父亲对我参加政治活动、放弃药剂学校的学业早已深感不安，他开始威胁要断绝我的资金供应。为了使我回心转

意，我的未婚妻在她父亲陪同下启程来巴黎，以便我们正式成婚，他们认为，有了妻子温柔的劝说，使我产生了作为丈夫的责任感，我就能浪子回头。当时我对这种安排没有任何反对。我对时事政治的理解感到很有把握，但是远离祖国和家庭是不能叫人自在的。我在考虑民族斗争的同时常常夹杂着对未婚妻的怀念。我的父母想利用这次结婚使我放弃我所认定的正确道路，但这不会给我多大的影响，况且，享受未婚妻的爱情和陪伴也有着强大的吸引力。

他们父女到达以后，我陪同他们在法国、意大利和瑞士玩了一圈。回到巴黎后，我们在巴黎第15区区长官邸举行婚礼（与此同时，在西贡的两亲家也聚在祖先的牌位前，举行传统的庆祝仪式）。当然按照我父亲的想法，婚后甜蜜安宁的生活、建立家庭、有了职业，所有这些可以毫不困难地把儿子从邪念中解救出来，而正是这股邪念使他的儿子成了一个政治魔术家的信徒。对于目前正在吞没旧式家庭和殖民地秩序的大地震，我父亲是毫无经验和准备的。而对我来说，我的心里正燃烧着爱国主义的火焰，我的脑子里正憧憬着民族解放的未来。我早已准备采取断然措施，走自己的路。父亲也没有觉察，在我的妻子恭顺的举止后面蕴藏着火热的感情。我们现在共同建立起来的幸福，并没有受到政治分歧的影响。我妻子一到巴黎，没有陶醉在安宁的传统生活中，而是象我一样，心甘情愿地起而响应争取越南独立的号召。

在越南战争不断加剧的同时，巴黎的反战运动也增强了势头。我现在已成为反对这场肮脏战争的正式成员，投身到了动员越侨团体和法国公众舆论的斗争中。在这个工作中，我和战友们发现，我们的主要盟友是进步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法国共产党人。尽管法共在对待越南独立的问题上不可否

认地象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法共总书记莫里斯·多列士曾宣称“如果我们不能同他们〔越南民族主义者〕达成一项协议，我们将用大炮同他们谈”），但几乎只有法共在法国进行有组织的反战运动，我们要尽可能支援他们。

旅法越南人协会决定，让我的妻子在法共主持的一次为了争取法国舆论的广为宣传的巨大集会上，向法共中央委员、多列士夫人珍妮特·弗斯麦尔茨女士献花。我父母听说此事以及我成功地让自己的妻子也和法共搞在一块的消息之后，大为恼怒，并对我们采取了行动。她父亲和我父亲使用各种诅咒的语言，以联合的威严，向我们发出一道明确指令，要我们立即返回西贡。

我的妻子不愿走，她准备向他父亲的巨大权威挑战。而我在此之前就不对父亲百依百顺了。但是妻子已经怀孕六个月，况且我们的父母已经断言要完全断绝我们的生活来源。这使我们苦思冥想了几夭。如果只有我一个人，我当然可以对付过去，但如何才能养活妻子和孩子呢？我们竭力想生活在一起。但我的妻子对我们的孩子感到非常担心。如果她没有怀孕，我们两人都可以留下来。我们最后决定，她自己回去。我们希望我们的父母见到出生的小孙子能消消气，从而宽容我的不恭顺，忘掉前嫌。然而这一推理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多少安慰，并且还预示着极大的凶兆，我们互相拥抱，暗中担心以后再也不能见面了。

就这样，我妻子独自一人走了。当我父亲意识到，无法改变我桀骜不驯的本性时，他大发雷霆，火气比过去更大。我很快就发现，我不仅完全失去了过去生活里所得到的父母之爱，而且也没有一分钱来支付食宿费用。我非常想念妻子，同时又因同父母疏远而极感痛苦。钱则是另外一码事。为了

挣钱，我在大学餐厅找了一个当伙计的差事，每天刷碟子洗碗，还要帮忙削土豆皮，这是我第一次干体力劳动。不久我就感到我恐怕永远得干这活了。

我父母也许认为，我一贫如洗，再加上把我同妻子分开，最终会使我回心转意。但后来他们听说我已能自食其力，并且仍然坚持搞我的莫名其妙的政治鼓动，就感到再也不能容忍了。我的父亲和岳父，命令我妻子完全断绝和我的联系。然后他们准备着手解除我们的婚姻。我妻子在她最后一封来信中说，她永远爱我，但她孤身一人，无法抗拒两家的父母。她当时才20岁。我们结婚已有两年半了。

我接到妻子的来信时，精神受到很大刺激。我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我从来不相信我们最害怕的事情真的会发生。我父母不可能走得这么远，真的把我当作逆子，永远赶出家门。他们和我的岳父母可能会认定我妻子应当嫁给一个更符合他们的规矩的人，重新开始生活。不，我不能接受这种想法。但是他们正是这样干的。我象一个生活在浓雾里的机器人，在回国重新改变生活，还是留在巴黎继续进行反抗活动这一问题上犹豫不决。经过几个月激烈的思想斗争，我决定一定得留下来。

第 四 章

回 国

父亲有一年半没有给我来信。在这个时期，我忍受着巨大痛苦并迅速成长起来。1951年我完成学业，获得政治学硕士学位。接着我又在巴黎大学攻读法学硕士学位。在此期间，越南战争变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罪恶战争。无论在南方还是在北方，胡志明的抵抗部队日益有效地同现代化的法军作战。1948年，苏联开始积极关心越盟的努力，1949年中国共产党人战胜蒋介石，为越南的游击队获得武器和装备打开了一条直接通道。

法国人了解，胡志明对越南民族主义者有巨大号召力。因此，他们企图按照自己的模式建立一个以世袭皇帝保大为首的越南政府，并力图得到美国支持。当越南冲突国际化之后，国内的暴力行为愈演愈烈。在巴黎，我开始认真考虑是否应该回国参加抵抗斗争。

尽管回国的时机已到，我在越南人协会的朋友们劝我还是不要走。他们认为我毫无作战经验，也没有尝过战争的滋味。他们无法想象我能适应游击生活。他们坚持说，我不但帮不了游击队的忙，而且会给他们增加负担。另一方面，我已经显示出组织才能。我的位置显然是在法国的政治战线，帮助唤起公众来抵制战争。

我仔细考虑过这些坦率的劝告后，勉强认为他们也许是对的。我将继续留在巴黎进行政治鼓动工作，帮助筹划集会和示威游行，写公开信，散发印刷品，尽我一切努力，进行宣传，促使法国人撤出越南。我对决定留在巴黎，并不完全感到遗憾。巴黎是我的再生之地。我承认，过去五年的政治活动与学习生活决定性地改变了我这个人。我是作为法国殖民制度及其“文明使命”的一个特级产品而来到法国的。奇怪的是，生活在法国首都，使我更加深了对祖国的了解和热爱。五年之后，我就同越南人的特性，同她的历史和民族文化，同我国的亚洲精神融为一体了。我感到越南蒙受的屈辱和苦难就是我自己的屈辱和苦难。我把1946年胡志明对我们的讲话视为自己的座右铭：“我们必须对外国统治开战，对饥饿和愚昧开战。为了赢得胜利、胜利、伟大的胜利，我们必须有团结、团结、伟大的民族团结。”

我留在法国的计划因形势的变化而夭折，也许我不该感到吃惊。将近1951年底，我意外地收到父亲的来信。信上说，生意越来越不好做。土龙木地区的战斗使橡胶种植园受到很大破坏，面印刷所在西贡恶劣的经济环境下也快支撑不住了。供应我的五个兄弟上学（五个人现正在欧洲各大学求学）已成了他经济上的一大负担。他不能再象过去那样精力充沛地工作了，他非常害怕我的几个兄弟因此面被迫停学。他以威严而又略带绝望的语气，请求我回国助他一臂之力。

这时，我大哥琼正在巴黎大学医学院攻读最后一年的课程。老三碧也只差一年就可以获得伦敦经济学院的学位。我和父亲的心情一样，不愿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前功尽弃，中途辍学。由于我是唯一完成学业的人，我有义务回国去。我和父亲一样毫不怀疑自己的责任，如果我的兄弟们处于我的位

置，他们也不会怀疑自己该尽的义务。这一次我别无选择。1951年底，我启程返回西贡。

我回到家里才几天，就收到了保大政府的征兵令。这位花花公子国王的军队严重缺员，急需补充，我正好赶上了。为了能给家里帮忙，同时避开参加法国傀儡军，我只有一条出路，即去一个边远省份，选择一项服务性工作。由于教员可以在任何需要的地方找到工作，我登记准备当一名教员。

这时政府恰好在毗邻柬埔寨，大约在西贡以西200英里的朱笃省开办了一所中学。由于道路极差，交通很不方便，去那里工作同流放没有什么两样。但是我别无选择，还是去学校报到了。我不仅当了教员，而且成了学校的高级教员。正象八月革命时期我的中学文凭（还有我的枪）使我自然地成为领导人那样，在这儿，我在巴黎获得的学位使我有资格成为高级教员，并被人冠以“教授”头衔。但是我很快就发现，在南越农村，渴望受教育的人民并没有因其对教师的尊敬而降低对他们的要求。我担负起一大堆教学任务，负责讲授法语、数学、历史、化学、物理，甚至还有英语。

我把每周的薪水直接寄到家中。只要学校有三天以上的假期，我就回西贡帮助父亲作生意。除了我能给予的资金和组织工作上的帮助外，我感到在情感上我的父母也越来越倚重我，因为其他孩子都不在他们身边，他们又不适应过拮据的日子，而且对战争也感到忧虑。

我逐渐熟悉了我周围的同事和镇上的人，并且领悟到，这场反法战争具有真正的全民族性质。几乎所有的人都同情越盟，他们或者有亲戚参加战斗，或者亲自用某些具体办法支援这场斗争。自打我熟悉了新的工作和周围的人，我就开始重操旧业：宣传组织群众，支援游击战争。组织向游击队

输送急需的药品。但是，我清楚地知道，我的贡献是微不足道的。我想做更多的事情。

带着这个想法，在复活节期间，我同在首都东南埃来地区活动的马基^①游击队建立了联系，并被游击队接收为临时队员。我急于了解游击队的生活，想要发现他们的思想动机。我想知道他们究竟是怎样克服艰难困苦，年复一年地以旺盛的斗志，坚持反法斗争的。我将第一次亲眼目睹战斗的场面。

尽管我因严重外痔而引起出血和剧痛，我还是设法按照约定时间来到联络地点。就在这种身体极为不适而心情振奋中，我开始体验游击队生活的危险了。

在这一周，我所在的分队的主要战斗任务是打一次计划好的伏击，因为一支法国人的船队要经过湄公河的一条小支流——周文接运河。在运河拐弯处的河岸上，游击队预先运来障碍物，有圆木和捆在一起的树枝，然后用厚厚的水生植物盖在上面，伪装好。游击队还在拐弯处前面的河两岸准备了障碍物。待法国人的船队到来，就把障碍物抛入河中，断其后路，使敌船无路可逃。法国人果然在预料的时间里出现了，大约有12条船，船上载着官兵近400人。船队刚一遇到障碍，埋伏在河两岸的游击队就向他们开火。在敌船后面的运河两岸上，另一组游击队员也把障碍物抛进了河道。这样法国船队就成了瓮中之鳖。游击队猛烈的交叉火力打得法国人动弹不得。许多法国兵象割草似地被子弹撂倒。法国人的机关枪和重武器只是盲目射击，根本打不着藏在河两岸芦苇深处的游击队员。敌船一条接一条地沉入水中。当法国飞机赶

^① 系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抗击德国法西斯军队的游击队或其成员。越南游击队取此名以表示抗法决心。——译注

来增援的时候，法军船只被打得不是漏进半船水漂在河面上，就是沉到了河底。

我跟在游击队长身后，猫腰躲在芦苇丛中相对安全的地方，观察了这场战斗的全过程。我不无吃惊地发现，战斗中的死亡场面我竟然敢看下去。我对游击队十分钦佩。尽管在人数和武器装备上处于劣势，他们仍然以自己的机智勇敢对敌人发动了这场袭击。在我们撤出战斗并重新集合以后，我发现自己舍不得离开这支队伍了，但是我心里明白，根据我的情况（不必说我的家庭责任了），这是不可能的。我本能地感觉到，我永远不会成为一名士兵。然而，我同样有把握的是，我在宣传和心理战方面能发挥作用。我已经开始懂得，这方面的斗争同实际战斗是同样重要的。直到周末，我的病仍然不见好转，游击队的指挥官劝我回家，待养好身子后，再作出决定。

不管那时我心里是怎样想的，一旦回到朱笃，很明显，我就无法积极参加抵抗活动了。一回到学校，我就得投入工作。我再次发现，自己又被缠进教学和行政工作里，不得不勉强去干我份内的事。不久，又有一件料想不到的事扰乱了我对未来的设想。1952年7月，我正在芹苴市担任高中毕业考试的监考员，我的一个同事把他住在这个城里的侄女，一个非常迷人的姑娘介绍给我。我们的友谊很快就成熟了，六个月就结了婚。一年之后，在1953年12月，我们的女儿鸾就出生了。

这时战争显然已经到了某种严重关头。早在1953年11月，法国就伸出了谈判的触角，日内瓦会议就是在这种接触下最后召开的。尽管举行严肃会谈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但是，战况并没有因此而缓和下来。在11月20日，第一批法国伞兵部

队在奠边府着陆。到12月，胡志明的总参谋长武元甲将军决定，如果法国司令官敢于阻碍他，他就要在奠边府发动一次大的战役。与此同时，法国得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美援，使法国得以招募和装备大批补充的兵员。

这些事件对我产生了直接影响。在发动新的招募兵员运动时，保大政府下令，不允许应征人员去担任别的工作。征兵通知书又一次发到我手里。我权衡利弊，最后决定，报名参加刚组建的国家海军。受培训的越南海军军官都要去法国，这样我就可以重返法国，呆上一段不短的时间，到我受训完毕时，战争很可能就结束了。如果国内还在打仗，我可以设法留在法国，避免参加战斗。由于我有必要的硕士学位，我被设在上伦的法国海军后勤学校录取了。1954年初我启程去法国，不久，我的妻子和女儿也跟着去了。

我在上伦的时候，越盟和法国的代表正在日内瓦举行会谈。参加会谈的还有保大政府，老挝、柬埔寨、苏联、中国、英国和美国的代表。就在日内瓦会议开幕的前一天，即5月7日，武元甲将军的部队在奠边府被摧毁的法军司令部上空升起了他们的旗帜，法国人不得不承认冷酷的事实，七年的努力给他们带来的是战场上的失败和国内动乱，他们现在准备让步。但是，制订有关协议文件仍然费了两个月的时间，直到7月20日才最后完成。终于给予越南独立。但在这个过程中，越南还是按照17度纬线暂时被划分成两部分。胡志明将在北方掌权，而在南方，政权仍然掌握在保大当局及其法国主子手里。日内瓦协议还规定，两年后将举行全国选举来统一这两个地区。

虽然我对这一结果感到失望，但是对法国的胜利使我感到非常自豪。事实上这次斗争加强了越南人的团结意识和民

族意识。另一方面，日内瓦协议是一个警告信号，它标志着越南民族主义已成为大国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冲突的抵押品。俄国的莫洛托夫和中国的周恩来从本国的利益出发，都同意将越南分为两个部分。但最不祥的预兆是，美国拒绝在日内瓦协议上签字。一些越南民族主义者虽然对胡志明接受临时分成两部分怒气冲冲，但是人们都清楚，法国人背后有美国人，如果战争再拖延下去，美国干涉的可能性是很明显的。

我在很远之外观察着国内局势的变化，与此同时，我在海军学校完成了学业，随后就退出了海军。在越南国内，吴庭艳掌了权，当上了保大政府的新总理，他正在西贡组建一个可靠的政府。对我和大多数越南人来说，吴庭艳是个未知数。我决定选择最明智的办法，在西贡局势明朗化之前，还是留在法国，等等再说。但在1955年中期，我父亲又来信要我回国。我的兄弟琼、碧、和奎三人在完成学业后，现在都已回到了西贡。他们拿出部分薪水交给我父亲，以支持两个最小的弟弟上学。但是，种植园全被毁了，而印刷所又处在特别困难时期，因此需要我回家去。

第五章

反对吴庭艳

1955年7月我回到国内时，西贡的政局毫无平静的迹象。国王保大任命吴庭艳为政府总理之后，吴庭艳却发动了一场要求废黜他的主子国王的运动。由一些民族主义党派组成的称为“革命委员会”的组织在西贡到处散发传单，要求废除世袭君主制，在南越建立共和国。这个集团正在进行宣传鼓动，要求吴庭艳担任新政府首脑，呼吁撤出全部在越南的法国军队。每个人都清楚，这个“革命委员会”的活动是由吴庭艳在幕后操纵的。

在“革命委员会”大放厥词时，保大自己的帝国政务会也提高嗓门赞成建立一个新的共和国。顺化市最强有力的政治人物是吴庭艳的一个兄弟，在他的授意下，帝国政务会明确宣布，应当废黜国王，权力现在就应当移交给吴庭艳，由他肩负起“保护人民利益与前途”的重任。几乎在这同时，政府发表声明说，“按照人民的意愿”，将在10月份就选择旧王朝还是建立议论中的共和国举行全国公民投票。

显然，吴庭艳和他的美国顾问在策划如何向未来过渡方面干得不坏。如果说大部分情况已很清楚，那么剩下很小的不明之处、也是最大谜团，便是吴庭艳本人。一方面，吴庭艳同美国人的关系是人们真正担心的问题。吴庭艳的支持者们

深深陷入世界范围的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陷入引起了一系列地区性热战的“冷战”之中，1948年的柏林封锁，中国内战（美国企图通过它来遏制中国革命），三年朝鲜战争（最近刚刚结束），美国对这些事件的反应以及它在印度支那支持法国殖民主义，所有这一切都表明美国人很重视他们在战后地缘政治方面的作用和他們所承担的反共义务。

虽然在意识形态方面，我对美国并不仇视，但是我能够看出，美国的活动早已证明是敌视越南民族主义的。美国人对法国的军事活动提供大量费用，他们在日内瓦会议上的态度是冷淡和具有威胁性的。对我来说，美国同它的共产党对手在道德和哲学方面的冲突，当然还有美苏国家利益在全球范围的冲突，并不是主要问题。我认为，美国只是在有关越南问题上有着巨大危险。美国目标的明显企图是，在越南南北之间竖起一堵无法逾越的墙，并且支持南部实行最强硬的反共政策。所有这一切预示着，越南将面临永久分裂并在内部实行政治高压政策。美国的意向及其政策的意图已经昭然若揭，但是吴庭艳却叫人捉摸不透。外国企图操纵越南简直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但是操纵往往是双向的。在这方面典型的例子就是胡志明本人。他利用中国和苏联的支援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自己的民族主义形象。与此相类似，美国的目标是一回事，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无法说明吴庭艳在多大程度上想利用美国人来帮助他建立一个有活力的南越政府，也无法判断他与美国人在越南问题上的看法能一致到什么程度。

要了解吴庭艳个人的特征是不容易的。他出身于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官宦家庭，脑子里自然会有封建思想，而且心胸狭隘。他与美国知名人士如法兰西斯·卡迪纳尔·斯佩尔

曼¹的私人关系，也表明了他僵硬、狭隘的政治观点。另一方面，吴庭艳在战争爆发前就辞去了法国殖民当局的官职，以抗议法国不愿给予越南人自治。他在美国一所神学院生活的经历表明，他可能带有一些禁欲主义的味道，并且具有内在的力量。他本人是个谜。当他着手建立自己的政府时，我细心观察他是否带有爱国主义和独立自主的色彩。

我特别期望能有这样一个政府，它不但能团结原来亲法的越南人（如我父亲那样的人），还能团结各个不同的民族主义派别，特别是能团结原来的越盟战士以及他们的同情者（如果我在朱笃的经历能作为根据的话，这种人占农村人口的绝大多数）。应当建立一个具有广泛基础的法国民主式的联合政府。我也不愿接受由大国任意强加的，或者是由一个越南政客屈从于大国意志所造成的南北之间永久的对抗。

事实上，这时两个越南已经存在：一个早已是社会主义的，另一个将要在斗争中诞生。它们两者的关系会怎样发展是一个问题。毫无疑问，1956年将不会举行南北统一的选举，尽管日内瓦协议规定要对统一问题举行公民投票。假如吴庭艳有足够的力量，而且有充分的威望，他可能会成功地在南方建立一个政治实体，同时努力同北方建立各种政治和经济联系。我看到的是，要求国家统一的感情是这样的强烈，以致必须找出某种办法使之得到实现。另一方面，南北之间经济、社会、文化上的巨大差异（更不用说少数民族地区）要求以地方分权而不是中央集权的方式来实行统一。这就要求南方的领导既要有力量和想象力，同时还要有争取大众支持

1. 斯佩尔曼1889年5月4日生，马萨诸塞州，他是美国著名的宗教和政治界人士，曾获多种名誉学位，先后曾在美国各地任天主教和大主教，包括纽约市大主教，并著有《胜利的道路》等多种著作。——译注

的能力。但是国内政治舞台上的两极分化必定会使人民要求统一的根本愿望变成一支子弹上膛、直接对准吴庭艳的枪。

我虽然希望南方发展民主政治，但是，说我坚决反对北方正在发生的一切事情，那就错了。我在法国所诚心信奉的（同其他许多人共同坚信的）民族主义，实质上是一种北政治学更易传播的爱国主义。我个人的斗争曾经是一场在法国殖民主义的文化 and 心理背景下，认清自己是一个越南人的斗争。与此相比，接受一种系统的政治哲学虽然重要，但对我来说，这只是第二位的问题。经过多年对胡志明品质的努力了解，我确信他内心的动机和我们相类似。他信奉列宁主义是为了更好地为越南民族主义事业服务，无论我个人的倾向如何，我几乎愿意接受任何政权，只要这个政权能够真正独立并真心为民造福。在这个问题上，考虑到国家地位的恢复需要经历长期和艰难的过程，我十分愿意假定胡志明的北方政府是无辜的。

有关北方情况的消息很难获得。日内瓦协定签订之后，大量难民从17度线北面逃往南方^①。他们大多数是天主教徒，对无论哪种形式的共产主义都怀着根深蒂固的仇恨。因此，他们所讲的有关集体化和“人民审判”的情况并不特别可信。尤其是，无论南方人还是北方人，都拥戴胡志明为民族英雄，他的巨大威望影响着整个河内政府。在这种情况下，我对河内方面的动机和举动并没有产生疑虑，我当时最关心的是自己鼻子底下西贡政局的发展情况。

在西贡，我算是少数货真价实的受过法国教育的知识分

① 1954年日内瓦协定规定，在一个时期内南北居民可以自由迁徙，个人可以选择在任何一个地区居住。在这期间，北方有30万人，大多数是天主教徒迁到南方，南方约有10万人移居北方。（原注）

子，我确信自己不会永远做一个消极的旁观者。果然，我很快就和老同学们有了联系。在我回国不久的一天晚上，当我正和父母在堤岸（西贡华人居住的地区）的家里进餐时，我身边猛然出现了武文海的熟悉面孔，他对我回到城里颇为惊奇，高兴地喊起来：“噢，好久不见你了！这些日子里你都在于些什么？”武文海曾和我一道就学于法国的政治学院。

一年半前在布鲁塞尔，他是吴庭艳的随从，现在他当上了吴庭艳的私人秘书，成了吴的“影子”，并且在新政府里很有权势。

“唉呀！我刚回来没几天，还没有什么特别的打算，你怎么样？”

“你不知道我在政府里做事？陈老弟（陈世扬，也是我们在法国的另一名校友）是管外贸的局长。还有一些其他同学也和我一起共事，我们真该都呆在一起。你没这样想吗？给我来一个电话，我们可以聊聊。”

但是，也有同武文海不合拍的人，他们并不象他那样对吴庭艳充满热情。我后来碰到的另一个巴黎同学就是同政府唱对台戏的。区长清¹在西贡大学法律系任教，他加入了前年建立的保卫和平运动组织。该组织力促遵照日内瓦协定，举行有关统一问题的选举。这个组织主要是由从法国回来的知识分子组成的，也包括一些西贡的知名人士。这个组织后来被吴庭艳和他的首席美国顾问爱德华·兰兹代尔上校搞垮了。由于害怕这个运动会妨碍政府巩固权力，吴庭艳指控它的大多数温和派、或不明显的左派成员是共产党人；他把一些人监禁起来，把另一些人驱逐到国外，还将一些人在国内

1. 区长清后来成为阮高其手下的经济部长。——原注

流放，包括后来担任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第一任主席的阮友寿^①。另外还有一些朋友也吃过吴庭艳的苦头，有的吃的少些，有的则不然。有一个叫阮文寿的好友，他是美国人训练出来的牙科医生。尽管他受过良好教育，很有才干，但是他发现，无论他到政府还是到大学谋事，总是碰壁。因为吴庭艳认为，阮文寿在美国曾瞧不起他^②。

但是，同吴庭艳后来残酷地迫害前反法游击战士（我在巴黎时曾结识他们中的一些人，我开始再次同他们接触）比起来，他的这种无礼和无情就算不了什么了。尽管在过去几年里，吴庭艳曾确立了他自己的爱国主义，但是他从来就没有积极参加过反法战争，而且在战争的最后四年他一直呆在国外。所以，他认为，这些抗法老战士会跟他争权，必须予以铲除。吴庭艳把这些人全都贴上共产党分子或亲共分子的标签，使用秘密警察和身着蓝衣的共和国青年团来追捕这些人。而对于这些人，几乎人人都把他们看作争取自由的战士。

这是一种灾难性政策。由于吴庭艳强制施行消灭任何潜在反对派的政策招致众怒，他不可避免地会疏远高昂的民族主义。而十年来，正是民族主义是越南最强有力的力量。吴庭艳抛弃爱国主义旗帜，不利用这面旗帜把全国团结起来，反而依仗手中的权力恫吓或迫害任何可能妨碍他的人。在行使权力方面，他将封闭式政权的老一套封建方式又恢复起来，同时辅之以美国支持者提供的建议和训练。我很快就清

^① 与当时的几个历史学家所作出的断言相反，保卫和平运动与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并没有组织上的关系。尽管该组织的一些成员与阮友寿一道后来加入了该阵线。但是认为该运动在某种形式上就是早期的民族解放阵线是不确切的。

——原注

^② 阮高其后来任命阮文寿为教育部长。——原注

楚地意识到，吴庭艳生性不容人而且独断专行，他只能指望凭暴力来维持政府工作。在这一努力中，美国人定将成为吴庭艳可靠的伙伴。美国就是这样轻率地继承了刚离去的法国殖民者的衣钵。在一个经历了八年革命并且仇外情绪已经爆发出来的国度里，吴庭艳没有能力使自己成为一个人民的领袖，这意味着他的政权只能永远依赖美国的援助与保护。

至少我认为就是这样。就是在那时，我作出决定，不问我的朋友武文海以及其他参加政府的人合作。现在，唯一的问题是，我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反政府方式，就在我仔细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南越正式变为共和国，吴庭艳当上了第一任总统。赞成吴庭艳的选票98%是通过运用各种作弊手段、包括利用投票人身份证等获得的。身份证都要在投票站盖戳，否则警察就会找麻烦。吴庭艳对选举的嘲弄和明目张胆的操纵并没有什么特别高明之处。但是，目睹这位顽固守旧的达官玩弄民主形式来安抚他的美国保护人，既罕见又令人丧气。这时我毫不怀疑，我们已经处在我认为最坏的境况里：专制政权继续屈从于外国；人民在政治上两极分化；一道铁幕垂在南北之间^①。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也开始考虑另一个问题：也许可以利用吴庭艳被迫搞的这种表面民主来公开反对他的政策。这时，一个来自美国密执安州立大学的代表团正在南越同政府商讨有关执行民主政治的程序问题。我不知道这些专家们是否真正相信，这个以98.2%的票数当选的总统可能变成一位新生的民主主义者。但是，吴庭艳至少暂时对被认可的议会形式显示了热情，其中包括他计划在3月份召开的立宪大会。

① 据披露，吴庭艳在美国期间受到了麦卡锡—斯佩尔曼及共产主义的训练。很明显，他的观点与麦卡锡、斯佩尔曼一样的强硬。——原注

我与两个同我想法一致的朋友聚在一起，开始制定以合法的形式开展反对活动的计划。我们在嘉定我祖父的家里开会。（祖父过世以后，我父母和我一家都搬到了这里。）陈友世、吴克性和我共同起草了一个建立自由党的纲领，并开始设想我们的竞选战略^①。但是正当我们积极筹划的时候，政府发出通告，只有吴庭艳的兄弟吴庭儒领导下的“民族革命运动”的成员才可以参加立宪大会。尽管在美国顾问的压力下，吴庭艳勉强使用了强加给他的民主词句，但是他明显不愿在某种西方式的选举过程中丧失任何微小的控制。他不能容忍反对派的存在。

鉴于出现了这一令人不安的变化（尽管并不令人特别吃惊），吴克性建议我们应当改变战略，参加吴庭儒的运动，一旦我们当选，再作进一步打算。我的结论和他不同。我对吴克性和陈友世说：“如果我们参加进去，我们就没有任何回旋余地了。更糟的是，我们会丧失掉全部信誉。这就是我的看法。当然人人有权选择自己的道路，但是我不去参加。”最后我的两个同事决定参加，后来两人都当选了。在所有当选的议员中，只有两个其他党派的成员。但即使这样的选举后来也被宣布是非正式的，他们的席位被吴庭儒的人所取代。已建立起来的民族主义政党感到十分愤怒，这是可以理解的。吴庭艳的所作所为已经完全使他们认清，他们为建立一个能够与北方抗衡的、强大和民主的南方政府的努力只能受到压制，而不可能得到支持。在未来的几个月中，这一点会得到进一步证明，吴庭艳将会颁布一系列镇压法令，有效地排除真正的反对派存在的可能性。对这个来自顺化王

^① 陈友世后来成为吴庭艳的教育部长，而吴克性后来接受了阮文绍内阁的任命。——原注

官的后裔来说，真正的理论是最不可信的语词矛盾的说法。

形势如此发展震动了各个民族主义政党领导人，他们开始设想不同的反对模式。我的道路也转到了其他方向。就在我即将作出决定的时候，我在越南工商银行谋到一个职位，任审计长。在我决定迈出下一步时，这个职务可以为我提供掩护，避开政府对我的注意。

第六章

间谍大师艾尔伯特·范玉草

1956年1月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我开始从事审计员的工作不久，一个人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但他拒绝对我的秘书透露姓名，我拿起话筒，才听到对方说：“你真是蠢吗？我是艾尔伯特——艾尔伯特·范玉草。”

“我的天，艾尔伯特！”我在电话里喊起来。“你究竟在什么地方？都在干些什么？如果方便，你现在就到我这儿来吧，我非常想见你。”

艾尔伯特·范玉草是我中学时最要好的朋友。我们俩曾一道和姑娘们外出，不知消磨掉多少时光，谈论天下各种事情。我们亲密无间，胜过兄弟。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11年前的八月革命时期。那天我在街上见他骑摩托车疾驰而过，臂上红黄色的革命袖章格外醒目。起义的当天早晨他就跑来找过我。我们拿走了我的那杆猎枪，骑着摩托车，穿过人群，率领朋友们走向光荣和独立的未来。当街头发生暴乱使我感到意外时，我就把枪交给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艾尔伯特。他后来取代我，当上了地区“先锋青年”的首领。

在我动身去巴黎并且在法国上大学时，艾尔伯特留在国内，在运输部担任管理工作。他的情况我只知道这些。我也了解艾尔伯特的哥哥卡斯顿的一些情况。他是一个令人尊敬的

律师，曾参加棧盟，战争结束时任南方抗战委员会副主席。尽管艾尔伯特的家庭笃信天主教，1954年卡斯顿还是应召到北方去，并被任命为新政府驻民主德国的大使。艾尔伯特在战争期间做了些什么我不了解，但是我急切想知道和听取他对当前形势的看法。

艾尔伯特不能立即走开，所以我丢下桌上的帐簿，叫了一辆三轮车，直接赶到国家银行，果然他正在工作。我们热烈拥抱。这么多年不见，他一点也没有变，身材还是那样瘦长，而且行动敏捷，讲话还是那样温和而富于幽默，一只斜视的眼睛，能分散你的注意力。和艾尔伯特在一起，你永远也无法弄清，究竟他的哪只眼在瞧你，就好象你永远无法弄清他何时严肃，何时开玩笑一样。在我看来，艾尔伯特·范玉草身上总是表现出谜一样的品质，有些隐藏起来的思想你是无法弄清楚的。但是他那只恍惚的眼睛使人感到既神秘又幽默，这与他随和，滑稽的性格也是相符的。

我们很快就抓紧时间，回忆起我们在查西劳普·劳巴特中学的日子，以及那时同那些喜欢欺负学校里的“乡下佬”和“小安南人”的法国同学打架的情况。艾尔伯特告诉我，八月革命使他在政治上觉醒，他谈到的经历使我感到吃惊。

他说：“我响应号召。虽然我对马克思或列宁一点也不了解，但是我对胡志明是了解的，而且我认为，他是领导我们的正确人选。他牺牲了自己的一切，他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我想要做的就是那一类事情，所以我参加了游击队。

“1946年，抗战委员会命令我到湄公河三角洲去帮助开展组织工作。不巧在半路，美蔴地区的一支游击队把我抓住，当然他们不知道我的来历。他们见我身着法式服装，还带着身份证，就认定我一定是法国人的奸细。所以他们决定把我

干掉。我的双臂被反绑在背后，上面还捆上了一块大石头，然后他们把我扔到河中，我想这下我可完了。可谁知，在我往下沉的时候，我设法把双臂从绳索中挣脱出来，游到对岸，爬到岸上。我说，他们要是知道了，准得气疯了！

“最后我找到了去永隆的路，我想在这儿至少是安全的。我全家都在这个省。但是在我接上关系之前，我又一次被另一支地方游击队抓了起来。就象是作了一场恶梦，我不能相信眼前发生的事情。这些人并不想冒险，他们开始把我捆绑起来，就象我上次遇到的那伙人一样。就在他们要把我处理掉时，游击队的一个领导人认出了我，后来我被送到我哥哥卡斯頓那儿。不久，我受命去帮助组织和训练第410营。任务完成后，我们在金甌一带打了不少仗。到了1952年，我被秘密送回西贡，任务是搞清那里部队的动向，向上级汇报。”

我看着范玉草，半开玩笑地问，他是否仍然是个特务，他只是笑。

“日内瓦协定签署以后，我奉命参加了联合停火委员会。工作结束后，我没打算回北方，所以我留了下来。我担心统一选举搞不起来，而且我当然不想一直呆在河内。我了解美国人在干什么，所以我可以告诉你，吴庭艳举行选举的机会是绝不会有的。这些人都是狂热的反共分子。你知道，起先我对吴庭艳并不了解。他似乎象是一个爱国者，且不管他是干什么的。没有比和平统一再好的事了。但是某些大人物可能会推迟这个进程。我愿同任何推进和平统一的人合作。很遗憾吴庭艳不是这种人。他同美国人的关系太密切了。可是谁知道，也许我还能对此事起些影响。”

我告诉范玉草，当初我同他对吴庭艳有着相同的看法。
“但是，后来我了解到，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思想狭隘的独

裁者。他是无法改变的。他心胸狭窄，不会同意搞和平统一。此人顽固不化，会按照自己的路走下去，而不顾及有多少人厌恶他的作法。依我之见，美国人正在为吴庭艳掌舵，而吴庭艳在划桨。应该起来反对这个政权！是什么促使你认为你、或者其他任何人可以有机会起作用？”

“噢，”范玉草回答说，“你也许是对的，但是，毕竟我已经在政府任职了。我已经选择了我自己的方式。”

我没有听出他话里有话——一种典型的艾尔伯特主义，话里隐藏着更深的含义。八年以后，当吴庭艳已经殒命，艾尔伯特担任了南方军事安全首脑时，我才弄清他那句话的确切含义。当时，我明白，对这种惊人的事，刨根问底是徒劳的，所以我改变了话题。

“听我说，艾尔伯特，如果你陷得很深的话，怎么能避开‘控共灭共’运动^①的麻烦呢？你怎么会找这种差事干呢？”

范玉草的脸上喜气洋洋，他说：“现在看来，那是一个有意思的经历。联合委员会的工作结束以后，我就迫不及待地从西贡逃了出来。我知道秘密警察和青年运动的人正在抓我。但是我在战争期间已将那里的地下组织网发展得相当完善，所以我能够顺利逃往永隆。

“你知道，除了卡斯頓和我以外，我家的大多数成员都对共产党人怕得要死。你知道他们为了祈求上帝保佑，去了多少次教堂啊！唉，他们把我藏了起来并让我同教区牧师接触。我成了回到家中的不肖子弟。我父母是吴庭淑主教的追随者^②，难道你不知道？后来他们劝说吴庭儒和我见面。事情本不会

① “控共灭共”运动是吴庭艳发动的，他企图囚禁或灭绝那些参加越盟的人。他们被怀疑是共产党的同情者。——原注

② 吴庭淑是吴庭艳的大哥，他也许是吴家最有影响的成员。——原注

这样顺利。吴庭淑主教非常喜欢我，所以他决定保护我，我目前的处境，就是他给安排的。”

几天以后，艾尔伯特来我家聚餐。席间，我进一步了解到，吴主教不仅为他提供保护和找工作，而且还把他介绍给秘密警察头子陈金宣和吴庭儒以及吴庭艳本人。艾尔伯特没有详细讲他是怎样将吴主教迷住的。但是很明显，吴庭淑相信，这个前越盟游击队员，以其聪明才智，充沛的精力和对共产党策略的熟悉了解，可能对这个政权有重要价值。他无疑考虑到，范玉草对天主教和家庭的忠诚要比他年青时对革命的热情强烈得多。尽管吴的一家是越盟的死敌，但是他们也同样反对保大傀儡政府的帮凶。由于对越南民族主义有着天生的理解，吴庭淑会断定，艾尔伯特·范玉草参加反法战争，即使误入歧途，也是吴庭淑所深知的那种爱国感情的真正流露。他显然愿意相信，战后，范玉草对自己曾和共产党人牵扯在一起已感到懊悔。吴庭淑想象艾尔伯特浪子回头，成为他的忠实追随者。艾尔伯特就巧妙地利用这点把自己扮演成一个有才干、可以信任的人。

不管怎样，我再次见到艾尔伯特的时候，他身穿陆军制服，肩章标志是少校。他刚接到吴庭艳的委任，负责训练民兵。

就在这时，我在西贡社会上同前越盟成员和其他不满分子进行越来越多的接触。不久我就发现，我自己成了人们反对吴庭艳的地下活动网的一部分。我们开始逐渐地建立地下抵抗组织，最终它发展成为民族解放阵线，即越共的政治组织。而艾尔伯特却留在军队里，赢得了上司的信任，扩大了他的联系范围。

有一段时间，艾尔伯特进一步密切了他与吴庭艳和吴庭

儒的关系，并且使他们相信艾尔伯特的反游击战略和乡村绥靖构想。结果，1957年他被派往马来西亚，在那儿学习反暴乱战术，因为马来西亚运用这种战术在对付共产党游击队方面卓有成效。其中“战略村”计划引起了吴庭艳和他的美国顾问的特别兴趣。英国人发展了这个概念，他们将农民集中在防卫严密的大村寨里，以便将游击队同农村老百姓隔绝开来。这样的村寨政府便于控制，同时，游击队也不易发挥自己的政治军事影响。

但是在南越，这种主张却很难推行。1959年，吴庭艳打算搞越南式的战略村。他们企图推行一项雄心勃勃的全国性计划，建立能够自我控制的现代化的村寨。这种村寨称之为农业村。农民一开始就对这项计划感到愤慨。首先他们得被迫出劳力，去修建这些设想拙劣的村社，而这种村社与他们通常的社会和经济生活方式毫不相干。但是后来，他们又不得不被迫离开自己的老家，搬进这个用围墙圈起来的场地。一年以后，农民的痛恨越发猛烈，终于迫使政府放弃这一计划。政府什么目标也没有实现，反而大大丧失了民心。

然而，在1962年，有关战略村的设想经酝酿后又重新提了出来。这时艾尔伯特被委任负责此事。他告诉我，在同他一起共事的美国顾问中，对战略村计划有两种态度。一些人主张迅速推行，采取主动并强制实行建设村寨和重新安置的工作。他们担心节外生枝和遇到许多困难而使计划停顿下来。而另一些人对实施如此巨大的社会工程计划的危险性则敏感得多。这些较为谨慎的美国人打算逐步推行计划，先建立样板，认真分析其成效，然后再大规模地推广。

但是，吴庭艳的弟弟吴庭儒是神经质的和专门为自己打算的人。他急于将游击队与农村隔离开来。他还要求速见成

效。艾尔伯特卖力地推行这一计划，甚至超过了主子所希望的程度。这时他没有让我知道他的内心想法。但是，回想起来，艾尔伯特的真正目的也许是打算埋下混乱的种子。当然，农民对他监督下建立的战略村的痛恨，实际上更甚于过去对“农业村”的痛恨。时间不长，这一计划就夭折了。政府再次失败。

就在艾尔伯特负责战略村计划期间，甚至在这之前，吴庭儒还让艾尔伯特负责调查他怀疑有不忠之嫌的陆军军官。出于对自己日渐不得人心的担心，吴庭艳和吴庭儒经常检查自己周围的人是否有不忠的迹象。战地指挥官们受到了无处不在的艾尔伯特·范玉章的特别监视。他的监察地位使他赢得了普遍的畏惧和尊重。艾尔伯特利用自己的地位同许多最著名的军事人物发展关系。其中与他关系最密切的是阮庆和陈善谦将军。陈善谦当时任第7师师长。他的师部设在美荻，大约在西贡西南30英里。后来他曾在阮文绍任总统时期先后担任过总参谋长、国防部长和政府总理职务。陈善谦是一个野心勃勃、渴望权力的人物，他的动机是明显的，又处在关键的野战司令的位置上，自然引起了艾尔伯特的注意。而阮庆曾在1964年成功地策划了一场军事政变。他具有另一种性格。他的贪婪的野心和不择手段，表明他是一个有潜力制造麻烦的人。

在这一整个时期，艾尔伯特和我保持着密切接触。就在他日益受到吴庭艳兄弟的青睐之时，一股团结的反政府力量已经形成，而且越来越吸引了我的注意。到1960年秋，离我们（民族解放阵线）召开第一次大规模的组织会议只有几个月了，甚至在其外部反对力量已经巩固的形势下，吴庭艳还一心想着其内部不忠的问题。

1960年11月11日，吴庭艳所担心的事发生了。那天一早，几个营的伞兵部队占领了西贡的重要地点，同时将总统府团团围住。指挥这次反叛行动的上校们获得了代表温和党派的若干反对派政治人物的支持。他们的目的是要迫使吴庭艳扩大他的政府，同时清除他左右的腐化分子，特别是那个令人憎恨的吴庭儒。在同总统府通电话时，反叛者向吴庭艳施加压力，逼他作出承诺，允许反对派的民族主义者，甚至还有前越盟的人参加国会。就在他们进行谈判时，反对政变的阮庆驱车来到准备战斗的总统府。他发现总统府有一段围墙无人防卫，便翻身而入。吴庭艳同反叛的上校们就建立一个自由化的新政权有关细节进行了长时间讨论。在这段时间里，阮庆鼓起了总统府卫队的勇气，并部署他们准备决一死战。与此同时，艾尔伯特·范玉草驱车沿4号公路朝美荻方向赶去。他打算亲自向陈善谦说明形势，催他进行干预。在第二天上午10时，陈善谦师的先头部队就同反叛的伞兵部队接上了火，后来反叛的头目纷纷逃往柬埔寨。

吴庭艳和吴庭儒利用这次镇压叛乱的有利条件，大肆逮捕对他们持怀疑态度或痛恨他们的人。数以千计的人遭到拘捕。而范玉草却越发得到吴氏兄弟的器重，而且他同陈善谦和阮庆的关系也愈加密切。

1961年，吴庭艳赏给这位前游击队员一个职位，让他担任槟榔省长。该省位于西贡以南的湄公河三角洲，是有名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前哨基地。在反法战争期间，该地区曾经是越盟的一个堡垒。在1959和1960年，游击队对此地的攻击日益增多且越来越猛烈。由于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和对政府控制的抵制，这个省已变成吴庭艳的敌人的藏身之地。

但是在艾尔伯特走马上任后不久，槟榔省内的局势开始

改变。我曾找过他几次，在那里开车尽可放心，就是在晚上也还用不着害怕。已经不再出现伏击事件，也没有发生什么破坏活动，很少有任何这类的战斗。经过多年以后，我才了解到，艾尔伯特和游击队曾达成一项秘密的谅解，以便使该地区保持稳定，从而使它成为越共休整和集结的地方。我不知道这事是否属实，或者说这只是艾尔伯特在当地搞的一次暂停活动，目的是为了提提高吴庭艳对他的信任。但是只要他任省长，槟榔省就太平。该省也许是南越各省中最太平的省份，在艾尔伯特离任以后，这个省很快又恢复原状，再次成为令吴庭艳士兵胆寒的暴乱地区。

美国顾问和吴庭艳都一致赞赏艾尔伯特在槟榔省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因此，他被提升到总参谋部担任职务，同他的老朋友，当时已被任命为陆军首脑的阮庆一道共事。野心勃勃的陈善谦也得到擢升，在联合参谋部任主任参谋。陈文敦是艾尔伯特的又一位熟人，他被任命为代理总参谋长。这类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头衔只是吴庭艳对自己不信任的人所给予的没有实际权力的虚职。总统不断采取各种办法来减少他的恐惧，例如，使他的将军们不能保持稳定，把他们从各野战司令部调来调去进行轮换，并使他们处于可靠的副官的监视之下。同时，艾尔伯特·范玉草正在建立一个有影响的关系网，包括总参谋部的军官，并且一直发展到少壮派的校官。西贡就是由这些校官带领的部队守卫的。

新上任的代理总参谋长陈文敦并不是一个幸运的人。吴庭艳和吴庭儒给他制造了难题：使他孤立无权和把事情搞得一团糟。在经过长时间的反复思考后，陈文敦开始寻找解决办法。首先，他争取到几个与他处境相同的将领的帮助。然后，他又接近陈善谦和阮庆，以及那些心怀不满的高级军官和校

官们。这些人所掌管的野战指挥部，对发动一场成功的军事政变是至关重要的。1963年夏季，南越陷入动荡和分裂状态。陈文教发现，要搞政变的并不是单单他自己一个人。别人也在策划阴谋，有些甚至很认真。艾尔伯特就是一个关键性人物，他同各种密谋集团和野战司令官们都有联系，而且，他又受到总统及其兄弟的绝对信任。

在这个微妙时期，艾尔伯特面临的复杂问题是，怎样才能圆满地实现动摇西贡政权的总目标。对于民族解放阵线方面来说，它不十分急于看到吴庭艳被推翻。吴庭艳听不得不同意见和残酷无情，已使他脱离了南越社会的各个集团和阶层，这有助于不断增强民族解放阵线的力量。政府采取的镇压佛教徒的行动，甚至连美国大使洛奇也忍受不下去了。由于对吴庭艳那一套封建思想感到恼怒，美国人曾对吴庭艳施加压力，企图迫使他实行自由化政策，并摆脱他身边的魔鬼吴庭儒。可这一切都是徒劳。就在美国人连碰钉子的同时，吴庭艳对他们的怨恨也越来越大了。民族解放阵线当然希望二者的矛盾越大越好。

吴庭儒这时利用国际监督委员会（该委员会成立于日内瓦，目的在于监督日内瓦协议的实施）里的波兰人作为中间人，同驻在河内的民族解放阵线的代表建立了联系，致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了。我们很快就摸清了吴庭儒的真实意图。他的建议并不是认真的，其主要目的只不过是以此来讹诈美国人。当然，我们对这些所谓的会谈还是继续予以鼓励，以利于进一步打乱吴庭艳同其美国盟友的关系。

除此以外，我们还确信，完全受惠于美国的将领集团，可能会通过发动一场军事政变上台，从而使华盛顿和西贡之间的合作更有效果。所以，我们没有得到帮助推翻吴庭艳的

命令。我没有得到，但是我非常怀疑艾尔伯特得到了。他的任务就是给吴庭艳制造麻烦，在这场混乱中无论出现什么样的铁腕人物，他都要尽可能地同他们接近。

尽管在这个时候，我和艾尔伯特没有互相暴露自己的民族解放阵线成员身份，但是我们之间的友谊以及观点上的一致，使得我们可以自由地讨论各种问题。这种情况有些异乎寻常，也并不完全令人惬意。艾尔伯特是我的朋友、知己，又是一个向我提供西贡军方内部斗争情况的情报来源。他对我一定也会有类似的感觉——一个和他谈得来的密友，而且也是有潜力帮助他的人。我们两人的秘密身份迫使我们用两种眼光来看待对方，一种是友谊的眼光，一种是分析的眼光。由于受到战争影响，朋友之间，甚至亲戚之间，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在陈文敦将军的密谋计划加紧酝酿的时候，艾尔伯特开始非常小心地权衡他的选择。他说吴庭艳非常自高自大，除了他家人以外，他不听任何外人的劝告，甚至美国人的劝告他也不予理睬。当他的政策招致越来越强烈的反对时，他干脆在身边只留下那些腐败的谄媚者，而与任何批评完全隔绝。他面临着各个阶层对他的真正挑战，其中有农民阶层，城市里的各个党派，最重要的是佛教徒。他们的骚动与自焚事件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而在这种情况下，吴庭艳却无动于衷。根据艾尔伯特判断，甚至美国人也开始认为支持他是个失策。在这种情况下，似乎已无法挽救他，艾尔伯特得出结论说，为了保住同下一个掌权政府的联系，同陈文敦密谋集团真正结盟的时机已经到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10月份时间的消逝，美国人也作出了相类似的结论。

1963年10月28日，艾尔伯特突然来到我家。他看上去心

事重重。他告诉我，他担心秘密警察给他设了圈套。我后来才知道，事实上，吴庭儒当时已得到有人密谋的警告。他已经精心作了安排，准备诱捕密谋分子，并企图在自己和美国人之间重新建立起信任关系。他计划发动一次假政变，由实际上忠于政府的部队发起，接着就镇压这次“政变”，大量逮捕持不同政见者和可疑的军官。艾尔伯特象往常一样谨慎，他不愿睡在自己家里，担心会遭到吴庭儒的逮捕。在此后的三天里，他一直和我呆在一起。每天黄昏时，我开车送他去会见一个个将领。他们都参加了最后阶段的密谋计划。晚上我俩就在我房里就寝，仔细商讨各方面的准备情况。

艾尔伯特告诉我，陈文教集团已经把至关重要的第三军区（在西贡周围）的年轻校官们争取过来。他们可以把任何一个企图反对这次政变的将领孤立起来。除陈文教外，陈重金、阮文春和杨文明将军也是政变的组织者，而且负责军事安全的首脑杜茂也参加进来。陈文教确信，他已允诺要予以嘉奖的那些主要将领会跟他一起走，特别是由于青年军官们承担了大部分军事行动任务。

第三军区总司令孙室订将军是这次政变的主要障碍。孙室订以忠于吴庭艳著称，但他与密谋分子也有密切联系。如果他不合作，这个精心制订的政变计划就会夭折。艾尔伯特谈到，交给安全首脑杜茂的任务是，向难以预料和反复无常的孙室订做说服工作（他们两人都是顺化人）。杜茂虽然取得了成功，但是，若不是他跪下来求孙室订“为了国家利益”而跟他们走的话，孙室订是不会轻易点头的。

由于孙室订将军也入了伙，正规军中唯一能够制造困难的部队，就剩下驻守在西贡以南湄公河三角洲的部队了。为了阻止来自这一方向的任何部队的救援行动，孙室订安排部

下掌握了第七师，并把该师部署在封锁南来的通道上。一切安排就绪之后，密谋分子们就准备动手了。

在31日吃晚饭的时候，艾尔伯特警告我说，按照计划，第二天下午3点开始行动，发动政变。我若是明智的话，就呆在家里别出去。第二天吃过早饭后，他就走了。政变按计划准时发动，艾尔伯特在这场战斗的最后阶段亲自指挥一支坦克部队。第二天晚上，传出来的消息说，吴庭艳和吴庭儒已在堤岸的一所教堂外面被打死。他们曾在教堂里面躲避。艾尔伯特·范玉草一步也没有走错，现在他又成了南越新统治者可靠的同僚。

政变发生大约一星期之后，艾尔伯特请我和妻子到他家里吃饭。和我们一起就座的还有一个伞兵司令和他的夫人，一个年青的空军少校，他带着一个很象外国人的舞女。这个两眼炯炯有神、留着小胡子的少校原来就是阮高其。这次晚餐的主要话题都是有关阮高其的事，特别谈到如何安排他升任空军司令的问题。显然，这位打扮入时的飞行员引起了艾尔伯特的注意。他是一个潜在的有希望获得高位的人。其实他也受到了其他人的注意。由于艾尔伯特同政变领导人关系密切，他认为他可以运用自己的影响，设法使现任空军司令调离其职，让阮高其擢升该职。当然，为了感激范玉草对他的有利安排，阮高其将会成为艾尔伯特情报网的重要成员。

不久，艾尔伯特的努力果然奏效。空军司令梅上校一天突然接到一项令人不快的任命，到波恩出任南越驻西德使馆的武官。而年仅33岁、蓄着小胡子的阮高其却开始了自己飞黄腾达的生涯。至于艾尔伯特本人，他成了“革命委员会”的发言人，并且接任了杜茂的职务，出任南越武装部队的安全首脑。

此时，我已辞掉了银行审计长的工作，当上了南越国家糖业公司的总经理。该公司经营种植园，榨汁机厂，制糖厂，酿酒厂以及进出口贸易，是南方最大的联合企业。但是，不管我现在的工作有多么重，我都要同艾尔伯特接触，而且，我成了军事安全总部里的常客。在一次谈话中，艾尔伯特谈到了他对美国南越政策的看法。

他对我说：“你应该懂得，美国在东南亚的战略是保住南越这个反共堡垒，特别是为了遏制中国。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找一个他们认为不会同民族解放阵线谈判的政府。美国人怀疑陈文敦同法国人有联系，可能会采取某种中立战略。我的感觉是，他们会特别支持阮庆—泰勒¹联盟的。我想泰勒把阮庆看成是铁杆的亲美派。”

这时戴高乐正在倡议东南亚的中立化，以作为最近法国谋求同中国和解的一部分，这已成为人所共知的事实。这一政策显然不合美国人的胃口。法美之间的分歧是否会影响西贡的政治，社会上流传着不少猜测。陈文敦出生在法国，而且还在法国军队里当过军官，很容易被人认为他怀有缠绵不尽的亲法感情。

我对艾尔伯特的回答是，不管情况怎样变化，人民大众、特别是佛教徒们将会为南方的中立化而战斗。民族解放阵线肯定也会在自己的斗争中，利用群众力量来争取参政。尽管吴庭艳的统治残酷无情，但是他无法压制人民的感情，后来的独裁者也会同吴庭艳一样，对此束手无策。我想正是我的一番宏论才促使他打断了我的独白，他用友善的目光看着我。

“小二，”他故意用我的小名对我说，“我在你身上闻到某种气味，你是游击队员，对不对？”

¹ 此时，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是美国驻南越的大使。

——原注

“艾尔伯特，”我回答他说，“我也一直在你身上嗅出了这种气味。”

我们双方一段时间以来都确信，各自是在为民族解放阵线工作。但是直到那时，两人都避免提及这一问题。事实上，我们在言谈里流露出的民族主义和反美情绪，在南方人里是很普遍的，而他们并不一定都同民族解放阵线有关系。在这个问题上互相刨根问底是没有必要的。而且，鉴于这种了解会带来危险，因此，还是不知道为好。虽然我和艾尔伯特亲密无间，但是，七年来我们两人尽量保持表面上的冷淡。

自那天以后，我们一走进军事安全总部的大门，就特别感到有一种讽刺的意味。我在1958年就是民族解放阵线最早的组织者之一，并在1962年被选为中央委员会的秘密委员；艾尔伯特自1954年以来过的却是更危险的双重生活。这并不是说安插在西贡政府里的民族解放阵线成员只有我们两个人。但是一旦知道我们两人能够共担风险和共同坚持信念，我们都感到十分满意。

1964年1月30日，反吴庭艳密谋分子所建立的笨拙的统治委员会，在另一个密谋集团面前垮了台。这个密谋集团的领导人，一个是善于看风使舵的阮庆将军，另一个是野心勃勃的陈善谦将军。这两人都是艾尔伯特的老朋友，现在又都在台上，因而艾尔伯特又被提升为上校，而且还成为阮庆最亲密的顾问之一。此后，南越进入了一个政局不稳定和混乱时期，即使按南越标准看来，这种情况也令人吃惊。这一时期混乱的标志是，当上国家代理首脑的阮庆同形形色色企图获得更多权力的政治家、将领以及那些反对阮庆领导的人进行着更加激烈的争斗。在这些对手当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陈善谦。而艾尔伯特仍然同陈善谦保持着最亲密的关系。对于阮

庆来说，他竭力采取措施加强控制，但是此举却激怒了他自己的许多政治盟友，以及重要的社会和宗教派别。佛教徒、天主教徒以及大学生们走上街头，每个集团都大声讲述他们的苦难，并且高呼要求变革的口号。西贡街头发生聚众暴乱事件已成家常便饭。这年夏季刚到，人们就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

为了挽救危局，8月底阮庆解散了他的政府并且建立了一个新的统治委员会。该委员会由阮庆本人以及陈善谦和“大名鼎鼎”的杨文明组成。杨文明曾经是反吴庭艳密谋分子中的重要成员。但是这个三头政治才维持不到一个月，就因三人不断勾心斗角而垮台。紧接着一个文官政府又建立起来，用以取代三头政治。年高望重的潘克丑任政府首脑，但是实际上则由阮庆控制。为了调虎离山，阮庆为“大名鼎鼎”的杨文明安排了一次长时间的国外友好访问，并且任命陈善谦为驻华盛顿大使。夹在阮庆与陈善谦二者明争暗斗之间的艾尔伯特，这回也没能幸免。他自己被放逐到美国首都，任使馆武官，伴陪他那位失意的朋友。

在这些疯狂的行动过去三个月之后，1964年12月底的一天上午，艾尔伯特突然出现在我家门前，手里提着皮箱。我大吃一惊，嚷起来，“我的天！你到底干什么了？”

“噢，”艾尔伯特若无其事地答道：“我刚从机场来，差点被阮庆的人抓住。”

阮庆显然已重新考虑，把艾尔伯特和陈善谦这两个潜在的危险人物放在一起是否可取。因此，他命令艾尔伯特返回西贡，打算将其逮捕并处决（艾尔伯特是这样看的）。尽管风险很大，艾尔伯特还是决定启程回国。他计划躲过阮庆的警察搜捕并转守为攻。他想躲藏在我家里筹划他的反阮庆行

动。但在12月底的这个时候，我正忙于组织保卫和平委员会的工作，进出我家门口的都是些反对派人士。我家最终会成为警察当局注意的目标。由于活动不方便，艾尔伯特要我和一个在黎利街开药店的女药剂师联系。她是我们的朋友，艾尔伯特很快就搬到她铺子后面的一间密室里，暂时躲过了警察的魔掌。

阮庆将军这时紧张起来，他本来就该警惕。艾尔伯特已向各处建立了联系，其中有他精心培植起来的武装部队的军官，包括当时是空军少将的阮高其，还有政治家和天主教领导人，当然也包括他自反法战争以来所建立的广泛的地下关系网。对阮庆来说，艾尔伯特是一个会跟人算帐的危险的策划者。对这样一种人，他是既熟悉又害怕，但阮庆万万没想到，艾尔伯特的真正动机要深得多。

在艾尔伯特突然回国的四个半月前，即1964年8月4日，美国第七舰队对北越目标发动了第一次袭击。几天以后，美国国会通过《东京湾决议》，授权约翰逊总统，“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当艾尔伯特还在华盛顿的时候，美国政府正在紧张地估价自己的选择。2月初，以支持干涉著称的麦乔治·邦迪^①到达西贡，同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他已代替洛奇出任大使）磋商并对当地形势作第一手调查。

我们认为，美国军事卷入的升级和美国政府活动的增强都显示出不良的迹象，美国地面部队的干涉就要降临。对民族解放阵线来说，这一不测事件是一场真正的恶梦。在1965年初，没有任何人幻想用我们自己的力量对付威力强大的美国战争机器而能够取得决定性的军事胜利。我们都痛苦地预

①：在肯尼迪总统和约翰逊总统任期内，邦迪曾任国家安全委员会首脑。

——原注

料到，美国直接干涉必将导致一场长期的更加残酷的战争。

这并不是一个对夺取最后胜利缺乏决心和信心的问题。但是，从我们来看，我们在南越正在进行的战争，主要是一场政治斗争，而军事方面的斗争则处于从属地位。我们的战略是实现政治革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武装斗争是一个手段，政治战线上的斗争才是主要的。如果美国人用武力干涉，暴力冲突的规模将会急剧扩大，当重点发生变化时，武装斗争很可能占据舞台的中心。这样的情景已明显地展示出来——国家和人民将会遭受一次前所未有的灾难，蒙受长期的苦难。我们强烈地预感到这一前景。

如果说，美国卷入的某些后果是明显的话，那么，如何才能防止美国干涉就一点也不清楚了。在10月份，我们成功地袭击了边和空军基地。12月底，我们又占领了平嘉。诸如此类的军事行动显示了我们的力量和决心，也可能会促使美国领导人谨慎考虑是否把他们的部队投入越南。但是，这些行动同样可能将西贡军队的不足之处暴露无遗，从而加强约翰逊政府内部主张卷入者的影响。

在这种背景下，有几个因素变得突出了。首先，我们不会有多少时间了；其次，尽管我们同西贡的军事力量正稳步地趋向平衡，但是我们真正的力量和敌人真正的弱点都是在政治战线上。吴庭艳垮台后，令西贡政权头痛的一系列事件就是再好不过的说明。将领们的无能以及玩忽职守引起了各阶层人民的沮丧和厌恶。南越是一个既无领导又失去方向的社会，而美国人是无法提供这些要素的。他们无法在混乱的状态下建立秩序。如果西贡没有一个起码能显示其合法有效的政府，美国怎敢投入其军队，并拿自己的整个声誉去冒险呢？在西贡，公开的混乱状态也许会迫使美国人重新考虑自

已担当的义务。迫使他们开始考虑这样的问题，在越南，他们可能挽回什么，而不是他们将怎样取胜。

阮庆将军的政权，虽然已证明无能而又不稳定，但它毕竟还是一个政府。不过如果再推进一步，总起义的形势就会成熟，那正是我们政治革命的目标。至少它将对美国人发出的又一次明显的警告。艾尔伯特·范玉草打算推动这一步。当他走进黎利街药店后面的房子时对我说，“阮庆会镇压所有的反对派，我们会蒙受你我都想不到的更大的干扰和流血牺牲。不管付出什么代价，我都要把他干掉。”

“艾尔伯特，”我对他说，“你孤身一人，还要东躲西藏，你不能这样干。即使你干成了，美国人还会扶植另一个阮庆上台。”

“不，舜，你错了，在这个时候，美国人对其他人都不信任。阮庆是他们唯一信任的人。如果把他搞掉，事情就好办了。你不用太担心，我知道怎么应付这些事。”

“听我说，”我对艾尔伯特说，“如果干不成，你最好还是转移到丛林里去。你到那儿他们会高兴的。”

当我们还在谈话时，艾尔伯特已戴上草帽和墨镜。这是他在紧要关头要出去冒险时才用的。

他对我说：“来，开车送我去咸仪街的电话亭，我必须和几个人通电话。”

坐落在咸仪街的电话亭是木制的，漆成蓝色，里面空间挺大。可以挤进我和艾尔伯特两个人。当艾尔伯特同阮高其（此人现在是军队中最有实力的人物之一）通话时，我挤在他身旁，他们交谈的大部分内容我都听到了。其实，艾尔伯特带我一起出去的原因之一是想减轻我对他安全的过份担心，同时想让我看看，他已胸有成竹。

“喂，是高其吗？我是范玉草。”

尽管话筒里有电流干扰，我还能辨认出阮高其是多么吃惊：“草，你从哪儿打来的电话？你哪来这么大的胆子？”

“听我说，高其，阮庆正在极力加强控制，我打算除掉这狗娘养的，我想知道你对此事的看法。”

阮高其开始时对艾尔伯特热情问候，这时，他的调子变得小心谨慎了。

“阮庆待我不错，在你和他之间，我持中立态度。我认为你们俩都是我的好朋友。”

无论欠谁的情，阮高其在完全确认有把握之前，无论如何不打算承担任何义务。作为一个有经验的密谋家，艾尔伯特一定早已料到这一情况。但是他没有料到，几周后，当政变处于要么胜利要么失败的关键时刻，阮高其实际扮演了复杂的和损人利己的角色。

和阮高其通完话之后，艾尔伯特又接连一个个同他的支持者通话。这些人包括战场指挥官，政治家，天主教领袖。他力图将他10年来苦心经营的全部支持网络都动员起来。

我没能目睹艾尔伯特实现他的这一计划。在他行动的10天前，我遭到逮捕，并被关进芝和中央监狱。此后，这些牢房陆续关进了参与艾尔伯特密谋的人。我从他们那儿了解到这次政变的一些具体情况。

1965年2月19日，由艾尔伯特支持者指挥的部队占领了无线电台和邮电局，并将军事总部和阮庆的住宅包围起来。但是，阮庆只身逃脱，并同在边和的空军中将阮高其取得了联系。开始，阮高其将阮庆保护起来，并威胁要派飞机轰炸西贡的叛乱部队。后来在当晚，在阮高其和他的旧恩人艾尔伯特·范玉草，还有艾尔伯特的同事发将军之间举行了一次

会晤。为了打破僵持局面，艾尔伯特和发提出，只要迫使阮庆辞职，他们愿意放弃这次政变。这是一个对阮高其有吸引力的建议，他同意照此办理。阮庆一旦去职，阮高其自己和一个其他军事首脑就可以成为西贡政治舞台上的主要人物。是否阮高其巧妙地利用了艾尔伯特发动的改变，或者是否艾尔伯特在政变不分胜负的时候运用手腕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些问题仍然有待探讨。此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艾尔伯特。当效忠于自己军事司令（尽管不是效忠于阮庆）的部队开进西贡时，艾尔伯特失踪了。几周以后，我通过我母亲获得了艾尔伯特的消息。他曾经拜访我母亲。他让她转告我说，迟早，他将设法使我获释。

7月份，当我仍囚禁在芝和监狱时，我从报上看到了艾尔伯特的死讯。艾尔伯特一直在西贡以北一个信奉天主教的难民区里藏身。有一个消息说，他是被一个神父出卖给政府的。也有谣传说，阮文绍将军（后来任总统）设下陷阱抓他。在发生小冲突时，艾尔伯特被打伤，后被带到军事总部，在那里被毒打致死。

不论艾尔伯特·范玉草是怎么死的，他是一位为越南独立而奋斗终身的战士。他是一位民族主义者，而不是一个理论家。他的立场和奋斗目标是在越南处于法国殖民统治下，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年代里形成的。他天资聪颖，有着充满活力的个性，他也是一位完美无缺的演员，在解放南方的斗争中，他扮演了领导角色。回顾他的一生，几乎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是他个人改变了西贡政权同民族解放阵线之间政治上的力量对比。这样说是一点也不夸张的。他促使农村绥靖计划破产，从而削弱了吴庭艳和吴庭儒的力量，而且他也是进行破坏和最后毁灭他们的各种密谋活动的主要人

物之一。在阮庆处境困难，政府摇摇欲坠的时候，他曾给诡计多端的阮庆当过一段主要政治顾问。随后他把阮庆拉下马，从而使南方出现了领导真空状态。最终由阮高其和阮文绍来填补这一真空，而他们是最后失败的创造者。当艾尔伯特面临死亡时，他仍然在制造不和，这回的对象是无能的阮庆的继任者。我们最后一次谈话时，我曾劝他转移到游击区去，那里相对来讲要安全些。由于艾尔伯特的身份还没有暴露，所以他拒绝离开政治舞台。

在60年代初期，范玉草的最大失败（的确也是民族解放阵线的最大失败）就是，他的一切努力无济于事，无法阻止美国决定进行干涉。然而艾尔伯特本人几乎是无可指责的。因为南越的政治制度确实是腐败无能的，而美国的新战略最终还是要依靠这个政治制度。

第七章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诞生

从1956年1月那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在银行撞见艾尔伯特·范玉草，到1965年他牺牲的这段时期，先后发生了一系列事件，正是这些事件影响了我的生活，使我走上了参加起义的道路。

在1957年和1958年，吴庭艳已失去了他初任总统时人们对他的期望。从一开始，他就用残暴手段巩固其个人权力，消灭了平川教的私人武装¹，随后又征服了其他有武装的教派。以此为开端，他发动了所谓的“讨共”运动，对同情共产党的嫌疑分子进行镇压，逮捕和处决了数以千计的前抗法战士。吴庭艳以惊人的干劲推行他的镇压计划。照他们的话说，他们达到了目的。上台三年以后，在吴庭艳再次审度政治局势时，他可以看到，组织良好的反对派中心已不复存在，国民议会完全控制在以他兄弟为首的“民族革命运动”组织的手里，制造事端的私人武装受到严格控制，共产党领导的抵抗老战士被吓倒了，内部一片混乱。

但是，吴庭艳的成功总有其相反的一面，尽管他维持住了自己的权威并赢得了时间，但是他并没有制定满足国家经

1. 控制西贡和堤岸地区地下活动的一个严密的犯罪集团，它也参与政治活动。——原注

济和社会需要的积极计划。他没有利用他所赢得的时间。三年之后，新总统权力贩子的面目暴露无遗。他并不是一个建设者。对于明眼人来说，吴庭艳的政治头脑暴露出致命的狭隘性。

首先，大部分反吴庭艳的武装力量虽然受到挫折，但是，并没有被消灭。失利的教派武装人员转入地下，正在重整旗鼓和寻找盟友。他们逐渐同“讨共”镇压中逃出来的前越盟战士建立起联系。这样，一支游击队的核心力量开始形成。

就在吴庭艳的老敌手重新组合的时候，吴庭艳又在匆忙给自己树立新对手。在农村，他一下子将几十万农民的尊严与生计摧残殆尽。他宣布废除越盟在1954年之前在自己的控制地区实行的土地改革计划。吴庭艳本来可以利用美援来补偿一般地主并取得农民对他的支持。相反，他却去讨好大地主。那些几年来一直认为是在自己土地上耕种的农民重新面临着要补交过去的地租和更高的地租率的威胁。对他们来说，这是一场经济灾难。

1957年，吴庭艳颁布了他的土改计划。虽然表面上打算分配土地，但是，只有那些付得起钱的农民才能得到。即使这样的土改基本上还是停留在纸面上。在各省，由于官方的不闻不问，地主们到处破坏土改。农民对这种状况既灰心又愤慨。这为反对吴庭艳的宣传鼓动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与此同时，城市地区穷人也尝到了食物定量分配的苦头。在西贡，政府迅猛推行“城市重新发展计划”。为了建设现代化的商业设施和豪华的公寓而占据整条街道。而这类建筑只供美国人和当地的上层人物享用。贫民区好几次因发生无法控制的大火而被焚毁（特别是庆会和府尹地区受灾最重）。人们几乎都不相信大火是偶然引起的，因为随后进行的大规

模新建设靠得太近了。穷人被迫迁移，有的只能到船上安家，有的被迫搬到更远的地区。贫民区和棚户区的居民不仅对美国人恨得咬牙切齿，对西贡政权也是怒火中烧。

对高原地区的山地人，吴庭艳也推行残酷无情的破坏性政策。为了便于控制高原部族，军队和官员强迫村民下山，迁入山谷，使他们远离他们祖先的土地和墓地。在班迷迷和其他地区，这种强制性的重新安置极大地破坏了原有的日常生活。对部族人来说，这无异于遭受一场从天而降的暴行。

吴庭艳在1958年底取得了击溃敌手，攫取权力的辉煌胜利，但是他也疏远了大部分南越人，全国仇恨情绪不断增长。起初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但在短短的几年中，他就使自己变成了一个广受憎恶的人，一个只能在北方天主教难民和从其计划中捞到钱的人那里寻求支持的独裁者。而最令人诅咒的是，他屠杀了大批抗击法国侵略的爱国者。他的生存是依靠法国的继承者美国的庇护。对许多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越南人来说，吴庭艳已丧失掉他宣称的对人民的忠诚。他们的这种心情正是反映了刚刚摆脱上百年外国奴役的人民的心情。

根据吴庭艳担任总统期间的所作所为，有两个事实是清楚的：第一、这个国家已经变成了人们十分熟悉的寡头统治模式，而且完全忽视人民的利益；第二，对外国人俯首贴耳，照旧不变。我们有一个统治者，他压倒一切的兴趣是权力，靠美国人给他撑腰，即使美国人利用他来实现他们自己的战略目标也不在乎。

就我个人来说，这种形势令人无法忍受。用一个越南人的专制政府来取代法国人的专制政府并不是一个重大进步。这既不能促进广泛的经济的发展，也不能树立我（和许多人）

渴望已久的民族尊严。我的许多朋友都对局势这样转变深表愤慨和沮丧。我们感到我们是生活在历史性的时刻。100年来深受屈辱的历史在激烈斗争中即将结束，一个新的国家正在我们面前形成。我们许多人都一致认为，我们不能默认正在形成的这种国家形式。如果不许我们从政府内部讲出我们的心里话，那么我们只能到社会上说出我们的看法。

1958年底，我们中怀有上述想法的人决定建立一个不受法律限制的政治组织。这个组织要制定完整的纲领和行动计划。但是我们没有迅速采取行动。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需要多年努力才能具备向吴庭艳独裁政权挑战的力量。对某些人来说，这只不过是空想而已。但是我们大多数人都认为，我们别无选择。

从不定期的讨论开始，然后我们召开稍微正式的小组会，有时只有我们几个人，有时有十个八个人聚在一块。其中起积极作用的人有：杨琼花和冯文恭两位医生，工厂主阮友善，律师郑庭草和建筑师黄晋发。两位中学教员阮文孝和雍玉奇，还有其他一些朋友，如阮隆和陈宝剑也参加了聚会。由于意识到斗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我们干的头一件事就是分清敌友，同潜在的盟友建立联系。

为了做到这点，我们建立起一个我们称为动员委员会的组织。它由我和阮文孝、陈宝剑、雍玉奇、阮隆、冯文恭以及建筑师黄晋发七人组成。通过亲戚朋友的关系，商业和政治上的联系，我们开始建立一个由一批象我们这样对吴庭艳及其政策不满的人组成的联络网。黄晋发和其他几个人都是抵抗老战士。他们同那些为逃避讨共迫害而躲在朋友处和家中的反法战争时期的老战友仍然保持着联系。他们也正在开始组织起来。他们在全国各地都有战友和同情者。他们是我们

的天然盟友。

在我们当中，也有人同教派组织、合法的政党以及佛教徒保持着密切联系。我们在各种团体里提出建议，到处都获得同情和支持。有时是个人向我们表示愿意积极参加活动。但是，更多的是向我们保证，要同我们暗中团结起来。同时，我们还派遣阮文孝赴河内，准备打开北方同胞支持我们的渠道。

在每一个阶段，我们都仔细讨论寻找盟友的工作，谨慎地研究如何赢得支持，同时仍然保持我们的方向和行动自由。这是一个微妙和关键性的问题，也是一个最复杂的问题。由于敌人的力量占压倒优势，促使我们去争取任何可能得到的支持。此外，反殖民主义战争并不是在1954年就完全结束了；残留的越盟基层组织仍然存在并且开始恢复。不管怎样，我们的努力是顺应越南独立的历史潮流的。越南的独立运动已形成自己的一套哲学和行动方法。在这个运动中，胡志明是南方和北方的精神之父。我们自然指望他和他的政府的指导和帮助。然而，这场斗争也是我们自己的斗争。如吴庭艳是一个胸襟开阔、眼光远大的人，那些参加民族解放阵线及其姐妹组织中的核心人物就会聚集在他的周围。由于吴庭艳蔑视他们所崇敬的独立原则与社会进步，南越民族主义者被迫揭竿而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南方革命是由南方本身引起的，是出自南方人民的情感、良心与愿望。

斗争的复杂性也反映在我们成员的构成方面。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是劳动党（越南共产党的正式名称）党员；许多人几乎没有想到自己的政治色彩，甚至没有想到什么意识形态的东西。我们在抵抗老战士中的盟友多数也是民族主义者而不是具有政治色彩的人物（当然他们曾经受到党的领导和监

督)。但是在我们中间也有劳动党的活动分子，有些人是公开的，有些则是秘密的。据我所知，陈宝剑、黄晋发和阮文孝、雍玉奇两位教师是有政治倾向的人。40年代初，他们在河内大学上学时，曾担任新民党的领导人。1951年劳动党将这个富于战斗性的学生组织吸收过去。它的一些成员加入了劳动党；有些人则结伙跑掉了；有些人只是接受了领导层的变化，但是并没有变成共产党人。我不知道的是，黄晋发早在1940年就是劳动党的秘密党员了，而阮文孝、雍玉奇和陈宝剑则是在1951年才加入劳动党的。

我那时并不十分在意南方民族主义者同理论家之间存在的潜在冲突。我们是共同战斗的盟友，或者是我相信如此。我们互相需要。背景、家庭和爱国主义这些最紧密的纽带把我们团结起来，而各自的意图得到尊重。这是我在1959年对形势的判断。当时，尚未命名的民族解放阵线正在发展的势头上，并不是仅仅我一人作出了这样的结论，也不仅仅是我一个人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了看法。

除了同支持者们建立联系，确立工作关系外，我们也在选择自己的领袖。我们的要求是明确的：这个人必须为众人所了解，有为人正直的声望，既同法国人没有瓜葛，也同共产党人不沾边。这个人必须给人以亲切和稳健的印象，能吸引各方面的支持，而不疏远任何人。我们在讨论中提到了几个人的名字。最后，我们确定了四个候选人。

我们首先选择的是陈金冠。他是一名药剂师，1954年曾担任河内大学南越学生联合会以及和平运动组织的主席。陈金冠完全符合标准。他既有爱国者的声望又作为一个讲原则的人而普遍受到尊重。我们派陈宝剑作为代表同他接触。但是，尽管他同情我们的目标，却不愿接受我们的建议。他也

许已预见到这种斗争的曲折性。

其次，我们还有两个人选：一是已成为我们同事的郑庭草，另一个是迈克尔·文伟。郑庭草是高台教教派组织的高级成员，还曾担任过旧帝国内阁的大臣。所以，他显然没有沾染任何共产党的痕迹。文伟是法华银行的董事，他是远离左倾思想的。他的业余兴趣主要在文化方面，担任越南语言传播协会主席。郑庭草和文伟两人由我负责联系。但是我的运气也比陈宝剑好不了多少。他们两人表示愿意支持我们，但是不想出任领导职务。

我们的候选人名单最后只剩下阮友寿一个人了。他是个律师，曾和陈金冠一道担任和平运动组织主席。该组织由西贡的知识分子组成，具有模糊的左翼倾向，曾试图鼓励吴庭艳遵循日内瓦协议的规定举行统一选举。说到阮友寿，事情还真不好办。他因从事和平活动已被软禁在越南中部城市绥和。黄晋发同这个地区的抵抗老战士有联系，因此分配任务给他们，要他们帮助阮友寿从卫兵的监视下逃出来。

当黄晋发制定他的计划时，我们开始修订我们的工作程序。这时，我们对警察并不十分害怕。人们很容易会把我们看成是又一群饶舌的西贡知识分子，只不过是谈论政治，开开国家的玩笑而已。那时，我们实际上还没有做什么事。但是到了1959年秋天，我们的组织已经有很大的发展。随着我们筹备召开第一次大规模会议，使我们的工作方法更为正规和更自觉注意安全的时候也到了。

现在，我们将组织中的成员分成许多工作小组。每个小组由3—5人组成。小组成员之间互不知道谁是属于哪个小组的。这种组织结构有时被认为是共产党人发明的。但是，对于有着长期秘密结社史的越南人来说，这实际上是他们的

第二本性。为了能汇集各方面的思想，每个小组包括不同阶级和有着不同背景的人们。和我一道工作的有三个人：六冈是个小商人；黎文凤是个抵抗老战士；张高福是我的一个同学，他曾与越盟并肩战斗，他家拥有一处面积很大的橡胶种植园。

动员委员会还任命由黄晋发、阮文寿和陈宝剑三人组成的领导小组来负责监督组织的具体活动，并收集各个工作小组的意见。整个组织经过两个月左右的紧张活动，领导人员准备将一份已达成一致意见的文件让大家传阅。总协议要求达到下列目标：

1. 增强南方各不同阶级人民的团结观念，不论他们的社会地位、政治观点、宗教信仰如何；

2. 推翻吴廷艳政权；

3. 实现美国顾问的撤离，停止美国对南越人民自决权的干涉；

4. 保卫和维护越南公民的权利，包括享有民主自由的权利以及尊重私有财产权；

5. 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

6. 建立越南独立的经济；

7. 建立一个能够保护越南传统与文化的教育制度；

8. 建立一个多元化的民族政府，对外执行不结盟和中立政策；

9. 在互利的基础上，通过谈判而不是通过战争来完成南北统一。

在完满地制定我们的广泛目标并进而推敲其细节问题的同时，我们还暂定召开第一次人会的日期，即下一年的12月19—20日。我们还确定了我们这个运动的名称：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我们设计了一面旗帜（后来这面旗帜因成为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正式旗帜而闻名于世），并且创作了一首歌曲《解放南方》。与此同时，阮文孝再次被派往北方。这次是要求胡伯伯对我们发表的纲领提出指导性意见。到1959年底，我们已经完成了将这些总原则改为一项宣言和一个正式的政治纲领的工作。

最后定稿的文件对南方的政治形势以及国内与东南亚和全世界的力量对比作了透彻分析，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很明显，这些文件写的这样好，是为了向最广泛的南方人民发出呼吁，并且把握住了激励着几乎每一个人的反殖民主义情感。同时，宣言和纲领还有力而具体地对南越社会，包括知识分子、学生、中间阶层、农民和工人等各个不同阶层的利益问题作出了回答。

当我阅读这些文件时，我有一种明显的感觉，这些历史性文件不会仅仅是领导集团制定出来的。这些文件含意很深，表现出对政治、心理和语言文字的驾轻就熟。我觉得我看到的这些文件中有胡志明的巧手妙笔。这似乎并不奇怪。胡志明的革命斗争经验并不是舶来品，不会引起人们的怀疑和担心。它是我们自己国家经历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现在处在1959年至1960年的冬季，准备转入斗争的第二阶段。3月初，当国内紧张局势加剧时，抵抗老战士协会突然向南方人民发出呼吁。这项呼吁书通过标语、传单和河内电台广播传播开来。它号召开始进行武装斗争。这个信号表明，过去两年来我们着重进行的政治活动现在需要辅以相应的军事行动。由于采取这一步骤，北方政府增强了对民族解放阵线的信任，同时表明它准备迎接更大的冲突。

我对此感到有些震惊。几年来，暴力冲突在农村依然存在。确实，自从吴庭艳镇压各种不同的派别和前越盟战士以

来，暴力冲突在人们生活中已成为事实。但是，我们现在所进行的斗争必须包括一种规模完全不同的军事对抗。我的同事和我从一开始就懂得，要迫使吴庭艳就有关参政问题进行任何严肃的谈判，就需要不断地使用武力手段。不论我们个人的喜好如何，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选择。但是以前，我们的侧重点一直明显地是在政治方面。我们设想我们的目标是政治解决，可以主要用政治手段来实现。我们，或者是其他任何人对军事上取胜的可能性都没有认真考虑过。吴庭艳军队的力量比我们所能调动的武装部队强大得多，而且吴庭艳后面还有美国人。战争的升级将会增加美国直接干涉的严重危险。而这正是我们不惜一切代价力图避免的。所有这一切意味着，要开展暴力斗争，但是这种暴力斗争应当在谨慎控制下进行，为政治目标服务。另外，我相信，在民族解放阵线的核心组织中，和我有类似看法的人能够有效制止那些热衷于用军事方法来解决的人。然而，既然战端已开，就引起了一连串的怀疑。

但是事情的发展使惊慌很快就过去了。在9月的第二周，在河内召开的劳动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完全确认抵抗老战士协会发出的倡议。北方政府正式以最明确的方式宣告，它的首要目标是解放南方。现在，活动的舞台已经完全确定下来了。

与此同时，黄晋发组织了一次袭击行动以解救被拘禁在绥和的当选主席阮友寿。反法战争期间，绥和城周围地区曾是越盟活动的中心，到处都有前游击队员在活动。黄晋发在这些前游击队员中间组织了一支突击队，它的任务是救出阮友寿，把他秘密护送到越老柬三国交界地带的安全地区。阮友寿可以在此藏身，等待定于12月19日召开的大会筹备工作

的完成。黄晋发要完成任务的期限很快临近了。

阮友寿和其他几个和平主义者一起被拘禁在一间由地方士兵看管、警卫松弛的房子里。当局并不认为他们是极端的危险分子。他们的罪行就在于在前几年的选举中进行了一些无关痛痒的宣传鼓动。不论是阮友寿本人或者他的看守，都没有料到阮友寿会成为游击队的主要目标。黄晋发的突击队员利用松懈的气氛，向看守的士兵们说，他们家里有紧急事情，需要他们赶紧回家去。看守的士兵就这样被引开了。士兵们一走，援救者们就大摇大摆地走进那间房子。但是事不凑巧，阮友寿对营救他的计划毫无所知。在此之前，他已申请探亲（并已获准离开）。就在企图营救他的人开始在囚室仔细搜寻时，在该镇另一端的一个政府收容所里，阮友寿正同妻儿们一起享受着团圆的欢乐。

突击队在行动中一系列的失误，带有喜剧色彩。所有来自绥和地区的突击队员实际上没有一个人见过阮友寿。他们只有依靠阮友寿的一张照片，帮助辨认。突击队员在房间里逐一询问，并拿着照片相面。因为无法确定谁是阮友寿，而且不相信阮友寿已经离开的说法，他们决定将两个长得最象阮友寿的人带走。两人迅速地被护送到边界地区的藏身处。在那儿，突击队才最终弄清，他们确实救错了人，这才感到很狼狈^①。

在解救了两个弄错的人之后，突击队只得进行第二次行动。这次组织得较为周密，还带上了认得阮友寿面容的人。

①. 1968年，我同这两个人见了面。他俩已决定留在抵抗运动里。两人各有自己的别名。一个叫三和平，另一个叫十和平。意思是和平3号与和平10号。阿拉伯数字表示他们在家中的位置。和平表示他们是通过和平运动而参加解放阵线的。这是对些事件的注释。——原注

但是由于第一次行动的失误，当12月19日大会召开时，我们还是自己的主席。

1960年12月17日一大早，我就出了家门，直奔西贡公共汽车站。黎文凤正在车站等我。他和我在同一工作小组。几分钟后，一个女人走近我们，黎文凤向我介绍说她是三川（“3号女人”），他告诉我：“三川会把你带到你要去的地方”。我和我的向导买了两张去西宁的汽车票。西宁距西贡大约有70英里，那个地方是高台教教派的发祥地。我对这个地方很熟悉，因为小时候曾到这个高台教教派的“梵蒂冈”游玩过。在汽车上，三川发出了明确指示，她说：“如果我们受到公安人员盘问，由我来同他们谈话。如果你不得不开口，那就说，我们打算去干当看望剑叔。”

一路上，我们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只是在西宁，我们换乘了一辆去干当的三轮车。政府在距柬埔寨边境约10英里远的地方设有村寨哨所。我们的车子在哨所前停了一会儿。3号女人下车同站岗的士兵说了几句，并往他上衣口袋里塞了一些东西。随后她上了车，叫司机将车开进一条肮脏的林间小路。沿着小路大约走了15英里，我们到了一所林间小农舍，我们要看望的“叔叔”家总算到了。下了车，我的向导把我带到一间房屋里，老剑正在屋里等我呢。在三川轻轻地走出前门时，剑又把我带进了那间房屋后面的小小外屋里，我就在这儿等候护送我进行第二段旅程的人。

我们在这里吃了午饭。饭后，我在靠墙的一张帆布床上打了个盹。过了一段时辰，我发觉有人在轻轻推我，是剑。他手里拿着一套黑衣裤，示意我把它们换上。夜幕降临，我换上这套黑衣衫时，感觉到有人正站在门口。他是个年青人，也是穿着一身黑衣服，还推着一辆自行车。他打算用它把我

载到下一个指定的约会地点。我坐在自行车后轮上面的临时座位上，小伙子在前面蹬车。在夜幕降临前的微光里，我们经过的甘蔗地和木薯地还依稀可见。大约走了一个小时，我们在丛林深处的一间小房屋前停下来。走进屋里，看见一张桌子上点着一盏煤油灯，光线昏暗，三个地方游击队员坐在桌子旁正在喝茶。

他们给我倒了一杯茶，于是我和他们一起坐了几分钟。这几分钟的小憩使我很高兴。但是，不多一会儿，换了一个为我蹬车的人，我们又上路了。我这次旅程跟冒险差不多，而且我认为，这次护送行动组织得相当细致。我们的车驶入了密林深处。当我们来到边界地区山脚下时，这条看不见的林间小路开始向上延伸。我们一直走过了午夜。每走一小时左右，我们都要在路旁游击队员的小屋前停下来，歇歇气，喝杯茶。不知在清晨的什么时候，我们来到了一排小型建筑物面前。我们终于到达了开会地点¹。由于长时间坐在自行车后座上，我感到周身酸疼，精疲力竭。我对我的司机颇感惊奇。他对这种长途跋涉却若无其事。我很快就被送到一间小屋里。不管我对这次不平凡的旅行有何想法，我一下子就睡着了，连梦都没有做。

18日上午，我一觉醒来，觉得精神好多了。屋里只有我一个人。起了床，我环顾这间小屋，看见一个穿黑衣裤的游击队员来到屋门口。他告诉我，以后两天我的活动由他陪同。他说，象其他的秘密代表一样，我也得单独居住。我的饮食起居等需要由他料理。他还详细讲了一下对我们的安全保障措施。我受到隔离保护，不得和他人接触。同别人交谈只能

¹ 1958年我回到丛林时了解到，这次成立大会是在诺村：“中部村庄”举行的。它坐落在靠近柬埔寨边界的东波古河岸上。——原注

用化名“三占”。一会儿，黄晋发和另一个人走了过来。黄晋发向我介绍说，和他一块来的这位是“双马车兄弟”，他负责主管民族解放阵线的财政事务。看上去他年纪约50岁左右，从越南人的角度看，他的身材异常魁梧强壮，还长得很漂亮。（后来我才知道，这个人就是阮文初，是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我们互相讲了几句笑话。随后双马车兄弟交给我一叠有关大会议程、宣言的文件以及其他各种问题的文件。如果我有什么建议和看法，就写出书面报告，他们将在会议上予以考虑。

整个白天，我都在仔细研究这些文件，只是在用午饭和晚饭时，才暂时停下来。我的饭菜都是由照顾我的服务员准备好的，但是我吃得不多。晚上，我领到了一条能遮住面孔的大围巾，围上它后，我被领到一个大厅。大厅的一头有一个低台子。它左侧有一排挂帘的包厢。我被安排坐进了一个包厢。大厅中间慢慢地摆满了板凳。我还听到相邻包厢领人进去的脚步声。当与会者到齐后，一支演出队走上舞台，开始演出节目。抵抗老战士们的表演精彩多样。唱歌完了是滑稽戏，接下来是喜剧。节目中政治讽刺色彩浓厚，台下的观众极为赞赏。演出结束之后，我的陪同又将我送回我住的那间小屋。他尽力避开同其他观众接触。有些观众也和我一样，是被小心翼翼地带进会议厅的。

第二天上午，即12月19日，我再次被带到大厅。一天大厅的布置发生了变化。入口处悬挂着一幅红白两色的标语，上面写着“欢迎参加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大会”。标语两侧挂着两面旗帜，颜色是红蓝色的，中间镶着一颗金星。这一旗帜的图案是我们上一年工作会议期间设计好的。昨晚大厅里的舞台已布置成讲台。讲台后面的墙上也悬挂着同样

的旗帜。在讲台上就座的有：黄晋发、阮文孝和陈宝剑三人，这是我们的领导小组。他们三人与雍玉奇和冯文恭医生以及几个我不认识的人坐在一起。这些我不认识的人都是青年农民、工人、妇女以及各个组织的代表。他们分别是范春泰、阮友世、阮姑心和阮氏定。我还是被送进了大厅旁边挂帘的包厢里，不能同公开的代表们接触¹。他们都坐在大厅中间的板凳上。我也不能同坐在邻近包厢里的其他秘密代表谈话。加上20个左右坐在帘子后面的代表，与会者大约共有60人。当一个发言人起立宣布大会议程时，所有与会者都产生了一种期待的感觉。

大会议程宣布完毕之后，一个负责安全的代表起立向大家详细介绍为大会采取的安全措施以及遇到警报、空袭或地面袭击时应如何对待等问题。然后，冯文恭医生起来致开幕词。他宣布大会开始并祝愿我们成功地完成伟大的任务。陈宝剑随后作了关于南越政治形势的报告。阮文孝最后宣读了大会宣言和政治纲领。

这些文件中的忠告性语言似乎加强了大会戏剧性场面。大厅里每一个与会者都认识到，他们正在参加一个历史性事件。在大会兴奋的情绪中，阮文孝对“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名称的含义作了解释，说这个名称象征着南方人民团结奋斗，把南方从美国和吴庭艳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他指出，旗帜上的红蓝两色代表越南南北两部分，两色中间的金星象征南北方为了一个目标而团结在一起。《解放南方》这首歌是这个明确要求的反响。

¹ “公开”代表是那些生活在丛林中的职业革命家们。“秘密”代表是象我一样、表面上生活在政府控制区，而其“阵线”成员身份受到严格保密的人们。

中午，大会暂停，代表们吃饭的时候，人们显然十分激动。大会中洋溢着兄弟般的气氛和决心使他们无法平静。而对我来说，这些感情只能埋在心底。我蒙上自己的大围巾，被领回到小屋里一个人用餐。

午饭后，会议继续进行。社会各阶层的代表谈了他们各自组织的愿望。这些人包括宗教教派、知识分子、学生和农民的代表。听完了他们的报告之后，代表们用了一顿有汤又有菜的晚餐，主食是米饭。接着会议又继续进行，听取了那些代表前一天向大会提出的书面声明和建议。到将近午夜的时候，大会进行表决。代表们对大会宣言、纲领、旗帜等所有在我们眼前的东西都表示赞成，没有不同意的人。

最后，黄晋发提议，希望通过临时委员会委员名单建议草案，在下届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由临时委员会负责处理各项工作。尤其是，临时委员会不仅要向整个越南，而且要在国际上宣告民族解放阵线的诞生以及公开宣传它的宣言和纲领。（外交战线将随即打开。）临时委员会将加强争取人心的工作并且筹备下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在下次大会上，将选举正式的中央委员会和建立组织领导制度。此外，在整个南方，要继续发展我们的基层组织，尤其要注意发展西贡—堤岸—嘉定地区的组织。

黄晋发的提议再次被一致通过了。冯文恭医生当选为临时委员会主席。阮文孝任秘书长。12月20日凌晨，大会宣告结束。

我们的工作一完成，代表们就尽可能快地分别离去。因为他们知道，被发现的危险每时每刻在增长。我乘上自行车，立即沿着来时的崎岖小道，返回到老剑的家。我到他那时已筋疲力尽，但是精神上却很兴奋。我在老剑的那间小外屋

里脱下黑长裤换上我来时穿的衣服。随后，我就坐上了开往西宁的三轮车。到那儿，我就可以乘坐公共汽车回西贡了。这回我不再需要向导陪送了。

睡了一个晚上之后，第二天早晨，尽管身上还有些酸痛，我完全恢复了精神。就在这天上午，河内电台的特别广播节目传到了南方的每一个角落。它向人们宣告，民族解放阵线成立，同时播送了越南劳动党和北方政府的贺辞。满怀最崇高希望的时刻来到了。

第八章

加强“阵线”

1960年是吴庭艳担任总统的第五个年头。尽管他没有什么惊人之举，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吴庭艳的忧虑一定在加重。游击队的活动不但开始加强，而且得到了一个统一的政治组织的支持。总之，在国内，反对吴庭艳的言论日益畅言无忌，甚至达到了吵吵嚷嚷的地步。在数月不断的骚动之后，4月26日，18个最有名望和有影响的公民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严厉谴责吴庭艳的镇压政策。政府对此举的反应很典型：把所有18个署名者都投入监狱，而且严令禁止西贡的报纸继续刊载任何批评性文章。政府的每一个新行动都激起众怒。吴庭艳感到自己似乎正面临着越来越接近的大火。城市中的上层对他软硬兼施的策略十分恼怒。学生们不满政府的教育政策，走上街头，酿成了一场大示威。报纸猛烈抨击和抗议政府对报纸的限制政策。这些政策压得它们简直透不过气来。

被这股愤怒的浪潮所激怒的吴庭艳，日益怀疑他手下的人对他不忠。随即，11月11日伞兵叛乱突然爆发。幸亏吴庭艳对这起政变施展了明智的拖延策略，再加上艾尔伯特·范玉草紧急赶赴美获求援，吴庭艳才稳住阵脚，并对自己的敌人大举反扑。他不问清红皂白，逮捕了数千人，其中包括许

多与这次政变毫无关系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

在愈来愈高的抗议浪潮中，刚刚成立的民族解放阵线临时委员会加紧在首都发展力量。建立西贡一堤岸—嘉定区委的计划很快就制定了，这样可以利用吴庭艳政权的弱点，密切指导这个关键地区民族解放阵线的工作。在春节建立这个委员会似乎比较有利，那时政府的保安工作会松弛下来。再加上庆祝阴历新年的通常混乱状况，可以掩盖我们的聚会。

于是，就在1961年1月30日，我再次去中央汽车站，准备开始又一次长途跋涉。这次的旅程还不算艰难。我和我的新向导乘上了一辆去边和的公共汽车。边和位于西贡东北20英里处，是南越空军的中心基地。我们在边和又换乘一辆运货车去同奈河，那儿有一条机动小船，准备把我们送到上游的岗渡口，那是一个在河北岸的寂静小村。我在那里换上必不可少的黑色衣裤。在夜幕降临时，再次坐到自行车后座上，穿过当地的橡胶林，到达了新县地区的一个种植园。我知道这个种植园，它属于我的老朋友和工作组同志张高福家庭所有。

这里的居住条件可比不上我们在诺村的条件。一张悬在两棵橡胶树之间的吊床是我的卧榻。为了防雨，头顶上还安有一个塑料篷。在寒冷、蚊子肆虐的丛林中过夜，是好受不了的。我时睡时醒，无法安睡。我的护送者为了避寒，找来一个陶制的装胶桶，在桶里生了一把火，但是这令人愉快的火光释放出的热量显然不足以暖身。

这个不眠之夜逐渐变成了黎明。我们的早餐用的是热咖啡和鸡汤。我的护送者和我刚喝完，黄晋发就从丛林里走了出来。这回陪他的不是双马车兄弟，而是“六民”，六民是武文杰的化名，武文杰是前越盟的一个官员，多年一直隐藏

在西贡地区。他与朋友或亲戚居住在安全的地方，而且经常变换住址。他甚至在我家呆过几夜，这回又成了我的客人。尽管我们两人那时谁也想象不到命运如此曲折，武文杰竟在17年后无意中掩护我逃离越南。

我直到后来才知道，自抗法战争以来，武文杰一直担任着西贡—堤岸—嘉定地区的劳动党（共产党）书记一职。1954年以后，劳动党在南方保留着一个基干组织，在更重要的行政地区还任命书记负责领导工作。这些人、包括武文杰和他的同事一直留在南方。他们不是从事地下活动，就是巧妙地把自己的党员身份掩盖起来（有时他们确实都做过这两种事）。武文杰本人具有很大的魅力。他思想敏锐，坦率，待人诚恳热情¹。

武文杰热情地同我打招呼。他随身带着我们将要讨论研究的文件材料，其中一个告城市居民书，呼吁城市人民起来争取他们的公民权；加强反对吴庭艳及其政策的斗争。武文杰说，这次大会和上次代表大会的程序一样。如果我有什麼问题和意见，要写成书面的东西，事前提交大会。我又一次几乎花了整个白天研究大会文件。太阳落山以后，我就蒙上脸跟着护卫来到会议大厅。这个建筑同在诺村开会时的那个差不多，但是大厅里点的是煤油灯，光线不足。大厅两侧是为秘密代表们准备的挂着帘子的包厢。这表明，许多来自西贡的代表彼此还是不能相见。

在大会讲台上就座的有：黄晋发、武文杰和青鸾女士。后者是一个著名的女歌唱家和喜剧演员。她加入了游击队，并且现在在丛林里生活。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三个我不认识

1 当我写这本书时，他已是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

——原注

的人。会议程序和一个半月前召开的大会程序差不多。在宣布议程之后，负责安全保卫的官员向人家作应付紧急情况的指示。然后由黄晋发致开幕辞，武文杰接着作政治形势报告。随后是听取关于西贡各种群众运动的报告，中心内容是最近高涨的学生和新闻界反政府活动。在听取学生和新闻界代表的报告之后，黄晋发宣读告西贡人民书，并由各方面代表对这一号召书发表意见。然后他要求代表们对这一号召书进行表决。结果得到了大会的一致通过。

最后，鸾女士提议建立西贡·堤岸—嘉定委员会的领导小组：由黄晋发任主席，工程师黎文塌任副主席（他后来在临时革命政府司法部任我的首席副部长），阮文泰任秘书长。阮文泰曾经是西贡商会会员，后因被指控有亲共倾向，为逃避逮捕而投奔了游击队。

大会正式批准了鸾女士的提议之后，黄晋发宣布大会闭幕并通知晚上将举行文艺晚会，由解放文工团演出一台话剧。这个剧讽刺了西贡政府的腐败无能，剧名叫做《原始武器能战胜现代化武器》。虽然这个剧名显得有些冗长，但是剧中的连珠妙语和滑稽动作，逗得观众大笑不止。在欢庆新年的汤端上桌时，代表们的欢乐情绪又一次达到高潮。

在我坐上自行车的后座、穿越丛林回到岗渡口时，我开始感到自己象是干这类事情的老手了。不过，应该说，这次会议和第一次大会的组织工作一样搞得很好，对此我很赞赏。到达小村庄后，我脱下黑衫裤，换上原来的衣服，准备返回西贡。我一早到达中央公共汽车站的时候，正值街道里响起新年的爆竹声。

这一时期，我的家庭和职业生活一直比较安定。我在银行找了个工作，以便尽可能多地利用业余时间开展争取人的

活动。我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这项工作中。没有人怀疑我是民族解放阵线的成员。我只不过是一个十分关心政府的人，而在这方面，许多人是和我一样的。我会很自然地和朋友们、同事们接近，同他们谈论时事，了解他们的政治倾向和对时局的看法。我的家庭背景、所受的教育和当时我所处的地位，使我能够广泛接触政府、商业、知识界的许多人。我主动提出计划，不仅仅着眼于发展民族解放阵线的成员，也要罗致那些同情我们，或者是他们的部分意见同我们的立场相近的人。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当南越趋向爆发广泛的政治起义时，社会各阶层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

我费时间接触的不少人并不都能接纳进民族解放阵线，这是由于民族解放阵线同北方和共产党有关系。但是这些人都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观点。我尽力同这种人加强联系。几年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参加了民族、民主及和平力量联盟，即所谓第三种力量。在1968年以后，这一力量曾为争取南越独立而奋力工作。

另外一些人则愿意直接加入民族解放阵线。例如，我们能够把武文门司令以及他剩下来的部队争取过来。武文门是受镇压的平川教教派的领导人。高台教教派的蒙少校和和好教¹教派的十知上校也带着自己的武装部队加入了民族解放阵线。这些行动当然特别受到欢迎。这时正式参加阵线的还有许多其他人，如政府各级人员以及各种专业人员。他们同样受欢迎的。西贡社会到处是我们的人。

在这个时期，我每个星期日都要和黄晋发的联络员碰头，他会给我带来最新的政治与军事情况分析，以及向我通报有

¹ 高台教和和好教（另一个半民族主义性质的宗教派别）都拥有自己的军队。——原注

关全国形势的发展。我也非常了解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计划。这次代表大会将把参加民族解放阵线的所有的集团和运动统一起来，并且建立一个正式的长期的组织机构。1962年初，大会的一切准备工作已经就绪。2月初，联络员通知我作好离开西贡10天左右的准备。就在大会即将召开之前，令人懊恼的事情发生了。我的肚子开始剧痛起来。当时我患的胃溃疡病已处于中期阶段，无法下床活动了。

几周以后，通过正常的联络途径，我收到了有关代表大会的完整的报告。这次代表大会开得很成功，南方社会的各阶层、各民族和各地区都派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我们现在在省和区一级建立了系统的组织，因而具有足够的力量向西贡政府对很多地区的控制进行挑战。民族解放阵线说它是“南越人民唯一的真正代表”。它已经采取巨大步骤来证实这一点。

在上层领导中，选出了一个主席团，由阮友寿任主席，黄晋发任第一副主席。代表大会还产生了一个由52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虽然公开宣布的中央委员名字只有30人，其余22个有些是秘密的中央委员，其他则是保留给将来可能加入的另外一些集团的代表。联络员通知我说，我已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会的秘密委员。

由于召开了这次代表大会，民族解放阵线的战略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上，并且将在可见的未来得到证实。压倒一切的目标仍然是迫使美国从南越撤退，促进民族解放阵线与其对手之间举行谈判，以便建立一个新的南方政府。为了实现这些政治目的，我们将在政治、军事和外交三条战线上开展斗争。我们在战场上同我们的敌人战斗，同时，还要动员国内的支持来破坏吴庭艳政权。在国际上要团结盟友，同时不要

忘记美国人民。

这种三叉战略显示出在整个战争中我们斗争方法的特点。每一次军事冲突，每一次示威游行，每一次宣传运动都可以看成是这个统一体的组成部分。每一次行动的意义都远远大于其直接的后果。在这一构想下，我们可以把军事斗争视为一种心理战，同时还可以利用谈判来加强我们的军事地位，美国人似乎从未认识到这个战略的前景。而我们自己通常简要地把这种情况称为“边打边谈，边谈边打”。毕竟这是越南传统的对付战争的方法，是从几百年来反抗比我们自己强大得多的侵略者的斗争中总结出来的斗争艺术。

第九章

城市斗争

吴庭艳政权垮台后不久，我被任命为国家糖业公司的总经理。这个公司当时是越南最大的一家联合企业，雇员超过5000人。这个公司拥有四个制糖厂，两个提炼厂和两个酿酒厂。酿酒厂生产甘蔗酒和酒精。此外，我们还拥有一个纺织厂，专门生产装糖用的麻袋。同时，公司还有大宗的进口业务，大约每年要从国外进口20万吨糖。

由于接受了新工作，我的工作日程安排有了很大变化。上午7点至7点半之间我去上班，中午回家用过午餐再回到办公室，一直工作到至少晚上7点，常常甚至要忙到很晚才能回家。每周我对公司所属的企业要视察两次，监督生产、分配以及各个经理的工作。为了安排公司的进口事宜，偶尔我还得出国，赴台湾或日本。我的顶头上司是主管经济计划的副部长阮英俊，每周我要和他一起开一次会。经济部长也经常参加这种会议。

由于公司的工作占去很多时间，我先前一直在进行的宣传鼓动工作，就没有多少时间再搞了。此外，1964年初，为了适应吴庭艳倒台后的新形势，民族解放阵线正在全神贯注地制定军事和政治计划。确实，随着西贡政治局势的恶化，我们的注意力都被这一紧迫和具有潜在决定意义的形势发展

吸引过去了。我现在努力工作，正是为了加剧这场危机。

我们知道，美国出于对吴庭艳的异常恼怒，同军队将领们合谋搞了这次突袭吴庭艳的政变。吴庭艳政权疏远了一个又一个社会阶层，最后激起了全国大多数佛教徒的义愤。华盛顿驻西贡大使亨利·卡伯特·洛奇对吴庭艳的这种做法几乎不掩饰自己的失望情绪。尽管美国人不断提供必不可少的援助，吴庭艳还是轻蔑地拒绝了美国人劝其容忍除民族解放阵线以外的反对派的建议。当佛教徒们走上街头以死表示抗议的时候，吴庭艳却沉浸在被洛奇认为是一种莫名其妙的不妥协和轻蔑的情绪之中（总统的弟媳公开把这类事件称之为“烤猪”）。

洛奇一心想使政府尽量稳定一些，最后他完全失去了耐心，放弃了对吴庭艳的支持。美国政府通过中央情报局的特务卢西恩·科奈恩示意，它愿意支持陈文敦将军为首的军队的反叛行动。尽管这次军事政变取得了成功，但是随后政局的发展却并不符合美国的愿望。美国人受到的最大挫折是，新建立的陈文敦政府的效率还不如吴庭艳政权。尽管缓和与轻松的气氛取代了先前的紧张状态，但执政的军事委员会看来毫无生气，没有主心骨。过不了几个月，将会出现完全混乱的局面。

1964年1月30日清晨，陈文敦和他的伙伴们被军用车辆的轰鸣声吵醒。他们的住宅被包围了。令他们大吃一惊的是，包围他们的竟是自己以前的同谋者、精力充沛而又不知廉耻的阮庆。这样，一个动乱与政治上纷争的时期便开始了。面对这种局势，洛奇一定会极度后悔失去了吴庭艳。到了6月，这位大使就忍受不了了。他刚摆脱掉一个令人厌恶的独裁者，现在又要应付另一个更糟的人。由于对美国国内政治运动的

兴趣，洛奇决定辞去已干了将近一年的大使职务。我们认为，美国派谁来接替洛奇的位置，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显示出美国未来的意图。我们怀着极度不安的心情注视着局势的发展。

任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担任大使，是一个不祥和令人沮丧的消息。同时被任命的人还有威廉·威斯特摩兰，他负责军事指挥。由于这些新任命，美国直接干涉的可能性日益增长。一切迹象都显示出这个倾向。显然，美国人对南越的战略重要性的看法没有改变。但是，这时的南越政府却过于暴虐，难以驾驭，而且太脆弱，无法担当赋予它的任务。由于美国没有重新估价它在这个地区所承担的根本任务，华盛顿现在不得不更深地卷入越南事务，特别是在军事方面。我们感到，泰勒和威斯特摩兰将会增强美国卷入的领导和组织能力。我们无法了解美国进行调解的程度，但是任何美国部队的直接参与，都会带来最严重的后果。

不仅民族解放阵线，而且北方政府的领导都害怕局势发展到这一步。一旦美国人卷入战争，那么，通过谈判解决的机会，就会象夏季的阵雨，转眼即逝。因此，我们制定计划的目标是，尽力防止出现这个灾难。

1961年上半年，当美国干涉的危机即将到来之际，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防止这一危机的关键是，充分利用西贡政权政治上的弱点。我们没有改变战略，仍然强调在农村和城市加强政治斗争。在农村地区，我们采取措施，加强对解放区的控制；在双方争夺的地区，加速建立民族解放阵线的政权。这并不是要占据地盘，而是要在各地建立强有力的、永久的民族解放阵线的行政机构，使村民们把这些机构看成是自己的政府。在城市，我们要采取步骤，进一步增加压力，

争取实现谈判。如果我们能够真正削弱西贡政权控制农民的能力，在城市发动人民要求进行谈判，我们就完全可以制造一场美国人无力施加影响的政治危机。如果能够争取到群众的支持，我们就可以发动一场总起义。这是我们的战略目标。要不就是迫使风雨飘摇的阮庆（或他的继任者）政权迅速进行谈判。这两种发展前途都可以避开或者驱走美国军事干涉的幽灵。

当西贡局势在阮庆将军的无能统治下逐渐失去控制时，发动一场总起义的所有条件似乎已经具备。骚乱不仅影响到学生和知识分子，而且触动了一向难于安抚的佛教徒，甚至波及工商界。西贡有影响的工商界人士最终陷到灾难边缘。他们的既得利益使他们怀疑和害怕民族解放阵线。同时，他们又惧怕美国干涉和全面内战。在这个紧要关头，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各阶层的愤怒和怀疑变成一股力量，随时准备推翻阮庆政府的脆弱统治。

为了动员舆论，促成谈判和结束敌对行动，我们第一步就要组织起一个公开而合法的运动。这个运动同民族解放阵线没有明显的联系。为了避免过早引起警察的注意，我们计划在我们的一个朋友家里，借他家举行祖父母逝世周年纪念的机会，召开取名为“争取自决运动”的首次会议。这个朋友在嘉定做眼镜生意。他的大家族里的许多成员和朋友都要参加这种传统的纪念会。在这一场合，将增加40—50个特邀来宾。这些人当中没有一个是民族解放阵线的成员，但是对形势的发展却十分关注。

我有六年在西贡从事地下工作的经验，这使我不仅注意争取那些同情我们事业的人，而且注意团结那些同西贡不同阶层、不同派别有广泛联系和有威望的人。当焚香、祷告和

筵席结束之后，我们就言归正传了。如我所料，与会的来宾一致认为，南方正面临着危机。他们也充分意识到，对此应当采取行动。至少他们现在已经看出，需要互相支持。根据总协议和紧迫感，这一批人（在我的倡议下）马上成立了一个叫做“争取自决运动”的委员会。

阮隆律师当选为这个新组织的主席，副主席是工程师胡嘉厘，他是交通部的一个高级官员。另外选入委员会的三个人是：阮伯宜（工厂主）、陈友奎（教师）和我。这几个领导人都是西贡的知名人士，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除了阮隆以外，其他四个人都没有政治倾向，（就他们所知）我也和他们一样。

这些令人尊敬的、基本上属于保守派的人，没有什么政治野心，也看不出他们对行动主义有什么倾向。这些人能够以这样的方式联合起来，非常令人鼓舞。实际上，我只是作出一些安排，暗中指点一下。因为与会者对安排的领导人很满意，他们欣然同意我们对西贡形势的看法。现在只剩下采取行动的问题了。

第一件事是要起草和发表一个宣言。其他的人都十分愉快地接受了我起草的宣言。对我写的另一张传单的措施也没有提出异议。这两个文件都抨击了美国对越南的干涉，要求享有自决权利。我利用办公室的复印机把传单印了出来。传单的标题就是“自决运动”。传单写到：

“美国是美国人的美国。南越是南越人的南越。我们要求民族解放阵线和政府两兄弟¹之间举行和平谈判。南越必须享有决定它自己未来命运的权利。”

¹ 系指西贡政权和民族解放阵线。——原注

就在我们开始公布我们主张的时候，民族解放阵线对美国人的动向却日益感到紧张不安。自洛奇辞去大使职务以来，华盛顿一直在不断施加压力。在7月份，我们每周对美国战略所作的分析表明，约翰逊已经作出了干涉的决定，现在他正在寻找借口。我们也确信，美国总统会尽力避免承认民族解放阵线为合法组织的。任何这种性质的承认将标志着美国在东南亚的遏制政策的失败，而南越则是这一遏制政策的基石。因此，约翰逊会企图迫使北越中止对民族解放阵线的支持，希望民族解放阵线在没有任何援助的情况下慢慢地自行灭亡。我们进而能够估计到，为了赢得必要的影响，美国不久就会以某种持续的方式对北方发动攻击。

不久之后的8月初，美国就对北越发动了空袭，从此揭开了以武力对付北方的战略序幕。表面上，这次轰炸是东京湾事件引起的，而实际上，这是美国企图迫使河内中止同南方革命者联系的长期计划的一部分。然而，这个战略一开始就面临着失败的命运，尽管美国人可能相信，他们别无选择。这种特殊的方法完全没有对我们的状况作现实的估计。西贡政府脆弱得象根芦苇，在政治和军事压力下，随时都有可能倒台。由于阮庆政权岌岌可危，我们不可能因此放弃进攻，取消我们的计划和政策。尽管我们承认面临着困难，但是西贡政权的不稳定使我们的地位得以增强，我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在谈判桌上屈膝投降。在这方面，美国人正在试图对我们实施长距离的军事压力。但是，正当美国采取行动使军事冲突升级的时候，我们却把精力投到了政治战线上。因为我们懂得，在政治上取得一场决定性的胜利，就可以实现我们所有的目标，而且不管美国人作出什么努力，都将无济于事。

但是要做到这点，时间不多了。美国的决策人毕竟和我们一样，也在研究各种办法。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会意识到，对河内的军事压力毫无效果，至少在短期内是这样。到那时，他们将不得不加强西贡政权。要做到这一点，美国人只得参加南越农村中的战斗。只有这样做，他们才能为西贡的领导赢得足够的时间，以解决难题和维持有效的控制。如果回顾过去10年的历史，某些人可能认为，这个打算是异想天开。但是，华盛顿显然不准备放弃这个企图。直接干涉可能使河内长时间受到拧紧螺丝之苦。所以，我们迫使西贡政府坐下来谈判的时间不多了（东京湾事件七个月之后，美军就在岘港登陆）。

1961年12月，我接到黄晋发的指示，他要我进一步加强政治斗争，发动一场人民向政府的请愿运动，要求政府以谈判方式结束内战，并通过这场运动吸引国内和全世界的注意力。

因此，通过“自决运动”，我组织了一次由十来个在西贡有势力的人物参加的会议。我相信，西贡政权对这些人的呼声会立即有所反应。12月底，我们的第一次会议在我家里召开。艾尔伯特·范玉章就是在这个时候出人意料地从美国回到越南的。我们在制订行动计划时，艾尔伯特·范玉章就躲在卧室里。通过“自决运动”的力量，我们就可以在西贡和各省省会发动一场请愿运动，要求立即同民族解放阵线谈判。然后，我们就可以在各国众目睽睽之下，把请愿书交给政府。

召开过几次预备会议之后，在1965年最初的几天里，“保卫和平委员会”就在武丁街“自决运动”的办事处正式宣告成立。该委员会的领导人是范文贇博士，他在1951年曾

担任吴庭艳的难民事务专员。范文莹原来是北方人，他是在日内瓦协议签署之后，从共产党那里跑出来的。他的女儿吴伯成女士也是委员会的成员。她谈吐坦率，显然受过良好教育。她在巴黎大学、巴塞罗那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都获得过法律学位，并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教授过比较法。日内瓦协议签订以后，她曾担任吴庭艳的司法顾问。该委员会的其他成员还有艺术家邓文记、有影响的新闻工作者高明占、西贡大学历史系教授孙室扬记，他是一位越南的世袭贵族。

这些人很快就行动起来。他们在西贡和各省到处散发传单，号召人们参加请愿运动。这些传单是由“自决运动”组织的学生志愿小组印刷，并由他们挨门挨户地散发出去的。传单谴责美国袭击北方，要求政府通过在“两个敌对兄弟”之间举行谈判来实现民族和解。

当支持请愿书的签名达到数千人的规模时，“和平委员会”宣布，在1965年2月1日晚，在西贡市中心的一家饭店举行记者招待会。西贡政权此刻才意识到，眼前的事可能会产生严重后果。于是他们开始镇压，逮捕了一直担任委员会首席发言人的范文莹博士。

但是，记者招待会还是按计划举行了。艺术家邓文记代替范文莹博士出现在讲台上。当邓文记宣读请愿书时，饭店挤满了出席招待会的国内外记者。吴伯成女士负责把内容译成英语。随后，吴伯成手持麦克风发表了一篇讲话，激烈抨击政府逮捕她的父亲。

警察在会议开到一半的时候赶到了。他们急于制止会议，害怕事态扩大而无法控制。但是由于有外国记者在旁边看着，他们就犹豫起来，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在这个时候，委员会向与会者散发了印有越语、法语、英语的声明。吴伯成女士

号召大家上街游行，向政府示威。这时，警察实在忍不住了，连忙宣布会议结束，大家应当回家去。

然而，吴伯成女士和其他一些人并没有轻易退缩。在饭店外面，委员会成员和支持者们分成两批。一批人向嘉龙宵进发，准备向当时阮庆政府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潘克丑递交请愿书。另一批人前往“国际监督委员会”的办事处，请求该办事处向民族解放阵线转交请愿书。

这次激动人心的记者招待会结束后，过了几天，我比平常稍微迟了一些来到办公室，发现有两个衣冠楚楚的人正在等我。当我请他们两人进我的房间时，他们中的一个人对我说：“发生了紧急问题。”然后自我介绍说，他是一个国家警察官员，又递给我一封国家警察局长范文嫫写给我的信，信中邀请我与他本人会晤。两位来访者虽然尽量表现很客气，显然，这种邀请是无法拒绝的。我请他们等我一会儿，待我给下面几个部门负责人交待一些事情。我告诉手下的人，我可能要外出一会儿。随后，我就和那两个来访者一块出了大门。

到了外面，他们请我上他们的轿车。我对他们说：“不，谢谢，如果你们不介意，我还是坐我自己的车。”我话音刚落，那两人就爬进公司的那辆福特猎鹰牌汽车，在车的后排座上，他们两人把我夹在中间。其中一人给他们的司机打了一下手势，示意让他的车在后面跟着。我们到达警察总部的时候，那两人对我的司机说，总部周围没有停车的地方，他最好还是把车开回糖业公司。

走进警察总部大楼，那两个人并没有带我到范文嫫的办公室，而是把我领进一间大审讯室，屋子里的人全是被警察抓来的。他们有的在报到处附近徘徊，显得坐立不安。有的

坐在20来张桌子后面同便衣警察谈着话。我在屋里观察着，开始找我认识的人。最后我发现，几乎所有的“自决运动”成员与“和平委员会”的高级人物都在这儿。其他一些知名人士也进来了，他们正在同面露倦容的审讯者大声争辩。显然，凡是在西贡帮助散发传单或者是在请愿书上签名的人都被警察一网打尽了。

我对眼前的情景并不感到吃惊。范文贇博士早在记者招待会举行之前就被抓走了。第二天，身任“自决运动”主席的阮隆律师又遭到同样的命运。从那以后，我就预料到，政府为了防止这场运动演变成燎原大火，一定会加紧镇压这两个组织，我知道，警察早晚 would 来抓我。

我坐下来等待审问的时候，不断有新的人被带进这间审讯室：有的是学生，有的是工人，还有商人和知识分子。在我们的这些支持者人流中，随时都能发现知名人士的身影。就好象这些西贡精英要去出席上层社会的聚会，但是却找错了门。

轮到审问我时，我走过去坐到—个中年警官面前。他看上去已经疲惫不堪，工作热情大减。他用呆板的声—音问我，民族解放阵线和我有什么关系，而且一口咬定我有这种关系。我有礼貌地否认了他的指控，语气里带着几分轻蔑，暗示他竟然会有这种看法。我了解，他难于相信，处于我这样地位的人会同民族解放阵线搞在一块，比起那许多挤在这间屋子里的商人、政府官员、医生和律师来，他没有更多的理由相信我会这样做。如果这些人都是越共的话，那么，屋子里剩下的人就只有警察和士兵了。我和审问者都清楚，问这些话只不过是例行公事。当我明确地对他说，如果渴望和平有罪，那么我会以此为荣时，他甚至没有什么反应。好象在审问我

之前，他就听到过这样的回答。

大约问了10分钟左右，审问者就不耐烦了。他挥手招呼卫兵把我带走。结果，并没有把我带回到大街上去，而是把我押进了警察总部旁边的一间大囚室。囚室里面关押了大约30名“自决运动”与“和平委员会”的成员。我一踏进这间囚室的大门，就受到先来者的鼓掌热情欢迎，好象我是一个刚赶来参加聚会的贵宾。每进来一个新人，就会受到同样的欢迎。卫兵几乎是恭敬地、甚至有些敬畏地看着这些名人聚集在一起。他们曾被告知要采取克制态度。

我在牢房里呆了一个星期之后，潘辉括总理就宣布，要将范文肯博士、孙室扬记教授和高明占记者驱逐到北越去。拿这三个人开刀，因为他们是“和平委员会”的领导人。特别是该委员会搞的请愿和向外国宣传令当局无法容忍。驱逐他们，目的在于警告我们其他人，不准再搞抗议运动。警察指控我说，“自决运动”组织曾允许“和平委员会”的人使用它的办事处开会。因此，我们同那些危害国家政府的人已经同流合污。”我被告知说，这种行为是令人不能容忍的。

许多在请愿书上签名的人都被迫要签署一项声明，宣称他们在请愿书上签名是受人引诱，并保证今后不再在类似的文件上签名。但是，两个组织的领导人没有被轻易放过（在吴庭艳统治时期，法律规定，如果被指控犯有颠覆罪，就要移交军事法庭审理）。因此，阮隆律师、吴伯成女士、艺术家邓文记、陈友奎老师、胡嘉厘工程师和我以及其他几个人一道，将被押往支和中央监狱，在那儿听候军事法庭的裁决。

在支和监狱，我们很快就发现，某些囚犯的生活还不算太难熬，至少对我们来说是这样。我们所在的那栋房子只有

大门上着锁。在房子里面，我们可以自由走动，看守的卫兵对我们的态度友好，管束也不严。他们满不在乎地向我妻子索贿，这已是一种习惯。他们知道，就是在我出狱之后，他们也还会照样做的（后来他们的确这样做了）。我们可以在门外进行长时间活动，自由阅读书报，需要什么东西，几乎都能获准得到。铁窗生涯为我们创造了共同生活的机会。我们一起做饭，一道用餐。对我们所关心的问题一块进行详尽的讨论。实际上，警察为我们提供了免费的房间、膳食和开会场所，使我们得以发展和增进友谊，制订我们未来的计划。在我们的牢房里，某些西贡最大的家族成员开始感受到团结与兄弟情谊的温暖。在共同经历过战斗与苦难之后，才会产生这种感情。他们开始感觉到象个革命者。他们中一些人的政治活动生涯，就是从这时开始的。政府以后将会对这样的结果感到后悔。

我被押进警察总部以后，即我受到审问的第二天，我的妻子来看我，给我捎来干净衣服和一篮子食品。转到支和监狱之后，当局允许她每周探监一次。每次她都要给我带来家中的食品和干净衣物，拿走我的脏衣服。我们都不太注意外面的局势。大家在一起的日子过得不算坏。范文萱、高明占和孙室扬记三人被驱逐以后，我不大相信西贡政府会采取更加严厉的惩罚措施。我心里有底，我的民族解放阵线成员身份肯定没有暴露。令我妻子也感到高兴的是，有一次她探监时，竟能把黄晋发写给我的字条顺利交给我。那张字条上写着一些祝贺我的话：“你为和平事业和你的国家采取了勇敢的行为。”署名是“三志”，这是黄晋发的化名。

我的难友们和我一样，心情没有那么不安。我们毕竟是享有一些特权的人。即使我们被政府部门辞退工作，我们还

是能找到新工作的。在越南，训练有素的专门人材奇缺，将我们掌握的技能弃之不用，简直是太可惜了。另外，我们知道，我们可以依靠许多家庭关系、朋友和同事的帮助。在越南紧密交织起来的关系网中，这些相互的关系和义务是得以生存的要素。人人因根深蒂固的习惯思维方式和既得利益而需要这种关系安全网。在我被关在支和监狱期间，来探望我的还有我的上司阮英俊副部长，他向我表露他对我的支持和友情。这个姿态对我来说有很大的意义。在一个对个人的忠诚大大重于组织机构关系的独特的社会里，这类事情是正常的。

在我们转移到支和监狱的同时，另一批囚犯也到了这里。几天前，艾尔伯特·范玉草发动的政变失败了，那些因参加政变而被捕的人都被关在比我们更高一级的牢房里。在每天散步和放风的时候，两伙人（卫兵分别称我们为“和平集团”和“政变集团”）混在一起交谈时，我们互相交换信息，互相鼓励。被怀疑与范玉草的政变有牵连的军事或政治领导人以及和平请愿者们当然想不到，他们的行动是由民族解放阵线的代理人特别安排的。尽管如此，他们参加了民族解放阵线为防止美国军事干涉而进行的最后拼死战斗。两周以后，即1965年3月8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岘港登陆了。

直到8月8日，军事法庭终于开庭，指控“自决运动”领导人“威胁国家安全和从事颠覆活动”。同时另外几个人也受到审判。这是政府对各种形式的和平运动的一次大镇压。在这些人当中，有著名的女诗人阮玉昌。法庭指控她用赞美和平的诗句来瓦解军队的士气。按照审判长的话说，她的危险性不亚于传奇般的中国将军张良，此公在临战前吹起动听的长笛，以瓦解敌人的斗志。

阮玉昌由于发表瓦解士气的诗篇而被判五年徒刑。她的丈夫是“和平委员会”成员，被判10年徒刑，其中5年在国内流放。阮隆律师和陈友奎教师被判处同样的徒刑。其他人被判刑期长短不一。由于我的妻子给了审判长5000元贿赂，我的刑期只有两年。那个审判长后来成了阮文绍手下的安全顾问。

在法庭上，我发表了一个简短声明，大意是：“为了和平事业，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认为有必要，我就将进行斗争。”然后我就回家去了。屈指一算，我被扣在监狱里已经有半年多了。

第十章

再度被捕入狱

临出狱前，法庭加判我停职六个月，目的是想叫我记住，即使我走出牢门，仍然要背黑锅。这项判决对我的损害程度要比过去严重得多。在越南这样的国家，法国人热衷于衔头和地位的习惯已经和原来当地的尊重达官贵人的传统结合在一起。因此，这个社会对个人地位上的细微变化十分敏感。在这个环境里，如果我打算继续搞我的争取和组织人的工作，就必须保持住我原来的地位，取得人们的信任，这是很重要的。因此，在1965年夏末，我回到家中不久，就开始千方百计为恢复我失去的有名望的地位而奔走。

我的第一步是要求当局重新考虑我的问题。我向阮英俊副部长和其他人申述说，我为实现自决权而进行的工作，根本没有越出我个人的权利范围。我没有犯什么罪。根据法律，我只有在不能胜任自己工作的前提下才能被辞退。但是，并没有对我的工作能力提出过什么问题。后来我的案卷慢慢转到潘辉括总理的桌上，以后就再也没有听到下文。

在这期间，我又采取另一种方式，准备联合几个经商的朋友开办一家私营银行。我们作好了必要的法律和财政各方面的安排之后，就开始活动以获得必不可少的许可证。就在烦琐而拖拉的办理许可证过程中，我接到阮英俊副部长的邀

请，约我到他办公室去见他。会面时他对我说，他准备重新让我回糖业垄断公司，不过这回不是担任总经理，而是改任审计长。

由于我的工作问题最终解决了，我得以重操争取西贡上层政府官员和专业人员的工作。为了瓦解西贡政权，这种我已搞了多年的政治活动仍然具有重大意义。过去一年，由于美军大规模入侵，迫使我们把侧重点放在军事战场。这是没有问题的。正如我们早已预料到的那样，美国干涉改变了这场战争的性质。这就要求我们改变以政治斗争为主的战略，这个战略是斗争第一阶段的标志。

为了同急剧增长的敌人力量相抗衡，越来越多的北方部队开进了南方，同时，许多北方干部开始占据民族解放阵线部队的政治机关中的位置。这种军事集结正在改变这支革命队伍的构成和战略的发展。在发生巨大转变的时刻，陈白腾通过一个联络员捎话给我，他想马上见我，讨论民族解放阵线新的城市战略问题。

陈白腾是西贡—堤岸—嘉定地区党的常务书记，他全面负责动员城市知识分子的工作。他本人是一位杰出的宣传鼓动家，曾争取到不少高层人士参加民族解放阵线的秘密组织网。这些人中不仅有工业家、银行家，还有一些越南最著名的作家。陈白腾还担任“青年解放协会”主席。这个组织是青年革命者的全国性组织。某些人认为，它是党的红色卫士。

在6月份的第二周，我在一个任纺织公司副经理的朋友家里同陈白腾见了面。我们仔细讨论了民族解放阵线1966年决议中所规定的政策。总的来说，这份文件反映出最近政策的变化，强调在冲突中要保持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平衡。它规

定今后两年的总战略是，在农村开展武装斗争，在城市开展政治斗争。在西贡，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动员青年人参加革命活动。

特别是，我们打算寻求新办法利用城市里易于激动和好斗的青年来加剧城市人民与西贡政权之间的政治对抗。“三哥同志”（即黎笋）1966年春在致西贡党委会的一封信中，阐明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想法：

“我们必须利用一切手段和方法来动员和团结青年和妇女，因为他们代表了城市中政治与军事斗争的主要力量。

“为了把广大人民群众团结组织起来，我们必须发展大量的过渡性组织。这些组织将在多种多样隐蔽形式下进行公开或半公开活动。这样做是为了以最便利的方式引导群众响应我们的斗争号召。与此同时，隐蔽我们的核心力量，这样就能够成功地开展活动。

“这些隐蔽组织可以采取许多形式。只要这些组织能够团结群众。只要我们能够使群众逐步走上革命的道路，保持和壮大群众队伍。通过从低级到高级的各种形式的斗争，使群众保持革命精神。有关这些组织的形式、名称、规章和领导问题我们完全可以灵活掌握。重要的是，党员或忠实可靠的青年和妇女应当成为这些组织的核心力量。”

美军的最终登陆，消除了我们极大的紧张情绪。这种情绪一直是惧怕外来干涉的人民的一大包袱。在这个时候，就更需要仔细地安排各种运动，使它们向着总起义这一目标发展。青年们富于感情又无所畏惧，可以用来带动其他派别和运动。同时，一旦爆发街头革命，青年组织可以提供指挥这场革命的干部。

。这实际上并不是什么新东西。领导上一向认为，青年是

促成革命危机的主要动力。“先锋青年”组织在1945年8月革命时，就是促成这一起义的“发动机”。1965年我们恢复采用“先锋青年”作为青年组织的名称。参加“先锋青年”组织的青年是陈白腾的“解放青年”的干部从高中、大学和工厂争取来的。原设想把“先锋青年”办成一个有战斗力的青年组织，但是青年的反应不太热烈，因此，后来就打湾了这个计划。

为了掀起新的更大的抗议浪潮，陈白腾要求我动员全市的青年运动，包括那些与我们没有联系的青年组织，如佛教青年、基督教青年组织以及高中、大学的学生会、青年工人组织等，以形成促进总起义爆发的核心力量。这件事不应直接去做。相反，我们要先建立一个由我们秘密控制的伪装组织，只有在时机完全成熟时，这个组织强有力的反政府领导才能公开发挥作用。我将不得不再次进行公开活动。

在我和民族解放阵线负责群众工作的副主任谢伯宋召开的制订初步计划的会议上，我被介绍认识了几个协助我工作的人。三茶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受委派担任我的联络员。他是个越盟的老抵抗战士，是我在民族解放阵线最早的同事之一，冯文恭博士的内弟。他看上去好象精力充沛，决心很大，发言中充满革命词藻。由于我们正在策划的行动是公开性质的，对此我感到有些紧张。

我参加了“自决运动”与一些和平组织的工作，后来又被捕入狱，因此赢得了持不同政见者的声誉。我告诉各派青年领导人，我们应当组织一次会议。如果所有组织能够统一行动，那么我们就可以极大地增强青年集团的力量。大家对我的建议反应热烈。我安排6月30日在守德郊区的一所房子电举行会议。我在会议上积极倡议建立一个能够协调政治行

动的广泛组织。我的倡议受到欢迎并引起大家的热烈讨论。结果建立了一个“南越青年协会”。虽然我已经13岁了，但仍被推选为协会的第一任主席。我拿不准自己是否能胜任这项工作。

在这次会议之后的一系列会议和讨论中，三茶超出我的意愿，越发活跃起来。他发表长篇讲话，大谈人人必须有献身精神，需要进行不停的斗争，绝不能有妥协思想。他的话虽然不会产生什么坏作用，但是，他的不谨慎会引来破坏，特别是考虑到他担任联络员职务，本应十分小心行事。

尽管三茶刺耳的说教方式叫我担心，但他是一个效率高的行政工作者，有时能够迅速圆满地完成复杂琐碎的任务。在这个时候，因我要做的工作太多，所以，助手们的工作效率对我来说是特别宝贵的。我现在得同时扮演三个角色。我利用我的审计长这个新职务作为一条战线，继续争取西贡的知识分子和管理人员阶层，目前的工作是使其向独立的民族主义者的“第三种力量”发展，只是没有预计需要三年才能正式形成这股力量（当时我还猜测不到这一点）。争取工作是秘密的，是用暗中活动的方式进行的，这是为了防止被警察发现或者在同那些不作出反应的人联系时受到怀疑。而我从事的青年工作则完全是另一码事。

我是以公开身份从事青年工作的。我是“青年协会”主席，经常与西贡的许多青年俱乐部和青年组织的领导人联系，举行会议、聚餐和聚会，尽力争取他们，并安排他们在我的组织中担任负责工作，给他们以帮助，尽可能博得他们的好感。我每月定期举行所有青年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他们当中既有加入“青年协会”的人，也有将来可能加入的人。我还组织青年人参加大型聚会，讨论在当前祖国历史上的艰难时

期青年们所肩负的重任。我举出了较发达国家青年的献身精神为例（在西方国家中，我最了解法国，所以总爱举法国的例子）。

警察有礼貌地注视着我们的活动。虽然有时我也谨慎地涉及政治问题，但从来没有谈得很深。而且议论时总是用爱国主义的词句。表面上，我们没有做什么反对政府的事情，也没有对民族解放阵线表露过同情，或者直接讨论革命问题。我确实不是为直接的革命目标而把他们组织起来的，而是建立联系，争取群众同情，寻求和利用共同的感情，唤起大众的民族主义热忱。这种热忱将有助于未来的革命。我正在逐渐建立自己的控制机构，准备一旦时机成熟，就能及时操纵我的系统运转。

警察认为我是一个令人头疼、不能让人放心的怪人，但又不象是想危害这个政权。为了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反复无常但实质上无害的政治上的理想主义者，我开始仿效西贡上流社会玩乐和无聊的生活方式，也玩乐享受起来。我继续做好审计长的工作，但并不表现出对这个工作过份热心。一到周末，我就带妻子和女儿到坐落在头顿的海滨住所度假。要不就上大叻山游玩。在这些胜地进行社交活动，或打网球，游泳。周末之夜，我不是和朋友们一道出入夜总会和饭店，就是协助安排各人自带食品突然到某朋友家里聚会和打“四色牌”。这些是晚上进行社交必不可少的活动。我每月薪金比一个内阁部长的收入几乎多两倍，但仍然入不敷出。我相信，监视者会把我在“青年协会”的活动看成只不过是想在政治上搞点最吸引人的东西，这是西贡有钱人的一种寻欢作乐。在我尽力工作和伪装下，这一年转眼就过去了。

1967年6月16日12点1刻，我下班开车回家，打算与妻

子一块吃午饭。这时，一辆小汽车突然闯到我的车的正前方停下来，一下子把我的车挤到路边。我还没弄清怎么回事，两个男人就从车上跳了下来，他们猛然拧开车前门，把我的手从方向盘上拽了下来，并把我推到座位中间。我马上意识到，这些人都是保安人员。但是我还是奋力叫喊：“你们这样做想干什么？你们是些什么人，是土匪吗？”汽车启动之后，他们向我出示了保安人员的身份证，并说阮玉鸾将军要“请我去谈话”。阮玉鸾是南越秘密警察头子，在后来发生的春节攻势中，他成了世界新闻人物。当时一名摄影师把他在街上持枪向一名越共俘虏头颅射击的镜头拍了下来。早先阮玉鸾的行事方式在人们眼中就不那么温文尔雅，这次“逮清”当然要比我上次被捕入狱时粗野得多，也更令人不安。当汽车载着我驶向堤岸即西贡的唐人街时，我向押送的人抗议说，这条路并不是通往保安警察总部。押车人猛力把我推回到座位上，算是对我的回答。我屏住呼吸，看到花明市场从车窗外一晃而过，小贩和家庭主妇正在那里忙碌着。又驶过几座建筑物之后，车子在一幢别墅前停了下来。我认出这是平川教教派的旧总部。这个地方一度是平川教教派用来开设赌场和作为贩卖毒品的中心。我走下汽车，发现别墅旁边有一个象被废弃的锯木场或木料厂，周围架设着铁丝网。

走进别墅，押送我的人把我推进一间很象是接待室的房间里。他们把我的裤腰带解下来，又要我把鞋子脱下来，同时还没收了我的证件。随后，他们带着我穿过走廊，走进了此处主人的办公室。门打开了，我发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个身材高大、身穿制服的男人。他眯缝的双眼对我闪露着凶光。我立刻意识到，这人是刽子手！（不久我就知道，他实际上是个职业拷问者，曾亲手拷问过许多人。此刻我虽然还不

了解这些情况，但是从他的一副凶相上就能感觉到他是个残暴的虐待狂。我迅速思考着对付他的办法。他们不可能知道我的民族解放阵线成员身份。他们一定是对我的宣传鼓动活动感到恼怒，于是这样把我带到这儿来教训我一顿。当然他们想要彻底调查我的关系。但是，（我想）如果我什么都不承认，他们能拿我怎么样？只要我表面上坚决，把自己装扮成完全是一个受委屈的人，最后就能安全脱身。

当这些想法在我的脑子里闪过的时候，那个刽子手突然向我吼道：“你是个越共分子！所以我把你抓来！”他不等我开口答话，就尖声嚷道：“你想见见你的同志吗？”

随后，他朝站在门旁的卫兵使了一下眼色，高叫：“把三茶那个杂种带进来！”

三茶！我一下子惊呆了，象泄了气的皮球，喉咙也哽住了，几乎透不过气来。一阵极度疲乏感透遍全身，我的力量和意志此刻已不复存在了。我心里暗想，现在没有什么可以否认的了。就象有人关上了开关，我原先竭力思索的对付办法一下子就从脑子里消失了。我完全陷入了孤立无援之中。

为了掩饰过份的暴露，那个刽子手停了一会儿，然后又张嘴说起来。这回话音虽然柔和了一些，但是听起来还是跟吼叫差不多：

“你知道，我拥有打你至死的权力。带到这儿来的越共分子的生命都攥在我手里。这儿没有任何法律可以保护你。我可以任意处置你。”

我不知怎么找到了回答他的话。我说，我热爱祖国，办事凭良心。尽管这些话在当时的情况下起不了什么作用，但是，这是我的肺腑之言。我知道，那个刽子手跟我说的都是真话。南越宪法第四条特别提到，法律不保护共产党人（所

有民族解放阵线成员都被认为是共产党人)

这时卫兵把三茶推进了这间房子。这位过去的狂热分子双目低垂，眼睛盯着地板，不敢抬眼看我。他了解在西贡上层组织的全部秘密关系网。我立即意识到，如果他出卖了我，那么，他也出卖了我们所有的人！

我一句话没说，也没有什么可说。

刽子手猛地按了一下姆指，示意卫兵把我带走。卫兵用枪顶着我的后背，粗暴地把我推出口外。我被带着拐了一个弯，来到另一条走廊。猛然间，走廊里阴森可怖的景象一下子闪现在我眼前，我立刻惊呆了。走廊两旁的人都戴着脚镣，脸上被打得隆肿和血迹斑斑，青一块紫一块，肢体不自然地扭屈着，有的痛苦地蠕动着身子，有的躺在地上发呆。从混乱的人堆中传来呻吟声和哭声，气氛悲惨，令人压抑。我的心脏开始剧烈跳动起来。在这条走廊的一侧有几扇门，显然是通向审讯室的，不断有咒骂声和一阵阵痛苦的尖叫声从门里面传出来。

走到将近大厅尽头时，我被卫兵推进其中一间屋子里，这间屋子很小，大约有10平方英尺，对面的墙那边摆着一张桌子和一张椅子。一个审问者坐在桌子后面。我一进屋并没有先注意到他。在桌子一侧的地板上躺着一位失去知觉的妇女^①，面色惨白，象具死尸。这间房子左后方有一间耳房，

① 事实上，三茶比我早一个星期或八天就被推了审讯中，他供出了所有由他负责联络的秘密干部。据了解，他听到要给他死刑，就垮了。实际上，他并没有受皮肉之苦。后来民族解放阵线以叛卖罪判他死刑，在1968年春节攻势中将他处死。——原注

② 我后来才知道，躺在地板上的妇女是陈白腾的妻子。她受过多次审讯，但昏厥过去。几年以后，她成为参加巴黎和平谈判的临时革命政府代表团的成员。——原注

那里原来是一间浴室。浴室里有一个抽水马桶，上面盖着一块板，板上躺着另一个妇女，她也是一动不动。我惊呆地看着这一切，随即被推到桌前的那张椅子上。审问者坐在我对面，下一个该轮到我了。

那个官员的脸我现在记不清了。他把一支铅笔和一些纸推给我，要我把我的活动情况全部写下来。然后他就站起身，走了出去。房间里只剩下我和两个失去知觉的妇女。我想，我一定写了好几个小时。我叙述了我在“自决运动”与“和平委员会”里所起的作用以及我在西贡青年团体中的工作。所有我认为三茶可能泄露的情况，我都写了下来，但是小心不提及三茶不知道的任何人。在这一整段时间里，躺在那里的两个妇女没有动弹，也没有声音。没有人进来查看她们是死是活。

我写完了材料之后，那个官员回来看了一下材料，就把它拿走了。只是在这个时候，躺在地上的妇女才动弹了几下。她慢慢半睁开眼睛，谨慎地环顾了一下周围。看到审问者不在，她便看着我，声音嘶哑地小声说：“你不知道我是谁，但是我认识你。三茶把一切都跟他们说了，你只把三茶了解的东西讲出来就行。”我点了点头，力图让她了解我自己正是这样做的。

过了一会儿，一个卫兵给我端来一碗米饭，上面放着一小块干鱼。这时我才感到肚子饿得发慌，几口就把饭吞进肚里。我想知道审问者什么时候会回来。但是没有人再进过这间屋子。陈白腾夫人和另一位妇女仍然躺在那里，不断呻吟着。我坐在椅子上，思绪很乱，脑子里也不知在想什么。

接近午夜时，一个卫兵进来再次把我带到主管办公室。这回那个刽子手倒没有叫喊，可脸上仍然怒气冲冲。他说：

“你是个共产党员。”

我加以否认，说：“我承认我是一个民族解放阵线的成员，但我没有参加党。我从来不是一个共产党员。”我的回答似乎激怒了他。

他说：“听着，难道你还是不明白，三茶把一切事情都告诉我们了，包括你和你所有朋友的情况。我们知道你是个共产党员。”

我回答说：“不，你搞错了。我从来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三茶并不知道这方面的情况。”

他说：“你一定是个大笨蛋。你就不知道拒绝承认会给你带来什么后果吗？还需要我告诉你吗？在这儿我们有对付你这种人的办法——严厉的办法。”

我看着他的眼睛，再次告诉他我不是党员，试图使他相信我讲的是实话。他盯着我看了一下，转身对卫兵说：“把他带出去。”

卫兵架着我的两臂，把我带进旁边的一间房子，那里看上去象个中世纪时的行刑室。铁钩、绳索和一圈圈铁链吊在天花板上，象脚镣和手铐的铁链一样。这后一种刑器是被囚禁的民族解放阵线成员和积极分子所熟知的。他们称之为“飞机”。在房子的一个角落里摆着一部发电机，几张桌子和几条板凳放在房子中央，有的则堆在墙的旁边。

他们把我按倒在一条矮板凳上面，仰面躺着，让我的头部空悬在板凳一端，然后把我的双手用手铐扣在板凳底下，双脚也用脚镣扣在板凳的另一端。用布包住我的眼睛和鼻子，随即猛力掰开我的嘴，往我喉咙里猛灌肥皂水。我拼命摇头，但是动不了。我呕吐起来，根本喘不过气来。我窒息了，随后失去了知觉。

待我苏醒过来，一个卫兵猛力地压我的肚子，迫使我呕吐。一切东西，包括水都从胃里翻了出来。许多天以后，嘴里仍然有胃液的可怕的苦味。这些事我至今记忆犹新。（尽管我那时还不知道，肥皂水会给人的消化系统带来永久性的损害。）我拼命摇晃脑袋，力图防止因呕吐所引起的呛水和窒息。

灌过肥皂水之后，卫兵打烂我手脚上的镣铐，把我拖向走廊里的一间囚室。这就是我的落脚之地。这间空荡的小房间约有20平方英尺，里面没有任何家具，没有床，甚至连一块木板也没有。没有厕所，也没有小桶，甚至地上连个洞也找不出来。我瘫倒在冰冷的水泥地上，眼前一片漆黑。一缕微弱的光线从走廊里通过囚室紧闭的木门透进这间小房间。

我在地板上可能躺了两三天。在这漫长的昏天黑地之中，要准确地计算时日是做不到的。从走廊深处不断传来受酷刑者的惨叫声。我只能觉察到，卫兵在送饭时在门口出现，把一碗米饭放在地上就走。我曾一两次强打起精神敲门，求外面的人带我去浴室，其他时间我好象一直处于瘫痪状态。除了腹部持续的肿痛外，我再也没有别的感觉了。

这样过了几天之后，我又被带到那个刽子手面前。我知道他还会要我承认是个共产党员。可是我打定主意坚持自己的说法。西贡政权认为，任何人只要反对这个政权，就一定是共产党。这是西贡政权的一种思维方式。它不承认这样的事实：可能存在着这样的人，他们仇恨这个政权是由于这个政权把国家引入了歧途，是由于这个政权听不得不同意见和贪污、腐化以及对它的许多国民漠不关心。对他们来说，只要是政府的反对派，就一定会得到暗中为害的外部支持。因此，应当给这些党派贴上标签，最后把它们彻底消灭。我暗

下决心，只要我能做到，他们休想在我身上捞到什么好处。

这回，那个刽子手表现出无疑他以为是较仁慈的态度。

他对我说：“好啦，你现在知道了这样能给你带来什么结果。这种结果可能会更坏，还得多。但这些都是不必要的。你知道我想要你干什么，只要你承认你的身份，我们就可以把其他一切都忘掉。”

我没有回答他，只是注视着前面，避开他紧盯着我的眼睛。

他继续说：“没有人敢于同我对抗，没有人是硬骨头。我跟你讲的都是实话。想和我试试也毫无用处。现在就承认，别等到最后对你采取措施，你才承认一切。”

我以自己没有觉察到的勇气回答了他。我说：“我不是共产党，不管你把我当作什么人，我不能对你说你想要听的话。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决不能这样做。”

刽子手耸了耸肩，叫我回牢房，对此事再考虑两天。这次我感觉略好一些，对每天两次送进来的米饭和鱼干也开始吃起来。后来有一天晚上，我被人摇醒，又被带回到刽子手那间办公室，新一轮威吓行动又开始了。这回，在简短审讯之后，卫兵没有押我回牢房，而是把我拖到走廊中的一间行刑室里。

他们撕开我的衬衫，用电极夹住我的乳头，然后启动发电机。在他们扭动开关时，耀眼的火星跳跃在我眼前。随即，一阵令人肝胆俱裂的疼痛传遍全身。在我昏死过去之前，我只感到两只眼球快要 from 眼眶里蹦出来了。

醒来时，我知道自己正躺在地板上。令我吃惊的是，我还能辨认躺在我周围的人。显然，我没有被电刑弄瞎，但是我的双眼痛得很厉害。我想坐却坐不起来。后来，我又发现

我是在审讯室外边的过道里。我在五六天前第一次看见这个地方时，曾感到非常可怕。我周围的囚犯和我一样都瘫倒在地上，脚上戴着脚镣。我旁边一个人正在按摩我的太阳穴。我的耳朵里充满周围传来的低沉的悲泣声。

我在过道里没有呆多久。一个卫兵看到我苏醒了，他弯腰将我的脚镣打开，然后把我拖回牢房，扔在水泥地上。我朦朦胧胧地躺在地上，处于半昏迷状态。只记得我几次被带到刽子手那里，但是到那里后发生什么事，就记不起来了。黑暗中，我躺在坚硬的水泥地上，不吃也不睡，外面传来的惨叫声，白天黑夜不断灌入我的耳朵里。只有每天定时送进来的饭碗，才暂时打断一下这种气氛。我只意识到，我已经深陷于永远无法摆脱的精神和心灵上的危机之中。有的时候，我曾想到要去死，不只是因为我不怕死，而是我希望死，愿意死。

我清楚记得的另一件事，就是在我又一次被带到那间办公室时，发现我的妻子正站在那个刽子手旁边。她痛哭流涕。猛然间，我的两眼也流出了滚滚热泪。那个刽子手走了出去，留下我们俩在屋里。我妻子打开一个装得满满的筐子，给我看她带来的食品和衣物。同时她说了家中的情况，我们的女儿和我们父母的情况。我们两人一边说话，一边掉泪。我几乎呜咽得说不出话来。我妻子告诉我，我被他们抓走几乎近一个月了。她四处寻找线索，打听我的下落。最后她贿赂了一个国家警察局的高级官员，才知道了我的关押地点。

她对我说：“你应当告诉他们，你是个共产党员。反正就那么一回事。这样我可以使你免受折磨。我想法子把你转到国家警察监狱。在这儿，他们可以把你杀死，而没有人会

知道。在国家警察局那边，可能会好一点。我会找人安排的。在我办成之前，你只要挺着活下来就行……”

说到这里，刽子手回到屋里，告诉我妻子说，时间已经到了，她该走了。我妻子出去之后，刽子手对我说：“现在我可以给你时间，让你仔细考虑一下你妻子对你说的话。”他已经知道了我们俩的谈话内容，我感到迷惑不解。事后，我妻子才告诉我，只有说服我承认是共产党员，刽子手才允许她来探狱。

不管怎么样，她的话起了作用。回到牢房，我脑子好象变成了木头，不听使唤了。当时，我已经准备好等他们再一次把我带到那间办公室。

我对那个刽子手说：“你知道，我不是共产党员。我从来就不是。但是如果你想要我承认是共产党，那我就承认。你究竟想要干什么呢！”

他听完后，示意让我坐下，交给我铅笔和纸张，对我说，“只写你是一名积极的共产党员。”

我写下这句话后，又不得不重新写一遍我原来写过的材料，再加上我的共产党员的有关“事实”，甚至还有我胡乱想出来的入党日期。

从刽子手办公室出来后，他们没有带我回到那个黑窟窿囚室，而是把我关进了一间集体牢房。这个地方象个汽车库，只有可供睡觉的水泥板，里面关押了30—40名囚犯。我觉得自己好象爬出了地狱，重新回到了人间。

大约10天以后，我被塞进一辆汽车，驶向国家警察总部。我妻子的确进行了贿赂。我后来才知道，接受贿赂的原来就是那个刽子手。他的出价高达6000元。

第十一章

春节和一次秘密交换

如果我的妻子了解警察总部监狱的情况，她就不会给任何人送什么东西。我来到这里不久，就被关在一间单人牢房里。我的新囚室要比在秘密警察监狱里的那一间稍大一些，约6英尺长6英尺宽。它的一边架起了一块长条水泥板，因此不用睡在地板上。在房间里头的角落处有一个洞，那就是厕所。门全是钢制的，门中间有一个小窗，只有从门外面才能打开这个小口。我的每顿饭是从这个小口送进来的。牢房里一片漆黑。没有窗，没有灯照明。只有在看守打开小口把饭碗递进来或者要同我讲话时，我才能见到从走廊里射进来的光线。除此之外永远是黑夜。我象一只被关在洞里的动物一样。

我还要在这个地方生活六个月。没有放风活动的时间，没有审问，什么也没有。我简直象是投进监狱以后就被遗忘了。心理学家会说我正在经历的是“感觉上的丧失”。我想我的小牢房就象是棺材，我正躺在这口棺材里，整天都感到全身十分疲乏，好象我的身体和精神都很虚弱。我读过别人对类似经历的描述。我相信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的反应是不同的。在为保持自己健康的斗争中，我的身心看来几乎垮了，各种器官运转能力减弱，一切生命活动完全受到伤害，好

象处于一种假死的状态。就我所知，这种状态将会永远保持下去。我知道用来送饭的小口每天只开两次，我送出去一只空碗，并拿进来一只装满饭的碗。每星期一次，我被人带着、眯起怕光的两眼蹒跚地走过大厅去洗一个澡。

我认为，使我免患长期紧张症的，是监狱内传播的小道消息，每天晚上都有。我把嘴巴对准门上送饭的小口的门缝，就可轻轻地同两边牢房的邻居通话。我把耳朵贴在那条门缝，就可听到他们传回来的耳语，使我得知有关他们自己以及他们隔壁邻居、直至走廊其他单间小牢房的情况。

最靠近我的邻居是两名民族解放阵线的干部，过去在秘密警察监狱的普通牢房里，我曾见过她们一面。她们被转移到此地之前曾受过刑，比我所受的要重得多。她们两人都是党的高级组织工作者，在陈白腾领导下工作（象我一样），并且也是在三茶带来的灾祸中被捕的。一个名叫陈文娇，她是西贡一堤岸一嘉定工人委员会主席，另一个是黎氏凌女士，她是妇女委员会主席。

陈文娇和黎氏凌是“新参加者委员会”的成员。这个委员会在西贡各个比较安全的人员家里，包括有时在我的家里，通常每个月召开一次会议。由于不知道三茶已经泄露秘密，这两个干部在参加一次会议时被捕了。秘密警察没有任何理由真正相信我是一个共产党员，然而陈文娇和黎氏凌却是名副其实的党员。因此，她们受到了刽子手所说的重刑。她们两人由于伤口发炎而遭受了极大的痛苦。当然她们的伤是无人过问的。

我们用耳朵贴在门边，紧张地听着对方的每一句话和从厅里传来的看守们的动静。我们谈到如何才能把抗生素偷送进来和把消息传出去。我们共同为我们联络网里的人深感担

忧，不知道他们的命运将会如何。我特别感到紧张不安的是，如果草率地在我家举行会议，会连累我的妻子。虽然她坚决支持我，但她本人却是完全不过问政治的。我第一次坐牢时，就把我同民族解放阵线的关系告诉了她。自从那时以来，她对我的活动感到十分不安。

除了这些谨慎而匆忙的耳语外，起初，在我生活的这个内部世界里，没有别的东西使我分心。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另一条生命线也打开了。我妻子得到允许，每月可以探望我一次。那时我会被带到接待室去，而我的眼睛几乎看不见东西，嘴巴也近乎说不出话来。这些探望并非是愉快的事情，特别对我妻子来说是这样。因为一次又一次的探望，她可怕地看到了她丈夫每况愈下的身体。但是对我来说，这些探望却可以借此得到一些其他东西，一些使我能够同我的棺材外面的世界联系起来的东西。

但是这些同外面短暂和脆弱的联系只能妨碍我内心世界的进步。这种偶尔对我的黑暗生活的打扰，我逐渐越来越不关心了。到11月中旬，我已在牢房里关了四个月。我已不再想活下去。

如果我知道陈白腾已经同美国大使馆联系，试图交换在押犯这件事，我是会关心的。陈白腾在西贡的许多主要干部，包括他的妻子（就是躺在审问室地板上的那位妇女）在三茶被捕后都遭到逮捕。民族解放阵线现在正试图用其手中的最高一级美国人换回干部以弥补某些损失。

美国人对此感兴趣并且开始同陈白腾的代表，一个名叫六何的干部会晤。双方竭力使谈判秘密进行，不让其他方面知道。然而，在这个过程中，阮高其空军中将及其伙伴阮文绍（他们现在已是副总统和总统）发觉了此事。他们知道谈

判正在进行并力图加以破坏。由于对美国人背着他们同民族解放阵线进行谈判感到不满，他们在六何参加了一次会议后，对他进行了跟踪并逮捕了他。

就在这时，我知道发生了一些事。圣诞节前夕，陈文娇和黎氏凌被带走了，而陈白腾的夫人则被转移到我隔壁的小牢房里。她来的当天晚上，她通过门边低声向我谈起她听说正在讨论某项交易。几天之后，她也被带走了。走廊周围的人都不知道她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们相信那些传言是真实的，而且交换正在进行。

但真实情况则要复杂得多。当美国人知道谈判人六何被捕后，他们发怒了。陈白腾严厉指责美国人没有保护好谈判人的安全。由于担心在民族解放阵线手中的美国官员的生命，美国施加强大压力要政府释放六何。后来，作为一种友好姿态，他们也迫使政府释放了陈白腾夫人。

但是当局内部的强硬派及其警察仍然不愿向美国人让步。警察从六何那里抄走了民族解放阵线打算交换的被捕干部名单。为了败坏美国人在民族解放阵线面前的信誉，有人下令处决这个名单中两名最高级人物——我过去的邻居陈文娇和黎氏凌夫人。当然，在被隔离状态下，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了解这些事件的背景。但后来，一次不寻常的机会使我们知道了谁是杀害我们同志的凶手。

正月底，陈文娇和黎氏凌从她们的牢房被带出去，并被装进囚车。表面上是把她们运往别的监狱，实际上，看守在车内就把她们打死了。这个事件的经过后来之所以被透露出来，是因为在囚车上还有第三个犯人，她中了子弹，但没有被打死，侥幸活了下来。开枪之后，监狱看守把囚车开到左关医院，把尸体卸了下来，告诉护理员说，这些是在巷战中

被打死的越共分子。但是在检查中发现有一人仍然活着。

这第三个人是一名华人劳工领导人，她在南越最大的一家纺织厂维纳特梭厂工作。她把在该厂工作的许多华人血统的妇女组织起来，因而政府怀疑她是一个中国奸细。当她的伤痊愈后，就被送回监狱。不久以后，她的故事就成为监狱内小道消息的主要内容。陈白腾夫人的失踪，后来对陈文娇和黎氏凌的杀害，所有这一切都给被隔离的牢房带来了极大的刺激。对这些被关在牢房里的人来说，任何消息总是具有消遣价值的。

实际上，我自己独守一房的状况在传播这个谋杀故事的一个多星期之前就结束了。有一天，我的牢房突然被打开，另一个犯人被推进来。如果说我为有了一个同伴而感到惊奇，那么我更感到高兴的是，我的这个牢友丁商，是工业协会主席、我的老朋友。虽然丁商不是民族解放阵线的成员，他曾用各种方式支持民族解放阵线。有时，我们在他的家里开会，通过这种联系他跟三茶认识了。后来在6月中旬的逮捕中，他也被抓去了。丁商的出现使我很惊讶。在此之前，我只是躺在水泥板上，两眼盯着黑暗，而现在友谊和交谈又重新进入了我的生活天地，使我摆脱了正充盈脑际的迷惘。

大约是丁商与我关在一起一个星期后的一天晚上，我们的谈话被远处的爆竹声打断了。这传统的风俗习惯宣布了戊申春节，即阴历新年的到来。这一天是1968年1月31日。

（我们不知道那一年政府已经禁止燃放烟火和爆竹。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不同方向。）但当砰砰的响声越来越大和越来越接近时，我们听出了这是小型武器射击的声音。后来又听到了重武器的轰击声。

监狱突然骚动起来，叫喊声和看守在厅里跑来跑去的声

音交织在一起。一场政变发动起来了！丁商和我立刻就猜到了。但是谁是这次政变的发动者？听着这些枪声，我们开始辨别出中国造AK 47型步枪的射击声。在大厅过道外面，混乱情况越来越严重。监狱看守陷入一片混乱，横冲直撞，高喊命令，互相咒骂，还夹杂着用力关门的铿锵声。一个看守突然猛拉开给我们送饭的小窗口，狂叫着：“如果他们进来，我们将开枪打死每一个人！懂吗？”想象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很明显是越共的部队打进了城市。现在我们可以听到直升飞机在监狱附近盘旋以及手提扩音器发出的警告人们不要上街的声音。

我们耳朵紧贴着门边，倾听外面的枪声，战斗似乎就发生在我们周围。现在可以断定，警察总部本身遭到了攻击。在这混乱和断断续续的枪炮声中，我自己在猜想，这一定是一次总起义和军事进攻，这是1966年决议里指示我们准备的。我全神注意外面的战斗和看守的叫喊声，努力判断外面发生的情况。我暗暗祈求进攻者打进来并释放我们。渴望获得自由的思想一直在我心中激荡。

第二天战斗还在进行，但枪炮声越来越零散和遥远，最后完全无声无息了。不论在外面发生了什么，牢房内暂时的兴奋很快消失了，人们又恢复了每天同沉闷和黑暗的战斗。由于希望的破灭，狱中的生活更叫人难熬。在送食物的小窗口上，盛着饭和鱼干的碗一天两次又重新出现了，在这次战斗期间，看守们完全忘了给我们饭吃。

春节过后约三个星期，在2月底的某个时候，一个监狱看守走到我的牢房门口，语气尖刻地说：“犯人张如霖，带上你所有的东西跟我走。”这是不祥之语。我的第一个想法是，现在他们要枪毙我。只要叫你带上所有的东西离开，你

要么就被转移到别处，要么就被处死。那时把我转移到别处是没有道理的。陈文娇和黎氏凌已被处决了。我想现在该轮到我了。奇怪的是，我对此并没有感到害怕。因为在秘密警察监狱以及在这里，我已呆了八个月。我生活在黑暗中，大部分时间没有一个人跟我讲过话。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完全无法摆脱的绝望时期。我经常怀疑自己是否仍然健在。我早已发现，死亡并不是什么特别恐怖的事情。

看守带我下了楼梯，我拖着缓慢的脚步跟着他走，随之进入了监狱长的办公室。在这里有好几个警察和两个妇女。她们两人我认识，一个叫六努，我曾经在秘密警察的审问室里看到她躺在盥洗间的地板上。另一个叫维连，她是西贡—堤岸—嘉定地区民族解放阵线的特工人员。六努的左手无力地垂吊在她的身边，这是秘密警察给她上电刑造成的。

我同这两位妇女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我想给她们一个信号，告诉我们将被处死。她们的表情显得筋疲力尽和无可奈何。我想我的样子也是如此。后来我们提着我们的手提行李走向停在院内的囚车，正象陈文娇和黎氏凌经历过的那样。虽然我很久没有到外面去，但我竟然没有注意太阳或空气。我想我早已死了。

囚车开走时，几个卫兵坐在我们对面，冷漠无情地凝视着前面。我的眼睛紧紧盯着他们，惊奇地想弄清楚他们究竟什么时候拿起枪，对准我们射击。过了约10分钟，囚车停下来，我们被押下车，到了一个我认识的地方，离嘉隆中学不远。停在囚车前面的是一辆美国陆军的红十字卡车和几辆美国军车。

我们三人被带到那辆卡车前，在别人的帮助下，从后门

上了车。两个身穿便服的美国人坐在车的一边。他们做手势让我们坐下，用无懈可击的越南话同我们打招呼。有一个美国人问：“你们害怕吗？”对此，维连回答说：“没有什么可怕的。嗨，在春节时你们害怕吗？”

“我？”这个美国人说，“不。”

当卡车开走时，车内主要是维连同一个人进行着少许的对话。我迷迷糊糊地听着这些话，竭力集中精力弄清事情这样奇怪地转变可能意味着什么。

过了一会卡车停了下来，我们从车上爬了下来，发现我们自己是在新山一机场附近的住宅区。在这里我们被带进一间房子，那里已有几个美国人（他们是军人）在等待着我们。起初，除了这个地方的奢侈品，如舒适的家具，空调设备之外，我感到很难集中注意其他任何东西。我坐的沙发上盖的是一块华丽的天鹅绒般柔软光滑的织物。我确信这块料子和这间房子并没有什么特别。但那时，我恍然觉得，这料子就象印度的泰姬陵那样灿烂。

很快来了一个美国少校。他坐在我的对面。另一个人拿来可口可乐和一盘小甜饼，放在我们沙发前的茶几上。当少校讲话时，那位在红十字卡车上爱说话的美国人把他的话翻译成越语。把我们带到这里来的目的是要进行俘虏交换，不久我们就会被移交给我们的人。同时我们可以暂时住在这间房子里休息。听到这一切，我简直无法相信。

当我仍在思索发生的这些事情时，一名士兵请我们跟他上楼去。他在这里让我看我住的房子，然后把两位妇女带到大厅下面的另一间住房。我看到我的床上铺盖着一条干净的白被单，一条毛巾被铺在被单上。另一间房是个洗澡间，有一个热水喷头。从所有的东西看来，象是一个四星级的旅馆。

但是，就要同我们在“马基”^①中的同志们重新团聚，我们的心情无比激动，房间里这些叫人眼花缭乱的奢侈品，倒显得无足轻重了。

我们在这家“旅馆”（也许这是一座中央情报局的安全宅邸）住了两天，等待民族解放阵线人员来联系。兴奋和期望激发了我们三个人的活力，我们得到了新生。我开始摆脱在迷茫中生活的感觉，在这种感觉里，其他的人和事只是模糊地和虚幻地存在着。我感到我好像是从某种半死状态中恢复过来的。

第二天，一名民族解放阵线的代表来到了这间房子，并且向我们作了自我介绍。维连女士和六努两人一下子就认出了这位代表。他过去是经常同她们在一起工作的联络员。这位联络员与美国少校讲了一会儿话，然后告诉我们，准备好明天就走，随后就离去了。

第二天吃过早饭后，少校送给我们几件礼品：一本小册子，一台收音机，和一叠越南钞票。当我们拒绝接受这些礼物时，他坚持说，小册子一定要我们交给民族解放阵线最高当局。这是一本在紧急情况下使用的通信录。经我们几个人商量之后，我们决定收下小册子，但拒绝接受钱和收音机。我们不需要钱，至于收音机，我们担心可能装有便于追踪我们的电子引导装置。

第二天联络员一到，我们三个人就上了一辆停在房子门口的车，少校开车，联络员坐在他的旁边，我们三人坐在后

^① 我用这个法语“马基”（“抵抗运动”），是因为它等同于越语“BUNG”，这是南方游击队称他们自己的名称。“BUNG”按字面翻译是“沼泽地”，湄公河三角洲通常是这种土地。“RUNG”这个字是指“丛林”，往往可缩写为“R”，这是指丛林中的堡垒。——原注

排。一辆美国宪兵的吉普车在前面开路，另一辆跟在我们车的后边，向着飞机场的方向开去。进入新山一机场之后，我们的车驶过了柏油马路，开到了一架待飞的直升飞机旁边，我们感觉到好象已经战胜了厄运。

我们刚坐好，直升飞机就起飞了。南越农村无限秀丽的景色在我们身下一览无余。我贪婪地一直往下瞧。我们飞了半个小时之后，直升飞机停在一个足球场上。我十分有把握地说，这是在西贡西北约50英里的壮观地区。在球场上，一名南方的陆军上尉（这个地区的保安负责人）正在等待我们。美国少校同上尉讲了几句话，告诉他要保证这次行程的绝对安全。然后开来了一辆三轮车，除少校外，我们都坐上了车。我们走时没有握手，也没有告别。

三轮车走了10—12英里的路程后，把我们带上一条崎岖不平的乡村小道，最后停在路边一家小咖啡店前面。我们在这里喝了点饮料，而联络员则检查了一番，弄清楚我们有没有被人跟踪。当他感到满意时，就让上尉和三轮车返回，并且领我们上了另一辆三轮车。车开了约20分钟后，我们停在一个地方，这里有一条横跨马路的丛林小道。我们在这里下车，走进了灌木林。

我们在这条小路上走了约两公里就停下来，希望能看到游击队。据联络员说，他们应该在这里同我们碰面。但是，没有任何人在等待我们。我们又走了10分钟之后，他们仍然没有露面。我们害怕再回去，而且担心后面有人跟踪，就决定继续往前走。因为身体虚弱，我们三人走得很慢，而且要经常停下来休息。约莫过了一个小时，我们惊奇地看到一群游击队员从我们来的方向走了过来。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支游击队的领导人竟是维连的丈

夫。他们两人已近一年没有见面。不可思议的是他们会这样的环境下，在丛林中相见。维连的丈夫根本不知道关于交换俘虏的事，并且也不是来这儿找我们的。他的武装宣传队完全是在执行另一项任务，这就是从春节开始的第二轮攻势。当维连和她的丈夫走开，两个人单独呆几分钟时，我们其他的人也坐下来和游击队员们交谈，渴望了解和收集自从我们被捕后游击队的消息。不久维连两口子就回来了。游击队是严格按照计划行动的，即使这个出人意料的夫妻会见，也不能影响游击队的计划。分别时，维连的丈夫选派了四名游击队员护送我们到他们的总部。然后他看了一眼妻子，就离开了，而她也目送着他，直到这支游击队消失在丛林之中。这是她最后一次见到他。一个月之后，我们听说，这支宣传队在执行任务后返回的路上，遭到了B—52轰炸机的袭击，他被炸死了^①。

我们坐在用来送我们的自行车后座上。走得很顺利，不久我们就到了总部。建立这个总部是为了指挥1968年的进攻。在总部里，我们见到了梅志寿。他是黎德寿的弟弟。黎德寿后来在巴黎谈判中成为基辛格的对手。梅志寿是掌管西贡一堤岸—嘉定地区党的机构的第二把手。梅志寿的相貌很象他的哥哥，是个爽快和开朗的人，而不象黎德寿那样沉默寡言和待人冷淡。他热情地拥抱我们并且听取了我们的离开监狱后的情况报告。我们把少校的小册子交给了他，并且谈到赠送收音机的事，我们怀疑美国人可能在其中装上了什么玩意儿，谈到美国人如何狡猾，我们都大笑起来。同时，梅志寿发了电报给越南南方中央局，告诉他们我们回来了并且请求指示。

^① 在反法战争中，维连的丈夫担任黎笋的私人秘书，黎笋当时是党在南方的主要代表。——原注

答复马上就来了：我们要尽可能快地到中央局那里去报到，走的道路要求选择最安全的。

但是，无论走什么路，去越南南方中央局的旅途都是困难和危险的，而且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是健康的。在进行这次艰苦跋涉之前，为了恢复体力，我们决定先休息。过了一个星期之后，我们才感觉可以试试看。

整个旅程约100英里，走的是一条穿过丛林的军用小道。在不断遭到攻击和轰炸的威胁下，我们只能在晚上走，有时乘自行车，有时步行。我们慢慢地从一个哨卡走到另一个哨卡，大家对几个月关押期间身体受到这样大的损害感到震惊。

我们在丛林小道上走了两个星期才到达著名的越南南方中央局。美国人曾费了很大力气试图寻找并消灭这个中央局。它的第一个标志是有一个木门横跨小道和一个约有10名警卫看守的岗哨。在这里我们的护送人员等了一会。几个从里边门出来的士兵骑着车，把我们载到一幢很象农舍的小招待所。待我们休息了一会儿，另一批护送人员载着我们沿着丛林覆盖下的羊肠小道继续往前走。偶尔，我们经过一些农舍，最后我们在其中一幢小屋门前停下来。这就是总部的房子。从远处看，它象是一家简陋的农舍；近一点就可看到在它周围有一系列的坑道和地堡。

在这幢综合建筑里等待我们的是陈南忠将军（他的代号是“海厚”和“南娥”^①）。他是民族解放阵线武装部队的司令员和越南南方中央局的第二书记。此时陈南忠将军是越南南方中央局的常委，负责总部的工作。情况确实是这样，

^① “娥”是陈南忠妻子的名字，高级干部经常用他们的妻子或孩子的名字来迷惑西贡的情报部门。——原注

大多数时间，其他中央局的成员都到别的地方去，从事他们负责的各种特殊任务。

越南南方中央局往往是指一批人而不是一个地方。它是一个由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组成的领导集团，其中若干人还兼任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委员。越南南方中央局执行北越政治局的指示并且协调党和民族解放阵线的行动。当情况需要时，常委把各地的成员召集在一起，有时是在别的地方，而通常是在总部地区，就是我们经过筋疲力尽的旅行后终于到达的这个地方。这个令美国人和政府搜索人员头疼的综合建筑位于棉末橡胶园内，该橡胶园地跨鱼钩地区的越南—柬埔寨边界。

陈南忠将军在越南南方中央局内位置更重要的同事有：范雄（代号是“七洪”），他是党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局第一书记；范文登（代号是“二文”），他是组织部长；阮文灵（代号是“十菊”），他掌管宣传和训练工作；武文杰（代号是“六民”），他是西贡—堤岸—嘉定地区的首脑和梅志寿的上司；黄文泰将军，他是驻南方的北方部队总司令，负责所有军事工作。

我们同陈南忠将军一起呆了一段时间，告诉他有关我们的经历，然后回去休息，这是经过艰苦旅行后所极其需要的。不久，陈南忠就送我们到民族解放阵线的高级干部医院去治疗。这个医院位于东威古河的柬埔寨一侧，从越南南方中央局驻地到那里需要几天的路程。我在这里要呆到下个月，逐步恢复体力和治疗肚子的毛病，这个毛病自从我被秘密警察逮捕后一直折磨着我。

第十二章

越南的第三种力量——联盟

我呆在这个环境优美、隐蔽的医院就医期间，摆脱了受B—52飞机轰炸或者直升飞机突然袭击的忧虑，而且受到了一位极不平常的医生的照料。水巴虽已40岁开外，但她无忧无虑，永远有着医学院学生时代的乐观，尽管实际上在日内瓦会议后重组北方之前的整个反法战争时期，她一直在丛林里担任护士工作。1960年她在河内完成了学业，成为一名医学博士。那时她决定穿越原始的胡志明小道，回到南方。当时这样走一趟，需要艰苦跋涉六个月。她是完成这一艰难旅程的第一位妇女。早先，这条通道吞没了几乎一半试图穿越它的人。

我在医院时，收到了黄晋发的一封来信，他祝贺我的获释并要求我一旦可以走动，就到民族解放阵线总部来。黄晋发在信中说，民族解放阵线正在进行建立“民族、民主及和平力量联盟”的工作，他希望我能参加进来。

1965年美国开始干涉之后，建立“民族、民主及和平力量联盟”这样的组织就变得非常需要。（我早在1966年就从事建立这个联盟的工作。）这一大变动的一个后果就是民族解放阵线不得不在极大程度上依靠它的北方盟友。为了对付大批美国人的出现，需要大量的部队，战争物资，组织才能

和宣传上的支持。这样大的规模，民族解放阵线的能力是办不到的。经过一段时期，北越已把它越来越多的资源投入战争，直到成为党的领导所喜欢指出的那样，北方是支持前线的“巨大的后方”。其结果是，民族解放阵线发现自己越来越明显地受到党和北方政府的支配。

其时，要将南方革命重建成一个具有包括南方各种各样民族主义者的广泛基础的运动，为时已晚。正如医院里一个爱开玩笑的人所说的，民族解放阵线旗帜上的半边蓝色已变得太红了。现在需要的是按照政府的方式建立一个组织，它应当由那些没有参加民族解放阵线、也没有染上共产党同情者色彩的南方最强有力的民族主义人物组成。它是一个能够可靠地保持自治和独立气氛的组织。这个联盟将会不可避免地被敌人说成是民族解放阵线的傀儡，但是至少这个联盟对共产党的压倒优势可以起到不小的抵消作用。而且这个不受约束的组织有助于恢复民族解放阵线那种已黯然失色的以联合为基础的倾向。

原来计划规定，最迟要在春节以前，公开宣布成立这个联盟。一旦春节攻势成功，那么一个更加广泛为人接受的运动就可以建立或者参加组成新政府。但是三茶事件破坏了民族解放阵线在西贡的组织力量，极大地妨碍了这类主要工作的进行。三茶被捕后，随之而来的是，在西贡一堤岸一嘉定财政部门工作的一个主要干部也被抓起来了。在受到严刑之后，他供出了极其重要的地下组织网的主要人物，从而掀起了另一次逮捕浪潮。1967年中，西贡的组织由于这两次打击而受到挫折，不得不大大推迟了时间表。直到1968年3月，重新修订的建立联盟的计划才开始加紧实行。对我来说，这意味着要离开医院，沿着东威古河长途跋涉，到民族解放阵

线总部去。这个总部隐藏在鸚鵡咀和鱼钩地区之间的西宁丛林里，位于越南南方中央局西南约40英里。

当我抵达时，民族解放阵线总部的气氛就象一家人团圆那样热烈。除了民族解放阵线中我的老同事外，我惊奇地看到了许多从西贡来的老朋友，他们当中许多人过去对民族解放阵线往往有戒心，但是现在他们却同意参加联盟。1958年我从事争取活动的时候，在他们中的一些人身上花过不少时间。我感到非常高兴的是，杨琼花医生也在这批人当中。她小时曾经是和我一起玩耍的好朋友，上学时我们也是密友。后来她成长为一个才华横溢、勇敢过人和热情奔放的女子。杨琼花曾到巴黎学医，1958年回到越南，开了一家私人诊所。自从她回国后，她公开同情民族解放阵线，这一态度使她不断遭到秘密警察的监视，从而使她不可能参加任何政治活动。过了春节之后，她最终下定决心，要尽一切可能把美国人赶出去，因此参加了联盟，转移到丛林，以实现自己的愿望。

另一个朋友林文节也在这里。林文节是一位工程师，他在民政委员会（“全国最高委员会”）工作。这个委员会是在吴庭艳被推翻后，将领们建立的表面上统治这个国家的机构。林文节也是相信了新年攻势而变成反对派的。陈白腾领导的从事动员知识分子工作的人说服他参加了联盟。清毅是一位作家，他以编纂权威性的法越词典而闻名。他也进入了丛林，同时来的还有其他两位很有名的人物：阮文杰教授和高文奔工程师。

我感到特别高兴的是，在这些人当中看到了卢西恩·范玉兴。他是艾尔伯特·范玉草的一个哥哥。卢西恩是1965年2月在艾尔伯特发动反对阮庆的政变后被捕的，并在监狱里被关了一年多。他是一个富有的商人，在抵抗活动中有着曲

折的经历，他曾在巴黎的大学主修新闻学。在枫丹白露谈判中，他参加了越盟新闻代表团的工作。后来在1954年他以同样的身份在日内瓦会议上帮助工作。1955年他回到西贡，与合伙人高文奔、阮友姜一道经营油漆工业，并且建立了一家巨大的制造企业。卢西恩、高文奔、阮友姜是不可分离的三位一体。他们在范玉章的政变中一起被捕，而现在他们三人都参加了联盟。

虽然这些人（还有其他为了建立联盟而来的人）多年来对民族解放阵线的许多目标表示同情，但是其中大多数人因各种各样的原因突然停止了与它的交往。其中最大的原因是意识形态问题。总的来说，这些人是受过西方教育，一般是信奉自由和民主（按西方术语的意义来讲）的政治原则。他们对经济不公平和社会不公正是极其敏感的，但却一点也不想为此而使自己卷入政变行动。他们明显地不是教条主义者，并且本能地不喜欢这样的人。另一方面，他们政治上的开诚布公又包孕着浓厚的越南民族主义意识。因此，他们对民族解放阵线的态度充满着特有的矛盾心理。民族解放阵线争取独立和反对外国统治的坚强立场受到他们的欢迎，但是对这个组织服从党，共产党理论家在其中起主要作用却感到厌恶。

但是，由于冲突的深化，这些人以及南方其他政治上的有识之士要保持他们所喜欢的不偏不倚的态度越来越困难。到1968年，全国卷入了一场剧烈的全面战争，多数社会组织早已分崩离析了。一支北方部队在农村地区作战，城市充斥着无家可归的难民。美国人正在用高科技的灭绝手段来征服他们的敌人（和其他妨碍他们的任何人）。南越正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它在一个列强的世界里，正亲身体会着充当他人工具的滋味。这种形势容不得任何人置身其外。

对那些将要组成这个联盟的许多人来说，春节是他们决定走上这条道路的转折点。春节攻势表明，未来甚至会出现更猛烈和更普遍的暴力。南方的抵抗运动已经为此流了血，但仍然一如既往地决心要争取胜利。这场攻势也暴露了美国人的弱点。从心理上来说，这是一个关键性的时刻，是人们感到需要作出决定的时刻，而每一个决定都将会带来预料不到的、甚至是潜在的灾难性后果。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象林文节、清毅等一些人，才最后把他们的法码公开地重重地投在反对美国人的战斗一边。他们认为，这主要是为了救国。但是一旦这样决定了，他们就满怀仁慈地往好处想，逐渐打消对民族解放阵线的怀疑和对党支配该阵线的不满。

这样的原因是很容易分析出来的。首先，他们了解，多年来越南民主共和国一直庄严地公开声明说，南方处于“一种与北方完全不同的特殊的和独特的形势下”。党的总书记黎笋说：“南方需要制定它自己的政策”。一再高喊的口号是：“在北方建设社会主义”，“在南方发展民族民主革命”。范文同（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喜欢向西方来访者宣称，“没有一个人具有要并吞南方这样愚蠢和罪恶的想法”。多少年来，在广播、各种宣传和声明中，甚至在党的内部文件中不断地、强烈地重申这类说法。这些宣传是有影响的。

参加联盟的人对范文同的说法很难感到满意。这类宣传既不公平也不中肯。但是越南民主共和国发誓要达到的目标，确实提供了一个消除疑虑的因素。在同共产党人建立合作关系的适应过程中，可以说重要得多的是个人关系，它把联盟的成员和民族解放阵线的成员联系在一起。虽然越南人对组织机构的看法往往持怀疑态度且反复无常，但他们更重视个

人的忠诚和信任。民族解放阵线内外的知识分子和上层民族主义者（既有共产党人，又有独立人士）之间的交往是很深的。在越南的多层次社会中，属于传统有钱的家庭和统治阶级的许多家庭之间的互相交往已历经好几代了。他们一起上学，一起养育子女，并且互相通婚。他们之间有着各种各样的恩义。他们是生活在同一水中的鱼。杨琼花医生和我童年时曾生活在一起。我经常把卢西恩·范玉兴的弟弟艾尔伯特藏起来，以免警察谋害他。当艾尔伯特已成为一个被追捕的逃亡者时，他仍然设法去看我的母亲，让她对我的安全放心。这类事情在这一个社会阶层中大量出现，并且一代一代延续下去。这样你就会对那些共同建立联盟的人们和那些在他们的母体组织——民族解放阵线的人们之间已有的个人联系有某些概念。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有着传统和文化背景的社会对发生个人背叛的可能性起着妨碍作用。

实际上，战争中充满着朋友和亲戚互相保护的事例，哪怕他们是站在对立面进行战斗。这里只提两件事。阮文绍的心理战首脑陈文忠将军把他的妹夫藏在自己家里，他是越共的干部，是顺化人民起义委员会的领导人。同样，一度担任南方陆军总司令的高文园保护过他妻子的两个侄子，他们是共产党干部的儿子。这些人并不特别喜欢他们的敌人，但是他们认为，对家庭的忠诚是极其神圣的。

越南人这种人际信任关系渊源之一是其受儒家学说影响很深的文化。这一哲学传统中的第五个基本道德原则是“信”。失去了“信”，一个人就丧失了名誉和面子，从而就丧失了基本人性。在儒教社会中产生的最深刻的观念之一是，不准背叛那些和自己有过信任关系的人。

这个观念是由《三国演义》加以传播的。越南人生活中

关于道德的故事多如繁星，《三国演义》可说是妇孺皆知了。这个故事说的是，1000年前中国有个君王叫做曹操，给一个名叫关公的漫游者提供过保护和避难。后来中国分成了三个敌对的国家，而关公成为曹操对手的主要将领之一。关公和曹操将要单独打一仗的时刻到来了。

在打仗前，关公的君王告诉关公说，他担心关公不忍杀死曹操，因为曹操过去待关公很好。但是关公向他的君王发誓，他如有机会会把曹操杀死。在战斗中，关公征服了曹操。但是当曹操向他提起过去他们之间的关系时，关公感到他不能伤害他以前的恩人。关公想，“与其对此人忘恩负义而被天下人鄙弃，还不如杀了我自己”。（越南有一句成语是这样说的，“失掉面子不如死”。）

于是，关公回到他的君王面前说：“杀死我吧。我背弃了我许给您的诺言。我不能伤害曹操。”但在听到这些话时，这位君王并没有如关公原来所料想的那样生气。相反他说：“如果我杀掉你，我将失去我最好的将帅。尤其重要的是，假如你杀了曹操，我将会不再尊敬你。在我眼里你会变得一钱不值。现在我知道你才是那位我所想的真正的关公。”

关公的故事是这样的完美，以致直到今日在越南乡村对他的崇拜仍十分盛行。在大多数的农舍里，都要专辟一个供奉体现关公个人忠诚的原型像和用来烧香的地方。

越南人这种先天的心理多少可以说明，为什么当战争已进入最后阶段，阮文绍仍不相信尼克松和基辛格终于会抛弃他。由于无视他所了解的美国国内政治情况（他是消息灵通的）以及他直接明确听到的美国领导人所谈的每件事，阮文绍完全不会相信在他身陷绝境时，美国人会遗弃他。他们打交道的的时间太长，范围也太广。当然，阮文绍也把赌注押在

美国对南越的地缘政治投资上。除此之外，个人的承诺关系也已建立起来了。限于越南人的思维习惯，阮文绍想象这种关系一定会有成效，不管明显的政治现实和逻辑如何。

联盟内的风气也差不多是这样，一旦他们未来的战友作出决定要加入进来，他们就极大地沉湎于对新同志的信任感之中。基辛格和尼克松很可能不完全理解其同盟者的期望。但是越南民主共和国、党的政治局及其在越南南方中央局和民族解放阵线中的代表却在根据他们南方同胞精神上的细微差别进行微妙的协调，并以非凡的艺术技巧来利用这些差别。我想这不是对民族主义者和共产党人协调一致现象的全部说明，但是一旦民族主义者直觉地、甚至是浪漫地投向民族解放阵线，象这样的心理状态就会提供令人鼓舞的理由使他们忽视恐惧和怀疑。

实际上，建立联盟的代表大会是在5月初召开的。我们事先准备好了它的宣言、纲领和各种组织方面的细节。它的纲领的调子与民族解放阵线的有所不同，带有更多一点南方特色和更少一点革命色彩。这个纲领提到：“目前我国南方和北方实际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国家的统一不能一夜就实现。因此，南方和北方应当在平等和尊重各自地区特点的基础上进行谈判。”

九年前我曾邀请担任民族解放阵线主席的郑庭草，现在接受了领导这个联盟的要求。郑庭草是一个有着一副小圆脸的近70岁的人。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快活而和蔼可亲的祖父。他浓厚和富于感情的爱国主义带着深厚的和平主义性质和特点，这使他在作出积极参加联盟的决定时，感到特别困难和痛苦。前政府官员林文节被任命为副主席，另一名副主席是佛教徒领袖释敦厚。我们选举孙室扬记为秘书长，他

原是一位尊贵的教授，曾参加和平委员会的工作，并且曾经从关押我们的支和普通监狱被驱逐到北方。我是联盟的常委并担任西贡一堤岸—嘉定联盟委员会副主席

联盟成立之后，立即派代表到南方的许多主要中心去建立秘密的地方委员会。这些人很快就开始动员不结盟分子支持同民族解放阵线谈判。同时，阮文绍总统已经注意到这一新敌手，对联盟领导人进行缺席审判，判处死刑并且没收了他们的财产。一些被判刑的领导人悄悄地把他们的家属从西贡转移到丛林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原想只是暂时与民族解放阵线呆在一起，现在则没有退路，只好开始准备长期呆下去。但是，可能连最悲观的人都没想到，他们在等待七年之后才能回家。

与此同时，阮文绍在加强自己对政权的控制，西贡正遭受着人们所熟悉的另一轮镇压的痛苦。正如以前这种时期所经常发生的那样，许多温和派分子都被推到民族解放阵线这边，尽管现在联盟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提供了一个更适宜的去处。那些参加者当中包括保护越南文化协会主席黎文甲和当时西贡大学学生联合会主席胡友一。胡友一和其他新成员曾经和平地进行宣传鼓动，要求举行自由选举。他们是根据宪法第四条禁止共产党或亲共产党的活动而被捕的。由于讨厌阮文绍政权，胡友一成了真正的反对派，转入丛林，首先参加联盟，后来在临时革命政府中担任教育和青年部副部长。

离民族解放阵线的综合建筑不远，联盟建立了自己的总部。现在联盟参加了越南南方中央局和民族解放阵线共同协调南方战略的工作。这是一个不断召开联络会议和公开交换意见的时期，它也许表明，河内党的领导人当时承认战争这一阶段南方当地居民抵抗运动的重要性。越南民主共和国倾

听它的同盟者的意见，明显地表现在越南南方中央局接受来自民族解放阵线和联盟的建议，并且在处理各项事务时体现出合作精神。

象征性的接触也没有放弃。1969年春，郑庭草主席率联盟代表团访问河内。在他们抵达时，郑庭草对河内以元首级礼节欢迎他感到有些吃惊。北方政府全力以赴，动员群众夹道欢迎，每天日程排满招待会和宴会。代表团也被安排拜访胡志明（他当时是最后一次患病，几个月后真的去世了）。但是，胡志明以独特的姿态，不同意让代表团到他居住的主席府庭园里的小屋来见他。相反他送去一个消息，告诉郑庭草说，不应当让光荣的南方人民的代表来看他，而应当由他来拜访代表团。就在当天晚上，谁也没有料到，胡志明来到联盟代表团居住的房子。他没有随行人员陪同，他的到来事先也没有通知。他只是随便地从后门走进来，好象他是一位亲密的朋友或者是家庭的成员。他碰到的第一个人是郑庭草夫人。她正站在一面镜子面前梳妆打扮。最初她没有认出他来。但很快她发觉这个衰弱的老人是谁，顿时激动得不能控制自己。她流着热泪去喊郑庭草和其他的人。胡志明纯朴的友谊姿态使大家深为感动。大家激动的心情难以用语言来形容。

当代表团回到南方后，所有代表团成员常常谈起这件事。胡志明的个人热情不仅感动了郑庭草及其夫人，也感动了整个南方的领导层。由于这是一种尊重的表示，它有着无比巨大的影响，进一步加强了普遍存在的南北战斗友谊。（关于这个事件有一个值得一提的小插曲，郑庭草夫人从此不再使用化妆品，因为胡伯伯曾看到她在打扮，她感到非常羞愧。）

当联盟领导人回顾他们第一年的活动时，他们看到了积

极的成果。进入斗争领导层的非共产党的温和分子，给动员政府反对派的工作带来了新活力。在扩大革命的基础方面，他们提供了新的持久力和新的力量。面对着北方同盟者，他们建立了一个有组织的完整的南方派别，以便对控制权已落入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政治局和军事管制委员会手中的事务能有发言权。

这一年也发生了其他一些重大而有着多种意义的事件。春节攻势以及1968年春季和夏季一系列有关的攻势对民族解放阵线的游击队和北方的主力部队造成了预料不到的巨大伤亡。但是这些行动也促进了美国舆论的日益不满和不断增长的分裂。3月31日，也就是春节攻势之后两个月，争夺溪山的战斗正在进行的时候，美国约翰逊总统宣布不参加竞选连任总统。我们认为，毫无疑问，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坚持不懈的军事行动所激起的美国国内压力造成的。当西方的反战运动突然爆发起来时，我们感到现在有希望迫使美国进行谈判，达成一项包括让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参加南方政府的解决方案。实际上，在约翰逊退出竞选之后一个半月，在巴黎举行了正式谈判。这次谈判的头几个月主要是对民族解放阵线在平等基础上与西贡政府一道参加谈判的权利问题争论不休。

但是，当我们的心理和政治战略（从长远来说，这些战略将会取得决定性的结果）正在展开时，1968年另一个主要事件不太令人鼓舞。11月7日尼克松当选为总统。对我们来说，尼克松将会是一个顽强的对手。他将全力以赴地用军事的办法来解决这个战争，这是没有问题的。我们能够预见到这位新总统的上台将意味着暴力的升级，并且毫无疑问，他会采用新的战略来实现旧的目标。

第十三章

临时革命政府

新战略的主要部分不久就宣布了。到1969年早春，尼克松开始公开讨论美国的撤军问题。显然新一届美国政府考虑这个问题已有一些时候了。在3月以及随后的几个月里，美国计划的概貌慢慢显露了出来。华盛顿正在作出某种姿态——也许并非仅仅是一种姿态——减少它在越南的部队。

我们知道，这一行动是美国愿意在谈判桌上妥协的一个信号。事实上它的目的是为了安抚美国的公众舆论。反战情绪的增长对美国耐力的影响愈来愈大，我们所作的这个分析果然得到了事实验证。显然，我们已经成功地开辟了我们现在所说的第四条战线（前三条是政治战线、军事战线和外交战线），而且我们已经开始更加注意美国国内形势的发展。

实际上，尼克松采取的防止他自己前院发生政治危机的步骤并没有什么独到的地方。美国发言人称这个战略为“越南化”，这同17年前法军司令塔西尼¹试图实行的所谓“黄色化”十分相似。它包括让南越政府的部队承担更多的战斗任务，从而模糊美国是一个主要参战者的形象，同时加强阮文绍政府作为一个独立实体的形象。

1 塔西尼生于1889年，死于1952年。1950—1952年任法军驻印支司令。1952年逝世后被追授为法军元帅。——译注

法国人把他们的战争说成是国内冲突，这种企图之荒谬是显而易见的。而尼克松的越南化政策与之不同的是，它的影响是严重的。与法国不同，美国有能力对战略目标和供应线保持巨大的军事压力，同时，即使它的大多数地面部队都撤走，也能够有效地采取近距离的战斗支援。总之，今后所有牺牲的人将是越南人。这一政策可望实现双重目标，一方面可以消除国内外反对战争的口实，与此同时又可以继续保持西贡的阮文绍政权。因此，斗争将会无限期地延续下去。

正如我们看到的，越南化是一种政治手段，旨在通过摧毁美国国内外的反战运动来打击我们。我们决定在同样的战场上作出反应，开展反威胁的斗争。我们早已作出计划准备在地区和地区以下各级建立正式的民族解放阵线的政府机构。我们现在准备建立一个中央政治实体，它能够在正式的、合法的基础上同西贡打交道。当然，这样一种新的政府机构对国内极其有利，而且更重要的是，南越的抵抗运动将会获得一个新的国际地位。

我们知道这个政府的建立会被尼克松政府认为是一种宣传伎俩。但是，这种反应完全错了。我们的目标是影响公众舆论。从国内方面来说，有了一个非共产党的政府将会增加南越人民对我们的信任；从国际上来说，我们就能够在争取正式承认方面同西贡抗争（并在这一过程中争取潜在的支持）。而且在美国，我们可以增强我们代表南方人民的地位、为和平运动火上加油。美国政府努力把西贡政权描绘成为一个自由的、合法的政府，现在将会受到另一个南方政府的回击。这个政府竭力在每一个国际讲台上争取自己的合法地位。从这里开始，我们将能够开展一场全面的外交战。

建立这个政府（将称为临时革命政府）的代表大会于

1969年6月的6、7、8日在边境线的越南一侧举行。地点在鱼钩地区，距22号公路不远。选择这个日期是因为我们想抢在尼克松和阮文绍会谈之前召开。他们两人会谈定于6月8日在中途岛举行，届时将正式宣布“越南化”方案。为保证这次代表大会的安全，民族解放阵线的第9师部队建立起一个严密的三环形防线。在安全地带的中心，修建了一座供代表们议事的大会堂。代表们来自民族解放阵线、联盟、人民革命党¹以及各种群众团体，少数民族和各个地区。大会堂是由黄晋发²设计的。他重操已多年不搞的建筑业也许别有一番怀旧之情。这座大厦的四壁都是木结构的，屋顶象个降落伞。正门上方的一幅大壁画，描绘了南方战士和人民一往无前的精神。

为了保持它的象征意义，在特定的环境下，我们尽力把代表大会组织得很隆重。墙上装饰着各种旗帜。一个著名的口号是“加强伟大的团结一致”，另一个是“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中立的越南南方”。往常我们开会时，人们随便走动，人声嘈杂，这次代表们按照严格的等级制度，仪式庄严地走入会议大厅，民族解放阵线主席阮友寿和联盟主席郑庭草率领着主席团成员，在两行仪仗队中间迈着缓慢而庄重的步伐走进会议厅。《解放南方》的乐曲响彻整个大厅，接着是演奏联盟的盟歌《山河之声》。

郑庭草致开幕词，接着按照现在大家熟悉的开会程序，分析当前政治、军事和外交各方面的形势，然后是各种群众

1 人民革命党成立于1962年，是越南劳动党的南方分部，虽然如此，它不是一成不变地实行共产党的路线，而是使自己适应了同其他党派合作的需要——原注

2 黄晋发也曾设计过民族解放阵线诺科首次会议的大厅，以及西贡地区委员会在福种植园召开的会议的大厅的车库——原注

团体和地方代表有关活动的报告。所有这些报告用了两个整天的时间。第三天，黄晋发提出了一个内阁部长的推荐名单。黄晋发本人被任命为主席，杨琼花医生为卫生部长，还有不久将为国际所知的外交部长阮氏萍。我被任命为司法部长。此外，还建立了一个由年长者组成的顾问委员会，包括阮友寿和郑庭草、林文节以及一些民族解放阵线和联盟的老成员。这个委员会反映了越南人尊重长者的根深蒂固的习惯，是力图使传统与革命和谐一致的一种努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个极好的宣传，同时也有现实的意义。我们大家对这样的安排都感到满意。任命名单一致通过之后，郑庭草语句亲切地向大会致闭幕词。然后进行最后一次投票，临时革命政府从此诞生。关于这次成立大会的录象带和新闻被散发到全世界，两天之后，各地的电视和报纸都报道了临时革命政府的成立。

实际上，组织政府的真正工作，是早在一个月前在民族解放阵线和联盟召开的一系列工作会议上进行的。当时最迫切的问题是将要任命什么人担任各种内阁职务，而主要考虑的（然而不是唯一的）条件是，他的可靠性和温和派的政治形象。

在这些讨论中，最初有人建议我担任内务部长。我有着广泛的联系，树敌不多，我的政治观点也不太令人注目，因而有人推荐我担任这个工作。也许同等重要的是，我的五个兄弟都在另一边工作，两个在空军部队（黄是少校，裔是一名尉官）；琼是西贡总医院院长；碧是国家银行外汇部的经理；奎是壳牌石油公司南越业务部的副经理。

有了这一批近亲，以及分散在西贡政府、军界和私营企业的更多的远亲，我在内务部工作，便可以成为（感觉也是

这样)一个令人放心的人物。我关于有必要和解的观点是众所周知的,而我在控制国家警察的内务部当头,将会强有力地临时革命政府战后的意图辩护。在经过几天的酝酿之后,我把内务部的职位让给了冯文恭医生,而同意担任财政部的职务。这位医生有着象我一样担任内务部职务的种种条件,但缺乏我在经济方面的背景¹⁾。

那时我们急切地想把司法部长的职位保留给阮隆,他是一名律师,曾经担任过“自决运动”主席。1965年曾判我2年缓刑的同一军事法庭却给阮隆判处了10年监禁。然而这个老律师因身体衰弱而被西贡当局释放了。现在他安静地生活在家里。不幸的是,他由于身体太弱,不能冒险来参加临时革命政府会议,如果他呆在西贡而任命他的话,就等于给他签署了死亡证。

结果,我们最后决定最好由我来担任司法部长(我在巴黎获得的法律学位给我提供了必要的正式资格)。按照对国内舆论的影响,这个司法部与内务部是同样关键性的。而且实际上,春节攻势的后果特别需要我们在南方人民中间消除恐惧。他们害怕一旦革命胜利将给他们带来大屠杀或者恐怖

1) 美国情报人员错误地认为冯文恭是一位恐怖主义的拥护者,“他的朋友都非常怕他”。事实恰恰相反,冯文恭在担任西贡综合医院院长之前曾经在几个省担任过医生。他是这样一种人,过着有道德的生活,喜欢打西贡流行的“四色牌。”他生性害怕同人家争论,希望同人家和好,他是位有名的和事佬。我们大多数人感到,如果让他自己行事,他永远不会参加到革命中来,然而他的妻子却是一个富有战斗精神的人。她成功地引导他很早就参加了民族解放阵线。她的兄弟是臭名远扬的三茶。美国情报部门对冯文恭传记分析的错误说明对民族解放阵线主要人物情况的保密工作卓有成效,即使被捕的干部也很少有机会知道敌人认为有用的那些人的情况。同时,犯人 or 越共变节分子提供的情况,要加以核实也是一分困难的。——原译

的统治。

1968年的联合攻势和起义取得成功的唯一城市是顺化。这是南越中部的一个美丽而古老的帝王都城。1月31日，民族解放阵线和北方的部队打下了这个城市并且占领了三个多星期。后来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占压倒优势的炮火和不断的飞机轰炸下才被迫撤出。然而这一最初的胜利并没有成为这场革命的一个更令人骄傲的时刻。在我调换工作职务后，我如饥似渴地钻进西贡旧报纸堆里，试图了解我八个月与外界隔绝期间外而所发生的情况（在丛林里我们每日收到的报纸为领导干部所用）。我在报上看到的关于顺化在革命统治下的情况，至少可以说是令人不安的，尽管西贡报界肯定无疑地作了夸张。

大批的人被处决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是同政府合作就是革命的反对者。但是还有其他被杀的人，包括被俘的美国士兵和其他一些属于非战斗人员的外国人。我曾私下向黄晋发问起关于这些暴行的情况，他表示，他对所发生的这些事情感到悲痛和失望，并且解释说，在顺化的纪律很差。疯狂的青年士兵不分青红皂白地开枪打人，而愤怒的拥护革命的当地市民在各种场合自行司法审判，据黄晋发说，民族解放阵线绝对没有什么政策或指示要进行大屠杀。这只不过是常常伴随战争而来的许多可怕的悲剧之一。

我对这种解释没有感到特别满意。但我必须承认，我也没有去深究这个问题。在流血和激烈冲突的情况下，顺化发生的事件毕竟没有给我造成极大震动，并迫使我去重新考虑自己的基本设想。此外，我相信，在相对不那么刚烈和倾向于暴力的南方（顺化是在中部地区）人民中间，实际上这类暴力事件不多见。这也许是一种过份武断的想法，但是不管

怎样，我感到我的想法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也考虑到，我在西贡的朋友和我本人可以在自己的家乡取得很大的控制权。由于各种原因，我就不再提起顺化事件了。

当然这些事件并没有过去，而只是退居后台。现在，回忆起这些事件，使我联想到司法部的问题。我的确急于想发表一项关于临时革命政府反对“革命审判”的强有力的公开声明，但是我也感觉到司法部的职务将会使我处于能影响事件进程的特别有利的地位，无论如何我们推动建立联合政府的努力将会取得成功。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我愉快地接受了司法部长这个职务。

内阁部长名单一旦确定，我们就通过越南南方中央局的联络渠道向河内送去了一份总结报告。通过同样的渠道，政治局送回他们的建议，要我们增加一些来自越南中部的人，其中包括阮朵、陈南忠和黄碧山。陈南忠就是我们从监狱释放后在越南南方中央局欢迎我们的那位将军。阮朵当时是一位老人，以前当过范文同的小学教师。而黄碧山在参加抵抗运动前是顺化的大学生领导人（在写这本书时，他是越南驻联合国的大使）。

有了这样一些人参加政府并且分配了适当的职位，临时革命政府就组成了。现在只是等待大会的正式批准。一个月之后，临时革命政府诞生的宣言、电影和图片都寄出去了，这正好是在尼克松和阮文绍宣布撤军声明的时候，因而同样引起了新闻媒介的注意。当世界各地的北越使馆开展一个要求国际上承认临时革命政府的广泛宣传运动时，我正在丛林中开始着手筹建临时革命政府的司法部。

第十四章

游击生活

沿东威古河而下，在离民族解放阵线总部数英里的地方，是我们选择的临时革命政府各部所在地。这个崎岖坎坷、林木茂盛的地区紧靠着柬埔寨边界，位于“铁三角”的深处，这里是我们的庇护所和基地。它为我们免遭B-52空中强盗和直升飞机的攻击提供了很好的保护。从我们这儿到北边棉末地区的种植园很方便，那里是越南南方中央局的所在地。遇到紧急情况，从这儿还可以很快越过边界。随着给司法部建地堡和隐蔽部工作的进展，我也逐渐习惯了丛林生活。

不久，那些来自城市的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人被安顿下来。他们的未来生活和过去的生活相比将会大不一样。此后，除因外交使命出去过几次之外，六年来我一直是在丛林中生活的。除了少数例外，这也是所有游击队员的共同生活，从临时革命政府主席黄晋发到职位最低的通讯员都是如此。那些在部里工作的人，行动时需要带上自己的供应品和煮好的饭。尽管条件很艰苦，但大家却始终保持着亲密的友情。

如果在战士们中间找不到领导干部，那一定是我们在研究收集外面的情报。当然，除了每日的通报外，我们有西贡的报纸和个人的收音机。我们可以收听英国广播公司或美国之音的广播，以及越南电台（北方和南方电台）和澳大利亚

的越南语广播（少数拥有收音机的战斗人员被严格禁止收听敌台。）这些坚固的日本造半导体收音机（约有100台），是日本共产党作为礼品送给胡志明的，这也许是不懈地传播日本技术的象征。（以后我们又得到大量的本田牌摩托车。）胡志明又将这些礼品转送给临时革命政府和联盟的领导人，从而使这些收音机派上了用场。

尽管有收音机，生活对每个人来说显然是一样的。我们象被人追猎的动物，在身体和精神上时刻都处在紧张状态。在这个“铁三角”地区，只要我们一觉醒来，警惕和紧张的感觉就会恢复。1969年底和1970年，当美国的轰炸机迫近我们的基地和庇护所时，我们的平静生活被打破，伤亡日益增加，我们所受的压力就更大了。为了准备随时迅速转移，我们把个人所带的行装减到最低限度：两件睡衣，两条衬裤，一顶蚊帐和几平方码的薄尼龙布（便于作雨衣或遮盖屋顶），这些就是一个游击队员的全部家当。当然战士还要带上武器和子弹以及“象肠”。我们把干粮袋叫做“象肠”，它装满大米后呈长圆筒形，可以挂在背上。

除了大米以外，每个人带的食品还有：一小块盐，一小袋味精，也许还有一点鱼干或肉。领导人和战士每人每月的大米配给额是20公斤。每日开饭两次，时间分别在上午9点和下午4点，口粮定量是不够吃的。总之这是我们全部的食物，这样的营养摄取量使我们大家都陷于半饥饿状态。

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必须不断地集中精力解决食品不足的问题。特别由于缺乏蛋白质，只要可行，我们就拼命从事畜牧或狩猎。有时有的部队驻扎的时间长一些，他们就养鸡，甚至还养猪。我永远忘不了那次只有一只鸡的宴会。我们30个人共享这一只鸡，尽可能切成最小的小块，以便大家

都能品尝。我觉得我从未吃过这样的美味。

偶尔会从柬埔寨那边特地运来一些货物，那时大家才会真正欢庆一番。游击队更经常的是进行狩猎远征，不时能猎获各类野兽。大象、老虎、野狗和猴子肉，这些对我们的烧菜锅来说都不陌生。但象我这样缺乏蛋白质的人对猴子或狗肉还是难于下咽。有些人认为狗肉是越南人爱吃的美味佳肴，但实际上这只是北方的烹饪。南方人也象西方人一样，并不喜欢狗肉。象肉是另一种引不起食欲的肉，它类似无味的硬橡胶，象旧皮鞋那样坚韧。如果象肉是干的，则稍微好吃一点。

我最终学会吃的——如果不是津津有味，至少当时也没有作呕——另一种补充食品，就是从林中的飞蛾。我们常常在晚上坐在煤油灯下写讨论计划，那时就可以捕捉到在灯光周围飞来飞去的大蛾。把它们的翅膀拔掉，然后很快放到火上烤熟，虽然这不是一种佳肴，但它并不难吃。所有这一切与我们娇生惯养时中国保姆精心准备的饭菜有天壤之别。对我们这些放弃西贡舒适条件，来丛林过变化无常的生活的人来说，这个对比真有点令人发笑。到我从监狱释放后的第二三个年头，大多数野味已在我们丛林的菜单中不见了。那时，老虎、大象、猴子都从丛林中消失了，进了游击队员的肚皮。

除了衣服和口粮外，我们每人每月发津贴60或75个皮阿斯特^①（领导干部额外补助15个）。我们能够用这些钱来购买砂糖、烟草、盐、肥皂、牙刷或其他生活用品。办法是开一张定购单给单位的后勤干部。这位救星与财政干部一道每月到民族解放阵线总部去取回定量的大米和生活费。一旦这

① 皮阿斯特系法国统治时期越南的货币名称。当时60个皮阿斯特相当于2美元。越南解放后，其货币名称改为盾。——译注。

些分配完毕，他们就徒步去柬埔寨购买他们单位需要的更加秘密的物资。我初到这里时，他们只能去边境城镇采购。但后来，柬埔寨的商人建立了更方便的商业渠道，一种越共丛林交换站。

虽然人们喜欢去比较安全的柬埔寨市场，但是我们附近的越南村庄有时所提供的供应品在别处是找不到的。1970年以后尤其如此。直到那时，我们通常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或者步行。但在1969—1970年的冬季，日本造的摩托车迅速在全国普及起来。不管怎样，这些摩托车都能够从城市开出来并转到最边远的村民手里，然后他们把这些车偷偷地带给游击队。农民往往从驻在当地的西贡陆军部队那里搞来摩托车。我们的车子就来自越南共和军第5师和第18师。我们的财政部终于能够在这些师团和民族解放阵线之间直接建立起固定的供应渠道，从而不再依赖农民作中介。

从那时起，我们有了固定的供应，不仅有本田牌摩托车，还有打字机、收音机、香烟和各种各样的其他物品。不久以后，越南共和军师团的高级军官和民族解放阵线之间在武器和弹药方面的生意也兴隆起来。其中最受欢迎的武器是手榴弹和克莱摩尔杀伤性地雷。有不少美国士兵被越南共和军出售的地雷炸死。对美式步话机的需求也很大，然而我们的部队习惯用中国造的AK—47步枪，他们从未对美国的M—16步枪产生兴趣。

但是，不论是这些供应来源，或者是沿胡志明小道从北方运来的物资，都不能减轻热带疾病对长期营养不良者的折磨。在丛林中的主要敌人不是美国人或“傀儡”（我们称呼西贡政府及其部队为“傀儡”），而是疟疾。很少人不患疟疾，这种疾病的周期性发作搞垮了游击队员的身体，得这种

病，游击队员们称之为交丛林税。我在丛林里每年需要花约两个月时间呆在医院里同高烧和这种疾病作斗争。由于长期的营养不足和患疟疾，几乎所有居住在丛林里的人都患有黄疸病，脸色发白。受派遣渗透到敌方的人员不只一个因此而露马脚。任何有见识和稍为留心的人，一眼就能看出谁是专职的游击队员。

疟疾的确是一个大问题，1971年北越卫生部长范玉石医生在游击区作了一次视察，进行调查研究，以便找到某些预防这种疾病的办法。但是范玉石医生本人在视察中都成了这种疾病的牺牲品，死在丛林中。这表明了我们医疗工作的不足。尽管我们没有作过统计，但是据我所知，我们因疟疾而损失的人肯定要比敌人给我们造成的伤亡多。

蛇是另一种祸患。虽然我到达丛林时，已普遍有了解毒药，但威胁仍然存在。在热带的沼泽地和丛林中，有许多各种各样的毒蛇。由于游击队员们穿的鞋子极为简陋（主要是橡皮条做的），他们特别容易受到伤害。毒性最大的是占瓜蛇，它是一种棕色的小毒蛇，很象一根棍子，在灌木丛中，很难把它同干树枝区别开来。它的毒液几乎立即就起作用。对付它的办法是立即服下一颗解毒丸，并把另一颗解毒丸浸软后涂在伤口上。多年来，这类毒蛇和其他毒性较小的蛇不断夺去人们的生命。它们是一种可怕而令人头疼的威胁。

当身体没有病，也没有战斗的时候，游击队员们就挖地道、种菜和训练，不停地训练。这是一种隐蔽备战的生活：隐蔽起来以免受攻击，备战是为了应付攻击或者执行各自的任务。如果某项参加或撤离战斗的军事调遣行动中有半天的休息，他们就挖战壕或地道。无论是在总部或在行军中，做饭都采用所谓“黄琴将军烹饪法”。这位越共将军发明了一种无烟

炊事法。我们把炉灶修建在战壕或洼地内，在泥土一侧挖一条卧式的烟囱，几乎所有的炊烟都会进入这个烟囱并被泥土吸收，只有很少的烟在远离我们的洞口冒出来。经历30多年的丛林战争，游击队员们创造了许多此类防御敌人保护自己的方法。这时开动脑筋想办法已成为他们的第二天性。

对民族解放阵线战士的训练包括很多课程，具有特色的是上时事课，政治和军事问题课以及革命历史课。这一切旨在加强他们的必胜信念。总的来说，没有进行什么政治灌输，例如马克思主义课题从未提及。相反，教师们全力宣讲胡伯伯伟大的民族主义口号：“没有任何东西比独立和自由更宝贵”：“团结、团结，伟大的团结！胜利，胜利，伟大的胜利！”等等。用这些来作为教材，就可以把爱国主义的主题同驱逐美国人的神圣责任结合在一起。

在北方部队中使用的教科书有很大的不同。那些在越南民主共和国严肃的马克思主义气氛下长大的人，习惯于直接接触意识形态的东西。他们的政治干部和指导员不断地给他们灌输马克思主义的观念和阶级分析的观点。如果我们试图对南方的农民游击队进行类似的灌输，他们就会认为这种事比西贡当局可能对他们的折磨还坏。

偶尔一个文工团的来访，能调剂一下丛林里这种无休止的训练与时刻戒备的严酷生活。文工团放电影或者演戏。他们演出的题材和内容都是标准的：游击战、革命英雄、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等等。文工团总会受到热情欢迎，因为他们为艰苦而充满危险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慰藉。

尤其受欢迎的是游击队员可以定期请假。那些从乡下来的人可以自己安排回家探亲。但对城里人来说，探亲就要困难得多。要渗入到政府牢固控制的地区去探望老婆和孩子

（他们往往被认为是越共的依靠者）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为了克服这一困难，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把士兵或干部的家属从城市带进丛林。但是这种会见时间不能长，他们来去也是很危险的（武文杰的老婆和孩子就是路上遭到B-52轰炸机的袭击而身亡的）从林里的人常常很长时间同他们的家庭没有任何联系。

游击队碰到的一切困难同B-52轰炸机狂轰滥炸所造成的恐怖比起来就微不足道了。美国卷入越南期间，美军投在越南土地上的炸弹总吨数要比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世界各个战场投下的炸弹多二倍以上。大多数炸弹是B-52轰炸机从高空投下来的。这些看不见的吃人强盗扔下了各种型号的炸弹。这个统计数字反映出美国对南北两方似乎都实施集中火力的攻击。在美国的对手眼里，这些数字实际上反映的是他们心理上的恐怖。多年来我们每天的生活都笼罩在这种恐怖之中。

B-52轰炸机投弹时的爆炸声能震破一公里外的人的耳膜，造成丛林居民终身耳聋；而在一公里范围内，冲击波能把受害者击昏过去；在半公里内，炸弹的爆炸能震塌没有加固的地堡，把畏缩在里边的人活埋掉。从近处看，炸弹的弹坑很大，直径有30英尺，深也几乎有30英尺。在雨季，这些弹坑灌满了水，往往可以在里面养鸭或养鱼。这对游击队丰富自己的食物起了作用。当沼泽地和低洼地被半英尺深的水淹没时，这些弹坑就看不见了。有些慌张的游击队员即使在沿着他熟悉的道路走时，也会突然陷进弹坑，这种情况屡见不鲜。

从1968年开始直到1970年，这种袭击虽然总的说来造成了巨大的伤亡，却没有炸死任何一个住在总部建筑物里的军

政领导人。这算是一个奇迹。然而，这种幸运需要在空袭前得到准确的警报，这样，在投弹之前才有可能使我们及早疏散，或者进入地堡躲避。B-52轰炸机从冲绳岛和关岛起飞后，在南中国海游弋的苏联间谍拖网渔船就能探测到。苏联船只把飞机的航向和速度计算出来并传送给越南南方中央局总部，总部就会下令可能会遭到袭击的民族解放阵线或北方人员撤离。来自泰国基地的飞机是由雷达和我们在泰国的情报人员通过目测进行监视的。他们的情报也用类似方法传给我们。

这些警报往往使我们有时间抢出一些大米，步行或骑自行车从一条疏散用的小道逃出去。几小时后我们回来，就会发现一切都荡然无存了。这种情况发生了好几次。从林象被长柄大镰刀横扫过一样，连巨大的柚木树都倒下了。炸弹威力所及，所有树木被撕成无数块碎片。有些时候，B-52轰炸机发现了目标，于是建筑物里的一切东西，如食品、衣服、供应品、文件等等尽皆毁去。岂止是受到毁坏，可怕的是它们已根本不复存在。当你回到你的单坡屋顶的小房子，地堡和你的家时，眼前简直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大地变成了你不认识的一片弹坑遍布的废墟。

然而，我们也常常会碰到不很走运的时候，自己刚能隐蔽好，敌机就飞来了。最初几次经历B-52轰炸机袭击时，我紧张地挤进地堡，感觉到似乎世界的末日就要降临。这种恐怖是全面的。当一个人内心处于极度恐惧的时候，他就会失去对自身的控制。一次，一个苏联代表团访问我们司法部，正好碰上了紧急空袭警报。警报解除以后，没有一个人受伤，但是整个代表团却大失面子。他们身体控制不住地颤抖和尿湿裤子的现象，明显反映出内心的极度恐惧。其实这些来访

者本不必脸红,因为他们主人中的每个人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只不过是见的多了。

多年来,炸弹象倾盆大雨般倾泻,我们在地面上却很少被击中,这要归功于苏联的监视技术。然而有一次我们几乎毁于一旦。由于对突如其来的地动山摇感到惊恐,我开始沿着一条战壕跑向地堡门口,这时一股巨大的冲击力把我冲离地面,一直把我推到迎面的门里。我的一些同事被震倒在地,象玩具娃娃在地上滚动。张高福是我的一位老友,在对外关系部工作,他跳进一个掩体后,这个掩体倒塌把他埋住,幸好他的头伸了出来,人还活着。我们用手从他身上扒开泥土,小心地移开他周围交叉的横架、支柱,这样才把他救出来。张高福陷进的是一个旧的U形掩体,许多人因躲进这种掩体而丧生。后来我们懂得用一种木制框架来加固这样的掩体,使两边的墙不致向内倒塌。采取这种办法加固后,这些掩体就能顶住B-52轰炸机炸弹近至100米的爆炸冲击。

虽然轰炸的震动会逐渐消失,人们听天由命的态度却会由此而形成。老战士们不再由于极大恐惧而在地堡里挣扎。反之人们只是听天由命,准备好“在祖先灵位里谋一个位置”。不知什么原因,B-52轰炸机使生活变得有秩序了。许多在空袭中幸免于难的人,在今后看待生活时将会更加沉着和富于哲理眼光。这种经历给我以启示,就象给其他许多人启示一样,它有助于我后来从容不迫地应付多次碰到的至关生死存亡的问题。

甚至最镇定自若的宿命论者,在尝过数年躲避高爆炸弹的苦头之后,也会不堪忍受。在最紧张的时期,我们每天都受到袭击,几个星期一直不断地在移动。在此期间,我们常常从吊床上爬起来就马上煮饭,把米饭捏成饭团并且躲进

地堡，等待着即将发生的事情，偶尔一段时期，我们天天都在跑动，只在做饭时才停下来，有时吃饭也不得不边走边吃。晚上，不论我停在什么地方，就找两颗树把床吊起来，筋疲力尽地躺倒在吊床上，想睡又不敢睡死，时刻要提防空袭。

这种恶魔般的无休止的袭击，使有些游击队员患神经衰弱症。他们被送进医院，有的人则要送回家去。也有这样的例子，有的战士因忍受不了丛林生活而跑到西贡政府那里去了。有时因无人管理，有的单位就越过柬埔寨边界去寻求避难。

我和助手黎文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筹建临时革命政府司法部的。为了开展这项工作，在丛林里我们拥有50名官员和一支约有30名游击队员的保安部队。最概括地说，我们的工作就是为我们自己参加联合政府做准备：在这个范围内，我们把任务分为两个部分，当务之急是制订计划将西贡政权实行的法律制度改造成适用于联合政府的法律制度。按照这样的方针，我们着手修改了有关工人权利的法律，以便贯彻一些原则，如严格规定工时、卫生和安全条件，保证最低工资和保护工人不被解雇。我们避开那些较富于煽动性的问题，尽可能少提诸如土地改革和公民自由等有争议的问题。在这个危险领域，我们凭经验的做法是“多交友，少树敌”。正式宣布土地所有权的分配是无偿的，肯定会触犯支持我们的那些地主的利益，也会得罪那些视土地为命根子的农民，而阐明基本权利的任何企图则更富于爆炸性，这会加剧我们队伍内部西方型的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潜在冲突。因此，我们忙于解决那些我们认为该办的、较危险也重要的问题。

我们还接收定期的报告，这些报告收集了西贡政府的法

院和其他法律机构活动的各种文件。对这些报告我们仔细地进行研究，追踪他们的不同发展并把他们的人员加以分类。在各种情报基础上，我们把西贡法律界分为三个部分：暗中支持我们的人；同情但没有帮助我们的人；反对我们的人。我们在这方面的目的是，搞清楚一旦联合政府成立，我们可以同哪些人合作。我们通过城市工作，努力使同情我们的人转变成积极支持我们的人，使同我们敌对的人转变成不抱偏见的人。

这时曾受到破坏的西贡地下联络网已经重建起来。我们还成功地派人打进了阮文绍的各级政府和军队。司法部有它自己的编制人员，然而在那个时期，我们司法部的特工人员从未获得过民族解放阵线其他某些特工人员的同等待遇。尽管如此，我们的情报工作是完善的，我们的争取工作进展顺利，令人感到满意。

但在解放区则没有多少事情可做。军法部门对所有有关战斗的案件有司法权，而居民中的吵架或争执大多数由当地政治干部进行调解，只是这些干部在碰到棘手的案件时，往往来征求我们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指导原则是采用传统越南司法式的、靠长辈的权威和智慧来调解纠纷，并且用传统的文化道德教育他们。

战士们内部问题由政治委员处理。这些政治委员跟随部队，熟练地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办法来处理这些问题。然而，总的来说，争吵是很少的。虽然游击队员们食物短缺和经常患病，他们保持的这种同志情谊，激励着人们为共同的目标而战。这种共同的目标他们是深信无疑的。他们通过互相帮助和虽是粗犷但却真诚的互相爱护而在可怕条件下坚持战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战后面面对大失所望的现实

生活时，许多游击队员们回顾他们在游击队中所过的共同生活，却感到那是一种田园诗般的美妙时期。这是一个特别宝贵的时期，因为它不会再来了。他们的领导人陈文茶将军这样写道：

每个人取得的每项成就，
都是大家共同的胜利。
假如你完成了某些事情，
这是他人帮助的结果。
我们享受果实，但要尊重
那些种树的人。
当你凯旋回到城市，
永远别忘记你在丛林中的生活。
有了你的同志们，
你才取得了成功。
值此功成之际，
可别忘记他们的友谊。

陈文茶的诗铭刻了他在战争中的历史。虽然他的诗计划出五卷，但只出版了一卷。这卷诗表达了这样的感情，赞美南方人民的忠诚和颂扬他们在战时的牺牲精神，但却遭到了没收，而陈文茶也从公开场合消失了。

第十五章

同死神赛跑

1970年头几个月是一个危险的时期。甚至在新年之前，来自金边的情报就已告诉我们，美国为了加强轰炸我们在柬埔寨的避难所，正在压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准予美国采取行动。战争年代，西哈努克勇敢和巧妙地保持了柬埔寨的中立，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对边境地区所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种种迹象表明，美国正期待柬埔寨政府正式默认他们对我们的基地和供应线的攻击，这确实是一个不祥之兆。与这一情报相联系，我们又接到苏联和中国向我们提供的情报，在柬埔寨内部可能会发生一场反西哈努克的政变。

为了对付可能发生的任何情况，我们总部的所有单位都在拟定应变计划。一旦发生紧急情况，我们的撤退路线是向西越过东威古河，进入柬埔寨的波罗勉省，然后向北到桔井。我们可以驻扎在那里，即在湄公河的西边，或者继续沿着胡志明小道北上直到老挝。在这个地区部署了民族解放阵线第5师、第7师和第9师的强大兵力，为我们可能被迫采取的任何行动提供安全保证。

随即，1970年3月18日，当西哈努克正在法国休假时，他的敌手发起攻击，废黜了他的柬埔寨政府首脑的职位。西哈努克的去职是我们立即感到忧虑的一个原因。因为我们现

在看到，我们在柬埔寨的安全带已由原来的避难所变成了一个潜在的危險区。由于西哈努克的没有远见的大臣朗诺^①当权，金边立即向我们投来毫不掩饰的、充满敌意的目光。我们可能遭到东面西贡和美国军队与西面柬埔寨王家部队的两面夹击。越南南方中央局并没有只是静观柬埔寨首都的发展情况。3月19日，常住工作人员已向深入到桔井内地的预定地点撤离。在美、柬军队入侵期间，当美军第25师进攻总部地区时，越南南方中央局指挥部的工作人员早在两个月前就已离开了。

形势越来越紧张，民族解放阵线、临时革命政府和联盟机关也准备紧急撤退。在我们重新检查防御措施和后勤计划时，B-52轰炸机的空袭次数达到了新的高峰。每天轰炸机不断地搜索周围的丛林，大量的炸弹在远处轰隆隆地爆炸，震撼着我们脚下的土地。紧接着在3月27日早晨4点钟，我们被熟悉的轰隆声惊醒，这次爆炸要比最近几天的近得多。所有官员和警卫都冲进掩体，凝神倾听着外面的动静。轰隆轰隆的巨响越来越近，弹着点在向我们径直逼近。随后，灾难突然降临到我们头上，每个人紧紧地伏在地上，有的人暗地里叫喊着，另外一些人拼命控制自己，不自觉地颤抖着。我们周围的土地开始一阵阵地翻腾起来，爆炸的声响将我们吞没了。后来，空袭结束了，留下约100个头晕目眩的游击队员，他们不断地摇晃着脑袋，试图消除耳压。最后一颗炸弹的弹坑离我们不到一公里。我们再一次奇迹般地躲过了空袭。

① 朗诺1913年11月2日生，毕业于柬埔寨王家军事学院。曾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总司令、国防大臣、首相等职。1970年3月18日和施里玛达一起发动政变，推翻西哈努克政府。后任首相兼国防大臣、总理、总统。1975年流亡美国。

没有一个人受伤。但是我们知道，危急时刻已经来临。我们的主要机关——所有政府部门和指挥单位紧跟着早已越过东威古河的先遣队，呈弧形地展开在一个50至60公里的范围内——开始长途跋涉进入柬埔寨。

到3月30日，司法部已经在避难处的一所房子里建立起来了。我们都在地堡里面工作和睡觉。

在我们遭到B-52轰炸机未达目的的近距离轰炸三天后的一个清晨，在震撼这个地区的一连串爆炸声中，我从吊床上被抛出来摔倒在地上。我和警卫迅速从地堡的门口向外观看，只见几架直升飞机正在丛林上方盘旋企图降落。我能够辨认出机上越南共和军士兵的脸孔和从机舱口伸出来的枪管。这时，我们的警卫人员从战壕和掩体内用小型武器和机枪向进攻者猛烈射击。从无线电话中传出来的爆裂声表明，其他各部也受到了攻击。

几个小时过去了，有时交火十分激烈，有时暂停下来，然后又突然发作起来。我整天在掩体里蹲着。我的两个警卫密切地注视着战斗，不时通过炮眼用AK-47步枪向外连发射击。我在地堡中辗转不安，把最重要的文件收拢起来，心想：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我们必须在天黑以后冲出这个包围圈。这是绝望中的挣扎。我们心里都清楚，如果我们继续呆在这所建筑物里，第二天就会被俘。

天黑以后，西贡部队对我们的压力缓和下来。他们肯定知道我们的主力部队是在这个地区，他们也害怕遭到埋伏。按照信号，在火焰已经熄灭的情况下，我和警卫溜出了地堡。当我们沿着丛林中一条早已安排好的逃亡路线往西走向第7师建立的安全走廊时，已经听不到枪声了。我尽可能跑步，有时拖着小步走，喘喘气。有的部里的官员走在我前面。我

也能听到后边人跟上来急促脚步声。地堡建筑群那边又交起火来，黑夜中回荡着断断续续的AK—47和M—16步枪炒豆般的射击声。

在我们后面，警卫队扇形展开，以便掩护我们撤离并把追击者引开。我在警卫中间，连跑带走地小路上紧赶。黑暗的从林中什么也看不清。整个晚上我们都在顽强地行进，也不管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当紧张的心情逐渐平静下来以后，我的腿却象灌了铅，迈不开步，我的喉咙干渴得发疼。前边刚一传话说我们可以停下来时，我就颓然倒在地上，由于过分疲劳而失去了知觉。昏倒之前，我从小路边的一个泥潭里用手舀了点水喝下去。

当我早晨6点钟醒来时，马上发现，我昨晚喝水的泥潭是水牛粪的粪坑。但是我很少有时间来回想这件令人不自在的事情。几架喷气式飞机正尖叫着朝我们这里飞来，它们一掠而过，同时用机枪向小路扫射，我们赶忙躲进丛林。整个早晨我们不顾飞机的零星轰炸和机枪扫射向前走。这时，全部队伍包括民族解放阵线、临时革命政府、联盟各部和后勤警卫人员。虽然不可能获得确实的消息，但在前一天受到的袭击中，我们似乎没有受到什么严重损失。

我们部队的力量在后撤的路途中逐渐显示出来。黄文泰将军将他的防卫部队部署在指定的集合地点（即我们曾经停下来睡了几小时的地方）与柬埔寨桔井省之间，建立了一个安全走廊。尽管在我们行进中间敌情不明，但是毫无疑问，黄文泰将军的部署正在经历严重的考验。我们知道西贡的部队已经从东边向我们扑过来，而朗诺的柬埔寨王家部队正在从西面沿7号公路向前推进。7号公路横贯那个走廊地带。

我们唯一的食物是冷饭团。肚子饿了，只能一边走一边吃。与此同时，第9师匆匆建立起一道屏障，阻止越南共和军的推进，而第5师则开到我们左侧以阻挡柬埔寨的部队。有了民族解放阵线两支大部队的阻击与第7师部队的严密保护，总部和政府全体工作人员终于逃了出来。

第二天深夜，即4月2日，我乘上一辆摩托车离开了行进中的队伍。摩托车是临时革命政府主席黄普发派来送我到远在北边的第7师总部去的，民族解放阵线、临时革命政府和联盟的其他领导人早已集合在那里，其中包括民族解放阵线武装力量副司令阮氏定夫人。第二天一早，我们就朝着北面相距只有数英里的7号公路进发，同时了解到该公路已遭到攻击。

为了突破人民解放武装力量的阻挡，越南共和军和柬埔寨的先遣部队正在竭力向前推进，以便在我们到达那里之前控制这条公路，这样就可以切断我们的逃路，并且把我们封锁在柬埔寨南部，在那里我们就会被包围和分割。我们不清楚那些试图阻拦我们的部队是否知道他们阻拦的是些什么人，而且直到今天，我还不知道美国和西贡政府的军事分析家们是否了解他们差一点儿就可以消灭或俘虏南方抵抗运动的中坚力量——前线战士的精锐部队以及大多数军政领导人。不过在我们匆忙穿越走廊时，我们至少十分清楚我们逃出来的利害关系。因此我们的努力不仅是为了逃脱敌人残忍的魔掌，也是为了真正保存我们的斗争力量。

这时杨琼花医生是在她丈夫和一名警卫的搀扶下向前走的。她已经怀孕七个月了，就在这个时候，她分娩了。原来设想她临产时需要作剖腹手术，因此就派了一个外科小组伴随着她进入柬埔寨。但不知是因为马不停蹄地走路还是因为

别的原因，分娩正常，只是急促些。林间空地上铺着一块方形尼龙布，这位卫生部长就在上面生下了一个男孩，孩子大声啼哭，显然一切顺利。尽管这是在危急时刻，孩子的降生不是时候，带着这个革命队伍中的新成员¹⁾，倾听着我们左右两侧的战斗中传来的一阵阵大炮声，我们靠近了7号公路。

在到达公路之前，我们接到战报，阻挡柬埔寨部队的防线坚持住了（至少暂时是这样），而我们的第9师在东边约10公里的克列向西贡部队发动了反攻²⁾。在这些消息的鼓舞下，我们通过了7号公路并向北前进，这是以后被迫进行一系列行军中的第一次行动。

突破包围算是一块石头落了地，但是很快我们又陷于难以形容的疲劳之中：日夜兼程的行军，很少睡眠，在路途上大多吃冷食引起的疾病和饥饿，使中老年部长们以及中年的文职人员吃不消，他们身体衰弱，开始垮下来。行军路上，正值雨季，连日不停的大雨，不断地使柬埔寨的红土变为胶泥，穿着橡皮凉鞋走在上面，几乎难以举步，最后只得把凉鞋丢掉。我们都赤着脚，把裤腿卷到膝盖上，在深到脚踝的烂泥中拖着脚步，每迈一步都得挣扎一番。那些带自行车的人只好把车子丢弃在小道旁边的垃圾堆里。我们象机器人一样，冒着倾盆大雨向前迈进。每个人抓住走在前面的人的衬衫，以便得到支撑和方向。

1) 我们在这一事件中的高兴心情七个月以后变成了悲伤，当时这个早产的婴儿死于疟疾。——原注

2) 1971年冬，越南共军向柬埔寨推进时，7号公路再次成为激战的战场。那时，西贡部队在靠近卓普大胶园的九龙和皮埃尔湾地方遭到了严重失败。在那里，人民解放武装力量第5师的屏护部队现在正在阻击朗诺的军队。——原注

雨不停地下了五天。这时我只能勉强站着，更不用说走路了。我茫然而缓慢地向前移动，我只意识到走在我前面的那个人（我仍然抓住他的衬衫）以及两侧丛林中迫击炮和大炮炮弹的零星爆炸声。为了躲避炮弹，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扑倒在地，把脸紧贴地面。晚上我们在橡胶树之间绑上吊床。为了防雨，头顶上张着一块方形尼龙布，可这块布根本挡不住瓢泼大雨。天明以后，我们当中的每个人都很难清楚自己是睡了一觉还是迷糊了一阵子。

当我们继续北上的时候，大家行动的紧迫感就逐渐减少了。在某些无法辨认的地方，我们发觉树林里已听不到几声炮弹的沉闷爆炸。最后，在7号公路北面约150公里的桔井外丛林里，我们终于可以停下来休息了。好几天，我们除了睡觉外很少干别的事情。我们能够享受一下了，喝上了热茶，吃到了精制的食品。这些东西我们有一个半星期没沾唇了。得到休息以后，大家体力开始逐渐恢复，精神也慢慢振作起来。越南南方中央局的范雄和陈南忠将军开玩笑说：“即使我们拼命地跑，我们仍然会取得胜利。”亨利·基辛格1968年在《外交季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也有这样的看法，他说：“游击队如果不失败就会取得胜利。一支正规军如果没有取得胜利就会失败。”

对形势作出的估计是，我们实际上没有遭受重大损失。按照伤亡人数来说，我们始终是幸运的。尽管我们在后撤途中历尽艰险，但是所有的领导人员都安全到达了桔井。先前转移到此地的越南南方中央局的人员也没有受到损失。我们与他们在这里汇合了。柬埔寨的北部省份不易受到B-52轰炸机的轰炸。相对来讲，也不会遭到袭击，因为事实上我们的部队控制了该地区（并且已经控制了一些时候）。我们

逃脱越南共和军进攻后一个月，美国随即对柬埔寨发动了大规模入侵。战争的进一步扩大几乎立即给我们带来了有利因素。美国和越南共和军的进攻确实造成了破坏并且摧毁了我们的供应线。但是我们的敌手在柬埔寨并没有持久力。美国在此地已开始单方面撤军，而美国单靠增加空军行动是无法真正代替这些地面部队的。西贡军队原来就得对付国内的军事挑战，更不用说增加对柬埔寨的负担了。同时朗诺的军队对眼下的战争也毫无准备。

尼克松和基辛格打赌说，对我们根据地 and 供应线发动一次有限的袭击就能产生明显效果。他们夸大了美国的能力，认为对手的忍耐力和持久力可以轻而易举地破坏掉。他们为了实现短期的军事目标，不顾后果如何，愚蠢地贸然入侵不稳定的柬埔寨，为此在国内还要面临长期严重的政治压力。我们的分析人员认为，入侵柬埔寨与两年前的春节攻势对美国的影响差不多，造成了美国国内的不和。的确，如范雄所说，我们是逃跑了，但是尼克松却为我们的暂时挫折付出了高昂的政治代价。基辛格争辩说，入侵柬埔寨赢得了一年的时间，这可能是真的。但是根据我们的看法，即从政治和外交观点以及军事方面来看，美国的行动为民族解放阵线造成了巨大优势。

虽然如此，整个事件却使我们大吃一惊，更不用说这个时期身体要经受严重摧残了。不过，在转移到湄公河西岸之前，我们在桔井外围有机会喘息了一下。在西岸、在湄公河的自然屏障后面，我们建立了新总部。

安顿下来之后，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取得当地居民的友谊和支持。历史上由来已久的柬埔寨人对越南人的疑虑是一个特别棘手的问题。西哈努克宣布支持我们的斗争，给了我们

无可估量的帮助。我们在湄公河岸边定居前一个星期，4月24日，反美的印度支那领导人，包括西哈努克亲王在中国广州举行了一次小型首脑会议。会议是由范文同（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发起的，参加会议的包括巴特寮^①领导人苏发努冯^②，民族解放阵线主席阮友寿和西哈努克。会议结束时，西哈努克亲王发表了一项声明，对美国进行了谴责，并正式允许民族解放阵线和北越人使用柬埔寨的领土。

在当地柬埔寨人中间，西哈努克不仅仅是作为一个政治领袖而且是作为一位半神人物受到尊敬的。对柬埔寨人来说，推翻西哈努克就是对他们的伤害，就是对君主的叛逆和亵渎，这是他们憎恨的事情。现在我们在亲王同意下作战，这在柬埔寨人眼里就有了合法性，否则我们就不会受欢迎。为了巩固这一有利条件，我们努力使自己的工作人员保持对主人最严格的规矩和礼节。部队遵守严格的纪律，出现个别偷盗和其他违反纪律的事例时，违纪者立即被枪毙并把对他们的处罚公布于众。与此同时，B-52轰炸机继续不断的袭击也对我们产生了有利影响。这些轰炸给柬埔寨的村民带来了极大的恐怖，促使红色高棉部队的战斗精神更加高昂，并且使其他的人更加同情美国的敌人。

虽然（或者也许是因为）目前我们的基地更加分散 要

① “巴特寮”就是“寮国”的意思。后来老挝爱国战线领导的寮国战斗部队，也被老挝人民称为“巴特寮”。——译注

② 苏发努冯1905年7月13日生于老挝琅勃拉邦市，出身皇族，小时在越南上中学，后赴法国留学，获土木工程学位。曾先后任老挝人民革命党政治局委员、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主席、最高人民议会主席、爱国战线、建国阵线主席等。1926年10月，由于健康原因，他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由富米、西维希代理。

——译注

精确轰炸更加困难，但是高空轰炸却越来越频繁，最后达到了每日81次的最高峰。这比我们从越南撤退前的几个星期中所遭到的轰炸次数要多得多。在这一重新恢复的狂轰乱炸中，我受到了疟疾的严重折磨，被转移到我们在丛林深处的干部医院。但是即使在那里，安全也得不到保证。当我在该医院中的一个地堡里养病时，B - 52轰炸机在附近投下的炸弹把地堡桌子上的药箱震得四处乱飞。我的警卫被抛起来一下子压在我的身上。但幸运的是，我们两人都没有被乱飞的家具击伤。此后，我又被转移到更远的医院，在那里住了两个月病才痊愈。

直到这年的6月底，我才从经常复发的贫血症中摆脱出来，身体完全康复。当我终于返回总部时，我很快发现，那里的人并不是个个都无忧无虑。

第十六章

与北方的第一次摩擦

回到总部不久，我感觉到气氛有了变化。往常我的热情欢乐的朋友变得闷闷不乐，开始奇怪地沉默寡言，好象我离开以后彼此有了隔膜。他们一旦开口，话中就带着恼怒和怨气，他们告诉我，新来的三岬是问题的根子。他是新派来为联盟工作的行政和联络事务主任。

三岬是一个爱吵架、易与人闹摩擦的人，过后也不觉得难为情，甚至在他为之服务的人面前，他也毫无顾虑地发火。三岬是一个只讲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北方人。他可能是为了对付联盟中持不同意见的南方民族主义者而被特别挑选来执行这个任务的。由于某些未知的原因，他被派来接替很受大家爱戴的九战（“战士老九”）。九战已随同一批联盟、临时革命政府和民族解放阵线的上了年纪的成员转移到河内，后来就留在北方。联络主任是一个起着主要作用的职务。九战和他的工作人员每日要同联盟和临时革命政府保持最密切的联系。三岬一走马上任，就马上表现出他与令人感到愉快的前任有许多不同之处。

我的老朋友、原先担任过法语教授和西贡教育部官员的阮文杰，那天找到一个机会把我拉到一边，脸色铁青

“这儿究竟怎么啦？”他责备说。“我参加了阵线，我

作了这个决定，我们都这样做了。你知道我们付出了什么代价。”他开始颤抖，又说：“现在这些北方人对待我们就象不速之客。这个狗娘养的三岬是我碰到过的最叫人无法忍受的家伙，他总是没完没了地讲什么小资产阶级呀小资产阶级。就象一台你无法关掉的进行广播宣传的收音机。他抓住每个机会批评我们。每个人对这样的虐待都苦不堪言。”

了解到更多的情况以后，我明白了。这很难说仅仅是个人脾气不好的问题。三岬曾告诉他的下级人员（也是从北方来的党的工作人员）说，他要使所有临时革命政府和联盟的领导人知道，人们为他们服务，不是因为他们自己有任何功劳，而仅仅因为他们是无产阶级和党的代表。三岬手下的干部忠实地执行他的指示并且设法同整个集团疏远。这是一种新态度，一种令人不安的举动。这同劳动党一向所表现的对非党的南方领导十分关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三岬是不会改弦更张，态度变好的。

阮文杰和其余的人，现在也包括我在内，对此都感到忿忿不平。我们当中的许多人来自富裕家庭并且在参加革命前过着优越的生活。我们参加革命的原因也许各不相同，但是我们大家都认为，我们不但早已为国家作出了巨大牺牲，而且还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我们许多人曾经用这种或那种办法抵抗法国人，后来又转入丛林，毅然投入到反美斗争的第一线。无论我们过去享受的生活有多么舒适，那已是过去的事情。关于我们的阶级背景，我们是没有什么罪的。我们感到我们动机的每一点都是纯正的，与那些思想意识很强的同事相比，毫无二致。某些干部把我们过去的城市生活方式当作嘲笑和蔑视的主题。对这样的言行我们是难以忍受的。在坐过监牢、遭受B-52轰炸机轰炸、患病和营养不良之后，

我们一下子成了二等革命者，想起来真叫人寒心。1970年初秋，三岬在B-52轰炸机的一次袭击中丧生，我们没有举行追悼会。

令人极为反感的三岬尽管不在了，但是那些北方干部的态度依然如故。显然，过去同志间的那种革命情谊没有恢复。当我和同事们回顾已往几年的情况时，觉察到似乎存在着一种模式。我们开始意识到，在任何特定的时期内，我们受重视的程度能够用我们所受到的待遇水平衡量出来。1968年，当党对革命的控制明显增强时，它需要扩大斗争的民族主义基础。1969年，当尼克松实行越南化政策时，需要国际（包括国内）承认我们的活动具有合法性。因为这些需要，就使联盟和临时革命政府行动起来，并竭力宣扬尊重南方的目标。相反，1970年是军事发展的一年，战争已扩大到整个柬埔寨和老挝，美国地面部队开始了所谓不可逆转的撤退。这一年是激战的一年，既有挫折，也有胜利。但由于美国人开始撤出，我们第一次能够希望军事力量的对比最终将会对我们有利。由于有些党的领导人看到了军事上有取胜的可能性，因此，政治战线就失去了发展的势头。这样一来，联盟和临时革命政府就不再起主要作用，因而批评我们有阶级局限性的话就多起来了。

从医院回来不久，在临时革命政府一次内阁会议上，我直接同黄晋发主席讨论了这些不愉快的事情。我问他，那些干部的作法究竟是怎样造成的？他对这种局面怎样看？我知道黄晋发会告诉我不少内幕情况。尽管他字斟句酌地简单回答，我想，他的话一定会透露出党的真实态度。

黄晋发说些什么和怎样说都叫他不好办。他告诉我说：“多半说来，三岬的阶级方向是十分正确的。另一方面，按

照革命的策路 and 战略来说，他的狂热是错误的。我们将调查这个问题，看看能够做些什么。”在面着我谈话时，黄晋发的语调包含着正式的、尴尬的、不明确的道歉，同时显示出他的不安。换句话说，这一切意味着，在胡志明逝世一年之后，意识形态专家们牢牢地控制了党，无论他们对外界怎么宣传，他们并不想在他们的小伙伴身上浪费精力。

尽管黄晋发讲了一些圆滑的话，结果仍然是一切如故，毫无作用。一议论起这些事，我们的怨恨和不安的情绪就越来越大，产生了与我们盟友疏远的感觉。而在过去，双方存在着和谐与合作。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卷进了一场令人讨厌的双重游戏，然而还不清楚这场游戏会导致什么结果。但可以肯定，我们许多人所坚信的斗争中的兄弟情谊正在迅速削弱。

现在回过头来观察那个时期，就会很容易地认为它可能、甚至应该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不但从中可以了解我们与控制北方的党的真正关系，同时还能为此做些事情。如果人们普遍认清了问题的实质并能预料到后果的话，那么，联盟的成员和临时革命政府的人们就会离开革命，或者至少革命营垒内部会发生严重分裂。但是，如果要象1970年中期南方民族主义者那样分析当时形势的话，就不能单凭逻辑推理下结论了。

首先，我们自己选择的道路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大家都经历过良心上最深刻的反省，从而真心实意地参加了革命。在1970年，考虑走其他道路来争取越南独立的想法，早已不合时宜。我自己的决定性时刻是在1955年我从法国归来之后。其他许多人也是在吴庭艳当政的头几年，对吴庭艳进行了细致的观察之后，才作出自己的选择。他们知道，这种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自己未来的生活方式。戊申春节之后的

1968年，是另一个这样的关键时期，对于那些15年来一直在仔细考虑国家前途的人来说，这是一个转折点。

在另一部分人眼里，解放问题一向是与共产党联系在一起的，这未必因为他们是热情的共产党人，而是由于早在1920年，共产国际便是越南民族主义唯一的同盟者。胡志明象一个落难溺水的人那样拼命抓住这一支持，并且在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基础上制定出独立的蓝图。但是甚至当胡志明热衷于共产国际的普遍革命的学说时，他仍然没有放弃其他的机会。几十年来，他独特的政治思想总是保持着对各种选择和潜在同盟者的敏感性。曾经有过这种机会：1944年和1945年，他采取低姿态要同美国搞好关系；1946年在枫丹白露宫，他打算争取同法国人合作；甚至在1954年，当同法国的战争结束，而美国正面临作出自己选择的时候，他也是这样。

但是，对胡志明来说，他从未争取到其他的同盟者。1970年夏，当我们考虑我们同劳动党的关系时，也没有其他同盟者亲近我们。我们完全被孤立起来。法国和西方对我们政治思想的形成起过很大作用，但极其矛盾的是，法国和西方并不赞同我们的独立，既不希望也不帮助使他们的价值观念适用于我们的社会。显然，西方领导人从来没有改变政策，接受越南人要求独立、建立一个体面的政府和经济进步的愿望，相反，法国人是一点一点地逐步放弃控制的。而美国人则把越南当作一个战略工具，无视这个国家人民的愿望，为独裁者撑腰打气，扶持前法国殖民官员。甚至在我们开始猛醒的时候，国内外对我们的态度仍然没有变化，我们还是得不到必要的支持。

对我们来说，这些事情十分明显，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我们历史和特质的一部分，要以“考虑事实”和“作出选择”

这些词句来描述形势，其本身就是弄虚作假。但这是在1970年夏季我个人的想法，因为党要操纵的意图已经开始暴露。这种暴露确实造成了某些困境，但是不考虑那些不现实的选择，问题还不算大。

除此之外，有充分理由相信，我们仍然能够依靠自身的力量在这场斗争中崭露头角。虽然武元甲将军正在高谈“正规战”（这是反对游击战和政治战的）和军事上的胜利，实际上，很少人对此预言抱有希望。只要美国支持西贡政府，全面胜利的想法似乎是渺茫和暗淡的，按照越南人的说法，这是“隧洞尽头的光线”，而在同一时期，美国政治家也日益喜欢这个比喻。在春节全面攻势中，民族解放阵线的武装力量遭到了令人痛心和无法弥补的损失。每个人都在猜测，北方的主力师团在美国空中力量残酷袭击下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溪山事件肯定不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先例^①。

也许B—52轰炸机狂轰滥炸造成的心理后果使我们形成了关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当飞机直接袭击我们藏身的总部地堡时，我们知道这种攻击的结果。不用想象就可预见到在实行“正规战”时，是如何把部队集中起来进行常规战斗的。在1967年年中以前，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阮志清将军曾在南越实施一项同越南共和军和美国部队正面对抗的战略，造成了可怕的伤亡率，结果被迫改变实行消耗战的策略，转而进行政治斗争。

所有这一切都强烈暗示着采取某种谈判解决的方式起码可以取得同一次决定性军事解决相类似的效果。如果情况向

① 溪山是美国在越南中部的火力基地，1968年1月初曾受到北越部队的包围，几乎将近三个月，进攻者招致B—52轰炸机和低空飞机的袭击，遭到了可怕的伤亡，最后放弃了包围。——原注

着这一方向发展的话（我们只能十分巧妙地采取行动），联盟和临时革命政府实际上和表面上的重要性都将会重新提高。任何政治方面的妥协将为南方民族主义者制造一个机会，为他们自己开辟一条起独特作用的道路，成为一种在党与美国和阮文绍力量之间的推动力或第三种势力。

这一点尤其明显，这是因为，根据我们的判断，临时革命政府和联盟公开声明的立场真正反映了大多数南方人民的愿望。南越人心底是矛盾的，既憎恨阮文绍的独裁，又惧怕共产主义。在这样的政治现实条件下，对大多数人来说，没有哪一方面可以投靠，因此，哪一方面占支配地位，他们就会表面上对那一方面表示忠诚。但是，如果谈判解决为中间道路提供了政治活力，我们相信巨大的人民支持就会涌现出来。就是这样的信念和希望从一开始就支撑着许多参加民族解放阵线和联盟的人们。在我们了解形势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认为有任何理由来改变我们的估计。

但事实上，战争的过程把我们推到了一个困难的处境，逐渐地削弱了我们真正的力量，同时又显示出我们在宣传方面的重要作用。最近这种困境加深了。但是，如果我们对人民情绪的分析在任一点上几乎都是正确的话，在客观条件允许下，可以组织起来的人民在政治和地区方面支援的基础是很强大的。而建立一个联合政府则可创造这样的客观条件。

考虑到民族解放阵线从属的军事作用以及象黄晋发这样的党员进行组织上的控制，我当时曾经自问这样的想法是否幼稚，我想不是的。如果随着美军的撤出，很可能从流血和双方都筋疲力尽中产生联合政府，那么，政治权力将会不可避免地倾向于中间派。两方面的动机都是想控制中间派，而那些属于中间派的人将会发现他们自己有力量来对付每一方

面。那时，就会有充分的理由来驾驭这个潮流。此外，虽然我们的理想主义当时可能受到更大的攻击，但是它很难完全熄灭。归根结底，我们认为这些与来自北方的先生们有关的问题仍然是阅墙之争。

但是，不管是兄弟与否，紧张状况继续存在。在临时革命政府各部门中，我们继续进行战后建立联合政府的准备工作，而许多工作在我们转移到柬埔寨之前已经在做了。但是，日复一日，我们的工作处在更加孤立的状态下。同越南南方中央局的联系越来越少，而且关系更加紧张。我们与那些直接指挥战争的人之间的情报交流大大减少了。我们对整个形势的了解比过去少得多，不仅发下来的通报少了，而且很少找我们磋商问题。后来传来了越南共和军在老挝和柬埔寨的卓普和皮埃尔潭战败的消息。这些地方我们熟悉，一年前我们逃往桔井时曾路过。毫无疑问，这些战斗是劳动党政治局军事委员会和北越陆军师团所制定的“正规战”方案的演习，以对付拥有美国空中支持而没有美国地面力量帮助的西贡部队。1971年夏季过后，我们知道为了在1972年初发动大规模进攻，各项准备工作正在抓紧进行，这次进攻将全面考验这次对部队的新调整。

同时在巴黎，黎德寿对亨利·基辛格进行了“又谈又打”的卓越表演，利用和谈尽可能争取时间来掩盖下一次真正的战争行动，这就是即将在旱季发动的南方战役。其中一个重要的策略是，提出“其他任何人都可以，但绝不要阮文绍”的建议，这是历史悠久的孤立主要敌人的策略的新花样。对基辛格，黎德寿坚持无论是通过选举或其他办法搞掉阮文绍是谈判解决的前提条件。我不知道美国政府对这种事情重视到何种程度。但是，从基辛格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在1971

年夏天，北越提出的会谈要点吸引了基辛格很大的注意力。在桔井，我们等待着将要到来的更大变化，同时认识到，在这个阶段中，战争将转入远离我们影响的范围。

不论我们所期待的变化是什么，在我们中间，没有人猜到到我们下一次的战斗竟是精心安排的以党的理论家为一方，以民族解放阵线、临时革命政府和联盟政治领导人为另一方的一场唇枪舌剑之战。它是在1971年秋天开始的。当时党决定我们抽出三个月时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杰出理论。这也许是我们的运气戏剧化发展所达到的最低点，或者也许它是把我们思想意识的顽固性看成多么严重的一个迹象。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几乎在同一时期，春水（他名义上是黎德寿的上级）在巴黎表示愿意考虑乔治·麦戈文提出的不可能实现的和平建议，而在湄公河西岸，其他党的专家正在准备向南越革命的资产阶级灌输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理。

这些讲习班为期三个月，是以最友好的方式邀请我们参加的。每个人都知道不幸的冲突已经发展了，而现在我们被邀请来并参加讨论，这将有助于澄清在共同争取独立的斗争中各种革命派别的作用。由阮爱国¹高级干部学院毕业的专家来授课。这些专家中许多人曾经在莫斯科受过训练并且在越南南方中央局担任工作。我一度曾想过这可能是黄普发主席答应要“对情况进行研究”而迟来的结果，而且通过这次学习，我们可以坦率地交换意见，最后可能达到某种对我们联盟性质的相互理解。

我把我原有的这些想法在我们最初召开的会议上提了出来。在会议议程中，第一项主要议题跟澄清各党派的作用问

1 “阮爱国”是胡志明最著名的化名之一。

— 181 —

题，跟未来的战略和其他有关战争的问题都毫无关系。相反，给我们讲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论述，说“物质是第一性的”，物质是独立于并先于思想和精神而普遍存在的。这样的论点很难适合于亚洲的知识分子。这批知识分子虽然受过法国的教育，但是他们在母亲怀里吃奶的时候，就接受了佛教和儒家的思想精神了。激烈的争论很快就出现了。马克思主义者竭力陈述他们的原理，并且说明这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他们的反对者则顽固地用嘲笑和表示不相信加以回击。当争论进入到毫无意义时，我开始感觉到方向错了。决定我们祖国未来的战争正在进行中，而这里是柬埔寨的荒野，我们却在这里讨论物质和存在的理论。整个事情具有超现实的性质。

当我看到有关这些抽象问题的讨论因不一致而告结束并进入讨论第二类系列问题时，我感到了某些宽慰。我们曾经被问起什么是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正确关系？如果那些组织这个讲习班的人预想到，一系列权威性的讲课不时会被听众有礼貌地提出问题所打断，他们就一定会完全失望。由于用刺耳的语言进行抨击，气氛立刻紧张起来。那些坚持民族主义是第一位的人也拥护民主自由和民族独立。党的干部急忙又转回到国际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问题上。民族独立或者是阶级斗争，究竟是那一个在历史上推动越南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

我和我的同事们一道争辩说，争取民族独立的要求为争取土地和民主自由的斗争提供了机会，这是不言而喻的。民族主义的起义也为无产阶级革命创造了条件。总之，民族解放是主要的动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独立之间没有必然的联

系，更不用说因果关系。干部们叫喊着他们过去学过的有关阶级斗争和反帝战争相互依赖关系的论点，但是他们感到很难对付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后者在法国学校中早已学会了辩论的技巧。

为了支持他们的论点，这些知识分子大量引用胡伯伯的语录。他们引用“没有什么东西比独立和自由更宝贵”，而着重点在于“没有什么东西”。“教条主义无视特点，宁愿依赖别人的经验”（也是引证胡志明的话），“别人”系指其他地方的共产主义革命。干部们发觉到胡志明也被列入反对他们的名单中，似乎特别感到烦恼，因此他们忙乱地到处寻找一种战略来对付这种貌似有理的恶毒攻击。

进入讨论第三个主要问题时，各集团间长期存在的和睦关系在不断的唇枪舌剑中已经烟消云散了。干部们碰到的资产阶级顽固性简直比他们预想的要大得多。民族主义者则被干部狭隘的偏执狂所激怒，认为召开这些会议是为了占用他们的时间，让战争由别人去进行。即使不发生这一充满仇恨的开端，最后一个题目即知识分子在民族革命中的作用（这是党的看法）本身就足够引起好争论的南方人中风。

现在转到干部们引用各种权威性的著作。从国防部长武元甲的著作中引用了关于各个阶级需要接受党的领导，以便“实现民族团结，……中立一切可以中立的力量并且分化瓦解一切可以分化瓦解的力量”。从总书记黎笋的著作中引用了关于社会各阶级的作用问题：

“在我们的时代，资本主义已经变成了时代的错误并且暴露了它的丑恶的反动面目。……在强大的革命运动面前，……知识分子从民族资产阶级那里跑了出来并与他们决裂，特别是他们的子女是这样做的。认识到历史的发展，他

们一点一点地改变了他们的观点，基本上参加到工农阵营中来。”

由于他们的材料来源具有权威性，干部们显然认为任何理由都是驳不倒的。我们要“走出来”，向无产阶级投降并且谴责我们“出身的阶级”，全心全意地与无产阶级革命结合在一起。

对此，杨琼花医生（她在丛林中生下一个孩子）的丈夫黄文毅站起来极其庄严地宣称：“如果我们接受越南劳动党的政治方针，是因为我们看到迄今这个党所走的是民族独立的正确道路。如果我们参加抗战，是因为我们的心、我们的良知、我们的爱国热情促使我们响应祖国的号召，而不是无产阶级的号召！我们没有理由向任何人投降或否定你们所说的我们的‘出身阶级’。”

黄文毅刚坐下，黄晋发的妻子裴氏娥泪水汪汪地对他讲了一番话。“党对我们恩重如山，”她呜咽着透不过气来，停顿了一下说：“党把我们的灵魂从资本主义的泥坑中救了出来，并向我们指明了走向无产阶级革命的光辉道路。”我马上想到，这位北方资产阶级父母的女儿、平常缺乏幽默感的黄晋发夫人试图在讽刺人。后来我使自己回到现实中来。她象其他的人一样只是一个狂热的信仰者。如果黄晋发本人在场的话，他将会对她的坦率感到畏缩。但是他的妻子无论如何是“跑出来”的。从这点来看，黄晋发夫人在民族解放阵线人士中间被认为是“宝塔的守护人”。

争论最后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使得越南南方中央局一些最有威望的领导人开始参加进来以平息风波。宣传部长阮文灵上台来作和事佬。这样做的还有军事首脑陈南忠、南方局党的第一书记范文登。他们巧妙地进行工作，使讨论的调

子温和下来，制止个人的反控诉，并且用柔和的声音对准备战斗的民族主义者的观点表示同情。显然，他们急切希望避免任何永久的分裂，巧妙地向民族解放阵线、联盟和临时革命政府的人们传达微妙的团结的信息。当讲习班快要结束时，我的同事和我了解到，阶级斗争的理论家并不代表党的上层领导的思想，这使我们感到宽慰。我们的愤怒开始消融。在遭受到下部们粗暴攻击之后，我们发现我们数得出来的北方同胞中间，还有许多人尊重我们的地位和我们的正直。明显的是，党内存在着各种派别，较年轻的受过苏联训练的官员是一个潜在的危险。而联合的心脏不可否认仍然是健康的，我们自己也确信这一点。

经过了五年，直到1975年伟大的春季胜利使党取得政权之后的几个月里，我才能充分欣赏雨季在桔井为我们所作的非凡表演。干部们对我们的原则、我们的尊严和我们的自我价值观念的全面攻击，使我们既感到愤慨又感到伤心，我们已经准备接受越南南方中央局向我们提出的重新保证。我们中间没有人懂得古典的审讯技术是什么样的。它就是，先用残酷的折磨使其软化，然后再亲切地给予友谊与和解。党进行了一场令人眼花缭乱的表演。

第十七章

1972年是分水岭

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对马克思主义的争论在1971年底被更加迫切的事情冲淡了。好象是为了加强讲习班收场后的积极作用，我们现在感到我们自己深深卷入到战争新的发展阶段所引起的许多问题中。那年夏天和秋天，军事行动呈现间歇状态，而在巴黎，外交舞台正上演着双人舞。但是现在双方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迫近的旱季攻势上。双方都指望这个攻势的结果能决定战争的前途和确定最终解决的性质。

在1972年1月的第一周召开的临时革命政府内阁会议上，我们大家都了解到，斗争正在接近一个分水岭。虽然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即将到来的战斗可能只是代表早已进入第三个10年的冲突的一个阶段。毫无疑问，这一年半以来已发生了潜在的决定性的变化。在北京和莫斯科，我们的同盟者现在正响应美国的外交建议，这一发展的最终结果很难预料，但不会是积极的。另一方面，在柬埔寨和老挝，力量对比目前明显地对我们有利。尤其是，尼克松不久将在那个十分厌战的国家里（如果我们能够相信美国报刊社论撰稿人的话）艰苦地进行连任总统的竞选。而这一切中最重要的是，40余万美国军队已经撤出越南，留下来的只是一支没有经过考验的南越军队，它将经受猛烈的战争洗礼。

针对迫近的摊牌所带来的期待和紧张心情，黄晋发主席有关政治、军事和外交的报告比往常更加详细和广泛。与通常在内阁范围的通报不同，黄晋发在报告中对最近发生的各种事件进行了全面的回顾，并且说明了来年的战略概要。据黄晋发说，在1970年和1971年，我们的斗争重点是挫败西贡部队及其美国支持者的计划。重要的一点是粉碎了南越在老挝南部和柬埔寨沿9号公路对我们供应线的进攻。我们也成功地扩大了位于这些国家境内的解放区。与红色高棉一道，我们正在不断对朗诺政权施加压力，把推翻西哈努克这个危险的威胁变得对我们有利，并且为美国人制造了另一个难以对付的对立面。对于未来，最保守的估计表明，我们可以期待对我们战争起重要作用的柬埔寨和老挝地区保持稳定。

另一个重要的活动领域是农村，特别是抵制“凤凰”计划的努力。这个计划是由西贡和美国情报机构共同实行的，旨在摸清和“中立”在乡村中进行活动的民族解放阵线人员。在这个计划中，“中立”这个术语意指对那些被辨认出来的人进行逮捕、杀害，或者使他们“转变”。在许多地方，这个计划推行得既笨拙又无力。“凤凰”往往是徒有其名。有时还不分青红皂白地滥施恐怖，如把普通村民与民族解放阵线工作人员一道逮捕起来并且对他们进行折磨或任意处决。然而，在某些地方，这些恐怖作法却十分有效。例如，离我们的老基地不远的厚义省，民族解放阵线的基层组织实际上被摧毁了。尽管如此，从另一方面来说，“凤凰”也不是没有付出代价的。随着实施这个计划而来的凌辱虐待和敲诈勒索，不可避免地会促进人民对民族解放阵线的同情。而恐怖行动当然经常受到恐怖行动的报复。因此，在许多地方，默认的妥协遭到破坏，双方的伤亡增加了。

黄晋发还回顾了春节以来我们在城市里重建群众力量和西贡当局面临严重的城市动乱的情况。1970年，阮文绍颁布了一项使教育制度军事化的命令，关闭了中学和大学并且强迫大学生上军事课和接受军训。这引起了巨大的反抗，大批学生持续进行一系列暴力示威游行，政府则实行逮捕和审判，从而造成了对民族解放阵线支持的高潮。民族解放阵线同时还吸收了一些大学生领导人。其中有西贡大学生联合会主席黄新敏，对他的所谓颠覆活动的审判，变成了一个轰动一时的诉讼案件。

与此同时，西贡政权加紧起草征税法案并且增加了工资税，引起了广泛的劳工骚乱。工人们经常举行罢工和游行示威。残疾退伍军人为了他们的权利而组织起来列队上街游行。佛教徒加倍努力攻击政府的政策，他们在“和平和中立”口号下起而响应民族解放阵线提出的和解与一致的号召。这一切最强烈的抗议矛头直指仍留在南越的外国军队，尤其是南朝鲜的军队，因为他们特别残暴，在中部各省杀害了大批老百姓。基于地方上的愤怒情绪，我们的代理人在南朝鲜军营周围组织了群众示威游行，力图引起国际（特别是美国）社会对这一局势的注意。

黄晋发然后对10月总统选举中造成的西贡政客的倾轧情况进行了评论。起初，副总统阮高其和以前反吴庭艳的同谋者“大人物”杨文明有意要竞选。但是阮文绍能够策划使阮高其失去竞选资格，而“大人物”杨文明也觉察到局势已不可逆转，避开了一场迎头撞击。如所意料，阮文绍对选举赤裸裸的操纵激起了国会中反对派和报刊的冷嘲热讽，加深了这个政权原想克服的分裂状况。

一些美国评论家总结说，黎德寿（当时他同基辛格正在

谈判)将会同意用停火来换取一次公开和公正的总统选举。但实际上,我们对这些选举绝对没有任何幻想。在我们看来,尼克松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会把阮文绍搞掉。我们知道埃尔斯沃思·邦克大使实际是这场选举的幕后操纵者。有一个谣言说,“大人物”杨文明已经获得了一大笔参加竞选的经费。但是不管外表如何,这场竞选的结局是预料中的事。

为了利用这一形势,我们指示打入杨文明追随者内部的我们的代理人劝他放弃参加竞选。甚至当美国人正在努力来表明阮文绍赞成民主时(尽管阮文绍本人缺乏合作),我们则强调他的独裁花招。我们做的是比较容易的工作。选举给我们提供了机会,使阮文绍在国内更加孤立并且加深了人民对他的愤恨。同时,越南民主共和国发动了一场宣传运动(其目标总是针对着西方的舆论和反战运动),要尼克松对西贡虚伪的总统竞选负责。对黎德寿将会愿意安排一次停火来换取真正选举的推测,是(而且迄今仍然是)北越心理战战略家们的一大胜利。

黄晋发指出,更重要的是美国撤退所引起的经济崩溃:由于美元不再流入,南方虚假的经济繁荣开始萎缩,导致失业和物价急剧增长。甚至士兵的家庭也只能勉强维持生活,他们也走上街头进行抗议。当这个政权的经济状况更加恶化时;西贡的政治、商业和军事领导人特有的贪污行为也日益猖獗。贪污第一次变得格外明目张胆,从而开始引起群众抗议。经济逐步陷于混乱,为民族解放阵线动员组织城市工人创造了特别有利的条件。同时,我们自己的经济状况仍然是稳定的。尽管在美国、中国和苏联中间正在玩弄着外交游戏,来自我们同盟者的供应品却大大地增加了。实际上,自从10月份以来,苏联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签订了一项新的军事援助

协定，供应品中包括前所未有的大量最尖端的苏联武器。

黄晋发的结论是乐观的。过去两年中，在春节遭受了内部损失之后，我们在军事和政治战线上的力量已从缩小转变为日益壮大。我们利用防御战来保护我们受威胁的庇护所和供应线。我们还极大地改善了在城镇的活动基地。尽管有不可避免的挫折和困难（特别是在乡村），我们处在从未有过的可以更好地利用阮文绍和美国人弱点的位置上。尤其是，西贡军事上的**弱点**使美国人在外交战线上脆弱不堪。

黄晋发作了关于政治、军事和外交的报告之后，由外交部一名官员对巴黎谈判作了分析。在会议结束时，“阮文灵（越南南方中央局书记，他曾协助使马克思主义讲习班上的愤怒情绪平静下来）说明了来年的计划。他说：“绝对必要的是，在三条战线上集中我们全部力量，进一步改变力量对比，并且使我们在谈判中处于有利的地位。要做到这点，我们必须破坏尼克松及其走狗阮文绍的信誉，正象1968年我们对待约翰逊那样。我们的目标是，孤立美国人并迫使他们在总统选举前作出让步。”

怎样去做这一切是没有什么秘密的。唯一的机密就是发动春季攻势的时间。

在越南，旱季是从11月开始的。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一个月又一个月过去之后，紧张气氛越来越浓。到了3月，几乎已能够接触到它。黎德寿匆忙地交给基辛格一个简短的备忘录，表面上显然是想引起美国谈判的热情，而实际上表明，所有的部队都作好了准备。3月30日，他们终于动手，首先攻击在非军事区以南的北面各省，然后是昆嵩周围的中部地区，最后是靠近柬埔寨边界的平隆。东河被攻克，然后又拿下了靠海岸的广治。在5月21日，民族解放阵线的旗帜

已飘扬在禄宁上空。离西贡60英里的一个省会安禄被包围。在每一个战区，南越军队在没有美国地面部队支持的情况下，都被打得疲于奔命，节节败退。越南共和军第3师完蛋了；第22师在企图保卫几处高地的战斗中大部分被歼灭。我们在1970年的老对手第5师也接近崩溃。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中描述了白宫的忧愁。他对自己说：“可以想象整个南越将会陷落。”在湄公河岸边的临时革命政府总部，我们也是这样想的。当时尼克松的失望有多深，我们的兴奋情绪就有多高。

由于美国空中力量及时赶到和更精锐的西贡部队挖壕固守，可以觉察到，最初的顺利进攻现在已经缓慢下来。B—52轰炸机每日加倍地轰炸，造成后勤混乱，并且使准备进攻的集结部队遭到令人震惊的伤亡。1967年以来，北越本身第一次成为高空袭击的目标。4月16日，美国轰炸机飞临河内和海防，那里的油库遭到了袭击。5月8日，尼克松在一次重要的电视讲话中宣布，将在北方的港口进行布雷。与此同时，海军的空中袭击增强到空前的水平。尼克松正在作出反应，如他所说的“将达到最大限度”。这种最后摊牌已经到了危机的程度。似乎这个时刻肯定决定着未来。

然而并非如此。事实上，在尼克松讲话的时候，美国 and 南越已经输掉了战争（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可以预料到的）。如果说我们知道这个结局，那么越共当然也会清楚。在5月2日基辛格和黎德寿在巴黎进行短暂而气氛紧张的会晤以及5月8日尼克松讲话期间，美国领导人作出了关键性的决定。差不多三年以后，当最后一架直升飞机飞离美国大使馆屋顶，当北越的第一辆坦克冲进西贡独立宫大门，碾过它的草坪时，这些影响才最后消逝。

这些耻辱保存在照片中。有关1975年7月18日在力士舞厅南方革命蒙受最后耻辱情况的照片还没有公开发表。这些耻辱也应在战争胜利的插画中有它的位置。造成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华盛顿当时作出的决定，即用一个月时间发动春季攻势。这个决定的产生是由于美国人过份地迷信军事力量，再加上铸成大错地不了解他们敌人的性质及其战略。我觉得事情似乎就是这样。

1971年7月，基辛格和黎德寿进行了最后一次十分认真的外交接触。10月黎德寿称病回国。实际上，准备未来进攻的工作做得过早，既不能进一步蒙蔽美国人也不能隐蔽越南人自己。就在这时，黎德寿提出了他的九点建议。此外，临时革命政府外交部长阮氏萍夫人又提出七点补充建议（她是在与黎德寿和基辛格秘密会谈同时进行的全体会议上提出的）。简单地说，两者都要求早日规定美国部队全部撤走的最后期限。对基辛格来说，他已不再坚持北越部队要同时撤走。但他也没有默许，在美国结束它的卷入之后，北越部队继续留下。相反，美国的立场是想签订一项协议，通过禁止增援或任何“外来部队进一步渗透”来削弱越南民主共和国在南方的力量。随后在4月，当春季攻势展开时，基辛格愤怒地要求在进攻中向南推进的所有北越部队撤走。现在在5月8日，美国发表了一项完全不同的备忘录。

那天晚上，尼克松在白宫的讲话是模棱两可的——他强烈谴责北方（说它在“国际上是非法的”），但也没有关死谈判解决的大门。他说，美国将会在四个月内撤走所有军事人员以换取交换俘虏和**停火**。而对于涌进南方参加进攻的或者在此之前已驻扎在**南方的北方师团**，他根本没有提及。基辛格第二天在记者招待会上证实（尽管是用外交辞令）总统

的建议时说：“我们说、如果交还战俘和结束战斗，我们将撤退我们所有的部队。……”

记者问：“北越人将会撤回到北越吗？”

基辛格答：“一旦认真的谈判开始，我们将高兴地提出我们的建议。……我们将会抱着慷慨的精神和采取使战争迅速结束的态度进行谈判。”

尽管在这些事上说了好多话，其真相实际上却非常露骨。现在全部北越陆军都留在南越，而且在美军撤出和西贡陷落、被打败之后还会继续留下来。5月初，美国人更加关心南越是否有能力坚持下去。尼克松和基辛格已经决定，虽然仍然可能有机会避开立即发生的军事上的大失败，但是他们没有其他选择，而只有正式和明确地接受全部北越军事力量在南越存在的既成事实。

他们的决定当然是由一些强有力的因素促成的。美国的报刊早已愤怒地大喊大叫反对恢复轰炸北越。国会的反应没有任何敏感的东西。正如基辛格已注意到的，国会正在努力通过立法使美国退出战争。尼克松和他的安全顾问能够预见到（显然已经发生）宣布布雷和空袭升级的决定将会引起阵阵怒潮。他们这种预期是不会落空的。

我们对这一切的估计是，不管我们可能听到什么样激烈的言词，美国领导人已经确认，美国承担不了为赢得重大军事让步而要付出的巨大代价。也许他们也想向他们新的苏联和中国朋友表明，他们真的在做建设性的努力。最后，由于他们自己的总统选举临近，实现谈判解决将会帮他们取得丰富的政治成果。我们认为，最理想的是，保持军事僵持（这将显示出我们的成功），接着重开有可能争取成功的认真的谈判。为了实现这些，我们可以指望美国人在战场上实

行最高程度的暴力，而同时准备在谈判桌上作出让步。

不久，事情就清楚了。美国人正是按照这条路子走的（绷紧每根弦以便事情有一个结果）。他们大规模地加强了舰队的作战行动。在空中，出现了新的B-52轰炸机和战斗轰炸机中队，对南方战场和北方的战略目标保持不断的袭击。美国政府发言人在公开声明中声称，目前正在进行决定性的战斗。这些事情的重要性在尼克松和基辛格两人的回忆录里都能得到证实。基辛格称这次攻势是摊牌。在会见苏联大使多勃雷宁时，基辛格宣称，美国现在要使“战争得出一个决定性的军事上的最后结果”。基辛格告诉埃尔斯沃思·邦克说：“最直率地说，我们对折衷办法不感兴趣。”

尼克松对“摊牌”在心理上甚至更感到焦虑。在他写给基辛格的一个长长的备忘录中说：“我决定我们要全力以赴。我们要使敌人了解的是，我们正在做的正是要达到这样的效果……我打算无所不用其极地迫使敌人屈服……敌人已经越过边缘，而我们也要这样做。我们有力量来摧毁他们制造战争的能力。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有这个意志来使用这个力量。我同约翰逊的区别在于我确实有这个意志。”

通过显示美国有能力进行大规模和持久的暴力来“惩罚”（尼克松语）他们的敌手，美国领导人力图阻止其对手的攻击。再加上有意让北越和民族解放阵线的军队享有他们胜利的果实，他们希望能创造达成最后协议的条件。同时，他们无疑地想让人知道：他们准备对任何未来的象春季攻势一类的侵略行为作出同样高水平的暴力的反应，企图挥舞他们的意志力量作为一种突出的因素以达成他们极需要的协议。

回顾这个时期以及在谈判中充满着失误，有些作家尽

力贬低亨利·基辛格的能力。如果考察历史的目的是为了从中得到启示，那么，这种做法不仅是无意义的，而且会危险地把人引入歧途。基辛格思想上的缺点实际上很难归咎于他个人。在考虑越南问题时，基辛格继承了他的美国和法国前辈概念上的框框，但他不能够或不愿去冲破它。而正是这种概念上的框框把他引向灾难。与他们的政治前辈一样，尼克松和基辛格两人都缺乏一种基本的本领，即了解他们对手精神世界的本领，以便据此制定政策，有效地挫败其敌手的战略，即人民战争的战略。

象他们在这场危机的早些年（例如在1965年和1968年）里所做的那样，1972年美国领导人又一次把注意力集中在军事方面。在某种程度上，美国人的行动和回忆录反映了他们的认识。对他们来说，春季攻势主要是一次战场上的演习，目的是要检验部队的训练和实战能力，这是敌人的“孤注一掷”，“全力以赴”的最后战斗。如果反击得当，就能导致最后的谈判，而美国的意志和它的惩罚能力反过来又可以保证谈判达成协议。尽管基辛格以所有的锦囊妙计和想象力来利用由他作主的谈判资本，但他运用他的聪明才智时必须借助的心理结构仍然是一个传统的战争鼓吹者的心理结构。

这种心理结构并不能使他充分具备解决紧迫问题的本领。为了反对美国在军事上支撑西贡军队，在战略战术上最大限度地打击敌人，并且显示我们的决心，我们正在追求一种综合的政治和军事目标。从军事上来说，是否能经受住大规模持续性的攻击，对西贡军队是一个考验。最好是，进攻能造成敌军的瓦解。退一步说，我们希望能夺取并坚守住可以充分获得后勤给养的地区。再者，在政府控制的地区内，

当正规军被抽调去增援主要战场时，我们能够建立有效的作战小分队。这些就是军事目标，而尤其重要的是政治目标。压倒一切的意图是，尽可能在最好的基础上使美国退出越南，并且阻止它再进来从而孤立阮文绍政权。要做到这点，必须进一步削弱尼克松和基辛格发动战争的能力，其办法是使美国国内对他们政策的反对达到十分尖锐的程度。我们现在断定，美国政府最后失去国内支持的日子已经不远了。这是一个我们愿意为之作出最大牺牲的目标。

在战争这个阶段，即在“边打边谈”中，我们的战略是（如越南南方中央局一位领导人所阐明的），“旨在激起和推动敌人内部矛盾的发展，使敌人更加孤立，使他们的宣传武器失去作用”。这就是说，将敌人同其支持者和潜在的支持者之间的有效联系破坏掉。我们在1972年是否达到这个目标，可以由当时直接观察美国国内情况的人十分准确地判断出来。然而强烈的暗示出现在美国报刊的评论中。在5月8日尼克松讲话后，《纽约时报》的社论撰稿人写道：“尼克松总统正在拼命地孤注一掷……这是为了无把握的微小的收获而拿美国基本安全和最重大的利益去冒险，这既与国会的授权相抵触，又违背了大部分美国人民的意愿和良心。……尼克松先生正在把国家向一次宪法危机推近；国会尚能挽救总统本人并把国家从灾难中拯救出来。”《华盛顿邮报》说：“唯一能解救这一严峻局势的办法是，尼克松先生结束他的任期。”美国国会早已禁止为美国在柬埔寨和老挝的活动拨款，而参议院不久将通过哈特菲尔德修正案，准备以撤回美国部队来换取释放战俘。根据我们情报的分析，那种认为美国继续干涉是不道德的看法，在美国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不仅具有战斗精神的反战团体，而且一般居民也相信这

点。这些迹象告诉我们，这次攻势是成功的。在这一时期，了解到这些情况，就与听到打胜仗的消息一样使我们非常高兴。

实际上，从严格的军事意义上讲，美国武器显然再次取得了胜利。和他们春节期间在柬埔寨同越共和北越主力部队进行的许多阵地战情况相同，在整个夏季战役中，我们的损失是巨大的。我们开始看到，在许多地区，进攻已无法再继续下去。最后统计的结果表明，我们为达到战略目标付出了极高的伤亡代价。然而，自相矛盾的是，即使这样，春节攻势对我们来说，仍然是一个决定性的胜利。三年之后，一个美国谈判者在河内对北越的谈判对手说：“您知道你们从未在战场上打败过我们。”他的对手回答说：“可能是这样，但这是不相干的。”

不相干的原因在于，美国人把他们的注意力和资源滥用在军事战场上，而这仅仅是全面对抗的一部分。主要的斗争并不是在这条战线上进行的。在整个巴黎谈判过程中，“拳打脚踢”的概念支配着我们的战略。它意指“分化”和“孤立”，其格言就是“促进敌人内部矛盾的发展”。在人民战争中有着三大革命潮流，这是所有政治干部牢记在心的理论。前两种革命潮流是不断发展的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和一些国家的武装解放运动，第三种潮流是殖民主义或新殖民主义强国内部的进步运动。一旦军事力量对比决定性地有利于革命，就需要对这第三种潮流投入最大的精力。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推动和利用美国公众舆论——美国人民的情绪。我们首先要促进的内部矛盾就在这里。我们就是这样一步步地达到了把阮文绍政府从它的同盟者中间孤立起来的目的。

在这个趋势稳步发展的每一阶段，我们的敌手得到安慰的是他们短期的胜利：破坏供应线，炸毁根据地以及给我们造成极高的伤亡人数。但是，甚至当这些明显的胜利不断增加时，他们的战争能力却遭到长期的无法恢复的损害。春节攻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只有当美国人开始用他们过去观察斯大林格勒或中途岛战役的方法来观察这次战斗的战略后果时，西方才能真正懂得春节攻势的教训。美国轰炸和侵略柬埔寨主要实现了它的近期目标（我本人是死里逃生）。尼克松和基辛格当时和后来都辩解说，对柬埔寨的战斗行动使美国赢得了一年的宝贵时间。但是，这一“胜利”证明，它对破坏美国的团结比其他任何战争都要大得多。美国领导人精神紧张地准备对付一场抗议风暴。他们认为，这场风暴迟早会平息下来。但是，一个人如何判断对他自己的国家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和厌恶所积累起来的影响呢？为了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在战场上实现毫无把握的胜利，尼克松和基辛格遭受了宣传上的失败，其影响在15年以后的今天仍然是明显的，甚至已经渗透到美国民族精神中，也许永远不会消除。不管是谁首先破坏了柬埔寨的中立，这样做将导致美国统治者失去国内的支持，而且许多美国人会对政府的道德观念产生持久的怀疑。而这对越南革命及随后的各国革命却是一份具有永久意义的礼物。

美国战略是由传统的军人心理支配的，它有很大缺陷。我们可以使用切意大利香肠的办法来利用派系分歧，逐步孤立我们的敌人。正如我们的口号所说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中立一切可以中立的人。”同时，美国的军事方针使美国不再注意我们营垒内部的矛盾和分歧。艾森豪威尔政府和肯尼迪政府喜欢把胡志明看成是中国扩张主义的工具。

他们无视越南民族有它自己独立的愿望和力量。正因为如此，约翰逊政府和尼克松政府固执地把民族解放阵线看成是铁板一块的北越的一部分，对越南政界的复杂现实不屑一顾。结果是，美国人一直在努力扑灭他们自己前院的大火，但从未在我们院内点燃任何火焰。基辛格象他的前任一样，被这种形势搅得烦躁不安。他比他的前任更富于想象力，企图通过苏联人和中国人向我们发动反击，希望我们的同盟者对我们施加压力，最终使我们变得温和些。但是他从未摸到喉部的位置。实际上，他的战略观点使他看不到喉部究竟在什么地方。

1972年夏天，由于尼克松和基辛格对越南的政治地理茫然无知，结果二人在巴黎被黎德寿精心设下的圈套所蒙骗。由于军事战线陷于僵局，对美国总统选举也没有抱更多的希望，政治局准备恢复和谈，而且这样做了。7月19日举行了第一次会谈。基辛格对黎德寿的和解态度印象很深，这与这位美国谈判者在5月2日看到的“傲慢态度”大不相同。在8月和9月以后的几次会谈中，黎德寿不仅在态度上而且在实质问题上也是和解的。8月初，黎德寿不再坚持要立即排除阮文绍作为进一步会谈的前提条件，终于默许阮文绍无限期存在下去。在10月8日开始至12日结束的会谈中，这位北越的特别顾问最后接受了美国提出的建立一个全国和解和协调委员会的方案。这个委员会将包括西贡政府、临时革命政府和中间派诸方面的代表。该委员会将负责贯彻执行协定并为自由选举一个未来政府做准备工作。黎德寿同意，这样就够了。他没有要求马上成立联合政府，也没有要求硬性规定程序来建立这样一个政府。

基辛格感到他胜利了。这里面的原因是容易分析出来的。

在5月份，他就轻易认可北越军队在南方的继续存在。在此之后，他采取了一种由空中力量，三角外交和顽强的讨价还价的混合办法，企图迫使至今仍表现强硬的黎德寿作出让步。黎德寿实际上已从原先两项最重要的和不能谈判的要求（排除阮文绍和立即建立联合政府）上后退了。这样迅速的让步使美国谈判者既感到有些迷惑又感到高兴。甚至从黎德寿在10月9日会谈结束时交给基辛格的关于西贡当局和临时革命政府举行政治谈判的细则看来，也是敷衍塞责的。基辛格在考验他的对手时，从来不为自己对手的反应伤脑筋，而黎德寿也没有再提这件事。美国人想，“也许黎德寿的越共同事要坚持，而他本人只是为了把此事记录在案。”

为了寻求确保阮文绍统治南方的解决办法，基辛格没有去分辨黎德寿对未来的考虑的全部意图。政治局的两个主要目标已经完满地实现了：第一、美国完全撤退，伴随而来的是国会、宣传媒介和大众激烈反对进一步卷入；第二、北越军队长期留在南方。在我们看来，这两个目标本身就决定了西贡政权的最终毁灭，这当然需要采取综合的政治和军事手段，而力量对比将取决于形势的发展。正如这个时期越南南方中央局的一个指示中所说明的：“我们将会有的新的优势，新的条件和新的力量……而敌人的矛盾和基本弱点将会比以往更加严重。这个时期对革命的暴力，对取得南越的政权，对争取部队和敌人转向我们，对极大地改变力量对比都存在着巨大的机会。”另一个文件分析说：“我们将会比敌人处于更有利的地位。我们政治上的优势特别……使我们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向前发展。它为我们开辟了新的前景。”

由于黎德寿的基本要求已经得到满足，他可以对其他重点采取稍微松动的态度。“除了阮文绍以外任何人都可接受”的策略一向被认为是打进美国和它的同盟者之间的一个楔子（“分化”和“孤立”他们），也是一种加剧西贡政权内部矛盾的催化剂。由于美国同意撤离，这个楔子就不再需要了。此外，基辛格顽固地坚决反对这个策略，认为它是一个要达成协议难以逾越的障碍。由于不愿为了追求一个非主要目标而失去一次基本满意的交易，黎德寿放弃了这个策略。这个四年来“不可谈判的”要求，现在却在谈判桌上被遗忘了。这一作法表明，在这个特别顾问的心目中，这个要求的重要性已经发生了变化。

黎德寿放弃的另一个谈判重点是立即成立联合政府。这是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只有时间和经验才能使它有实现的前景。5月2日，黎德寿一再向基辛格说明，政治现实是三类党派的存在，一类是支持西贡政权的党派；另一类是支持民族解放阵线的党派；再有就是持中立态度的党派。从总的方面看，这样讲是准确的，一个由这三类党派组成的联合政府将会反映出南越的政治现实。基辛格决心阻止这种格局的形成，因为他相信，一个联合政府将会对实现民族解放阵线和北越的控制起过渡作用。但是黎德寿并没有认为正式建立三方联合政府就纯粹是一件好事。

虽然组成这样的一个政府是一条推翻美国支持的政权的最快道路，但是南方民族主义者同时也要分享一部分权力。而按照黎德寿的想法，这些人不是可信赖的人。南方有真正的中立主义分子，他们没有参加民族解放阵线，但反对阮文绍。这些人是政治和宗教界民族主义的著名人物。他们当中有些人自己流亡到巴黎，有些人隐居在南方，有些人甚至在

国会中组成一个集团¹。当然，临时革命政府和联盟中也有非党的民族主义者，许多民族解放阵线成员，他们的共产主义也只是最薄的一层虚饰。甚至在越南南方中央局和民族解放阵线统治集团里的高级共产党人中，一些人的强烈的南方地方主义也特别令人害怕。后来形势的发展将会暴露他们的情况。

一个包括这些人的政府，无论安插了多少劳动党的监督人员，其内在的发展也是不可预测的。如果美国赞同这样一种联合政府，并且支持它，谁敢轻率预言，政治天平可能会倒向哪一边？越南劳动党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并没有把爱国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合成一个单一的革命工具，而只是当胜利在望时，才承认其他类型的爱国主义。尽管黎德寿多年来宣称，建立一个联合政府是公正和合乎逻辑的，但是他确定，现在已经到了后退的时候。首先是不再提立即建立三类党派统一体的要求，然后是放弃制定固定的程序以保证最终建立联合政府的要求。他可以撇开这条危机四伏的路，坦然行事。与此同时，坐在谈判桌对面、内心在微笑的亨利·基

¹ 其中最著名的中立主义分子有：陈友清，他是指导“人民反对贪污运动”积极活动的轴心；释智光，他是组织反对历届南方政权的佛教领袖。释智明，由于他进行反对阮文绍的活动而被判了15年徒刑。陈友清1975年被捕后一直被关押。释智光目前受到软禁。释智明1979年死于统一政府的城市监狱。“民族社会主义”反对党以阮文官为首，他是一名著名律师，统一后也死在监狱里。该党的副主席胡毛湖是一位新闻记者，他公布了阮文绍臭名昭著的老虎囚笼的内幕。战后，他被准许出版越南唯一的私人报纸，直到1980年当局将这家报纸关闭。他的国会议员同事（也是该报停刊前的编辑）吴功德应乔治·麦克斯文的邀请，在1972年总统选举期间到美国进行反战巡回演讲，因而享有国际盛名。阮功德是另一名反阮文绍的国会议员，他后来成为统一政权的第一届国会代表。此后，他入狱地乘坐渔船逃了出来，现在居住在美国。——原注

辛格感到一阵惊奇，好象黎德寿和越共在这个问题上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那种对基辛格在1972年夏秋之间上了北越人当的指责并非完全公正。首先，我自己的经历（总的来说，也是民族解放阵线的经历）就足以提出和上述指责相反的充分证据。尤其是，基辛格一直在忠实地推行四届美国政府的政策，其重点是遏制和军事对抗，而全然不考虑越南国内政治生活的特点。在支持阮文绍政权还是寻求建立联合政府的问题上，尼克松的安全顾问对前者并没有作很多考虑；他从不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有必要作出选择。对他来说，建立联合政府完全是一个共产党的陷阱。对这个方案，他没有想如何才能利用它，而只想如何才能除掉和毁掉它。基辛格在这方面的失败并非是他个人的失败，它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失败。这种外交政策在很久以前就对一个殖民地和不发达国家人民的伟大激情弃之不顾，听任美国意识形态上的敌人占领阵地。

如果说，这一政策给美国领导人带来的最明显后果是本国的分裂和怨恨情绪，那么，这些后果对临时革命政府也不是没有影响的。一旦我们在南越掌权（关于这，我将在本书的下一部分加以叙述），政府不是一个由国际协定保证，吸收国内各方面人士组成并且获得外国支持的政府，那么，它就是一个骑在北越军队老虎背上的政府。而北越军队是我们自己家里危险的临时客人。

第十八章

巴黎协定的后果

这些发展虽然还是遥远的事情，然而基辛格和黎德寿却很快采取行动把他们的交易掩盖起来。尽管立即建立联合政府的努力失败了，但是即将签署的协定使我们感到兴奋和激起希望。经过七年之后，美国最终被迫撤出，证明我们的牺牲是值得的，并且开辟了一个斗争的新阶段。在国际上，临时革命政府现在被承认为其管辖地区的事实上的政府，准备在平等基础上同西贡进行谈判。虽然我们对阮文绍是否愿意遵守这个协定抱有怀疑，但是10月中旬的气氛使我们感到宽慰和兴奋。当陈南忠宣布我们应当准备返回越南时，我们简直不能抑制我们的高兴劲儿。结束我们在柬埔寨的流亡生活，返回越南国土，这些梦想的实现，甚至激起了我们中间最冷漠的人的强烈感情。

10月17日，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离开桔井，重新踏上两年前撤退时走过的道路。靠近斯努的7号公路，曾是民族解放阵线第9师进行过猛烈阻击战的战场，现在还到处都是烧毁的西贡坦克、运兵车和卡车的残骸，还有越南共和军在1971年旱季攻势失败后留下来的尸首。大多数卡车都生了锈，卡车的轮胎早就变成了游击队员们穿的“胡志明拖鞋”^下。涉水渡过东威古河，我们重新踏上了越南的土地，

^下 游击队完全采用废轮胎胶皮做的。种拖鞋 ——译注

这是著名的“铁三角”地区，这里的丛林和橡胶园在1969年和1970年B-52轰炸机狂轰滥炸中保护了我们。最后我们停了下来，在沙蜜和善言建立了临时总部。这是两个小村庄，靠近7号和22号公路的交叉点，离西宁省中心约22公里。这儿接近我们上次逃离的道路，处在国际监督委员会设立的一个岗哨附近。我们认为这里可能会安全一些。

虽然政治局和我们自己的外交部已经暂时肯定尼克松重新当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官方的分析说明，这位美国总统需要一项协定以取得必要的选票。作出这一分析，目的在于鼓舞人民，并使他们懂得这场革命在西方获得了巨大的支持。但是实际上很少需要这类遁词。无论总统的选举如何，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美国新国会确实将会把旧国会留下来的工作继续进行下去，这就是提出各种中止拨款的修正案并采取限制军事卷入。照这样发展下去，我们看到了一种真正的希望，尼克松政府不久将完全陷于不能有所作为的境地。由于我们自己的部队经过激烈战斗以后急需休整和补充，我们就把注意力转移到了政治战线。

实际上，巴黎协定为通过政治手段结束阮文绍政府提供了广泛的新机会。虽然尼克松和基辛格可能已经注意到了巴黎发生的情况，但我们十分清楚地看到，大部分让步对我们有利。越南的领导人指出：“这个协定意味着越南人民决定性的胜利并且标志着越南革命新的转折点。它反映了国内和国际上的力量对比。它为中国人民继续去争取新的胜利开辟了道路。”特别是，我们可以期待西贡军队的士气江河日下，在这个政权内部出现新的危机。

尽管黎德寿要求立即建立联合政府的打算“失败了”，甚至也没有达成有关建立这样一个政府的程序的有意义的协

议，联合政府的方案仍然被写进了协定。协定第9条规定要成立一个民族和解和协调全国委员会，负责解决国内事务和主持选举，选举最好在90天内举行。在委员会内部，临时革命政府和西贡政权的地位是平等的，中立主义分子是第三种力量。建立这个委员会的目的是，为了通过政治手段解决越南的国内问题，公开宣布所有签署者都要赞成谈判和选举的原则。

因为该委员会要在全体一致的基础上进行工作（这样就给了阮文绍否决权），所以基辛格可能相信，他获得了某种默认，同意（用他的话来说）“把政治问题埋葬掉”。但是这些问题几乎是埋葬不了的。按照军事条件来考虑问题（这是美国人的习惯），美国领导人得出结论说，阮文绍已经武装到牙齿^①，他能够对付“不大不小的（军事）侵犯”，而美国则能够“惩罚重大的侵犯”。经过七年战争，我们才把美国军队赶出了这个国家（这一功绩大大超过了我们对法国的胜利或者诸如象以色列在1967年和1973年取得的暂时胜利），因此，我们对军事前景的看法正好与基辛格相反。

更简单地说，我们在这个阶段侧重的是政治战线，而不是军事问题。协定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取得政权的合法的政治道路。如果阮文绍敢于不遵守协定第9条的精神和条文（这是很可能的），那么，我们就可以使用手头现成的武器发动国内对我们的支持并在国际上孤立他。尼克松的墨守成规的思想和基辛格的外交构思也许是在和解委员会全体一致的特别规定中找到了安慰。另一方面，我们确信，联合和协调一致的方案和精神，会受到失去信心和厌战的越南人和西方公

^① 在协定签订前，美国进行了一次大规模装备西贡军队的行动，代号是“增进”。——原注

众舆论的重视。我们当然可以利用协定中的精神表达我们的主张。而对阮文绍来说，他会面临着这样的选择：要么解散他的政府，要么失信于世界。毫不奇怪他会竭力阻止这个发展前途。

甚至在巴黎的外交谈判暂时碰到困难之前，民族解放阵线、临时革命政府、联盟和越南南方中央局的领导集团就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旨在澄清有关“和解和协调一致”的各种问题。与此同时，在群众团体和军事干部中间，也在进行类似的讨论。所有民族解放阵线的人都在认真考虑制定有关这个问题的统一政策。我们的迫切问题是，如何才能最有效地利用这点来争取那些尚未同情我们的城市资产阶级，甚至争取到西贡的军事和政府机构中人员的支持，以便“继续削弱阮文绍政权的内部力量”。我的同事和我希望利用这些讨论首先明确了解“和解和协调一致”的重要性。这是临时革命政府一个不可动摇的原则。其次，我们打算尽全力制定出向居民传达我们立场的最有效的方法。

我们认为，巴黎协定为我们在西贡政权的中心开展争取工作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由于美国人撤出，可以预料，南越人会看到不祥之兆。尼克松和基辛格可能会对形成一种朝鲜式的均势感到满足。而南越人更加欣赏民族解放阵线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决心。他们知道，如果协定只是纸面上的东西，不能真正解决问题，那么，战争将继续进行下去。阮文绍的国内反对派，不论是隐蔽的或公开的，将会比以往更加热烈地寻求一条中间道路（协定为他们提供了参加政府的途径）。工商界，甚至官僚们十分容易接受温和派的影响。温和派主张合理的解决，而不是实行大变动。我们高兴地预感到，一旦协定签字，内部要求解决的压力就会增长。我们

决定利用这个时机，鼓励人民要求和平的情绪，尽可能打消人们畏惧同临时革命政府合作的念头。

尽管“和解和协调一致”作为一种宣传的武器（更不必说作为一种人道主义理想）有它毋庸置疑的力量，但是在我们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这个口号没有获得普遍的赞同。我们一提出自己的建议，马上就受到攻击，反对的理由同上一年我们在桔井时所听到的一样。那些同傀儡政权密切勾结并从他们的政策中受益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应是和解政策的对象（这是北方干部的意见）。那些直接为这个政权工作或为它打过仗的人就更不必说了。不管情况如何，同这样的人讲合作对革命不会有利。

况且那些理论家的这种立场并不是孤立的。他们对残酷无情的阶级斗争的看法得到了一些南方人动情的附和。这些南方人的大多数家庭在西贡政权或美国人手里深受苦难。很难对越盟干部的这种感情提出批评。他们于1954年在北方重新组织起来，20年后又回到南方。他们的妻子儿女在战争中或在政府的恐怖行动中曾惨遭暴行的折磨，或者被杀害。几乎每个人都失去了一些亲人。他们一直承受着巨大的悲痛。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急于为他们的亲人和同志报仇雪恨。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受到了他们的某些影响。

尽管如此，在民族解放阵线中，由民族主义知识分子领导的大多数南方游击队则坚决赞成和解。我们中为和解的好处辩护的人认为，这是一种将人道主义与实际问题的结合在一起的解决办法。不论“和解和协调一致”有利于直接争取多少人，我们现在有责任来考虑未来。毫无疑问，阮文绍政府由于内部腐败，基本上失去了生存的能力，最终将会灭亡（我们在这方面的信心可能是过早了）。我们需要制订一项复兴

国家的政策。这就是我们这次争论的内容。由于北方和南方伤亡人数约达三四百万，因此，即使经过几代人，这场战争的创伤也不能完全医治好。但是，如果不坚决实行和解，这些创伤将会继续恶化，必将给经济和人们带来难以承受的后果。

我们争辩说，越南是一个贫困的国家。甚至在抗法战争之前，它遭受盘剥的经济就是世界上最贫困的。此后，越南农村遭到劫掠，工业能力遭到破坏。无论北方还是南方，都依靠荒唐的外国贷款和援助来维持。在这样特定的情况下，单纯强调战后的建设和发展是行不通的。只有达成一致的目标才能成功地动员全国人民为此而努力。和解和复兴两个目标是相互依存的。我们不能被个人和主观的复仇情绪所左右，从而破坏这些目标的实现。我们也不能完全依靠僵死的思维模式来解决我们越南人所面临的独特困难。

在目前条件下，我们肩负着建设这个国家的重任（建设象胡志明所说的“更漂亮一千倍”的国家），就要求不同意见的和解，而不应使它加剧和永久化。我们争辩说，在反法和反美战争的情况下，应当把全体越南人民看成是受害者，包括南方的资产阶级，甚至包括那些为西贡政府工作的人和参加政府军打过仗的人。采取任何其它方式就是对我们民族神圣义务的亵渎，就是否定胡志明提倡的民族团结原则，而这个原则一直贯穿在我们的斗争中。

然而，我们的同情心和理由却说服不了我们的党内同志。他们已经抛弃了（对我来说似乎是这样）良心和注重实际的理念，只以他们的政治信仰为准则。在他们钢铁般的高傲的信念中，妥协的概念是不存在的。由于上一年我们早已尝过这些思想讨伐者的苦头，所以，我们对现在遭到的攻击并不

感到吃惊，也不准备对我们的建议作修改。

我和同事们都认为，和解的原则是不能抛弃的。我们大家经历过恐怖生活并亲眼目睹我国人民遭受摧残。当我们最初决定反抗吴庭艳时，我们就接触到这些东西，甚至朦胧地预见到它们。我们坚信，为解放事业付出任何牺牲都是值得的。但是，我们这样做不能背离越南的历史传统。同时，这些牺牲给我们，给领导人带来了最重大的责任。判断这个国家过去19年来所走过的道路正确与否，只有看结局才能下结论。如果听任干部们所支持的愤恨和报复情绪滋长，就会破坏我们所承担的重大责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退却的余地。

此刻，革命确实面临着根本分裂的危险。为了防止分裂的发生，黎笋总书记被迫进行了干预。在8月中旬，对这场决定革命前途的剧烈争论作出了明确的决议。它是总书记签署的一份指示的形式公布的，并向所有军政干部作了传达。这项指示说：“全国协调一致与和解而不采取报复行动是一项长期的战略。这是党的政治路线和政治态度，也是工人阶级的立场。”看到黎笋的指示，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赢得了实质上的胜利。象在桔井时那样，似乎我们最后能够成功地把党的上层领导拉到我们这方面来。整个革命现在都要为此承担义务，或者说它看来是这样。

当时没有人会相信，党的路线会被用作内部宣传的工具。黎笋的指示毕竟不是一篇旨在给外国人听的声明（所有这类消息都要根据心理战来考虑），而是一篇原则宣言，它将决定整个革命机器的行为和思想。后来当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人发觉自己已经从领导岗位退下来时，这些人就会有时间回味黎笋不仅善于操纵党的同盟者，也善于操纵党。当然，那

时为时已晚。这位第一书记和他最亲近的小圈子，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善于偷偷摸摸地歪曲劳动党的方针。例如，在紧要关头有效地利用“党的政治路线”，甚至是“工人阶级的立场”来赢得党和非党人士的支持。但是在1972年，这位第一书记公然的玩世不恭还要等几年才会暴露，其后果将破坏越南的全国生活并造成难民的灾难。

当我们争论的风波开始平静下来时，华盛顿和河内却在经受一场意志的考验。它对整个事件的成败是个威胁。阮文绍竭力阻止达成一项协议，劝说尼克松在实际上已经达成的协议中，重新提出大量的新要求。这个没有料到的对峙最终导致了12月份对海防和河内的轰炸。这些举动的确加深了人们对尼克松威胁力的认识，但是，尼克松却为此付出了极大的政治代价。在国际舞台上，尼克松被人唾骂为“野蛮人”和“轰炸狂”。甚至罗马教皇也对越南表示悲痛。在美国首都，国会恢复了对政府的战争权力的攻击。当一切已经过去之后，由于黎德寿和基辛格实际上在10月份已经取得一致意见，协定终于签订了。外交部长阮维桢和国务卿威廉·罗杰斯代表北越和美国，阮氏萍夫人代表临时革命政府（在另一页上），陈文林代表西贡当局分别在协定上签了字。

尽管他的外交部长已经签字，阮文绍很快就暴露出，他无意遵守这个协定。他在一次广播讲话中宣称，战争将继续下去。他说：“将不允许共产党人进入乡村和村庄。我们在任何地方碰到他们就要打他们。”阮文绍的立场毫无隐晦之处：这个协定对他是一场灾难，只有通过加强进攻，不理睬协定中最有害的条款，才能避免损失。他的政策是“四不”，即不联合，不谈判，不放弃地盘，不让共产党人和中立主义分子活动。

我们现在发动了一场自从秋天以来就一直在准备的政治攻势。在我们控制下的地区，我们印发了协定的全文，号召人民认真学习，特别要注意全国“和解和协调一致”的主题。阮文绍竭力不让人民知道他和他的同盟者已正式赞同的条款。为了挫败他的阴谋，我们与同情者和中间人士一道，在整个南方建立委员会，广泛宣传协定的内容。（在西贡的报纸开始刊登协定全文之后，我们不再散发协定的文本。）我们努力发动一场广泛的宣传运动，要求实现协定中规定的“民主自由”和南北合作，从而结束流血。我们强调，协定中承认，临时革命政府在决定南越未来的过程中，是一个合法与平等的参与者。我们把宣传的重点放在联合政府方面，这个政府将由协定规定的选举产生。与此同时，我们掀起了一个全国范围的宣传运动，通过印发传单，解放电台和河内电台的广播以及同情者在大学和中学的演讲，尽力宣传临时革命政府对“和解和协调一致”所作的承诺。在解放区，我们开始实施一项令人瞩目的公共援助计划，分配土地、农业设备和供应品，开始进行重建工程项目，组织帮助管理橡胶园的顾问小组，向群众具体明确地表明临时革命政府的善意和目的。

当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到政治协定方面去的时候，我们在军事上主要采取防御的态势。我们的态度与阮文绍咄咄逼人的好战态度形成了鲜明对照。我们相信它会激起人们对阮文绍的愤怒和对我们的支持。然而，我们很快发现，西贡部队能够利用我们的相对消极状态，发动一连串的战役来夺取土地和居民，特别是分布在各省的临时革命政府控制的许多孤立地区。由于暂时感到不安，越南南方中央局和临时革命政府在3月份开会，决定制定一项统一和协调的军事和政治战略来对付这些进攻。

这次会议决定采取一条不偏不倚的行动方针。临时革命政府1973年发布的第3号指示详细介绍了会议的成果。这个指示一方面谴责了通常所持的观点，即认为西贡的背信弃义，实际上已使协定不复存在，因而在我们的战略地位受到威胁之前，应当全力以赴采取军事行动，同敌人针锋相对。另一方面，指示也否定了这样的论点，即不管敌人进行什么活动，我们应当严格地坚持协定的精神，这样可以进一步突出我们在道义上的高姿态并进一步利用阮文绍的弱点。正确的做法是，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应当把巴黎协定看作是对付敌军的新武器。敌人部队由于美国地面部队和空中支援的撤离而士气沮丧，而且缺乏训练，难以应付目前的全面战争。要针对协定所提出的和平希望和阮文绍及其腐败的一伙人对和平的破坏活动来开展“争取敌军”的工作。我们同时要努力把人民广泛的不满引导成为一个和平运动，为实现停火、民主权利、谈判和释放政治犯而进行更加有力的宣传鼓动工作。

与此同时，我们准备对西贡抢占土地的作战行动作出强有力的反应，以有节制的方式把失去的土地夺回来，挫败新的夺地企图，但是要避免全面对抗。为了对付西贡一向坚持的军事解决，我们的武装部队正在重新装备和建设……眼下主要应开展政治斗争。

当进入1973年春季时，令人注目的水门事件在我们现在的临时首都沙蜜和禄宁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大的兴趣。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们开始收集美国的消息，通过定期的通报和来自河内的无线电报导，以及每日集体收听英国广播电台和美国之音的广播来了解时局的发展。由于尼克松政府明显地陷于混乱，美国参众两院正在忙于立法，准备最后结束对西贡政权的继续支持。后来于6月1日通过了凯斯和丘奇的修正案。

规定在8月15日以后，不再为印度支那的军事卷入提供拨款。当然，我们还不能确定这些条款对美国实际上的约束程度，特别是在战争发生重大升级的时候。但是，毫无疑问，在每一条战线上，即在政治、军事和外交战线上，这种势头正在扩大。

特别是在军事战线，10月份是一个关键时刻。在月初，政治局开会重新分析了力量对比并相应地调整战略。河内作出的结论使春季以来一直没有间断的军事对抗进一步加剧。这个结论指出：“力量对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利……革命武装斗争的道路就是南方革命的道路。”政治局第21号决议提出，当前还不具备发动大规模反攻的条件，但我们的部队也不应过份地限制在仅仅进行“争夺民众，蚕食土地”方面。我们希望（我和我的同事们都这样看）阮文绍会意识到他头顶上出现的滚滚乌云并看出在华盛顿出现的兆头，准备在协定的政治条款中找到一个避难所。但是，当我们放眼观察是否存在和解的迹象时，暴力的风暴骤然降临了。

10月15日，临时革命政府和民族解放阵线总参谋部在广播中说，加紧武装斗争是正确的；声称它有“合法的权利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来对付阮文绍当局破坏协定的行为，有权使用适当的部队来反击他们在任何地方的暴力行动，有权坚持正确地执行协定并且要保持协定的完整性。”我们的部队开始逐步地、一个哨所一个哨所地夺回西贡部队在协定签订前后抢占去的土地。我们坚韧不拔但慎重地解放了许多地区，特别是其中包括湄公河三角洲盛产大米的地区。我们这样做时，考虑了每一种情况的需要，竭力避免考验美国的决心。

不论华盛顿发生什么情况，我们的分析家们预料，美国空中力量可能会卷土重来，因而要求总参谋部谨慎行事。尽管这一强有力的心理武器压抑着我们的行动，压力仍落在阮

文绍部队身上。我们的力量和信心每天都在增长，而西贡部队却期待着越来越指望不上的援助。象它的将军们所说，他们现在正在打的仗是一场穷人的战争，既没有充足的供应，又缺乏机动性和他们习惯依靠的空中保护。在士兵和平民中间，有关秘密交易和政变的谣言四起。什么阮高其打算推翻阮文绍；阮文绍打算辞职；美国、河内和民族解放阵线之间已经召开了秘密会议，等等。每个人都相信形势要变，但没有人说得准会怎么发展。

为了给敌人制造恐慌气氛，在西贡，我们的地下工作者正在加紧工作。在吉弗拉酒吧间和首都的第五大街，“街道广播电台”在全力传播谣言。军政人员、西贡和外国记者在这里吃喝并传递最新消息。他们听到和谈到的都是事实和想象的混合物，有些是一般的小道消息，有些则是为他们的利益而特别制造的假情报。我们利用阮高其关于要更换阮文绍的公开谈话，散布宫廷阴谋的谣言。美国国会关于停止给西贡援助的辩论清楚地表明华盛顿和河内即将签订协定¹。

1 一年之后，街道谣言制造厂造成了严重后果。一个精心策划的诽谤运动散布消息说，基辛格已经秘密同意越南以北纬13度为界分治，以此为条件来换取停战。鉴于这位国务卿是有名的爱好秘密行动的人，以及美国当时在军事方面处于窘境，这类消息传播得越来越广泛。在顺化和岷港的富人中间，引发了一场惊慌地变卖物品的浪潮。

当分治谣言盛行时，人们开始听说，阮文绍和许多高级将领们已把他们的大笔财产暗中运往国外并且正在秘密准备逃离。这消息（部分有事实根据）广大人民都相信。这与南方人早已了解的他们领导人的贪污是完全一致的。对于其他想离开的人，护照的黑市价格已经猛涨到2万美元。不需要公布这一惊人的数字（及其含意）——西贡人懂得如何从经纪人那里获得最新的报价。

将近新年时，西贡的别墅开始大量在市场上削价拍卖。这些别墅主人的工厂和商店也在出售。有关社会名流已经逃离的传闻越来越多，这相当于美国人听说洛克菲勒、肯尼迪、亨特和默奇逊家族的人逃离美国一样。——原注

同时，随着恐惧在西贡开始增长，自春季以来军事战线上的大体均势也即将被打破。11月6日，我们的部队以师的规模在广德发动攻势，占领了越南共和军若干阵地。美国对此没有什么反应。美国国会几周前刚通过一项“战争权力法案”，这进一步证明，我们在美国国内赢得了真正广泛的胜利。当我们在湄公河三角洲的乌明地区和柬埔寨边界加紧活动时，我们的军事干部开始报告说，西贡部队的士气和战斗力已一落千丈。对南越的将领和普通士兵来说，把他们同美国人隔离开来等于击中了他们的要害。我们坚持不懈地推行“分化和孤立”的策略就要获得成果了。

1973—1974年旱季一开始，我们的后勤调整和供应集结不可逆转地改变了军事力量对比。我们民族解放阵线的部队已经完成了在西贡周围和湄公河三角洲的重新部署并且占据了卫护禄宁的强固的防御阵地。从北越到南越，我们扩大了公路系统并使之现代化，使它能运送物资和通过机械化部队。这些进展在一年前是不可想象的。经过长山山脉、联接广治和禄宁的1000英里长的输油管道被用来为新战场服务。正当我们为现代化战争作准备时，西贡军队却陷于防御状态，日益受到军火不足和汽油短缺的困扰。

好象是要加强这些变化的意义，12月2日，越共第10工兵团的十来个人渗透到南方最大的贮油设施芽蒴油库并把它炸毁了。我不知道阮文绍看到滚滚黑烟笼罩着西贡天空会作何感想。在这个时刻，他的美国朋友正在听自己最亲密的欧洲盟友演奏哀伤的音乐会，这些盟友的石油生命线突然被阿拉伯国家的禁运切断了。阮文绍五年来的老伙伴（和他唯一的希望）理查德·尼克松正在为政治生命而奋斗。在国内，严厉的政治控制无法抑制人民的愤怒和不满，阮文绍甚至制

止不住自己属下的反对活动。阮文绍无疑得到过有关几个著名将领已开始同民族解放阵线进行谨慎接触的报告。甚至在年初对阮文绍还很有利的军事形势，也变坏了。如果换一个人，在目前还没有垮掉的情势下，他可能会开始寻求妥协的道路。但是阮文绍却一心一意与亨利·基辛格一道承担建立一个不可动摇的、坚决反共的南越的义务。他的幻想不能适应任何东西。他样样都要，却全数失掉。

事后，人们可以思考一下一个联合政府的幸存潜力。这个联合政府中一派是河内支持的，一派是美国支持的，而中立主义者的“第三种势力”则是上述两方面都在争取的。甚至那时就很明显，中国会找到实际的办法来支持这样的政权，而且，相信许多第三世界和西方国家也有可能这样做，不是不可想象的。在这种情况下，南方的民族主义者是否能够经过自己的努力而获得占支配的地位仍然是战争中最令人感兴趣的（也是尖锐的）问题之一。但是，当阮文绍准备把南越引入漩涡时，在他的脑子里是否闪现过这个想法，目前尚没有找到记载。

第十九章

理论家对一个受害者的判处

随着武装斗争的加剧，我们进行了一项精心协调的外交活动，在国际讲坛上为临时革命政府的立场辩护，同时，争取外国政府在政治和物质方面的支持。早在1974年春天，黄晋发主席就曾要求我协助做这些工作。我曾长期泡在法国语言和文化的环境中，这使我身上带有明显的国际性色彩。而我作为一个没有意识形态倾向的民族主义者同第三世界的外交家们开展讨论是比较便利的。但在去阮氏萍夫人（我们的外交部长）手下工作之前，我要先到河内，然后再去东德治病。我的健康问题越来越麻烦。多年来，我一直在受疟疾的折磨，现在每次发作都使我更加虚弱，更难康复。在西贡坐牢期间染上的各种肠胃和眼睛的毛病也好象日益严重。虽然我不愿意离开同志们，但是我盼望自己能真正恢复健康，然后努力去做未来的工作。

然而，我对老首长陈白腾的思念却代替了告别时的激动情绪。我听说陈白腾在党内的职务已被撤掉了，目前他正在越南南方中央局等待判决。这一消息不仅对我和其他西贡的知识分子震动很大，而且对凡是了解这位卓越的组织者和党的一颗正在上升的明星的人都吃惊不小。

陈白腾在抗战时期就参加了党和抵抗运动。他有一

个代号叫做“抽插四号”，意思是他的无限精力包含着内心的紧张。尽管陈白腾有极大的魄力和说话直率的习惯，他却掌握着赢得友谊和尊敬的诀窍。即使按照越南人的标准衡量，他的身材还是瘦小，但是，在任何情况下，他工作时都充满着热情和乐观主义。他知识渊博并且富于激情，说起话来，象他本人所提倡的那样直率和尖锐。这就是陈白腾的劲头，甚至连革命也不能把他的全部注意力吸引住。他还是一个常写诗的诗人，用“香朝”的笔名发表作品。

在他的早期生涯中，陈白腾的即席创作天才和有效的组织能力获得了党的统治集团的注意。他提升得很快。据说，黎笋本人非常重视他的才干。在1963年，当他35岁时，陈白腾已经组织起青年解放协会，并且约在同一时期，开始秘密领导民族解放阵线在城市里争取知识分子的运动。1965年以来，在武文杰第一书记领导下，他是西贡一堤岸一嘉定地区的党务书记，专门负责动员城市群众的工作。1966年，他就是以那种身份同我会晤，商讨制定组织西贡青年的计划。那时，他在西贡已经搞了十多年的地下工作。我是在秘密警察总部第一次见到陈白腾妻子的。当时她躺在审讯室的地板上，已经失去了知觉。后来她被拘禁在国家警察总部的单人牢房里，曾短期成为我的邻居。象几乎所有的人那样，我对陈白腾本人和他所从事的工作都十分敬佩。此外，我感到我能够活下来要归功于他。他负责同美国大使馆进行艰苦的谈判，从而实现了1968年的俘虏交换。我就是通过这次交换得救的。

陈白腾碰到麻烦的原因是他在越南南方中央局会议上作的一次讲话。在那次会议上，他作了一个关于西贡群众运动的报告。在各方而工作介绍之后，举行了非正式讨论（这是

从一个熟悉的朋友那里听到的)。在讨论时，他一时流露出他那有名的幽默感。他说：“你们看，所有的城市运动——对知识分子、大学生、佛教徒，对所有这些人的工作都非常成功。只有工人运动象到外面的‘小食品摊’吃饭似的。”“小食品摊”的意思是“每况愈下”。

这个发言犯了战略性的错误。工人运动可能是“小食品摊”的说法，无论用什么借口都不能被从事工、农工作的倔强的党的领导人所接受。说出这样的话不仅仅是一种糟糕的失礼行为；它导致了一种暗藏的对立，而这是要作出彻底调查的。在两秒钟内，陈白腾犯下了不可宽恕的不敬罪，这就毁了他的前程。而他在所有的同龄人中本来似乎是最有发展前途的人之一。在不幸说了错话之后，陈白腾得到通知，要他到越南南方中央局进行自我批评。他被迫在那里详细说明他偏离正确路线和“工人阶级立场”的原因。同时，他被撤消了负责职务，人也被隔离起来，等待最后处理。

这一消息很快就传开了，引起了极大的惊恐。对我的朋友和我来说，这一事件的震动，使我们想起了许多党的干部的极端狂热。更加令人不安的是，陈白腾的遭遇暗示着，理论家在统治集团内部确实强有力地控制着决策机构。这不是简单的党的纪律问题。虽然我们当中没有人懂得它的全部含义，我们还是发觉了某些事实，只是尚未清楚地理解。陈白腾同许多南方民族主义者的关系是很密切的。他本人曾经引导他们中的不少人参加了革命，而且他还指导和支持其他一些人。他是一个有献身精神的共产党人，但他也是一个有魅力的南方人。他同所有主要城市的革命者都有联系。因此，他在党内的权力日益增长。

这个事件同几年前发生的牵连到陈宝剑的事件有着模糊

而又令人不安的相似之处。陈宝剑是民族解放阵线的创始人之一。他是1958年最早的动员委员会的创立者，在民族解放阵线正式成立前，他是该委员会核心领导小组的第3号人物（与黄晋发和阮文孝一道）。陈宝剑一开始就对对外关系的决策起过很大作用。从1963年起，他担任民族解放阵线外事委员会主席。1968年他率领第一个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赴巴黎。那时，很快就要出名的阮氏萍夫人是他的一名副手。虽然陈宝剑本人自1951年以来就是劳动党党员，还是派了一个特别政治干部跟随这个最初的代表团来保证党的监督。他们到达巴黎不久，在这个干部（陈怀南）和陈宝剑之间就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据陈怀南说，陈宝剑在巴黎的外交界和在法国的越南侨民中间进行了太多的、自作主张的、不受监督的接触。陈宝剑则对此感到愤怒，坚持认为他作为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团长，开展联络工作是他的正常职责。而且他还认为，没有什么必要让这些活动受到党的监督。

不久，陈宝剑和陈怀南都被召回国，阮氏萍夫人则被提升担任高级外交职务（她后来担任临时革命政府外交部长）。陈宝剑回到越南后被迫进行自我批评。没有多少人对他的前途抱有信心。然而，对陈宝剑来说，幸运的是，我们当时正在准备组织临时革命政府，而他显然是一个有名望的南方人物。民族解放阵线和民族、民主、及和平力量联盟双方都建议应吸收他参加新政府。结果是，他被任命为总统办公厅主任。但是十分明显，河内认为陈宝剑是管束不了的，他是一个只忠于地方而放弃他对党的责任的危险分子。

到了1974年，陈宝剑和临时革命政府中的其他成员又看到了一线希望。但是，陈宝剑对自己的前途（如果他能看到

的话)则没有多大把握。在1976年,陈宝剑这位南方革命的主要推动者之一,担任了起橡皮图章作用的越南统一国会的议员。不久之后,他甚至被解除了这一荣誉职务。他的政治活动只限于担任祖国阵线(吸收联盟和民族解放阵线参加的无所不包的群众组织)成员。最后他退休了。虽然他在政治上失势,但政府给了他足够的退休金、一幢房子和一部汽车,使他得到了某些宽慰。这样做也许是为了使这位以前的持不同政见者永远平静下来。

陈白腾后来的经历也没有好多少。陈白腾在越南南方中央局受到隔离审查之后,他奉命赴北方,到河内的阮爱国干部学院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陈白腾过去曾作为我们最杰出的城市斗争专家在这所学院讲过课。他过去的学生现在成了他的老师。当这一使其丢脸的训练结束之后,党又派他去东欧各国完成他的教育。在那里,他可以直接欣赏到苏联、保加利亚和其他典型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实现工人阶级的原则。1976年陈白腾最终又重新露面,他现在是一名祖国阵线的官员。在这个位置上,他会有充分的机会发展他写诗的才干,而且这些诗无疑是反映革命斗争的目的和方法的。

陈白腾从东欧回国不久,我们曾最后短暂地见过一次面。但是,当时我不愿意问起他所走过来的坎坷经历。他表现对象我一样的敏感,并且很有礼貌地问起我退职后所过的农民生活,问起我的妻子,我的村庄,我的收成。我想在两个当时处境相同的老革命者之间进行这样的交谈是很有意味的。

然而,当我准备启程去河内,开始作为临时革命政府一名外交家的新生活时,所有这一切还未发生。当陈白腾的令

人不安的消息传开以后，我对未来和自己的前途仍然充满热情。胡志明曾经在某一篇文章中写道，“越接近胜利，问题就越困难。”带着这个想法，我尽力不去想陈白腾的事，并且作好了穿越胡志明小道的准备。

第二十章

临时革命政府大使

我乘坐一辆宽敞的中国造吉普车，从禄宁穿过柬埔寨的边界，踏上著名的胡志明小道。在这次旅行中，我并不缺少同伴，一位医生、一位护士、一名行政助理以及我的警卫，再加上司机，都与我挤在一起。我们象个参观团，正在旅途中观赏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小道”的奇迹。我们行驶在一条贯穿柬埔寨东部和老挝的群山和丛林的全天候公路网中。过去那些开辟这条道路勇敢的人们可能都认不出它了。

第一批筑路的人是在1959年5月从河内南下来到这里的。他们是从南越来的越盟战士。在日内瓦协议签订之后，越盟组织在北纬17度以北进行改组，现在开始重新渗入到他们的老战场。这些最早的开路先锋走一趟需要六个月时间。每人要带上必备的给养和设备。在令人窒息的潮湿空气中，他们爬进高山丛林，披荆斩棘地开出一条路来，在世界上最险恶的环境中为生存而斗争。在那些日子里，疟疾、痢疾以及丛林中各种最凶恶的传染病，使许多人病倒在地。他们只带来一些简单的药品，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对付毒蛇和成群的蚊子。他们每日可望开路约10公里。那些病得太重而不能走动的人只能留在原始的茅屋里。这些茅屋是更早来此开路的人建造的。他们当中只有一半人生存下来。那些人曾说过，

他们对死亡并不害怕。

一个早期的旅行者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我们整天背着沉重的包袱弯着腰前进。在炎热和潮湿的气候下，我们经常被迫停下来休息和喘喘气。晚上，在极度疲劳中，我们把吊床和蚊帐悬挂在树上，伴着星光入睡。有时，我们要到离小道很远的地方去找一处瀑布或泉水。在那里我们才能喝上水并灌满我们的水壶。在丛林里有老虎和豹子，我们知道一些掉队和分散居住的人遭到袭击的事情。我们攀登的山峰高达1000米以上。我们要把头巾拉下来，盖住眼睛以遮挡阳光。从高山顶上往下看，一片雄奇壮观的景色呈现在我们眼前，真象神话故事里面的仙境。我们把那些患病者留在路旁的哨所。大队人马则继续前进，当此生死难辨之时，我们一定要对我们的斗争，我们的领导人和我们的国家抱有信心，这样才能忍受这些困难和艰苦的考验。”

原先的小路逐渐被加宽和改进，到我经过此路赴河内时，这条路已变成有两个车道的公路系统。它的泥土路面已铺上了碎石。为了维护这条生命线，沿途大约每100公里就设有一个供士兵和工程队驻扎的村寨。早在1974年，这支大部分自给的部队就已接近10万人。兵营、兵工厂、仓库、商店、农场、药房、招待所、加油站，一切可以想象的为防护、修理和运输所需要的东西，这些地方都有。这些物资储存在道路两旁较小的仓库和帐篷里。

这支真正的劳动者大军包括青年队伍、越南中部的山民和农民志愿者。有些人在这条道路上已经待了8至10年而没有回家。与我聊天的一些青年志愿者在十多岁时就来到这里，现在已经30岁出头了。我们到处可见他们所干的大量工作。巨大的弹坑密密麻麻地布满道路的两旁。很多炸弹明显地投

到离道路很近的地方或者直接命中道路。然而这条干线不仅没有被切断，反而得到扩大和发展。每一次“钢铁乌鸦”（B-52）轰炸后不久，大批工人就在那些被炸毁的地段旁边修筑一条旁道，使交通畅行无阻。同时，其他人则奋力修复受到破坏的主干线地段。多年来这就形成了一个布满各种旁道和近路的交通网。这样一个系统实际上不容易受空中袭击的破坏。

我们的车保持在每小时约30公里的速度，沿着这条奇迹般的道路前进，碰到来往车辆的洪流与我后来在车流量高峰时进入美国城郊所经历的没有很大的不同。在一个地方，我们超越了一支缓慢护送美国喷气飞机（机翼已拆掉）到北方去的重型卡车队。每到晚上，一幅奇丽的景象就会展现在我们眼前。举目远望，望不到尽头的车前灯的光线，在黑暗的原野中连结成一道弯曲的光带。我们在这次旅途中的膳宿招待确实是第一流的。上一年，北越政府为了协调战略曾接待西哈努克亲王来访。为了表示对这位亲王及其事业的关心（后来证明是暂时的关心），政治局下令建设了一批地点方便、设备很好的小型别墅，使他们一行人在每天乘车之后得到休息。过去为王族服务的别墅，现在转为革命所用。我们在路途上的11个晚上，过着不寻常的豪华生活。我们舒适的旅行与我们许多同胞过去在这条小道上遭受的苦难形成了鲜明对照，对此我浮想联翩。我相信，在我们这几个同路人中，不只是我一个人有这样的感受。

我们沿着老挝的连绵不绝的山脉行进，然后回转到越南的溪山，通过非军事区到达洞海。在那里，我们同司机告别。然后乘坐一架有两台发动机的苏联造飞机飞往北方的首都。在河内机场，我受到临时革命政府官员的迎接并被送到城里。

去见民族解放阵线主席阮友寿、我的老朋友郑庭草以及当时在河内的其他一些民族解放阵线和联盟的人。虽然我急于见到我的同事们，但是当我们驶进城里时，我的心开始感到沉重起来。

30年前即1944年，我作为一名大学生曾在河内呆过。与西贡市内无休止的乱哄哄相比较，当时河内是一个环境优美和安静的城市。而且，这个城市为一个刚开始独立生活的有钱的南方孩子提供了各种消遣娱乐条件。也许是我的怀旧思想夸大了现在我所看到的凄凉和贫困。但是毫无疑问，这个城市在受干涉的年代里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它不但一点也没有更加现代化或者更加美丽，而且似乎是破碎不堪了。透过车窗，我能够看到轰炸所造成的一些破坏，但好象没有进行什么修理。在这个城市里，法国殖民者曾留下许多漂亮的建筑。但是，现在对这些建筑物，连最基本的维修工作也被忽视了。这些房屋看上去破旧不堪，油漆脱落，只依稀透出一点往日的华贵。

人们同样在受折磨。在街上步行或骑自行车的人，看上去心事重重。他们似乎比30年前更穷了。他们缓慢地行走着，好象是屈服于他们的贫穷生活和常年劳累。虽然街道上人群拥挤，却没有亚洲城市特有的喧闹和活力。看上去过早衰老的人们使气氛变得毫无生气。景象暗淡而无色彩，象衣着一样。几乎无论男女，每一个人都穿黑色或灰色的裤子和白衬衫（纺织工业用的染料是一种供应不起的奢侈品）。想到河内市民所经历的苦难，战争要求他们作出的牺牲，不是几年而是整整一代人，此情此景，我的同情心不禁油然而生。

我参观过的每间房子，都是由几个家庭挤在一起住的。往往是拉上一块布帘把一间房子分成两家居住。每一家总是

在房子的一个角落里设立一个祭坛，上面贴着在南方被杀害的丈夫或孩子的照片。死去的亲人常常连死在或埋葬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对活着的人来说，他们的亲人这样死去是个不可想象的巨大损失，因为他们崇敬死了的人并认为死者长眠的地方是神圣的。

经过几天的会议和访问之后，我被送进越苏医院治疗。我入院后，在思想情绪上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在河内所见所闻使我非常沮丧。同时，我下了比以往更大的决心要看到这个入类大悲剧的结束，并且对我的受苦受难的国家的前途充满着希望。我的身体已经十分衰弱。因此，我极为乐意听从医生嘱咐，在床上休息一个月。

在越苏医院的治疗结束之后，医生宣布，我可以远行到民主德国的德累斯顿作进一步治疗并且需要长期疗养。也许是不习惯于看到经过6年丛林生活给我的身体造成的后果，德国医生们似乎不愿给我做手术。（在越南可以找到几十万象我这样的实例。）无论如何，要过几个月之后我才能回到河内，而且要在1974年11月以后我才能开始执行我的使命。

我最重要的第一站是阿尔及尔。我将率领一个临时革命政府代表团参加在那里举行的11月1日阿尔及利亚独立纪念活动。两个星期来，我是阿尔及利亚政府的贵宾，住在城里最豪华的法国人的旅馆（现已收归国有），法国文化的痕迹表明，此地过去是法国的殖民地。我住在法国旅馆就仿佛住在家里。我们的外长阮氏萍女士在临时革命政府和阿尔及利亚外长布特弗利卡之间建立了很密切的联系。布特弗利卡是一个特别宝贵的同盟者，阿尔及利亚向阮氏萍女士提供一切外交活动的经费。每次当她要去做其他国家时，她首先要到阿尔及利亚筹办她的必需品，居住在为她保留的私人住宅里。

当时阿尔及利亚还是不结盟国家的主席。部分是由于阿尔及利亚的支持，我们同不结盟国家的关系有很大的发展，这就为我们阐明自己的立场，提供了一个“中立的”讲坛。

阿尔及利亚反对法国殖民主义起义20周年的庆祝活动是一次盛会，吸引了第三世界各国的高级代表团。这次盛会为我同各国代表团团长会晤提供了理想的机会。我得以详细说明阮文绍破坏巴黎协定的行径，并且在外交上努力争取和协调对临时革命政府的支持。

当然，我也能够同阿尔及利亚人讨论物质援助问题。我特别急于获得对我们的国际宣传运动和各種教育计划的额外援助。阿尔及利亚文化和情报部长艾哈迈德·塔列布确实是一个仁慈宽厚的人，“愉快和友好地”同意了我的要求。在我们讨论的时候，他用独特的语言表达了所有阿尔及利亚官员的热情。他说，阿尔及利亚人民的责任就是帮助越南人民。他认为奠边府战役也是阿尔及利亚革命的转折点。在奠边府战斗之前，只有少数阿尔及利亚人赞成武装斗争，法国简直是被看作太强大了。但是，奠边府一战明显暴露出法国的弱点。此后，阿尔及利亚人大大增强了通过战斗取得独立的信心。（后来，阿尔及利亚文化和情报部替我们印刷了关于西贡政府破坏巴黎协定的《白皮书》和我们向塔列布提到的其他材料）阿尔及利亚司法部长包阿林·本·哈茂达也同样友好。我同他讨论了阿尔及利亚司法改革问题。他向我提供了他的国家从一种司法制度向另一种司法制度过渡的文件和各种背景材料。

西哈努克当时也在阿尔及利亚。我向他通报了有关我国的国内形势，重申越南支持高棉人的抵抗斗争。对他，同样对我们来说，1974—1975年的旱季斗争将会是一个转折点。

象我一样，亲王对他的国家的前途也充满希望，尽管当时看来，他的孩子气的热情掩盖着比我更深的忧虑。在离别前，我们回忆起我们在西贡的查西劳普·劳巴特中学一起上学的情景。我们在那里同坐一条板凳和一张课桌。西哈努克是个有才气的大学生，一个快活的、乐于助人的朋友。他也是一个喜欢同女孩子交朋友的男人。我们愉快地回想起顽固的中学校长和他美丽的女儿。西哈努克曾经爱上了她。

在不断的会议和讨论中，同西哈努克短暂的会见才使我得到唯一暂时的休息。两个星期以后，我感到极度疲劳并且十分愿意到莫斯科进行早已计划好的短期的休息访问。我乘坐的是一架伊柳辛飞机，旅途中飞行的噪音和震动一点也没有消除我的疲劳。我们到达莫斯科时，显然应该利用这次“休假”来休息和恢复健康。实际上，临时革命政府大使馆为我们准备的幽静的房间和舒适的床铺比起观光苏联首都都有更大的吸引力。我这次考察苏联人生活的机会就这样放弃了，大部分时间都处在甜蜜的梦乡之中。

除了大使馆内部，我在莫斯科没有看到什么东西。七天之后，应匈牙利政府的邀请，我离开莫斯科去布达佩斯访问。在那里，匈牙利人不断地让我参观，似乎是要补偿我在俄国失去的机会。发电站、湖上旅游胜地、历史古迹，一个接着一个地参观游览，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然而，我的主人却没有在欣赏景致，他们考虑的首要问题，不是匈牙利对临时革命政府的支持问题，而是越南在中苏争论中的立场。这位部长极大地抱怨中国领导人，并且希望我们在重要的问题上能同苏联保持一致。我谨慎地回答说，胡志明曾经告诫我们，要保持国际团结，而我们正是不断努力这样做的。我们对两个社会主义兄弟之间的冲突是感到不高兴的。我们期

待着双方能迅速和解。

这种无关痛痒的话旨在避开对这个问题作任何更多的探讨，因为我不愿意触及这个问题。我知道党早已决定同苏联结盟。向这个方向移动，早在1969年就开始了。而胡志明的逝世，为正式作出这项决定铺平了道路。然而没有发表什么公开的宣言，因为仍然需要中国的援助。实际上，1974年党内激烈斗争的结果是，以总书记黎笋和巴黎的谈判者黎德寿为首的亲苏派取得了明显的胜利。而一些党的忠实成员象武元甲将军、长期任政治局委员的黄文欢和协助巴黎谈判的春水，由于他们主张在两个巨人的争吵之间保持中立而受到了打击。其他党的领导人包括第二号人物长征和总理范文同没有作过多的表示，他们设法在“中立主义者”和亲苏派中间采取中间道路。（他们避免表态。但是长征在大部分政治生涯中，一直提倡同中国友好。据传说，范文同对与苏联结盟持极大的保留态度。）

我个人相信，黎笋和黎德寿破坏胡志明苦心维持的不偏不倚的原则是愚蠢的，这是在制造悲剧。如何处理同中国的关系问题历来是越南的难题。一旦我国永远摆脱掉西方国家的势力，这个难题就会再度出现在我们面前。但是那种依靠苏联人在战略上同中国人抗衡的想法，预示着严重的后果。首先和最重要的是，难道同苏联结盟不会使这个地区陷入长期的紧张状态？难道由于美国不再坚持把越南当作是他们遏制战略的试验场，我们就没有问题了吗？我想，难道我们从美国新殖民主义解放出来的目的是为了把自己变成苏联版的遏制政策的工具吗？更糟糕的是，我们需要时刻戒备，并付出精力来反对中国（这是作为一个俄国阵营的成员所要做到的），这样会不可避免地分散国家对国内建设的注意力。在

在我看来，同苏联合作和把军事作为重点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而要恢复经济，就必须同中立联系在一起。

当然，我把这些思想蕴藏在心里。我知道大多数越南革命者，不论是共产党人或非党人士，私下都仍然崇敬胡志明及其政策，并且有这样的共同看法，现在的领导在这个问题上错误的。但是，这样的事情是不能够公开讲的。

我从布达佩斯飞往地拉那参加阿尔巴尼亚的独立庆祝活动。来到这个多山的首都参加庆祝活动的最重要的代表团是姚文元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姚后来是一个有名的“四人帮”分子。姚开始不知道我是代表临时革命政府的。他的态度是冰冷的，这是由于中国和北越关系日益恶化所造成的。然而，当他知道还有一个从河内来的代表团之后，他就更恰当地把厌恶发泄在越南人的忘恩负义方面。

另一方面，阿尔巴尼亚一开始就热情地接待我。在同恩维尔·霍查会见时，他（用极好的法语）向我揭露中苏分裂的情况，这与我在布达佩斯听到的根本不同。霍查解释说，他不能接受苏联要统治全世界的要求。他强有力地批评他一再提到的“苏联修正主义”。霍查回顾了他同赫鲁晓夫在这些问题上的对抗情况，指出赫鲁晓夫利用捏造的材料攻击阿尔巴尼亚^①。霍查说，现在苏联已经提出建议，要恢复外交关系。但是，只有苏联对多年来侮辱阿尔巴尼亚人民的行为表示公开道歉，他才会同意两国复交。我不了解阿苏关系，但我知道霍查不屈服于超级大国压力的勇气和决心。

我旅程的最后两站是保加利亚和叙利亚。我同这两个国

① 据霍查说，赫鲁晓夫称他是“忘恩负义的”人。这是苏联领导人一个较温和的指责。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指责霍查亲自绞死他早期的一个政敌。

家的外长会晤时，说明了巴黎协定后的越南形势。然后我启程回国。1975年1月中旬我回到河内时，军事形势已经发生了对我们有利的巨大变化。我们在1974年旱季战斗中所抱的乐观主义，现在确实得到印证。我们几乎在所有的地区都获得了巩固和发展。除了在地方上获得许多成就外，民族解放阵线第3、第7和第9师各部队于1月6日占领了福隆，第一次解放了一个完整的南方省份。

这一胜利无论在军事和心理上都具有巨大的意义。正象我们的一位司令员所指出的那样，它是“通往胜利道路的血染的纪念碑”。接到从福隆来的战报后，政治局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如何密切注意局势的最新发展并制定下一阶段战略。这个消息对在场的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服兴奋剂。人们站立起来，兴高采烈地互相握手和拥抱。会场安静下来后，黎笋发表了一篇激动人心的讲话。他说：

“第一次一个南方的省份完全被解放了。尤其是，这个省份靠近西贡，……这个事件最明显地反映了我们的能力，同时反映出傀儡政权，特别是美国力量的下降。”这次长时间和紧张的会议在更加浓厚的乐观主义气氛中结束；作出了一项争取在未来两年中完成革命的计划。但是，在最后的决议中也声称：“如果时机到来，……我们将在1975年立即解放南方。”

实际上，在这年的雨季刚结束时，就已为这个“时机”的到来作了准备。当福隆解放时，我们负责运输和供应的部队已经在南越贮存了近3万吨的战争物资，包括即将到来的春季作战用的8000吨军火。西贡部队不仅被迫采取守势，而且他们现在明显地缺少军火和供应。民族解放阵线南部（基本上指南越的南半部分，包括西贡和湄公河三角洲）司令

员陈文茶将军离开会议时“十分兴奋和充满信心”，准备返回南边并实施最后作战计划^①。他将同文进勇密切合作。文进勇是精力旺盛的北越部队的总参谋长和整个战场的野战司令员。

战斗的关键将是位于中部的邦美蜀市。从这个市的规模看来，它似乎不会成为进攻的目标。3月8日，正在寻找机会向北部进攻的西贡部队在邦美蜀突然被包围，陷入措手不及的状态。32小时之后，西贡第23师最后一批抵抗部队停止了射击。我们攻占了这座城市。西贡的范文富将军懂得邦美蜀的重要性，试图进行一次反攻，但很快发现通往这个城市的道路都被强大的兵力封锁住了。在这一紧要关头，阮文绍作出了一项致命的决定，从中部高原撤回他所有的部队并在沿海地区重新集结。这次鲁莽的撤退把一个糟糕的战术失败变成了一个战略上的大灾难。西贡撤退部队的许多纵队被迫穿越丛林小道，向后方逃窜，结果被包围和消灭。

当南方军队的士气开始崩溃时，阮文绍旨在巩固他在海边的强大据点顺化和岷港的战略也同样遭厄运。3月21日文进勇切断了1号公路。这条公路是顺化联结南部的通道，被称作是一条“令人悲哀的道路”。与此同时，文进勇胜利完成了对沿海城市和孤立据点的一系列进攻。到3月底，西贡部队大规模溃退。顺化于26日，岷港于30日先后被攻克。4月初，有关情况的照片和电影拷贝送到河内我们那里。这些图片和影片显示了大批难民和西贡士兵疯狂地企图乘船逃

^① 陈文茶在巴黎协定后曾担任临时革命政府驻西贡代表团团长。他在西贡解放不久，担任了统治南方的军事管制委员会主席。陈文茶将军象陈白腾和陈宝剑一样是参加斗争几十年的共产党革命者。他也是一个南方人，由于对地方的忠诚而最终使自己遭了殃。——原注

走和争先恐后地爬上用于撤退的飞机和直升飞机的情景。政府当局完全陷于瓦解状态；士兵们为了自己逃命互相射击并开枪打平民。50万难民充塞了这一地区。这些简要的情况介绍和图片勾勒出一幅地狱般的疯人院的景象。

由于南方的防线以这样料想不到的速度在瓦解，政治局作出决定说，“时机”确实已经到来。为了抓住这一时机，文进勇下令制订立即进攻西贡的计划。按照这一指示，要求“用最大的决心，……尽可能迅速地就在最近的4月间”进行。这次作战的口号是，发挥“惊人的速度，勇敢，出其不意和必胜的信心”。现在文进勇挥师南下以便进行一万天战争中的最后一次战斗。

我没有亲眼看到这些进展。4月4日，我再一次飞往阿尔及利亚。这次是代表临时革命政府参加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联合会的会议。然而，实际情况是，事件的发展跟着我进入了会议。从越南来的消息通过左倾的代表团的传播，在大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兴奋情绪。与会代表们的具体反应是，一致选举我担任该联合会的副主席。当大会宣布南越临时革命政府的代表当选这个职务时，代表们的起立欢呼声驱散了我对西方参加者可能产生的任何怀疑。

我到达阿尔及尔后，向我表示支持临时革命政府的人络绎不绝，特别是，西方代表团在美国即将面临耻辱时所表现的高度热情使我感到有些惊奇。这鲜明地反映出美国对外政策所结下的积怨。我感到，与会代表的情绪与在美国街道上和在美国国会中明确表现出来的情绪没有多大的不同。在1974年广德被占领和1月份福隆遭到攻击时，就是这种力量使美国陷于软弱无能，无所作为。对西贡的最后进攻是一场典型的主力部队的战斗。但是，只有我们在政治和外交战线

取得全面胜利的时候，这种高潮才有可能到来。随着敌人内聚力的逐步削弱，西贡政权正在走向迅速崩溃。而它的保护者却无能为力地站在一旁观看。

美国将要蒙受它历史上最大的军事失败，这是由于它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能力制定对付人民战争的战略。但是听一听苏联代表在会议上的谈话，就可明显地看出，炫耀武力并非为美国人所垄断。有一次，我刚好站在苏联代表旁边。这位苏联代表就苏联对第三世界的援助问题向阿尔及利亚人和其他一些人大发议论。他摊开双手对大家说：“看看这双乐于助人的手。你们可以在这些乐于助人的苏联人的手中找到好的苏联武器。有了苏联武器，第三世界就能够保卫他们自己，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他边说边抓住我的一只手，猛然用力往前方一伸，生动地象征着此时此刻苏联的武器是如何使帝国主义者在越南丢脸的。

他的这些粗鲁、放肆而又无知的话使我感到震惊，我一时忘掉了外交礼节，把自己的手从他大而汗湿的手掌中抽了出来，脱口说道：“瞧，你们给了埃及最好的武器，但看来对他们帮助不大。”这句话引起一阵惊人的寂静。我意识到，我的评论的确是出格了。这是考虑到当时阿尔及利亚人的感情和苏联对我们真正是慷慨解囊的。我赶紧补充说：我想表达的意思是，越南的成功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武器问题，外交方面，特别是政治方面的斗争也是必不可少的。而没有人民的支持，世界上最好的武器也是无能为力的。我说不准俄国人是否能够理解这些话。那天晚上回到大使馆以后，我发誓将来要重新学习克制的艺术和礼仪。

在阿尔及尔，象我访问过的其他首都一样，临时革命政府的大使馆要比北方同胞的大使馆豪华得多——房子更大，

车子更新，家具更好。所有这一切说明，苏联集团和第三世界向我们提供了巨大的援助。（除了阿尔及利亚外，叙利亚和利比亚也是大援助国。）直接的财政补助包括我们所有的外交开支，大使馆的资产以及使馆工作人员和大使的工资。然而，这些工资从未动用过，直接转到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的帐上。甚至为临时革命政府办公室订购的报纸和杂志最终也跑到了北越的会客室里。（在全国统一后流传着一则冷酷的笑话，说临时革命政府是一只下金蛋的鹅，而我们的北方兄弟却千方百计想杀死这只鹅。）毫无疑问，南越的革命斗争为全世界树立了榜样，取得了北方政府得不到的同情和支持。

北越政府与南方革命的实际关系要比西方人想像的更复杂和更直截了当——比约翰逊和现在已离职的尼克松想象的更复杂，比许多反战人士认为的更直截了当。但是到了1975年4月，对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就变得意义不大了，至少暂时是这样。在这个月的中旬，文进勇向西贡的最后进军正在迅速进行。（他后来称这个最后攻势为“胡志明战役”，是“这个时代最美好的成果”。）这种雪崩一旦开始，就无法遏制，阮文绍政府正陷入最后的丧魂落魄的阶段。

与此同时，在柬埔寨，形势的发展甚至比越南还要快。4月15和16日金边受到了大炮和火箭的攻击。4月17日，当最后一名美国人走掉后，这个城市落到了红色高棉手里。在此前一天，阮氏萍女士在访问非洲期间到达阿尔及尔作了停留。她和我曾经到高棉人的代表处祝贺胜利。这是我在阿尔及利亚的最后一次官方活动。

4月20日我回到河内，准备率领一个临时革命政府代表团到北京，参加西哈努克的母亲、科萨玛王后的葬礼。西哈努克极其关心柬埔寨形势的发展。亲王很有礼貌地邀请临时

革命政府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双方的代表参加一次私人宴会。他希望我们在斗争中的伙伴关系在未来的和平建设中得到进一步发展。那天晚上热情亲切的气氛使人感到，这个愿望似乎不是不切合实际的。但是，西哈努克在这方面的失望不久将会象我在其他方面的失望一样深¹

另一个宴会是由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李先念和商业部长李强为了庆祝南越的胜利而举办的。这次宴会显然不太合我们北方同胞之意。在宴会过程中，李强宣布，中国人民已派出一艘大货船，满载着粮食、药品和其他必需品在海上行驶，准备一旦岘港或西贡解放，就直接把物资运到那里去。与会的南北双方的代表都明白这一宣布的含义。我们在中国停留期间，中国人对待我们要比对待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亲切得多。他们充分利用这个机会，表达他们对河内早已热衷于同苏联调情的不满。与此同时，他们向临时革命政府发出这样的信号，他们愿意和我们建立直接的联系。

虽然中国人的意图是清楚的，他们对我们接受这类建议的能力和意愿却作出了不正确的判断。我们早就尝到了压倒优势的胜利的滋味。21日，阮文绍已经辞职，他正在台湾大骂美国人。文进勇的军队已经打到西贡郊区，一生的希望就要实现了。在预期的大风暴到来之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切问题和困难正在消失。

¹ 直到1980年我再没有会见过西哈努克，当时我们两人都在流亡。那时我就有一种奇特的感觉，意识到西哈努克和我的命运相同，后来西哈努克向我叙述了他曾先后写了三封信给范文同，建议谈判政治解决已经两年的越南侵占柬埔寨的问题。范文同把每封信都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西哈努克说：“他想用这种办法来侮辱我。但是，我想，同我对越南作出的贡献相比，他确实是在侮辱自己，往自己脸上抹黑。”——原注

第二十一章

悲喜交加

参加过科萨玛王后的葬礼之后，1975年4月28日，我们的代表团飞返河内。在那儿，我们和河内的同事们一道，一天24小时都守在收音机旁，收听有关南方的新消息和阅读从南方发来的电报。30日早晨，联盟、临时革命政府和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人聚集在阮友寿的主席府里，等待即将宣布的声明。11点25分，我们伏在收音机旁，两手放在耳背，仔细听着每一个字。我们听到杨文明（这个“大人物”是在两天前被任命为总统的）宣布，所有西贡士兵现在将放下武器，完全投降。西贡已经解放，没有进行巷战或者拼死的防守。我们都曾担心西贡会遭到巨大破坏。听到这个消息，我们消除了担心，房间里顿时一片欢乐和激动。大家互相拥抱，热泪盈眶。郑庭草、杨琼花医生、林文节和我们所有的人，此刻都是归心似箭，想回家去看看。

外面，欢声四起。跑到街上，我们被卷进了欣喜若狂的人流中。整个河内万人空巷，到处是爆竹声；一向严肃而淡漠的河内人正在欢呼、歌唱、互相拥抱。许多人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啜泣起来。没有经历过他们所受的苦难，是体会不了他们此刻的心情的。几十万朵鲜花点缀着这一片纵情欢乐的海洋，空气中飘逸着花香。河内的桃树和樱桃树好象都

在开花，而在前一天我几乎没有注意到它们。饱受长期苦难与悲痛折磨的河内人和我们这些人，好象突然迎来了和平的春天。我们正在庆祝一个新世界的到来。

我与同事和朋友一道，立即开始计划回西贡去。当政治局通知我们说南方的形势还有一些不明朗，要等到安全有保障才能回去时，我们很难控制我们的不耐烦。同时，为了帮助新成立的军事管制委员会实现牢固的控制，一大批北方政府各部、委的干部先于我们被派到南方。这些干部走时，范文同总理给他们送行，告诫他们“要严格地保持革命者和工人阶级的美德”，并且警告他们，要防止“裹着糖衣的毒丸”的引诱。这就是说，在放荡的南方，物质的诱惑将会袭击他们。

最后，长征和春水来见我们，并且宣布，党为了向我们表示祝贺，准备于12日举行一次送别宴会。我们可以在第二天早晨离开河内，到西贡去参加盛大的庆祝胜利的活动。在动身前的几天里，我们想到的只是我们光荣的城市和多年未见的亲人。在整个流亡生活中，我们一直思念着他们。

最后，经过一夜盛宴和互叙同志、战友之情后，13日早晨，我们乘坐一架伊柳辛飞机飞往西贡。想起就要回到自己的故乡，又要同家人和朋友重新团聚，我们几乎无法抑制欣喜若狂的兴奋情绪。这是杨文明宣布西贡当局投降两星期后的日子，也是我们在西宁丛林正式发动革命历经14年多的日子。在西贡的新山一机场，我们受到了凯旋式的欢迎，举着旗帜和手拿鲜花的群众向我们欢呼致敬。整个机场洋溢着友爱和自豪的感情，我们深受感染。民族解放阵线和来自北方政府的高级官员拥抱我们，他们当中有的人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我们的车队沿着马路驶进城市，道路两旁，人们挥动着旗帜

向我们欢呼。

我们被直接送到美拉玛旅馆。这是位于自由街的一幢豪华的建筑物，由于还没有找到十分安全的住所，我们暂时住在这里。虽然战斗已经结束，但是，明显地看得出来，军事管制委员会仍然不放心，在我们下榻的旅馆周围部署了大批全副武装的警卫队伍。然而，不管还可能存在什么危险，我根本没有去想它。我一到旅馆就马上打电话找我父母。我知道他们与我的哥哥琼住在一起已有相当一个时期了。

挂过几次电话之后，我才和母亲接通。在电话里，她不象我期待的那样高兴，言语里也没有我渴望听到的那种亲切的声音。相反，她哭着告诉我，我父亲已经去世了，他是不到一个月前在久病之后死去的。这个消息对我不啻是当头一棒。我最后见到我的父亲是在1967年底。当时，我正被拘禁在国家警察局，身心憔悴，两眼处于半盲状态。我迈着蹒跚的步子，从我的“棺材”走向会客室。在那里，我父亲正在等着见我。他拥抱我时，眼里流露出无限的悲痛。他的话使我终身难忘。我回答他说：“我最亲爱的父亲，您有6个儿子。您应当乐意让我们中的一个人去献身于国家的独立和自由。”现在，虽然我作为新政府的一个部长，回到了获得解放的南方，但是，同父亲这次诀别时的悲痛心情，一直深深地埋在我心里，将永远不会消除。

现在，这个可怕的消息使我心烦意乱。母亲随后提到的事，又使我目瞪口呆。我妻子由于受不了多年与我分离的痛苦而同我离婚，她现在已去美国定居。我的孩子们也离开了这个国家。24岁的儿子（我的第一个妻子从法国返回越南生的）去了法国。女儿去了美国，正在一所大学里学

习”。对着话筒，我讲不出一句话。我周围洋溢着的是大家毕生的愿望已经实现的欣喜气氛，呈现在我眼前的，是那些多年与我一道战斗和受苦受难的同志们快活的面孔。在这喜气洋洋的气氛中，谁也想不到此刻我的心情有多么痛苦——突然面对我失去的一切。我眼前仿佛又浮现出：武文杰的妻儿惨死在轰炸中；维连女士没曾料想到与她丈夫5分钟的见面，而她丈夫在随后的行军中被B-52轰炸机炸死。没有活到胜利的战友里边还有艾尔伯特·范玉草，他长着一双迷惘的眼睛，脸上总带着嘲弄人的微笑；还有我在河内的破烂房子里看到的那些极度凄凉的面容。在所有这一切当中，我自己的损失并没有什么特别。但是这并不能减轻我的痛苦。然

〔1〕我女儿鸾的经历，是对这次战争的一个惊人讽刺。在我担任糖业公司经理时，我们曾让她进入在大叻的一所专设的天主教私立学校读书。这所学校是专门为高级官员的子女开办的。在学校里，她的最要好的朋友是阮文绍总统的女儿俊美。在我忙于秘密进行争取西贡知识分子的时期，鸾的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在总统府度过的。她同阮文绍一家人一起吃饭，经常就住在那儿。阮文绍夫人特别喜欢她，对待她几乎象自己亲生的女儿一样。1967年当我已经暴露并被逮捕时，阮文绍把鸾叫到床边，对她说：“叔叔和你的父亲是敌人，但是没有关系，你在我们家仍受欢迎。”

后来，当鸾毕业后想去海外读书时，阮文绍夫人出面把她介绍给内务部和教育部，替她领取出国护照并安排她出国。由于发现自己对数学和科学有天赋，鸾特别想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在等待申请被批准期间，她住在越南驻华盛顿的大使馆里。在那里她被看成是阮文绍夫人的亲戚。她的临时保护人见到麻省理工学院寄来的录取通知书时，又恐慌不安起来。由于反战活动剧烈，波士顿尤其是一个混乱的中心，它又是象霍华德·津恩和诺姆·乔姆斯基这样的反战鼓动者的家乡，而乔姆斯基实际上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最后断定，鉴于鸾与阮文绍夫人有亲戚关系，不论是多远的亲戚，都会招致波士顿好斗的抗议者的威胁和暴力。为了避免麻烦，鸾没有去麻省理工学院，她进入西宾夕法尼亚的一所大学，她去那里会较安全。四年后，她从该校毕业，获计算机科学学位。——原注

而，当我环视美拉玛旅馆的门厅时，我知道大家的心情都是悲喜交加的。大家都觉得，自己的牺牲是南北全体人民遭受极大苦难的一部分。

第二天，我们回到新山一机场，欢迎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孙德胜和其他前来参加庆祝胜利活动的人。黎德寿、文进勇将军，民族解放阵线主席阮友寿、临时革命政府主席黄晋发，内阁成员和高级干部，每个人都挤在飞机旁边迎接年长的孙德胜。孙德胜继承胡志明当了国家元首，他将用这一历史性胜利来纪念胡志明。当我们驱车返回美拉玛旅馆时，又碰到夹道欢呼的群众。回到旅馆，我们整天就忙于开会并准备未来的工作。

15日一起床，我们迎来了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早在天还没有大亮的时候，人民群众就潮水般涌进独立宫广场，准备庆祝经过30年浴血奋战而取得全面胜利这个最光荣的时刻。在检阅台的对面，入群的海洋一望无际。后来有人告诉我们，参加庆祝大会的人数超过50万，这看来还是保守的估计。我与其他临时革命政府的领导人一道，登上了检阅台，站在自己的位置上，望着人群和旗帜的海洋。我们的同事们聚集在我们周围，他们来自民族解放阵线、联盟、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劳动党。大家都高兴地微笑着，有些人流下了眼泪。

北方政府的孙德胜主席首先代表我们大家致词说，今天是属于胡伯伯的，他的精神似乎在检阅台周围的空气中都可以感觉出来。孙德胜宣布：“从这个时候起，全体越南人民将在一个新时代里共享新的幸福。”孙德胜致词后，民族解放阵线主席阮友寿代表民族解放阵线和临时革命政府讲话，他回顾并赞扬了人民的英勇斗争。范雄代表劳动党讲话。他指出，我们历史性的胜利具有震撼世界的意义，他号召全国

团结和重建国家。

范雄说：“失败的只是美国帝国主义，所有越南人都是胜利者。任何具有越南血统的人对这一全民族的共同胜利都应当感到自豪。你们，西贡的人民，现在是你们自己城市的主人。”

接着，游行开始了。首先是群众团体列队通过，然后是青年、学生、工人、佛教徒、天主教徒以及这个城市各个集团和阶层的代表依次通过广场。他们面带笑容，高举着北方共和国和南方新政府令人自豪的旗帜。胡志明的大幅画像悬挂在街道两旁，成千上万的小旗在空中飘扬，上面写着“没有什么比独立和自由更宝贵”、“胡主席万岁”、“团结，团结，伟大的团结”以及“光荣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光荣属于越南劳动党”，等等。

随后走过来的是武装队伍。这些部队来自北越陆军的各个单位。他们一律头戴崭新的橄榄绿的钢盔。坦克、高射炮和炮兵部队的车辆隆隆驶过。车辆上运载着现代化的、看来很有威力的苏联导弹。空军的飞机一直不停地从广场上空掠过，震动了检阅台。乐队奏出的军歌和爱国歌曲更增添了几分热闹。

最后，当我们几乎有些不耐烦时，越共的队伍终于来了。他们从广场上走过来。队伍显得散乱，与他们前头队伍的表现相比较，他们看起来有些衣冠不整。他们高举着一面红旗，旗上面镶着一颗金星，这是北越民主共和国的国旗。

看到这些，我非常震惊。我转向正站在我旁边的文进勇，轻轻地问他说：“我们军队的1师、3师、5师、7师和9

师，这些师团哪里去了？”

文进勇瞪了我一眼，然后慎重地回答我说：“军队已经统一了。”随即他的嘴角边露出一丝微笑。

我追问说：“什么时候开始搞的？对这样的事情并没有作出什么决定。”

文进勇没有回答，他慢慢地把眼睛转向街道，脸上禁不住流露出嘲讽的神态，虽然他一定知道他透露的太多了。这件事使我的厌恶情绪油然而生，更不用提我一直不愿去想的那些预兆了。

在随后的几天里，我逐渐了解到，我们的警察和安全工作即将全部控制在北越政府手中。我意识到，庆祝胜利活动的整个安排也是为了满足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需要。我们都注意到了在我们机构的负责岗位上安插北方干部的情况。

这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在这之前，我们曾参加了共同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我们的组织曾严重缺乏人力和专门知识。只是现在由于胜利，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

在合作关系中出现了一种新的气氛。所有临时革命政府的内阁成员都开始感到这种令人不舒服的气氛，然而，对所发生的事情我们总是努力往好的方面想，认为这是由于“组织上的困难”（在设法建立我们新的行政机构并使之运转方面），或者是由于缺乏有经验的工作人员所造成的。我们也确实需要一切行政管理方面的帮助。面对堆积如山的工作，我们尽力排除种种忧虑，按照这些思路思维。

同时，为维持秩序而建立起来的军事管制委员会仍然起着临时政府的作用。这个机构的真正权力掌握在武文杰（他当时是中央委员会的正式委员）手里，他同政治局保持经常的联系。一切有关胜利和过渡问题的政策和指示，实际上是

由政治局制定并且通过武文杰及其同事实施的。临时革命政府，“南方人民的唯一真正代表”（多年来党一直这样正确地称呼它），只起着纯粹的从属作用。为了使军管会的行动具有合法性，所有的决定都是以临时革命政府的名义通过并经有关部门批准的。但是，在5月份令人兴奋和混乱的日子里，大家顾不上对这样的安排进行仔细的考虑。一旦过渡时期的混乱状况得到控制，局势恢复平静，我们当然会开始更多地行使正式的政府职能。

但是，几个星期过去之后，我们不可能对党的工作干部在我们面前显露出来的高傲自大和盛气凌人视而不见，这些人似乎认为，他们是征服者而我们是被征服者。我们试图尽可能不去想这些事情，但我们每个人都强烈地感觉到它的存在。在司法部，我手下的官员开始声称，他们要执行北方政府的命令，而不接受我们的指示。我手下一个干部是北越高等法院的官员，他自己起草计划，打算在每一个南方省份建立地方法院。其他的人，即那些来自越南民主共和国最高检察委员会和国家司法委员会的人员，急于没收一些司法部的建筑物以便他们自己的部门使用。

起初我认为，这些计划和行动有助于划定我管辖的部门的权力。后来，在努力制止这些明目张胆的行为的同时，我分析说，整个内阁都将会碰到侵犯它的管辖范围的事情，而这实质上是官僚机构通常存在的内部斗争。我们首要的一项任务是确立一个畅通无阻的指挥系统。我利用建立省法院和移交财产的计划，开始着手这项工作。因为所有法官的任命和财产的转移都需要我的签字和图章，我就决定不予批准。我坚持这类指示要由部里发出，而且我要根据干部的政绩，考虑对他们的任命。只要这个部由我负责，我就有权作出这

些决定。

北方干部的要求越来越强烈，而我仍然保持强硬态度，继续遵循着紧握权柄的理论。最终，我的顽固态度有了结果，从北方来了访问者。我接到通知说，高等法院院长、最高检察长和司法委员会将同我会晤以解决形成的僵局。在一个下午的讨论中，我的客人们成功地向我表明了北方决心控制临时政府的重要意义。

在谈话中间，权力的真正轮廓已经昭然若揭。迄今我不愿去想的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惧感，突然迸发出来。来访者走了以后，我感到我尽力保持的是我职务上的尊严，因为我听这些人讲话时，好象是他们来恳求我的。其实双方都在巧妙地维持着表面的伪装，但是最终我还是签署了这个指示。

这次外交上的冲突结束以后，我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已经没有任何幻想。我知道不论是我或者我的同事都不会在职多久了。

与我一起共事的部长们很快发现他们的幻想破灭了，他们的合理化建议被弃置一旁。这些老革命大多数象我一样，开始进行斗争。他们一旦发现自己卷到这种滑稽戏中，就拒绝合作。许多人干脆一走了之，离开他们的办公室，仔细考虑今后将怎么办。杨琼花医生走出卫生部时发牢骚地说：“让北方干部去兴风作浪吧。”在民族解放阵线和临时革命政府中，大多数没有走的人则置身于一种令人厌恶的气氛里。

但是，也有少数几个引人注目的例外。主席府主任陈宝剑、阮文孝教授和文化部长刘友福由于思想上害怕背离党的旨意而闭口不言。与此同时，民族解放阵线主席阮友寿和临时革命政府主席黄晋发则通过忠实地为新路线辩护来巩固他们的特权。这条新路线是，强迫统一和迅速使南方社会主义

化。

我暂时留在任上，主持着一个充满争吵的部门。黎文塌是我的司法部副部长，他怒不可遏，有意在工作中找北方干部的麻烦。如果说，这些北方干部过去作为下级就高傲自大，那么，现在面纱已经揭开，他们就更令人难以忍受了。北方干部不满意黎文塌给他们出难题，他们自己不断争吵，主要是争论采取什么最好的方法来取消这个司法部。因为这些干部为之工作的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三个部门在这个问题上各有各的打算。

劳动党在这段时间里，显示出十足的玩世不恭的态度，对我们这些长期的战友突然厌恶起来。对于这个时期，北方党的历史学家阮克园评论说：“临时革命政府只不过是来自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一批人组成的。我们（越南民主共和国）这么长时期不这样说，这只是因为在战争时期我们不能亮出我们的牌来。”现在，由于全部权力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开始用最蛮横的方式亮出他们的牌了。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不言而喻的，越南的前途将是一个单一的铁板一块的集团，是集体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在那里，所有南方的传统和文化将被抛弃，并由征服者的政治机器加以塑造。不管形象如何，只要能达到上述目标就行。

临时革命政府和民族解放阵线的纲领体现了广大越南人民的愿望，即政治解决30年内战破坏所造成的困难，在人民中间实现和解。为了完成帝国主义时代的革命，北方党始终认为，同南方革命者的联合只是出于一种需要。在1975年胜利之后，民族解放阵线和临时革命政府不仅不再起作用，而且它们已变成了迅速巩固权力的实际障碍。

这个障碍必须加以排除。正如政治局的发言人长征所说，

“在这个新阶段中，我们革命战略的使命是，加速国家的统一和引导国家迅速地、强有力地走向社会主义。”长征的这句话不是随便说出来的，它表达了主要的政策决定，这些决定将会改变南方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的结构。南越已不再被看成是“一个单独的问题”。在同越南民主共和国谈判联合之前，它的经济和政府本来会有独立发展的机会。但是，民族解放阵线和临时革命政府所强调的民权、土地改革和社会福利已“不再起作用”。越南民主共和国表面上表示尊重南方的多元化政府、中立和民族的一致与和解。它这样惊人的伪装已经保持了21年，现在则要尽快地抛弃，按照长征的话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在7月中旬，代表旧时期的组织召开了最后一次全体会议。民族解放阵线，临时革命政府，民族、民主及和平力量联盟以及群众组织的领导人被召集在一起，听取首脑们的新计划。在大师们的一系列讲话中，范雄（负责南方问题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治局委员）、黄晋发和阮友寿专门讲了越南统一的问题。他们一次也没有提到民族解放阵线和临时革命政府的命运问题，而以前他们称它们为“唯一真正的代表”。

当这一惊人的表演正在进行时，总统府主任陈宝剑（前外交事务专家）凑到我身旁，在我耳边小声说：“他们正在埋葬我们而不用敲鼓吹号。你想，他们至少应当向死者祈祷。”

我小声回答他说：“你说得对。我们应该坚持举行正式葬礼。”在会议休息时，我走近阮友寿并对他说：“我有件事要说，我们有些人感到，鉴于此次会议，我们应当举行一次葬礼。你看怎么样？”

阮友寿疑惑地望着我，他是否觉察到这是一种嘲弄的语

言，我拿不准。过了一会儿，他十分严肃地回答说：“当然，我们能够很容易地作出安排。”

虽然讲出这样的话并不十分容易，但阮友寿说话是算数的。此时所有西贡政府的建筑物和官方住宅已被河内来的党的领导人所占用。这些领导人谁也没有想要处理这种可能出问题的事情。最后，阮友寿租用了力士舞厅作为举行葬礼之用。这个破败的昔日乐园曾经是西贡娼妓云集的地方。在这里可以看到1975年前这个城市最腐败的人所进行的形形色色的交易，毒品买卖，卖淫，权力的交易在此地是家常便饭。我可以肯定地说，在此地为南越革命举行最后仪式，真是破天荒。

民族解放阵线、临时革命政府各部和联盟约有30人出席这次集会。我们吃着东西却味同嚼蜡，会场上的革命乐曲也听不入耳。这些音乐是阮友寿从某个地方挖来的一个可怜的小乐队演奏的。我们强压住感情唱了一些老的战斗歌曲。但是没有办法吞下塞在我们口中的苦果，甩掉缠在我们灵魂上的裹尸布。我们终于知道我们完全被出卖了。

第二十二章

一致与和解

这是一个促人猛醒的时期，此时我最担心的是我们的全国一致与和解的政策。这一政策是临时革命政府政策的基石，它甚至得到了南方社会中非左派分子的巨大支持。这个政策使我们有可能争取许多有声望和正直的人参加到民族、民主及和平力量联盟中来，并且在减少普通人民对革命产生的恐惧情绪方面起着较大的作用。我们不断重申这一政策的结果是，西贡人在阮文绍政权开始崩溃时，不再愿意拼死抵抗。他们有意抱着谨慎友好和等着瞧的态度来迎接胜利的军队。

虽然一致与和解的政策是我们的一个最有力的政治武器，但是在西贡政府投降之前，我们对它尚未作出任何详细的说明。这是必须在西贡政权完全垮台的55天内完成的重大任务之一，而我们原来预计，开展这个宣传运动需要两年的时间。结果，当具体到怎样对付眼前的敌人时，这一切都没有准备好。5月初，召开了一次越南南方中央局和临时革命政府的会议，针对目前面临的紧迫问题，准备详细制订出有关政策。这次会议召开时，虽然许多临时革命政府的官员仍留在河内（我自己也是其中之一），但会议制定的方针，与过去在政策上十分强调温和与克制是相一致的。

5月初的指示号召所有旧政权的官兵和政府官员接受一

个时期的再教育。这包括参加各级政府的人员以及各政党的领导成员。普通士兵和低级雇员将在他们自己的家里或以前就职的地方报名参加为期三天的学习班。他们将受到关于他们自己的错误和美国犯下罪行的教育。中级军官和中级官员将接受更加深入的10天课程的教育。高级军官、全国政党的领导人、高级官员以及国家警察局的成员，他们的学习时间为30天。所有这些人人都要学完严格的课程，这些课程包括：

1. 他们的错误；
2. 美国的罪行；
3. 傀儡政权的罪行；
4. 越南英雄人物的历史；
5. 越南革命的历史；
6. 革命政府的政策；
7. 劳动的价值。

此外，这些人还需要参加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会议。

考虑到这次战争的长期性和破坏性，我们准备实行宽宏大量和人道的政策。我们中的许多人感到这样做也是明智的。对这类人采取温和作法，很可能使他们发生转变。他们由于被打败而受到了震动，现在则对自己的前途感到十分担心。对这样心理上脆弱的人采取人道的方法，将有助于赢得他们的忠诚，或者至少可以使他们对新政府采取老实的容忍态度。由于我们全面控制军政，那些可能被认为是反对派的人又没有重新聚合的条件，所以，实行宽容政策是利大于弊的。

我们希望，通过执行这项政策，动员起全体人民，参加国家的重建工作。这项工作需要投入整个国家的全部精力。实现这个目的的先决条件是，领导方面要互有诚意和互相信任。一致与和解政策不仅是一种对敌斗争的政治武器，而且

在未来新的意义更重大的斗争中，也具有重要作用。我们已经把国家从新殖民主义的状态下解放出来。现在我们的任务是使它摆脱不公正、贫穷和不发达状态。如果我们在这方面失败了，伟大的春季胜利的成果就会在我们手中变成灰烬。

引导人民的第一步，就是指导他们克服无限的困难，将长期的内战所遗留下来的剧烈的，往往是残暴的敌意化为和解。我个人就鼓励那些为旧司法部工作的官员遵照上边的指示，报名参加学习班，接受再教育。这些人包括司法行政官员、律师、法官等，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我第二次被捕前一年就已是我的朋友。我亲自在司法部为前政府的低级雇员开办了三天学习班，我尽可能减轻那些职员和低级官吏的忧虑，这些过去司法部的旧雇员大多数参加了我的学习班。

1975年6月16日，我用汽车把我的两个兄弟琼和碧送到接受再教育的地点。我的哥哥琼曾经担任西贡总医院院长并且是国民党的卫生政策顾问。我的弟弟碧曾任国家银行外汇部主任^①。按照指示，他们带着学习班30天所需要的一切东西，包括他们自己的食品。象其他几十万人一样，他们相信，党的允诺是真诚的，学习一个月之后，象他们这样有才干的人就会重新回到迫切需要人才的社会中来，而且受到欢迎。此外，他们感到（我的朋友们也这样想），我的地位将会保护他们免受任何特别严厉的惩罚。

30天过去了，然后又过了30天。在家里，我母亲越来越焦虑，她一再问起，“为什么你的兄弟还没有回来？你曾肯定地说，你的政府是信守诺言的。但我感觉到你受骗了。那些东京人（南方人对北方人的贬称）愚弄了你和所有其他的

^① 我另外几个兄弟黄和辉，早先已经从南方空军退役，因而没有被叫去接受重新教育，奎则是壳牌石油公司的经理，他从未为政府工作过。——原注

人。”

不仅母亲对我这么说。每天我朋友的家属会跑到我的办公室或在街上碰到我时问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们的问题是令人震惊和向罪式的。每个去接受再教育的人，至少在家里有半打的亲戚，所有这些都憋着一股恐惧和愤怒的情绪。越南人极其珍视的家庭和睦与亲密的环境还是没有得到恢复；大家也没有产生战争结束的轻松感。在这种气氛里，人们可以觉察到某些不祥而又说不清楚的征兆。几乎每一个家庭都受到影响。不安和不祥的气氛越来越令人忧郁。

随着时间的流逝，事情就清楚了。政治局并不是由于碰到了意外的困难，从而作出了延长30天期限的特别决定。实际上，这项决定是在越南南方中央局和临时革命政府5月会议上作出的。现在这件事暴露出这是掩盖政治局真实政策的一种诡计。政治局的真实政策与此不同，（据我看来）它是恶毒的，最后将会破坏整个国家。弄清这个真相之后，我决定直接质问临时革命政府主席黄晋发。黄晋发1940年以来就是一名党员，从一开始他就是政治局控制南方革命的主要代理人之一。他同我的谈话是很难令人满意的。

我对他说：“三志（黄晋发的化名）兄弟，也许你能向我解释一下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已经答应这些人用一个月时间接受再教育。这个时间早已过去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黄晋发说：“听我说，老二兄弟，我们从未说过期限只是30天。我们只说他们去报到时要带够30天用的食品和衣服。”

我疑惑地盯着黄晋发说：“这是什么，一个文字游戏吗？我们没有必要这样做。我们已经获得了政权，不是吗？你认

为我们有必要欺骗他们和惩罚他们？那是弱者干的事。我们是怕脚跟还没有站稳，还是你认为我们还没有牢靠地控制局势？我感到好象我个人在这个问题上已受到欺骗，你的欺骗！而且因为你，我也欺骗了别人！”

黄晋发试图使我冷静下来。他说：“老二兄弟，我们对大部分人采取宽容，真正宽容的态度。大多数士兵，军官和中级官员早已回去工作。你应当对罪犯和那些仅仅是充当炮灰的人加以区别。对那些决定政策的人来说，需要更多的时间。而对那些虐待者怎么办？你能让他们走吗？你不能够同样对待这些人。每一个人有着不同的情况，我们对每个人应当区别对待。”

我回答他说：“三志兄弟，你说要分别处理他们。但是实际情况是，他们是在一条船上，难道不是这样吗？他们都是无限期。我想把我的想法告诉你，最好还是守信用，让他们回家。如果我们要延长谁的学习时间，应当明确地告诉他们，以便他们的家属能够安排自己的生活。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远比惩罚更危险的因素”

在这次大动肝火的谈话结束以后，一种失望的感觉透遍了我的全身。多年来，党对我们口是心非，已经使我非常震惊，而这次我的心情就更糟了。现在我已经具体了解到，党控制南方意味着什么。几天以后，我的一个叫二顺的工作人员自杀身亡，这个消息使我的思绪更乱了。

二顺是一名抵抗老战士，在反法战争时期，他是越盟的一位南方干部。1954年日内瓦协定签订以后，他离家到了北方。和他一起走的同伴都是具有献身精神和政治觉悟的人。现在二顺再次回到西贡，与他的妻子团圆，并在司法部的调研处工作。早几天他曾到我办公室找我，我见他脸色不好，

好象心事重重。当我请他坐下时，他忍不住哭了起来。几分钟以后，他才恢复镇静。他求我帮助救他儿子出来。

事情似乎是这样，二顺去北方以后，这个孩子一直生活在西贡家中，他曾经在西贡陆军中当过军官，后来遵照指示参加了30天的再教育。他和所有其他人一样，还呆在教育营地没出来。而刚团聚的父母得不到他的一点消息。现在二顺受着该死的折磨，既为儿子担忧，又受到同他居住在一起的妻子和母亲最严厉的责备。她们提醒二顺说，他离家出走参加革命以后，养育这个男孩和其他孩子的任务就落在了她们肩上。她们已经忍受了一切苦难、贫穷、社会的排斥、警察的监视，因为她们相信，胜利将会给她们带来更好的生活。

“现在你回到家里，却不能为家里做一件事。你的工资甚至不能养活你自己，更谈不上养活我们。你不过为家里平添了一张吃饭的嘴，而我们却要与其他人一道来照顾你。”二顺告诉我，他对家里的生活已经忍受不了了。我能否为他的孩子做些事情？

不用说，我简直无法给二顺什么安慰。我劝他写一封请求书给政治局，回顾他本人对革命工作的情况，并且引证有关一致与和解的官方政策，要求释放他的孩子。二顺接受了我的建议，我在他的请求书上加上我的批语并转交给政治局。以后，就我所知，他没有得到回音。两个星期以后，二顺死了。他是从黎利街的一幢六层楼上跳下来的。我曾征用这幢房子作为司法部的住宅。他留下两封遗书。一封写给党的领导人，批评他们对南方问题的冷酷无情和他们的欺骗行为。第二封是给他的妻子和母亲的，他请求她们原谅他。

二顺的遭遇，甚至他的自杀，决不是个别现象，它对我的冲击极大。我也有自己的问题，近亲有两个兄弟，远亲就

更多了。人人都有亲属在教育营里受煎熬。甚至那些具有很强的革命信念的人，也只能面对冰冷的墙壁，默然而立。想要知道他们被关在哪儿，他们的情况如何，什么时候能回家，都是不可能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不明不白地在整个南方掀起了一股恐慌的浪潮。

这时我对我的兄弟越来越感到担心。我下决心要把他们的情况弄个水落石出。几天之后，通过黄晋发，我安排了一次去龙成营的访问，我的两个兄弟就关在那里。我的老朋友，民族、民主及和平力量联盟主席郑庭草也获准与我同行，他的女婿是一位前西贡的陆军医生，也被关在那里。

在龙成营地，我们受到营指挥官冷淡而有礼貌的接待。他说，他准备了一辆汽车，让我们到营地转一圈，但不准停下来，也不许同我们的亲戚和其他任何人谈话。因此我们只能开车通过营地。我们尽力想在一群神色茫然的拘留犯中辨认出自己的亲人。当我们的车子慢慢地驶过一群人时，我看到了碧和琼，他们在一起走着。直到现在，他们的面容仍然萦绕在我的脑海里：苍白，消瘦，惊恐，眼神暗淡无光。我们互相瞥了一下。我想象不出，他们看到我坐在一辆政府卧车的后座上驶过那个地方，心里是什么滋味。

经过4个月的不断努力，我硬要前越南南方中央局的首脑范雄帮助，才使碧获得释放。然而琼却被转移到北方的一个更加牢靠的营地。我在写这本书时，他仍被监禁在那里。从我用车送他到报名站去参加30天学习班直到现在，已经有九年光景了。他的罪行是接受了一个政党的顾问职务。这个政党参加旧国会使劳动党耿耿于怀。琼的错误似乎决定了这位有才能的医生和管理人员的命运，他将被终身监禁。这不仅对他本人，而且对那些极需他的技能的人民是一个悲剧。

因为他们需要这些永远被打入地狱的人奉献自己的技能。

再教育营地的事已经使我心慌意乱，另一些恶性事件又不断出现，很快，这些事件又吸引了我的注意。由于南方没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为了巩固占领区，各级党、军队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机构，在南方各自为政，因而造成混乱局面。在城乡掀起随意逮捕的浪潮就是最明显的例子。陆军、地方当局和治安警察都开始清除那些因某种原因而被他们列入各自名单的人。而有关逮捕人的法律条文根本没有，也没有一个权威机构统一管理各级单位的行动。对那些逮捕的人也没有什么保护措施。这些逮捕更象我第二次被捕那样，是绑架而不是依法逮捕。人们在自己家里、办公室，往往在街上就被随便抓走。没有人知道自己的邻居或同事为什么被逮捕，或者自己的儿女失踪以后的下落。西贡人已经被那种“一致与和解”政策搅得心慌意乱，现在又要被投入集中营，这使他们更加胆战心惊。起初他们欢迎革命，对未来满怀希望。现在他们却置身在令人恐惧的敌对气氛中。一种可怕的气氛笼罩着这个城市。

我对这种混乱局面无能为力，所以，我直接上书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向他递交了一份关于这里发生的无法无天的狂暴行为的详细报告，要求迅速制定一个统一的法规，禁止随便抓人。约一个月之后，我的建议有了回音。范文同在一封来信中告诉我，将派一个由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高等法院、检察院和国家司法委员会组成的代表团来西贡（现改为胡志明市），同我的司法部共同制定一个新法典。

我同这些先生打交道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讨论开始时，我并不抱有很大的热情。但是，范文同曾清楚地向代表团表明他希望有成果。因此，我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同行们一开始

就采取合作的态度，工作是高效率的。为了控制道德败坏、生产停顿和狂捕滥抓的混乱局面，我们努力工作，准备制定出一个适用的法律文件。经过两个月的时间，我们拟定了一个工作文件，内容包括：

1. 具体规定具有逮捕权的政府机构；
2. 对可以进行逮捕的违法行为的定义和分类；
3. 建立一个法院系统对那些被逮捕的人进行审判；
4. 制定一个统一的审判法规。

这些条例虽然不全面，而且又有缺点，但它至少可以使目前的混乱局面得到某些控制。

然而，黄晋发先生对我直接找范文同总理感到很生气，他拒绝在这个简明法规上签字，使它变成法律。我没有其他求助的对象，只能再次找总理。也许是范文同进行了调解，或者也许是黄晋发最后断定他已经达到了目的，我从未弄清其中的原因。但是不管怎么样，在胜利后将近一年，在我第一次写信给河内4个多月之后，即1976年3月，黄晋发参加了我们的工作。南方最终有了一个统一的法规。这一年是一个政府犯下各种暴行的一年。这个政府只要求无情地巩固政权，根本不进行重建国家的工作。一个历史性的机会已经失去，这样的机会再也得不到了。

至于我们可怜的法规，即使在它公布之后，它的遭遇也很不妙。这些法律理应在整个南越实施，但在西贡以外的行政单位，根本不把这些法律放在眼里。就全国来说，行政权力掌握在那些习惯于听从政治局命令的干部手里。这些人心安理得地无视南方政府发出的指示，特别是那些他们看来对党的路线有某些偏离的指示。有关哪些机关具有逮捕权和逮捕理由的规定，如何对待被捕者的规定，据这些人看来，都

是明显不合时宜的。由于南方政府缺乏实施自己政策的手段，各级地方政府几乎不受这些政策的约束。甚至在西贡，也没有办法保证法规得到实施。任意逮捕的浪潮继续泛滥，这十分清楚地说明，在许多情况下，法律并没有实行。

在解放后的第一年里，大约有30万人被逮捕。这个数字仅仅是应召去参加30天再教育的军官、国家官员、各政党领导人的人数。据我所知，在一个月甚至一年以后，没有一个人被释放回家。直到1976年夏天我从政府离职时，仍然听不到有人被释放出来的消息。这个数字当然不包括那些在西贡和各省实行恐怖统治时期，被政府机构和军事当局逮捕的人数。要估计这个时期被捕的人数，简直是不可能的。而这一切就发生在我担任司法部长的时期。

第二十三章

一个 国家

当和解政策在再教育营地和监狱里寿终正寝的时候，另一个革命的理想又面临着灭顶之灾。这就是大家关心的统一问题。儒家有一句古话，叫做“欲速则不达”。但是在我们伟大的春季胜利之后的一年里，尽管这句名言对越南的统一问题有很大的实际意义，但是长期以来，没有得到重视。临时革命政府和联盟为最终建立邦联制定的方案，成了一纸空文。这个邦联要求建立“在平等和尊重每一个地区特点的基础上”（联盟的政治纲领），“任何一方都不施行强迫”（临时革命政府行动纲领）。胡志明曾写道：“越南是一个整体，越南人民是一个民族。尽管河流会干枯，高山会崩溃，这个真理是永远不变的。”不管胡志明的话是否反映了越南的现实，越南还存在另一个具有同样深远意义的现实因素。这就是南北之间，在越南各个阶层的人民中间存在着政治、心理、道德和经济上的差异。

临时革命政府正是认识了这后一个真理，并远见卓识地认为一个缓慢和慎重的统一将会维持和保护这些特有的差别。重新统一需要15年的时间，这也是劳动党在内部所持的观点。孙德胜早在1960年9月在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反映了中央委员会的一贯立场：

“由于这个国家（南北）两个地区情况不同，南方必须制定一个自己的纲领。这个纲领在符合祖国阵线一般纲领的同时，要能适合它自己的情况。南方正在进行的是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北方是社会主义革命。”

重新强调这些观点当然是说给西方听的。范文同曾对各种来访的外国人说：“我们怎么会有要合并南方这样愚蠢的、恶劣的想法呢？！”黎德寿也在巴黎记者招待会讲过：“我们不想把共产主义强加给南方。”但是在胜利的年月里，无论是这种正式的内部路线或不是那么正式的公开保证，都被弃之不顾。

在这个时候，显然已经没有必要对西方新闻媒介和反战运动，以及对南方革命者作任何掩饰。

由于北越的人民军牢牢控制着局势，实际上就不再需要过去环境所要求的那种蒙骗策略或秘密控制。那些当权的人直接运用权力就够了，而不再需要采取其他方式。这至少是第二十四次中央全会的结论。这次会议是1975年初夏在原南越资产阶级的山区胜地大叻召开的，在这种形势下，谁还能够反对南方的迅速统一和社会主义化呢？

11月15日，在前独立宫举行的实现祖国统一的政治大会上，中央全会的决定正式开始实施。这次大会表面上是为了南北代表能够交换关于统一问题的意见，实际上，它不过是在旨在批准北方领导早已确定的统一方案。政治局的第二号人物长征率领北方代表团，而南方代表团团长既不是民族解放阵线主席阮友寿，也不是临时革命政府主席黄晋发，而是由前北越副总理和政治局第四号人物范雄担任。这样一来，所谓的“交换意见”只能在长征和范雄之间进行了。

南方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也参加了会议，但只是作为范雄

的代表。我是这些幸运的代表中的一个，我有投“赞成”票的权利（这种会议被越南人称为“投赞成票的会议”）。我和同事们感到，南方运动就象一具没有倒下的僵尸。这次会议象是一次为我们安排的奇怪的闹剧。我非常奇怪党究竟是怎么安排这次明显非法的集会的。但是我们相信领导有厚颜无耻地行事并泰然处之的本事，而这种信念也真的没有落空。政治局的长征代表北方讲话，他宣称，“不论北方和南方之间仍然存在着什么差别，我们一定要使它减少和消除”，而且“最重要的第一步是，建立一个统一的政府。”政治局委员范雄代表南方宣称：“南方代表完全支持和一致同意北方代表团提出的建议和措施”。“完全支持”这话全然用不着考虑大家是否能接受。大会号召代表们挨个儿发表“意见”，不厌其烦地重复这些话：完全支持尽快的统一……完全支持在南方建立社会主义……完全支持摒弃现在已不需要的“民族民主革命”。这次会议一致同意采取的最后步骤是，在春季，全国举行统一国会的选举。

后来，在我们的人中间流传着这样的传说，有人警告范雄说，在南方的干部和政府官员中，也许有些人对所发生的事情感到不满意。范雄笑着回答说：“这没有关系；通过统一方案只需要51%的赞成票就足够了。”当然这个笑话说明，范雄突然对达到简单多数的问题关心起来。在1976年4月25日举行的全国选举中，99%的选民是按照预期的那样投的票。他们没有多少选择。对那些不参加投票的人处罚的办法是，没收弃权者的口粮供应卡，而没有口粮供应卡，就休想买到任何吃的东西。

到了6月底，南北统一可以说已经完成了，只是当时还没有为此颁布最后的法令。为了确认和批准南北合并，在河

内召开了统一的国会会议。我也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开会中有一天，当代表和党的官员们正在休息时，我感觉到有人拍我的肩膀。转身一看，我见到长征正好奇地打量我。我曾经在11月召开的统一会议上见到过长征，但是同他个人接触是在解放之后。那时正值临时革命政府的部长们准备离开河内，赴西贡参加胜利庆典。那天晚上，党为南方领导人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宴会。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和许多中央委员都参加了。宴会上洋溢着团结和友爱的欢乐气氛。宴会结束以后，大家异常激动，脸上挂着欣喜的泪花，互相热烈拥抱。长征向我道别并紧紧和我拥抱，他祝愿我们在未来的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绩。现在，经过15个月令人感到极其痛苦的日子之后，长征再一次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的脸，这次他的眼睛却闪着疑惑的目光。

他对我说：“请原谅，同志。你看起来很面熟。你是谁？”当时，至少我感到有些迷惑。当我回答他说，我是南方的司法部长时，长征的眼睛一亮说：“噢，是真的吗？你的名字叫什么？现在你在做什么工作？”

我认为长征对我没有任何恶意，只是这位老人有些健忘。但是如果这些话是对南方革命的最后评论，那么，他的话就意味深长了。

在这次偶然会面以后不久，越南民主共和国食品和供应部长吴明鸾接见了。他欢迎我参加新的统一政府，并邀请我担任他的副部长，我无意参加这样一个政权。这是一个强加给南方的政权，它干的背信弃义的勾当实在太多了。但是出于礼貌，我告诉吴明鸾我将考虑他的建议。新政府吸收的临时革命政府或联盟的人寥寥无几。吴明鸾对我明显的冷淡情感到困惑。他不能相信，我们当中竟会有人拒绝这样的邀

情。

几个星期之后，吴明鸾飞回西贡，他和我又重新讨论了这个问题。他强调说，我在制糖工业方面的经验有很大的用处，特别是考虑到，越南有潜力发展成为一个蔗糖出口大国。吴明鸾说，范文同总理亲自批准了对我的任命，并要求他一定要我接受这个职位。

也许是过去15个月来我与范文同的交往使他认为，我会愿意与新政府一起工作。也许他认为，我参加政府可能会减轻临时革命政府和联盟领导人的普遍痛苦。但是不管范文同怎么想，我唯一的愿望是离开这里。我陷入了幻想彻底破灭的痛苦中，打算寻找机会早些退休。我对吴明鸾说，我对这项任命感到荣幸，请他转达我对总理的感谢，但令人遗憾的是，正如他所知道的，我的身体不好，并且我同家庭分开已经这么久了，我决定不再离开他们（这个职务需要我到河内去）。

吴明鸾把这一任命看成是一种少有的荣誉；而我却越来越强烈地感到继续在政府工作是一种耻辱。自从我们的和解政策开始遭到破坏以来，时间已经过去一年多了，而官方掀起的恐怖浪潮仍然在发展。在家里，已达78岁高龄但感觉仍然敏锐、说话依然直率的母亲将会问我，我怎么把这种“鬼东西”带了回来。也不知我中了什么邪，竟让自己的家庭和人民再次蒙受苦难。她说：“你的共产党朋友都是一些两面三刀的人。他们做了坏事必遭加倍报应。”我母亲曾为1975年4月西贡的解放而鼓掌欢呼，但就在这一年里，她对革命的态度发生了急剧变化，从同情革命一下子变得对它深恶痛绝起来。

不单我母亲忿忿不平，西贡人都在谈论周围所发生的事

情。西贡本来就是一人们议论纷纷的地方。至少在我的朋友当中，很多议论似乎是针对我的。我曾听到这样的说法：

“在吴庭艳和阮文绍统治下，窃贼们起碼还顾及一下面子，而这些党员们看到什么就抢什么。”

“你认为把美国人赶走就那么好吗？现在我们正在让俄国人掐住我们的脖子。当美国人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至少有东西吃。现在我们有什呢？是国际团结吗？”

“干部们总是说为人民服务。最后，我们算是作了国家的主人。可笑的是，主人是赤脚走路，而服务员却乘车到处跑。”

逮捕和局势的捉摸不定造成了人们对政府的敌意。对北方士兵和干部们的大肆掠夺，西贡人无比蔑视，同时这些北方佬的粗野下流也暴露无遗。有时连续几天，我在办公室天天听到的就是愤怒的控诉，要不就是令人不安的个人家庭悲剧的报告。我不敢走到街上去，怕碰到我的朋友、老同学和以前的同事找我谈话。最后，我再也无法忍受了，我把自己关在家里并且拒绝再回到办公室去。有些临时革命政府的部长和民族解放阵线的官员早已隐退，还有一些人继续在忍受那种每天内心受着煎熬的日子。也许他们感到，他们在那里可能对发生的事情起着某种缓和的作用，也许是因为他们对眼前的事情已经习以为常了。

到了1976年夏天，瘫痪现象四处蔓延，不仅官方而且各地的人民都能感觉到。办公室工作人员和工厂的工人不上班，要不就在班上整天同心情沮丧的伙伴们聊天。他们已经看到了最后胜利的伟大时刻——和平的到来，而和平是经过30年连续不断的暴力和100年可恨的外国统治才来到的。但是他们憧憬的和平不仅没有给他们带来幸福，反而给他们带来了

一场新的更阴险的战争。这次战争是解放者自己发动的，矛头指向了自己的人民。

在独立后的第一年，人们已经深深地体会到自己的绝望处境，他们心情沮丧，工作和生活都不顺心。甚至党也被迫承认这点。《人民报》（党的机关报）开始发表文章，提到旷工和劳动生产率下降的问题。一位评论员写道：“我们的工厂开工率只有50%。一天只进行四五个小时的有效劳动。所有农业计划都失败了，许多农民正在放弃他们的土地。”

为此，党的宣传机器制定了许多新的口号。这些刺耳的口号突出地表明，那些经济和政治计划的制定者对公众新的敌对情绪紧张不安。一张报纸印着醒目的大字标题：“我们已经打败了中国、日本、法国和美国这些世界上最大的强国”；“我们必定会克服我们所有的困难”。但是实际上，这些问题是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冷酷无情和完全不顾人类的尊严和人权而突然产生的。党的领导人头脑中的这种根深蒂固的意识要比对付越南的外部敌人更难办。正如范文同后来向记者斯坦利·卡诺承认说：“进行一场战争是简单的，但是管理一个国家是非常困难的。”

其中的一个大困难仍然是成千上万的北方干部涌进南方，对南方实行统治。由于过去生活极其艰苦，这些干部贪婪地抓住西方化的和腐败的西贡所提供的各种机会。他们互相争夺房子、汽车、妓女并且接受贿赂。在北越十分贫穷条件下长大并多年过着严酷的军事生活的官兵，突然来到对他们来说几乎是象神话故事里那样富有的地方，他们当然不能错过机会。西贡这个城市仿佛正在遭受一大群蝗虫的袭击。

由于我被夹在政府和群众之间，到了1976年夏天，我再也不愿见政府里面的任何人。甚至对他们极其厌恶。我甚至

不想同临时革命政府和联盟中的朋友谈话。这些朋友也有我同样的苦恼。我只不过是想离开，找一个清静的地方，在那里思考和制定我在这个令人厌恶的新世界中生存下去的计划。

第二十四章

出 走

将近1976年底，我就想要隐退。在那一年夏天，我同郑庭草家的一位很亲近的朋友结了婚。她是我回到西贡以后不久认识的。我和新婚妻子移居到一个小家庭农场，这个小农场坐落在西贡近郊的绊脚网地区。越南人爱沿习中国古代官僚的遗风。当官场的问题成堆而无法解决时，就在乡下置下一块土地，以备隐退之用。我发觉，这种传统的预防措施是一个天赐良策。

我和妻子搬进的那间农舍没有水电设备。我们种植稻谷和椰子，还饲养鱼和几头猪。我有时骑自行车到城里去看望我的母亲或者顺便看一下我的那幢别墅。这座房子仍然是我的官邸，而现在则由我的警卫住在里面。在我的官方别墅里，每月有我的工资和食品供应卡待我去取（政府还没有承认我的辞职）。部长每月的工资是210皮阿斯特（约40美元），但是我凭自己的食品卡可以到为外国人和高级官员开设的特权商店购买物品。那时口粮的定量是每人每月14公斤大米（在丛林时为20公斤——条件比过去更差），4罐炼乳和2公斤沙糖。我们尽量从农场中生产各种东西来弥补这些食品的不足。

我发现体力劳动是愉快而轻松的；它有助于我集中注意

眼前的问题。情况慢慢地变得十分清楚，我将要被迫作出具有最深远影响的决定。有两条道路，我可以选择一条。我可以轻易地默认所发生的事情，退休回家，逐渐平静地死去；或者我可以为30年来我们为之献身的政治和社会理想而继续进行斗争。但是如果我要继续这一斗争，该如何进行呢？对方是一个党的组织，它控制着各种残暴和完善的镇压机关以及强大的军事机器。而我在这场斗争中能找到什么同盟者呢？没有任何有力的和敢干的反抗者的组织可以参加。在丛林中，也没有现成的游击队运动。我们在反对吴庭艳和他的继任者时，曾获得世界舆论的支持，而这种支持目前也不存在。西方的反战运动对我们的胜利作出了很大贡献，但是他们几乎不会准备发动一次新的讨伐运动，因为只有认识到事实的真相，他们才有可能行动。但是，这样的认识又如何去实现呢？我逐渐得出结论，在越南，斗争的条件并不具备。但是，我也不甘心象受惊的啮齿动物那样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我准备远走高飞。

从南方刚一解放起，乘小船出逃就成了整个南方议论的重大话题。每一个人都谈论它，但实际上，真要把它付诸实施是一件危险的事情。首先你要找到一只船和一名舵手。当然，你决不会知道你的联系人的身份，这些联系是通过一些朋友的朋友安排的。也许你的联系人是个守法者，或是个窃贼，弄不好他还可能是个奸细或保安特务。许多不法之徒发现，他们可以从这股迅速高涨的出走浪潮中渔利。金钱损失同你要面对的众多风险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可能包括你一生的积蓄加上你从朋友和亲戚那里凑来的每一个铜板），弄不好你可能鸡飞蛋打，钱白扔了，人也进了班房。假定你能够找到一个亲戚，他有办法找到一条船，或者找到某个诚

实的船主，他准备逃亡，也愿意带你一起走，即使这样，你的命运也难以预料。去泰国，你面临着至少几百英里的航程。到马来西亚或印度尼西亚，要比那个距离多两倍。海上到处是海盜，如果你能闯过海盜这一关，下一个迎接你的就是一排排肮脏不堪的难民营，这些难民营早已人满为患。在令人作呕的难民营里，你唯一的希望就是，在异国他乡建立自己的新生活。这些外国政府可能愿意接受你，但当地的语言，习惯和人民是完全不同和难以亲近的。

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人们才会下决心逃亡。然而，一旦作出决定，你就只能硬着头皮，秘密地全力为安排船只奔走。

就我的地位来说，如果要安排逃亡的话，就要面临更加复杂的问题。我知道，即使我以健康为理由提出退休，也不会被批准，而且还会引起当局的怀疑。因此，我第一步打算掩盖自己的意图，避开党和安全机关的监视。首先我必须结束乡村生活，因为这本身就是明显不一致的举动。1977年秋天，我和妻子又搬回城里，居住在我母亲的房子里。

我们刚安顿好家，西贡党组织第一书记、中央委员武文杰就跑来看我。武文杰的态度是友好而和解的。他告诉我说：“你知道，党和我们的朋友为你担心。每个人都知道你在战争期间作出了什么样的贡献。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希望你能承担一些责任，帮助我们渡过这个困难时期。”

我感到我可以直截了当地同武文杰谈谈，用不着掩饰我的观点。我告诉他说：“我把一生献给了斗争。你是知道这点的。但是我感觉到领导似乎并不十分关心胡志明伯伯关于统一或革命道德的思想，或者没怎么讲到那些事。据我看来，

当前存在着很多严重的错误。每件事都办得太快了。官僚主义者和干部们在这中间起了主要作用。考虑到人民目前的遭遇，我认为我干不了什么事情。告诉我，难道你不为所发生的事情而感到烦恼？”

武文杰不愿和我谈这个话题。另一方面，他认为他还有希望使我回心转意。他说：“注意，老二，如果你不愿到北方去，我可以让你留在这里帮助我，就在我们自己的工业部门。你了解情况和每一个人。我用不着告诉你把工作再干起来意味着什么。”

武文杰有着很大的魅力和说服别人的本领，我钦佩他的高明手腕。尤其是，他是一个精力充沛和注重实际的人。我尊敬这个人。他的妻子和孩子是去丛林同他见面时被B—52轰炸机炸死的。因此，我对他十分同情，但是尽管他的个人品质好，当他谈话时，我自己不能不想到，他个人代表不了全体。

但是，如果接受武文杰给我的工作，我的逃亡计划就能得到极好的掩护。我把此事记在心上，就一直同武文杰讨论这个问题。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里，我同他见了几次面。最后，我接受了国家橡胶工业公司经理的任命，这个职务可以提供一定程度的掩护，免受过多的监视，并且也可以让我加紧寻找出路。

能否找到一个可靠的船主是一件非常伤脑筋的事情，特别是因为我不得不进行间接联系，尽管当时要非常小心谨慎。然而，最后还是取得了突破。我妻子的一个妹夫姓孙，他是一名医生。在反法战争时期，他曾与越盟一起战斗，并于1954年转移到河内。现在他回到了南方，在隆川省担任高级军医。据家里人说，孙深怀不满并且正在制定计划准备逃离。显然，

他20年来在河内逗留期间所接受的关于南方情况的宣传和隆川的实际大相径庭，这使这位医生怒不可遏。他曾经希望作为一名拯救者，受到劳苦大众的欢迎，这些人曾备受美国压迫者的蹂躏。而现实情况却完全是另一码事，孙医生感到，他完全被人蒙骗了。因此，他正在通盘考虑自己的计划。

在这个省内，孙有一个堂兄弟，他是一个有钱的商人。这个人也在到处找船。他已经同意把医生包括在他的计划之内。通过我的妻子，我们同孙取得了联系，然后由他代表我们同他的堂兄弟接洽。那个商人表示愿意带我们一起走。在这种情况下，典型的做法是，一批人将集中财力设法买一条船，而组织者和买船者一样，也要冒风险。如果“股东”之中隐藏着奸细，那么，几个月紧张的努力就很容易变成灾难。

我们因幸运地找到关系而欣喜若狂。我和妻子一方面设法筹措买船的钱，同时积极准备起来。在同孙见面时，我敦促他说，他应当劝他的堂兄弟买一条内河船只，而不要去买能在海上航行的拖网渔船。越南正处在大批人出逃的痛苦挣扎中，因此一切船只的交易都会受到官方的严密监视。一条内河船只大概不会引起太大的怀疑。只要船能买到手，其它的事就好办了。我们可以加固船体并且换上一个功率强大的发动机，使它适合于海上航行。当然还会有许多其他困难。航行中的必需品要设法弄到：足够的燃料，额外的大米，两个星期的饮用水，双筒望远镜，罗盘针等。这些东西都是严格限制的。只要你对这类东西感兴趣，马上就会受到怀疑。这些东西的买主一经发现，就会被投入监狱。

当我们听说孙的堂兄弟已经找到并且买下了一条35英尺长的小型内河货船时，大家都非常兴奋。这位商人利用他在

隆川的关系开始装备那条船，并且通过向一些地方官员贿赂，取得了一项运载货物的合同。从隆川向下游运载碎石到沿海的金瓯地区，再从那里把木炭运回隆川，往返一次约250英里。由于得到了合同，他领到一张船只驾驶许可证。凭着手里的许可证，他招募了一批水手。考核水手是否够格，并不看他有无航海技术，主要的条件是，他必须得有离开这个国家的愿望。这时就到了关键的时刻。

幸运的是，在隆川从事这种冒险活动非常理想。隆川位于离海80英里的湄公河畔，没有沿海地区那样的严密监视，而绝大多数抱着希望的难民是从沿海地区逃出去的。尽管如此，由于国际上围绕着船民问题的宣传，政府越来越警惕起来，甚至对内河航道也加强了警戒。沿河每隔一段设立了检查站，从隆川到海岸边设有六七个这样的检查站。每到一个检查站，舵手要把船停下来，带上证件上岸盖章，并交付必要的罚金。为了熟悉水道，孙的堂兄弟当上了专职的货船船长。他研究航海图、航行方式和警察分队的活动规律。他知道与其让巡逻队来找他，不如自己到检查站去登记。他学会了贿赂的方法——不要太少（太少会使警察生气），也不要太多（太多会引起他们的怀疑）。

在两个月的时间里，这位变成内河货船船长的前商人大概从隆川到金瓯往返航行了10次。每航行一次，他可以得到官方配给的燃料、大米和饮水，这些东西是他和不耐烦的水手们急切要囤积的。其它供应品是他们从黑市搞来的。到了1978年8月底，一切都已经准备妥当。自我决定出走到这时，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年多。

8月22日，星期三，我妻子的妹妹到西贡来告诉我们，4天之后即星期天准备动身。选择星期天有两个原因。孙的

堂弟在河上航行时发现，警察认为周末是休息和享乐的时候，因此，这时他们的警惕性有所放松。在周末很少进行突然检查和彻底盘查。更重要的是，此时正值季风季节，经常有间歇性的大风。通常的情况是，一场风暴持续几天，接着有一个短暂的间歇时间，然后再刮第二次大风。我们小船的构造根本经受不住海上风暴的袭击。因此，我们必须等待大风的间歇期。船一旦开航，在第二次风暴向我们袭来之前，我们必须靠岸避风。现在是星期三，大风已经刮了几天，正接近尾声。

25日即星期六的拂晓，我和妻子只带了几件随身行李，向我母亲挥泪告别。然后我们乘公共汽车到隆川，在下午很晚时候到了孙医生父母的家里。我们到达那里不久，我们的一个伙伴再一次仔细检查了计划，明确了集合地点、时间表，研究了碰到麻烦的应急措施。我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在后面一间阴暗的房间里安顿下来，以防被外人发现。那天等待的时间似乎特别长。

早晨4点钟我们听到外面房间有人在小声讲话；一名水手来领我们——我的妻子，我自己，孙及其夫人和他们5岁的男孩到船里去。我们五个人提心吊胆，尽量无声无息地跟着向导，走过昏暗的城镇，来到河岸边。上船后，我们下到底舱，又通过一道活动板门。这是孙的堂兄弟悄悄改装的。在船舱里，我们坐在水桶和米袋上，尽量想能坐得舒服些。当我的眼睛慢慢地适应船舱里的黑暗时，我开始辨认在底舱里的其他人。大约有20人，包括大人和小孩。他们是我们这次旅途的同伴。大人们背靠舱壁坐着，孩子们坐在中间。在我们下面是压舱物；在我们头上一英尺高的地方是掩盖我们的假地板。如果我们走运的话，也许能躲过水警的盘

查。

几分钟之后，发动机震颤着发动起来，这条船慢慢地离岸，平稳地向河下游驶去。由于舱内有点发臭的空气和船身左右摇摆，我不久就感到筋疲力尽，慢慢睡着了。一定是过了好几个小时，我好不容易才醒来，发现发动机的响声已经停止，船停在水面上，不再往前走了。突然间，地板门被掀开，一名水手把头探进来，压低嗓子对我们说，这条船准备装载更多的旅客。我不敢相信我听到的这些话。每个人除了感到震惊外还未来得及想其他事情，另外25个人就已从地板门口爬了下来，挤到我们中间。大人只能猫腰坐着，背靠墙，挺直膝盖，两只手臂交叉放在胸前，这样可能腾出几英寸的空间。这场景象就象我们当年的训练。孩子们躺在船舱中间空余的地方。我不知道，象我们这样挤成一团，如何能熬过整个旅途，活着上岸。原来就不新鲜的空气，现在变得更加污浊，难以呼吸。当船再次启动时，每个人都显得紧张不安，劳累疲乏。孩子们开始叫苦。但是，我们最担心的还是警察和这艘超载小船的安全，其次才是船舱中的恶劣条件。我不知道船上多少人了解（孙和我是了解的），整条船上连一个专业水手都没有。

大概在我们离开隆川20个小时之后，约在半夜里，船开到了这条河的入海口。在底舱里，我们感觉到浪涛汹涌的节奏，猜想我们的船一定正在通过大崖，准备进入公海。但是，当时我们当中没有人了解，湄公河河口潜藏着不少变化莫测的暗流。不幸的是，那位担任我们船长的前商人比他的一窍不通的旅客也强不了多少。他在短短两个月的自学航行中，没有开过夜航，而现在他的缺乏经验所造成的结果，几乎是致命的。由于在黑暗中对水路判断错误，他径直把船驶上了沙

滩，这个沙滩由于落潮几乎显露出水面，在我们脚下，先是传来一阵隆隆声，以后船身又微微颤动起来，最后船就完全停止不动了。

船舱里的乘客一下子都紧张起来，刚才那种象服了麻醉药似的睡意，被突如其来的停船给冲没了。男人们爬上舱口想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来到甲板上他们发现，大多数水手正站在浅滩中试图把船推走。身体较强壮的乘客学着他们的样子，脱掉裤子和衬衣，只穿内衣，跳下船站在他们旁边，帮助他们推船。大约20—25人在黑暗的水中全力以赴，想把船推出沙滩。但是船底还是牢牢地陷在沙滩上，丝毫不动。他们拼命往前推船，发动机却发出有气无力的倒转声，船一动也不动。他们的努力显然无济于事。最后，船长让大家挨个站成一行，组成一道人链，从底舱一直排到船下的浅水区，然后把压舱的石头从船上搬下来以减轻重量。大家很快行动起来，很重的石头被传送到甲板上，接着又被送到船外。

看着大家在拼命干，我站在一边爱莫能助，因为当时我身体虚弱。我只能迫使自己冷静下来，想一想下一步该怎么办。船的重量不断减轻，可船身仍然屹立不动。排成人链的男人们不时散开，争先恐后地跳下水去再去推船。但是看来一点也不起作用。人们开始感到，不论怎样发狂地努力也无办法了。我们已经动弹不得了。在这个地方，我们只能坐等黎明的到来，并迎来清晨出海的渔船队和警察巡逻队。

想到这些，我感到自己不能叫人抓住，万不得已的话，我宁可跳海自杀。我确信，如果他们抓住我，他们就会长时间地侮辱我并在精神上折磨我。这是他们一贯的手法。我想起了陈德草的不幸。陈德草是一位伟大的越南哲学家，他曾

经是萨特¹的同班同学和朋友。他的遭遇好象又突然呈现在我眼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陈德草就参加了共产党。1954年他到河内定居时，已经是哲学界一位知名的现象派学者。但是两年之后，竟犯了若干“错误”，其中一个错误给这位哲学家造成了飞来横祸。

血腥的北方土改计划是党犯下的一个错误，它为外界所熟知。在实施这个计划的过程中，处死了几千名所谓的地主。其实，这些地主不过是贫苦的农民，只是他们拥有的土地比邻居多一点。他们拥有的土地是微不足道的。这些暴行引起的愤怒导致胡志明取消了这个土改计划并处罚了那些直接负有责任的人。后来胡志明还采取了异乎寻常的步骤，他向人民表示道歉，承认此事“做得不公正”。

第二个错误是1956年镇压知识分子的运动，这是一种越南式的文化大革命，对此却没有人认错。陈德草的遭遇是许多受害者中最突出的一个例子。他虽然肉体没有受到伤害，人也没有进监狱，但是保安警察在他周围设了一道防疫线，把他孤立起来，不让任何人同他接触。陈德草继续住在河内的公寓里，孤身一人生活。他可以到商店去买食品和其他必需品，也可以在城里走一走，但当局不允许任何人同他交往，如果陈德草同某人接近，比如说在街上碰到一个朋友，那个人就会被逮捕并受到审问。从外表上看，这位哲学家好象并没有出什么事。但实际上，他过着象鲁宾逊那样的生活，完全被隔离起来，不能同周围的人交往。当局甚至不准许他的亲戚同他谈话。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在他的生活中需要同

1 让·保尔·萨特（1905—1980年）是法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作家、社会活动家。他是最引人注目的当代西方思想家之一。他的哲学思想是存在主义。

自己的同行交流思想感情。这是一种残酷的折磨。据说，支持我们斗争的萨特曾经多次要求释放陈德草，但他从未得到过任何答复。1974年，联盟成员和陈德草的老朋友范玉兴被批准去见陈德草。范玉兴后来告诉我说：陈德草“象一个生活在月亮上的人”，已经“半疯了”。

我对自己在国家警察监狱里经历过的孤独生活和精神上的打击，仍然记忆犹新。我不愿再一次遭受那样的折磨，不论它的形式如何。对于这一点，我是十分清楚的。

船长周围的人一阵骚乱，打断了我的沉思。我走近一看，船长浑身颤抖，好象得了疟疾。

他绝望地对孙说：“啊，天啊，如果我们被抓住，他们会杀掉我。他们会说是我把人诱拐出来的。而且我还带着一个高级干部，这就是我所做的一切。”

孙努力安慰他说，如果我们不能获得自由，他（孙）和我以及乘客中的所有前官员，将在巡逻艇来到之前，游到岸边去。

他说：“至少你不用担心这件事。”

我接着说：“无论如何，你可以相信，我不会听任那些歹徒捉住我。”

船长渐渐平静下来。他说：“好吧，我们必须要在太阳升起之前想出办法来。”

实际上，离天亮只有几个小时。大家继续在拼命努力，好象有可能把船推动，尽管有的人都快垮了。船看来仍然没有挪动。一个小时之后，连最乐观的人心里也在犯嘀咕，一旦我们被捕，大家不知道会有什么结局。约在早晨1点钟左右，有一个人注意到，船下的水正在上涨。涨潮开始了。顿时，大家振奋起来，船上的男人们又跳到水里，拼尽最后

点力气企图使船移动。船终于摇动起来。最后，当东方地平线上开始显露曙光的时候，船摆脱了搁浅，发动机又隆隆运转起来，人们纷纷爬上船舷和甲板，船开出了沙洲。甲板上爆发出一阵欢呼声：“好哇，我们可以走了！”

然而，我们的兴奋只是短暂的。天已经亮了，我们能够看见第一批几百艘渔船在海湾和海岸水域上作业。在1978年夏天，每一艘这样的渔船都配有一名政府士兵，借以防止水手们投入难民出走的洪流。这样，每一艘小拖网渔船又是巡逻艇。第一批渔船后面将很快跟来其他船只，那时河上的日常交通也就开始了。随之，警察巡逻队也开始了他们的例行抽查。

照这艘旧的内河货船的速度前进，巡逻船能够轻而易举地追上我们。也许我们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警察就会来到我们面前。船长这时机智地决定，最安全的办法还是应该躲起来，等待黑夜再次降临，然后趁天黑我们才能再次行动。但是躲到哪里去呢？唯一的选择只有调转船头，向河的上游走，假装我们是在作一次回程航行。

为了掩盖我们的意图，我们的船慢慢地向内地行驶，沿着我们走过的航道，驶向隆川。在白天的阳光和湿气下，恶臭的底舱越来越闷热。大人们一个紧挨一个有气无力地躺着。为了不让小孩哭叫，大人给他们服了安眠药。小孩在大人怀里时醒时睡，大一点的孩子杂乱地躺在底舱的中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继续向上游行驶，等待着黑夜来临，然后再掉转方向，进行第二次尝试。临近午夜时分，我们再一次回到了河的入海口。在船舱底下，我们一直提心吊胆，生怕再听到昨晚船搁浅时的那种声音。但是这一次，船长驾船顺利地闯过了河口水域，我们只听到了波涛汹涌的海浪

声。

船驶出海岸约半个小时，我们再次碰到恶运。我们听到一个水手在叫喊，“停一停，停一停！”不一会儿，船经过一阵颤动就不动了。这次我们的船径直闯进了渔民在沿海设置的固定的渔网区。这些渔网由缆索连着固定在浅海里的木桩上，一道又一道地设置在浅海地区。这样下网可以提高捕鱼效果。现在我们发现，我们的船钻进了一道渔网之中，进退两难，动弹不得。在经历过前一个晚上的担忧和向河上游回航的倒霉事之后，这回我们似乎不大可能再次绝处逢生。我们知道，时间只剩下四个小时，如果在这段时间内船走不了，那么，第一批载着士兵的拖网渔船就会发现我们。为了摆脱渔网，船长将发动机开足马力向前冲，随后又猛然开倒车往后退。船前后剧烈颠簸起来，将渔网拽紧。后来，碰巧船的螺旋桨击断了渔网的缆索，船才挣脱了渔网。船长小心地驾船向公海驶去。

然而，这时候还很难说我们已经脱离了危险。我们计划下面要走的航程，大体上是向南进入南中国海，然后驶上商业航线。在那里，我们希望能够被一艘货船或油船，或者是美国第七舰队的一艘船只搭救。我们曾听说，美国第七舰队的舰艇在这个地区活动。但是，我们那个半吊子船长再次把船开到了危险水域。在黑夜中航行平安无事，但是当太阳升起后，我们发现前面出现了一个海岛的黑色轮廓；有一个水手认出，这是昆仑岛。这个岛是一个臭名远扬的监禁犯人的岛屿。法国、西贡政府都在这儿关押过犯人，现在的新政府继续在使用岛上的监狱。我们原以为该岛远在我们航线的东侧，哪想到我们正在向它径直驶去。当船转舵准备绕过昆仑岛时，我们提心吊胆地观察着附近水域，唯恐巡逻船队出现，不

可思议的是，海面上一条船也没有看到。我们的船从不到1000米远的地方慢慢绕过小岛，此刻岛上一片寂静，岛上的监狱好象还在沉睡

一场虚惊之后，船再次恢复正常航行。我们希望这回前进的方向不会再出错。乘客们现在可以轮流到甲板上呼吸新鲜空气，看一看一望无边的大海。在阳光照射下，海水显得格外平静。但是长长的轻浪使相当一些人很不适应，那些头一次出海的乘客就更吃不消了。我自己也感到稍微有些恶心，但是我们大难不死，居然连闯数道难关，使我异常兴奋。而且现在我们是在公海上，不再会受到追捕，并且任何时候都可能被人搭救。天气越变越好，我的心情逐渐平静下来，信心又恢复了。

船走了一整天，我们没有碰到过任何船只。直到夜幕降临以后，我在甲板上凝视着夜色时，一个水手发现了正东方出现的一线微光。船长立即转舵，向光点驶去。全船的人都在议论，我们很快就能获救。当人们从底舱爬上来时，大家满怀希望地认为，这可能是一艘美国军舰发出的灯光。卡特总统曾命令美国军舰进入南中国海，尽力搭救乘船逃出来的难民。当我们的船向微弱的灯光破浪前进时，我有充分的时间回想我们遭到的命运的嘲弄。与我一起靠在栏杆旁边的孙医生却默不作声，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前而小小的闪烁灯光。我知道他也在回顾往事。我们两人的脑海中都浮现出一幕幕痛苦的往事。但是，我们彼此没有讲一句话。我们都知道，最好还是应该把这段辛酸往事深深地埋在自己心底。

然而，大多数乘客没有想得这么多。我们的船正向着解放全速前进着，每个人大概都这样认为。三个小时之后，那一线微光变成了一艘亮着灯光的拖网渔船。两条船渐渐靠近

了，这时我们发现那条船的桅杆上挂着一面旗子，在探照灯照射下，大家看清了那是一面红旗。

在我们船上，有人大喊了一声：“士兵！”大家顿时吓呆了，不知所措。我看见孙医生从裤子的口袋中掏出一支手枪，把它丢进海里，以免给他带来麻烦。我也准备向船外跳，想趁众人不注意的时候，能够消失在水里。我竭力想使自己安定下来，准备勇敢地面对这最后几分钟。然后我向着那条拖网渔船看了最后一眼。这条船现在已经直停靠在我们的船舷旁边。我看到一些男人拿着大砍刀和铁锤站在那条船的甲板上，准备跳到我们的船上来。我马上意识到，这些人不是越南士兵而是泰国人。泰国海盗马上就要强行登船。

奇怪的是，我紧张的心情突然松弛下来。我看着20个左右的泰国青年爬上了我们的船。他们手里拿着各种武器，有长刀，短柄小斧和铁锤，但是没有枪。看上去，他们不象凶神恶煞。我断定，这些人是渔民海盗，而不是专对“船民”施虐的职业海盗。每个人都知道，许多贫穷的泰国渔民也抢劫偶尔靠近他们的难民船。碰到这类海盗，难民们会被洗劫一空，但很少发生屠杀和强奸的事件。而职业海盗就全然不同了，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眼前的海盗们跳上甲板以后，挥着手里的家伙，将我们团团围住。然后他们开始搜身，并钻进船舱找值钱的东西。他们抢走了我们随身携带的钱、珠宝首饰和几件他们看中的衬衣。船上的罗盘针和双筒望远镜也成了他们的囊中物。但是他们没有动船上的粮食和淡水。他们在回到自己的拖网渔船并准备开走之前，还向我们指明了海上航道。后来我们把他们叫做我们尊敬的海盗。

此后，我们的船沿着一条单一的航线，慢慢驶入公海上的商业航道。海上最初几天的好天气现在变得雾气濛濛。这

预示着，第二次风暴不久就要来临。好几天过去了，海面上连船的影子也没有。后来到了第六天，我们看见一艘货船在我们前面几英里的海上驶过。不久我们又发现了一些船只，有的离我们还很近。我们推测，我们已经驶进香港至新加坡的繁忙的海上航线。而在这之前，我们看不到一艘船，现在好多船在这里来来往往，除了货船外，还有大型油轮。对每一艘过往船只，我们都向它显示遇难信号，挥舞衬衣，做手势，表示哀求等。我们甚至在甲板上点燃了火。那些船上的水手可以看到信号，有些人挥手回敬我们，但是没有一艘船停下来。

这时我们极其需要找个地方把船停下来。每个人都肮脏不堪，筋疲力尽。我们当中许多人已经病倒，特别是小孩。泰国人给我们留下来的食品和淡水已经越来越少，而且更危险的是，这次季风的间歇期很快就要结束。但是，过往船只仍然只是来来往往，船只驶过泛起的余波，能把我们的小船晃动。后来，在8月31日的晚上，我们发现远处海面上有灯光，灯光固定不动，象是从陆地上面发出来的。

到了第二天早晨，我们到达了发出灯光的地方。那里并不是海岸，而是印度尼西亚的一个石油勘探站。这个勘探站由一艘钻井船和一艘辅助船组成。两船之间有舷梯过道相连，还有好几道起固定作用的缆索。我们大胆地尽量靠近这个勘探站。我们的船长用英语向印度尼西亚站长喊话，请他允许我们上他的船。他用手提式电子扩音器回答说：他可以给我们一些食品、饮用水和燃料，但不准许我们登船。他对我们说，大批难民象潮水般涌进他们的国家，他们的政府已颁布强硬的命令，不再接受更多的难民。

对此，我们的船长开始恳求那个印度尼西亚站长，告诉

他说，妇女和小孩都严重晕船，身体快不行了。他至少应当允许他们到站上去洗一个澡并休息几个小时。我们看得出来，这位印度尼西亚站长显然是一个富于同情心的人，看着我们凄惨可怜的样子，他显然正在考虑船长的恳求。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他同意让妇女和小孩上船。大家帮助妇女和小孩爬上印度尼西亚船的软梯。这时，靠在船栏杆边上的几个西方技术员向我们作出各种古怪和异常的生动的手势。他们反复用自己的食指戳击另一只手的掌心，或者用掌心锤打掌头。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们是美国人和荷兰人。起初，我们发呆地望着他们，不解其意。他们明显地被我们的愚钝所激怒，更加用力地锤打着手掌。最后我们才领悟，他们在告诉我们把自己的船沉掉——在船底凿破几个洞将船沉掉。这样一来，印度尼西亚人就不能见死不救了。我们明白过来之后，船长马上派几个水手下到底舱，带着铁锤和铁撬准备凿破船底。但是那位印度尼西亚站长已经看到了西方技术员和我们的举动。他迅速命令自己的水手来到我们船上，冲到底舱阻止我们沉船，并把我们的年青人拉上甲板。

这位印度尼西亚站长当时是进退两难。如果他强迫我们离开，毫无疑问，我们会马上把船凿沉。但是，他又不肯违抗上面的命令，让我们登船。看得出来，他正在想找一个万全之策，既想使自己的良心不受谴责，又能做到克尽职守。最后，他命令我们在警卫下进入勘探站，同时他通过无线电向上级汇报并请求指示。印度尼西亚站长走了以后，我们的船长要我和孙告诉妇女们，不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要离开这条印度尼西亚船。就是用枪逼我们下船，也要想办法不要回到我们自己的船上去。如果我们能够在勘探站附近把船沉掉，我们就会这样干。总之，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在风暴到

来时，我们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当孙和我悄悄地把船长的嘱咐告诉妇女们时，印度尼西亚站长回来了，他面带笑容。他说，我们是受欢迎的，我们可以呆在这里。我们的逃亡就此结束了。两天之后，一艘新加坡货船把我们载往卡兰岛，那里有联合国建立的难民营。从此，我们开始体味在异国他乡的流亡生活。

后 记

我从卡兰岛的难民营最后流亡到法国，花费了六个月时间。30年前，我在法国产生了我的爱国主义意识并形成了我的政治价值观。那时我是作为一名青年学生到达巴黎的。为了实现父母的愿望，享有我生来就有的权利，创立美好的未来，我来到了此地。正是在法国，我违背父母的意愿，作出了自己的选择。我要追随一个政治明星。

我的决定并非是无二无三的，一批与我同时代的人，知识分子和农民，店员和商人都曾经这样做了。这种决定使他们许多人付出了生命。其他的人作出的牺牲，他们会认为只是程度上稍微轻一点。而那些幸存者才得以有机会来回顾他们的生命历程。我自己的道路似乎是一种循环。我再一次生活在巴黎，又回到开始的地方，不过，一次伟大的革命及其余波补充了我在外国干涉年代的经历。

这次革命，确实使越南摆脱了原殖民主义者的统治。但是发动这次革命并不单单是为了争取民族解放。对这个问题，胡志明是这样说的：“我们不仅必须向殖民主义开战，而且必须向饥饿和无知开战。”我们许多人也相信，我们正在为维护我国人民的尊严而战斗，这不仅是一场民族革命，而且是一场民族民主革命（这是民族解放阵线和临时革命政府的说法）。这场革命将保证组成这个国家的各个民族集团、各种宗教和地区以及个人发表政治与文化的各种意见的自由。

但是，这场民族民主革命却遭到了摧残，被那些倚仗权势、狂妄不可一世的掌握国家命运的人给扼杀了。胡志明的接班人违背了民族和解和独立的原则，他们把越南变成一个自我摧残的国家；外国人照旧在这里享受特权，不过现在是苏联人，而不再是美国人。为了建立一个新国家，越南人付出了重大牺牲。而今，无数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人民胜利却毁于一旦。越南革命领导人的背信弃义，会给他们自己带来精神负担。事实表明，他们僵硬的意识形态和好战的外交政策已把国家引向灾难，我国的命运将被他人左右。

当然，一件事情总会留下自己的影响。西园寺公望王子是19世纪90年代兴起的日本立宪运动的领袖（死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他曾亲眼目睹自己终身为之奋斗的事业毁于一旦，而好战的专制政府横行一时。但是，谁能说，他所从事的长期斗争，没有为战后日本接受民主政府铺平道路？

也许，这些人的斗争成果不会完全付诸东流。他们想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睦邻友好、尊重自己政治和文化多样性的越南、想为越南人民建设一个有活力的经济。他们的这些想法可能会实现。在越南，尽管许多革命者牺牲了，尽管许多人现在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尽管许多人被驱赶到世界各地，但是，谁能说，他们为建立一个新国家而埋下的种子不会开花结果？